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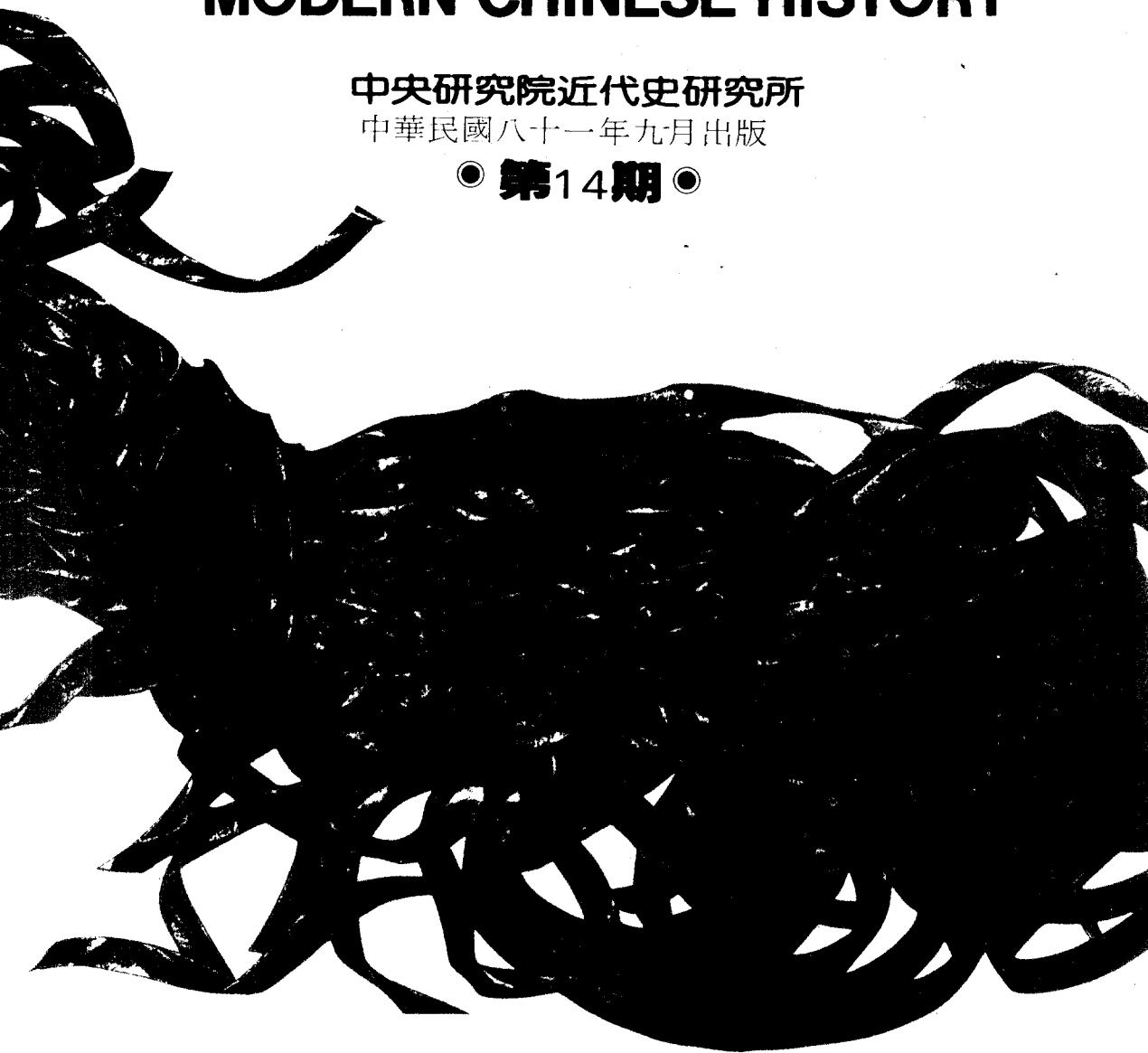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出版

● 第14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本（81）年7月2日假該所檔案館召開第一次會議，由劉廣京院士主持
出席會議人員包括（下排右起）全漢昇、劉廣京、孔復禮（Philip A. Kuhn）、王曾才、王壽南、李國祁、陳三井等七位委員



慶祝本所研究員

張玉法先生當選本院

第十九屆人文組院士

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敬賀
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九日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十四期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出版

| | | | |
|------|---|--------------------|-----|
| 學術會議 |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 | 楊維真 | 1 |
| | 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 許佩賢 | 5 |
| | 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議 | 黃繁光 | 11 |
| |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 | 簡笙簧 | 16 |
| | 柏克萊「文化、宗教與中國經濟發展」會議 | 葉文心 | 22 |
| | 莫斯科「中國民主和人權問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末）」學術座談會 | 葉文基 (Peter Ivanov) | 25 |
| 學術演講 | Russian Historical Tradi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附劉廣京中文節譯) | Robert O. Crummey | 28 |
| | Chinese and Russian Traditions Juxtaposed: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附作者中譯) | Kwang-ching Liu | 47 |
| |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wer Yangzi Education and the Lower Yangzi Educated Elite, 1895-1911 | Barry Keenan | 73 |
| | | | |
| 學人簡介 | 湯志鈞 | 楊志遠 | 76 |
| | 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 陳國棟 | 80 |
| 研究概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 | | 88 |
| |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 | 呂芳上 | 90 |
| |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公開徵稿 | | 92 |
| | 菲律賓華人史料基礎調查與蒐集計畫 | 朱滋源 | 93 |
| | 辛亥灤州起義史料的搜集與整理計畫 | 唐向榮 | 101 |
| | 大陸學界關於南京大屠殺問題的研究 | 孫宅巍 | 103 |
| | 哈佛大學 <i>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i> 學報簡介 | 張力 | 108 |
| 史料介紹 |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兼述高平叔對蔡元培著述的編印 | 陶英惠 | 111 |
| | 胡適佚信六封箋注 | 張挺、江小蕙 | 129 |
| |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五部檔」簡介 | 高純淑 | 133 |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 (十一) | 莊樹華 | 136 |
| | | | |
| 新書評介 | 王中江著：《嚴復與福澤諭吉》 | 王煜 | 140 |
| | 潘英著：《革命與立憲》 | 黃克武 | 144 |
| | 謝國興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 (1860-1937)》 | 翁飛 | 149 |
| | 久保亨著：《中國經濟 100 年のあゆみ》 | 陳慈玉 | 154 |

| | | |
|--|--------------|-----|
| <i>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i> by Charles Hayford..... | 江勇振 | 156 |
| <i>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i> edited by Ramon H. Myers... | 陳巨擘 | 159 |
| <i>The Making of a Sino-Marxist World View: Perce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 by Dorothea A. L. Martin | 劉德美 | 164 |
| <i>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i> by Betty Peh-t'i & <i>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1918-1939</i> by Harriet Sergeant..... | David Fraser | 167 |

| | | | |
|------|-------------------------------------|------|-----|
| 大事紀要 | 一九九〇年八月至一九九二年八月近代中國史 研究大事紀要..... | 游鑑明輯 | 177 |
| 出版消息 | 新書出版消息..... | 游鑑明輯 | 187 |
| 讀者來函 | 墨子刻、馬若孟、魏萼、賴澤涵來函..... | | 198 |

封面設計：黃憲鐘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

| | | | | | |
|------|-----|-----|-----|-----|-----|
| 主任委員 | 陳三井 | | | | |
| 編輯委員 | 陳三井 | 張存武 | 劉鳳翰 | 李恩涵 | 魏秀梅 |
| | 朱宏源 | 張瑞德 | 胡國台 | 張啟雄 | |
| 執行編輯 | 張瑞德 | | | | |
| 助理編輯 | 張秋雯 | 李達嘉 | 游鑑明 | |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十四期

| | |
|--------------|--|
| 編輯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
| 發行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郵撥帳號 1034172-5 |
| 印刷者 | 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
|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出版 | |

定價 新臺幣 250 元 美金 10 元



學術會議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

楊 維 真*

黃興於 1916 年 10 月在上海病逝，迄今已有四分之三個世紀。他對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貢獻與影響，早已為史家所肯定，論者更將其與孫中山並稱中國革命兩大領導人。然而以往學界對於中國革命的探討，因受各種條件的限制，多詳於孫而略於黃，或有討論黃興者，卻又大多集中於探索孫、黃的分合上，有關黃興的研究一直未能真正展開。其間學者亦曾從事一些積極的工作，諸如黃興的全集、紀念集、年譜等相關資料的編纂刊行，為日後黃興研究奠下良好基礎。及至 1961 年美籍華裔學者薛君度教授出版其名著《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尤其是該書於 1980 年譯成中文後，引起學界較大的迴響，黃興研究的形勢有了較大的轉變（尤以大陸學界為然）。近年來在大陸學界的努力下，有關黃興的資料陸續被整理刊布，武漢大學甚至成立「黃興研究室」以推動黃興研究的開展；大陸學界並於 1987 年舉辦海內外第一次黃興研討會，其研究成果亦頗有推陳出新之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鑒於此，同時亦思促進國內黃興研究之風氣，乃聯合由薛君度教授主持的美國黃興基金會等單位，在臺北舉辦「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重新探討辛亥革命及開國初期黃興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應有之歷史地位。

會議於 1992 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假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舉行兩天。應邀出席本次討論會的國內外學者共計七十餘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討論會有三位大陸學者與會，分別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張海鵬教授、研究員尚明軒教授及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所長韋傑廷教授。此外，國外學者包括美國黃興基金會主席薛君度教授及聖約翰大學李又寧教授，日本立教大學戴國輝教授，韓國漢城大學亞洲史學系閔斗基教授，以及香港珠海大學岑練英教授等；國內出席學者六十餘人，俱為研究中國近、現

*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代史之碩彥。大會並提供觀察員十八名，供國內各大學研究生參與。

此次研討會所發表的二十一篇論文中，雖未能完全涵括與黃興相關的所有領域，但卻已觸及了不少面向，除了向為學者所注意有關黃興與孫中山之間的關係外，還擴及到黃興的文學素養、教育思想、家庭生活及交友狀況等層面，其他政治活動亦有述及。謹將各文要旨依序介紹如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蔣永敬教授在〈胡漢民筆下的克強先生〉一文中，藉由胡漢民對黃興此一「革命伙伴」的論述，說明對於像黃興這樣的歷史人物，要做一公允的評價是不容易的。大抵而言，胡漢民對辛亥革命前黃興的表現持肯定的態度，但在民國以後胡對黃即屢有批評，甚且將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歸咎於黃興，認為黃已逐漸喪失革命精神。在作者看來，胡對黃的批評無非是站在「黨的立場上」，且若國家能在安定中求進步，用和平手段競爭於議壇，自不必採取革命暴烈方式，黃興於此倒是有先見之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呂實強教授在〈黃興的勛業與風範〉一文中，盛讚黃興創建民國之勛業及其「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的風範。作者認為過去國人多忽視黃興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地位，事實上黃興不僅是同盟會的中心人物，更是貫穿整個革命運動的一個重心。此外，黃興「無爭」的風範亦值吾人肯定。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雲漢教授撰述〈黃興的晚年〉一文，探討二次革命後至黃興病逝這段期間，黃興的活動與政見。李教授認為黃興晚年確實未能與孫中山在討袁奮鬥中同其步驟；其精神與心胸漸趨於穩健與包容，不復當年革命時代的豪邁風發；而其病況嚴重，無疑是其意志消沉的因素之一。唯孫、黃於國事、黨事上雖有歧見，然在志節及情感上可謂始終如一。美國聖約翰大學李又寧教授在〈徐宗漢與黃興〉一文中，透過對於「革命女傑」徐宗漢繁富的一生之探討，說明徐宗漢及其同時代的人物皆處於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新舊間雜的時代中，其人格特質亦是如此。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章開沅教授（未到會）在〈「孫黃軸心」的歷史演變〉一文中指出，在革命的進行中，孫黃二人是基於志同道合，相互輔助，攜手合作，構成所謂的「孫黃軸心」。作者並認為孫黃「軸心」消失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刺宋案後，孫、黃對於「武力討袁」與「法律討袁」主張的分歧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玉法教授在〈黃興與孫中山之關係〉一文指出，孫黃能維持長期友誼，主要因素在孫中山能看重、信任黃興，而黃興能不與人爭。黃從無意超孫而代之，孫亦不曾有意抑黃。及至 1920 年

代，孫擬用網羅羣眾的方法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始對黃興早年一些行徑（如助宋教仁推動政黨政治）有所批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呂芳上教授在其論文〈二次革命後國民黨孫、黃兩派的政治活動（1913~1917）〉中，詳論中華革命黨及歐事研究會在反袁運動中的活動及其所起的作用，並對二者的諸種限制及其未能取得反袁運動的主導位置作了深入的說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聿均教授撰述〈黃克強的文學作品和革命思想〉專文，探討黃興的文學作品與其革命思想的關係。作者從黃興的文學作品探索黃氏個人內心世界，認為文學是最能顯現黃興「本色」的地方，他的革命思想、情感悲喜皆因詩文而顯。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所長韋傑廷教授在〈黃興民族主義思想論略〉一文中指出，黃興的民族主義思想與孫中山基本上是一致的，較獨特的是，黃興將反帝反列強、救亡圖存放在首位，反滿排滿與之相較，只是放在第二位。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史研究所副所長岑練英教授在其論文〈黃克強先生之教育政策及其與時代之關係〉中，就黃興對教育的思想、主張做一歸納整理，從中尋出其與時代之關係。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胡春惠教授在〈論辛亥後臨時政府時期黃興的作為與不作爲〉一文中指出，黃興在其個人價值觀的影響下，嚴守讀書人的本色，故而在臨時政府時期能秉持此一理念，有所爲，有所不爲，其淡泊名利的胸襟是值得後人肯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張海鵬教授以〈論黃興對武昌首義的態度〉一文，論述黃興於武昌首義後，由於對武昌起事的認識不足，以致延緩了到達湖北的時間，終致錯失時機，湖北革命的領導權遂拱手讓人。作者認為這是黃興等同盟會領導人在決策方面的失誤。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姜義華教授（未到會）則發表專文〈民初政黨政治與黃興民主政治思想的發展〉，就黃興對政黨政治的理念來探討黃興的民主政治思想。韓國漢城大學閔斗基教授在其論文“The Controversy over Centralism and Provincialism in the Infant Republic and T’ungmenghui-Kuomintang Leaders.”中分析同盟會——國民黨系人物與由立憲派發展而來的政治人物對於政體的不同看法。大抵而言，立憲派發展而來的政治人物主張中央集權，同盟會——國民黨系人物則傾向於地方自治。天津南開大學李喜所教授（未到會）在〈黃興在「二次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以往論者對於黃興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現頗有微詞，事實上其偏頗之處甚多。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很多，黃興所須負的責任有限。黃興在二次革命中始終處於無法自拔的矛盾，這種矛盾主要在於想反袁，但本身實力不够。湖

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林增平教授（未到會）撰述〈孫黃交誼與辛亥革命〉專文，歷歷敘述孫黃結交之經過及辛亥革命之過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鳳翰教授在其論文〈黃興與陸參兩部〉中，詳細論列臨時政府時期黃興兼長陸軍、參謀兩部之情形，資料極為豐富，引證詳確，尤其對於陸、參兩部編制及其所轄軍隊番號、軍官姓名的查考上用力甚多，極有參考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尙明軒教授在〈黃興與國民黨〉一文中指出，黃興在國民黨創建階段有傑出的獨特貢獻，其與孫中山並稱革命兩大領導人絕非偶然。孫黃之間的矛盾只是國民黨內不同政見的分歧，且分裂只是短暫的，並未分道揚鑣。黃興是時刻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並始終擁護革命黨的團結和領袖的威信。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鵬仁教授在其專文〈黃興與宮崎滔天〉中，論述黃興與宮崎結識、交往之過程，以見黃興與日本友人情誼之深厚。日本立教大學戴國輝教授在〈自黃克強、一歐在日生活一瞥談起〉一文中，強調中國革命的國際性質，因之利用外國資料來補強中國革命之研究，實屬刻不容緩。日本追手門學院大學文學部伊原澤周教授在〈論黃興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以青少年的生活及教育環境為中心〉一文中指出，黃興自兩湖書院求學時，革命思想即已萌芽，而赴日留學對其革命思想的完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黃興的革命理論雖不及孫中山，但在民族意識及革命行動上卻決不亞於孫。然則從革命思想、理論及國家的領導來說，黃興是要讓孫中山一步。

以上對二十一篇論文所做的簡略介紹，雖未能盡其旨意，但從其中亦可略窺各文要旨所在。論文宣讀、討論結束後，隨即由薛君度教授發表閉幕講詞：「《黃興與中國革命》出版三十年」，略論三十年來黃興研究之狀況及其未來可供繼續探索之方向。隨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胡春惠教授亦發表閉幕謝詞，至此本次討論會乃順利完成。

此次討論會經過兩天熱烈的討論，基本上肯定黃興在辛亥革命及建國初期的歷史地位；對於一些爭論性的問題，諸如孫黃交誼、二次革命後黃之態度、國民黨內部派系政治活動等問題，與會學者也提供了寶貴的意見。然而就本次會議的主題「黃興與近代中國」而言，誠如主辦者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胡春惠所長所云，在兩天緊湊的議程中，大多數的論文及討論的焦點都集中在黃興身上——尤其是探討孫黃關係時，而較少觸及到黃興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此一論題。今後應如何開拓黃興研究，探索黃興與近代中國的關係，使其更具有新意，將是學界共同努力的目標。

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許佩賢*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在學校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贊助之下，於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假理學院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與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聯合舉辦「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在臺大歷史系張秀蓉主任及鄭欽仁、李永熾、黃富三諸位教授的籌畫下成形，並在黃富三教授、吳密察教授的策畫執行以及系中各位老師及同學的協助下籌辦成功。會議以臺灣史當中研究成果比較缺乏的日據時代為主題。據主辦單位表示，選擇日據時期臺灣史為此次會議主題，一方面固然意在藉此推動日據時代史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臺大為少數具有豐富日據時期史料收藏之研究機關，在這方面較有基礎。

為時兩天半的會議，分為八場討論會，共發表十八篇論文。其中有三篇為日本學者所提出，三篇來自美加，其餘十二篇為本地學者的研究成果。研究內容涵蓋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文學藝術及都市計畫各項不同領域。不同地區、不同背景的研究者，由於其立場、關懷層面、所受訓練的不同，從不同的角度、視點探討問題。茲將各篇論文之簡要內容整理如下：

1. 吳密察（臺大歷史系副教授）：「臺灣殖民地統治政策與外國顧問 W. Kirkwood」：

日本領臺之初，英籍顧問 Kirkwood 提出的取範英國君王直隸殖民地之構想，在明治政府規畫臺灣殖民統治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898年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赴臺履任前夕，Kirkwood 又在內閣會議中提出體系完整的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臺灣統治設計，成爲兒玉、後藤施政的最重要參考。其後，在大隈重信內閣時期，由於 Kirkwood 堅持暫緩在臺施用新條約，臺灣統治仍然採取殖民地主義，而使內地延長主義的統治政策要到原敬內閣時代（1919）才出現。

2.吳文星（臺灣師大歷史系教授）：「新渡戶稻造與日本治臺之宣傳」：

日本政府自領臺後即十分留意治臺宣傳，日本學者在對外的治臺宣傳中也居重要角色。新渡戶稻造正是兼具參與臺灣經營和宣傳治臺成果雙重角色的學者之一，他一方面是臺灣近代糖業的奠基者，一方面也是向西方人宣傳日本治臺成果的要角；而後者常爲世人所忽略。本文乃在探討新渡戶關於「克服殖民統治障礙」與「臺灣經驗」之宣傳。

3.若林正丈（日本東京大學副教授）：「一九二三年東宮臺灣行啟與『內地延長主義』」：

1923年當時的日本東宮皇太子裕仁行啟臺灣。本文假定天皇制人格象徵的行幸啟具有秩序、教化及統合三種機能，以此解讀東宮臺灣行啟劇。指出此次天皇行事是殖民當局要使臺灣諸族成爲「忠良臣民」的戰略性儀式，具有「通過儀禮」的意義。然而，由於此政治行事首先必須以殖民地的大和族爲對象及執行者，故須演出「征服儀禮」與「服屬儀禮」的融合；因而在作爲「通過儀禮」的意義上，它無視於政治文化中的彼我差異，而將臺灣諸族包攝進來。因此這個大和族人格象徵（東宮）之巡遊的政治行事是建立在自我欺騙上的。

4.黃富三（臺大歷史系教授）：「日本領臺與霧峰林家之肆應——以林朝棟爲中心」：

本文以清季臺人官職最高的霧峰林家爲例，探討其對日本領臺的因應策略及其演變過程，並略論其得失。1895年清廷割臺，林朝棟一方面率重要族人內渡，另求發展；然其內渡後生意失敗，又不願歸故土爲殖民地順民，終悒鬱而卒，下厝林家也因此衰落。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族人在臺承管家產，他們在政治上屈從日人統治，在經濟上與日人合作，但內心卻不滿與痛苦，而採避世策略。作者並指出，林家對新統治者的因應方式並不是孤立的，其他士紳家族也有類似模式。

5.H. J. Lamley（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教授）：「一九〇〇年的揚文會：日據初期臺灣精英演變的一段插曲」：

本文首先論述1895年在保良局之下代表臺灣順民的特設團體。其次描述日本統治者如何經由紳章頒布程序進行籠絡政策。1900年第四代總督兒玉源

太郎在臺北舉行一次為期甚長的揚文會來吸引舊士紳。總督府當局曾企圖將其轉變為永久性的組織，但未成功。兒玉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顯然是要進一步利用這個引人注目的團體作為文化的媒介，以幫助他們在臺灣實現首開文化移植的想法。本文的後半部就是在處理兒玉如何努力爭取可靠而有效率的精英力量。因為，本地精英的順服和效命對於加強殖民地的警察力量和官僚體制的步上軌道，是不可或缺的。

6.周婉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講師）：「皇民化運動時期改姓名運動初探」：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前後，日本政府在臺灣厲行「皇民化運動」，該運動以「國語運動」、「改姓名」及「徵召志願兵」為三大內容。本文以改姓名運動為研究對象，析論運動初期臺人的反應、改姓名人數、參與者背景、改姓名常見之模式、同姓宗親會的介入、運動末期規定的放寬，並略及原住民改姓名的情況。作者認為，日本政府在臺所推行的改姓名運動，係利誘多於脅迫；而臺灣人的反應相當複雜，改名與否，實難確切反應臺灣人內心的真正態度。

7.近藤正己（日本近畿大學講師）：「創氏改名研究的檢討與改姓名」：
1940年臺灣、朝鮮兩總督府同時公布將被統治民族之「姓名」改為日本式姓名之政策。此一政策在臺灣稱為「改姓名」，朝鮮則曰「創氏改名」。本文從檢討「創氏改名」的研究成果及問題點來探討改姓名運動之實態。作者指出由於日鮮家族制度的不同，朝鮮之「創氏改名」有著複雜的法律構造；而臺灣由於「姓」與民法的「氏」意義相同，故「改姓名」可說只是姓名的變更，二者在本質上並非異質。此與一般朝鮮史的研究者的結論是不同的。

8.Douglas Fix（美國禮德學院講師）：「進出中央文壇：新文學運動，1930~1937」：

本研究以各作家的回憶錄、三〇年代的文學批評以及指導新文學作品的述為主要材料，來敘述一九三〇年代民族文藝運動的發展，並檢討此運動存在之社會政治環境，進而分析其主要論戰，最後設法為民族主義文化運動的本質做一評估。作者以楊達的行為為例說明。楊達辦的雜誌在1937年因無法繼續，遂將之帶至東京，期能寄生於中央左派文壇。於是原來的鄉土文學，變成中央文學的一部分，但由於1937年的戰爭，加上個人的健康、窮困等因素，其進出中央文壇註定是要失敗的。

9.柯志明（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殖民經濟發展與階級支配結構

——日據臺灣米糖相剋體制的危機與重構（1925～1942）」：

本文探討1925年以後米部門的發展背後的結構因素、其如何加深米糖間的矛盾，及其如何引發以日本糖資本為中心的殖民剩餘榨取機制的危機。研究結果發現，米糖兩部門的階級支配結構有明顯的差異存在。1925年以後米作收益迅速提升，使米糖相剋的性質明顯化及尖銳化；而建議的解決方式是以政治力量取代市場力量，因此不可避免的便牽涉到階級間的衝突及力量消長，以及階級結構的重構。由於戰爭，殖民政府在絕對的權力之下於1939年完全壟斷出口米市場，貫徹了原先的計畫。在社會階級結構重塑的過程中總督府最重要的目的——解決殖民積累危機——也一併獲得解決。

10.陳慈玉（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日據時期臺灣煤礦業的發展」：

臺灣煤礦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進入黃金時代（1916～1927）。然而當時臺灣本島工業尚未發展，因此渡過短暫的自給自足時期後，便發生生產過剩現象，於是如何開拓海外市場便成為煤礦業者的重要課題。1928～35年受到國際經濟和政治情勢的影響，使臺灣煤業發展停滯。再者，臺灣的大煤礦公司多由三井、三菱等日本大財閥所投資，其經營重心並不在臺灣。因此臺灣本土煤礦業發展的侷限性，除了業者無力獨自拓展海外市場、島內工業化遲緩的原因之外，也因出口受制於財閥的多地區多產結構。

11.駒込武（日本御茶之水大學講師）：「抗日運動的教育要求和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以一九二〇～三〇年代臺中州草屯庄的事例為中心」：

本研究以教育為焦點，試圖解明民眾的教育要求與總督府教育政策的拮抗關係。具體上，則以『臺灣民報』的記事，追跡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在臺中州草屯庄從事抗日運動的洪元煌之活動。洪元煌的抗日活動在總督府的嚴厲彈壓下，在三〇年代前半逐漸淡化其政治運動的性格，而加強其教育運動的性格，甚至與總督府的「御用紳士」洪火煉採取共同步調。不過，洪元煌仍有意使「公學校」轉換成民眾所要求的教育。最後以有關產業組合抗爭的敗北為契機，洪元煌也被「皇民化政策」的浪潮吞沒了。

12.林瑞明（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

1941年底以後的臺灣文壇，隨著對英美宣戰的決戰體制之成立，亦加強了國策性的色彩。本文即由張文環於1943年「臺灣決戰文學會議」中：「臺灣沒有非皇民文學」的發言；及葉石濤於1980年代：「沒有皇民文學，全是抗議文學」兩種迥異的看法出發，比較陳火泉及王昶雄來解析當時的「皇民

文學」問題。作者認為王昶雄「奔流」一文，以發表刊物的選擇、小說角色的塑造及發表後的文壇反應而言，雖不足以稱為「抵抗文學」，卻絕非「皇民文學」；反之，陳火泉的「道」則為「皇民文學」，吾人雖可寄予時代的同情，但作家自身仍有無可推諉的責任。

13.梁華璜（成大歷史系教授）：「日據時代臺灣籍民在閩省的活動及處境」：

本文從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中之旭瀛書院及全閩新日報的辦理，考察臺灣籍民的協力狀況，並探究臺灣籍民在中日戰爭前後的處境及臺灣籍民的認同危機發生的背景。最後提及臺灣籍民的陰影在戰後的海峽兩岸產生的影響。顯示，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利用臺灣籍民與原屬同一民族之中國人互相仇視，製造民族分裂。部分臺灣籍民因一己私利甘為日本帝國主義鷹犬，而國民政府抱「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個」之報復政策，更擴大了中國人與臺灣籍民之間的矛盾，並產生了認同危機。

14.許雪姬（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日據時期的中華民國臺北總領事館」：

中華民國臺北總領事館建立於 1931 年 4 月 6 日，其成立是在臺華僑自 1925 年透過不同管道，一再向北方政府、國民政府呈請設領而來。在臺華僑努力於設領運動，其背後目的是要解決日益惡化的華僑子弟教育問題及想解除一切加諸華僑的不公平待遇。然而總領事館由於領事人選失當，辦公經費拮据，華僑派系紛擾不斷等因素，從開館到 1937 年閉館，幾乎沒有什麼作為，其業務多依賴中華總會館的協助。

15.顏娟英（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美術與文學運動」：

本文檢討三〇年代美術與文學發展的過程，側重 1934 至 36 年的臺灣文藝聯盟活動，主要在進一步瞭解現代美術的興起與文化啟蒙、文學運動之間的關係。二〇年代以文化協會為首的文化主導者，對美術並不重視，他們反對臺灣美術展覽會，排斥畫展作品「為藝術而藝術」的作風；到了三〇年代，以文學創作為主導的文化人士在態度上卻有了改變，開始接納美術界的成果，主動與美術界配合活動。新的開放風氣和合作關係，對藝文界水準的提高，以及文化品質的提昇都貢獻良多，頗具意義。

16.游鑑明（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助理）：「日據時期的臺籍女教師——以公學校為例」：

根據本文研究，臺灣總督府對女教師的培養始終抱持漠視的態度，且其任用資格及待遇均十分低落，並呈現明顯的兩性差別。此外女教師的分布不僅未廣泛普及，且異動頻繁。當然也有矢志教書的女教師堅守崗位，並從各種教學活動中，負起初等教育與女子教育的重任，甚至以個人的學養、才能影響家庭與社會。日據時期的臺籍女教師在戰後更得以充分發揮，她們或繼續服務教育界、或投身政壇、或從事社會服務，均有傑出表現。

17.溫振華（師大歷史系副教授）：「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鄉村社會的變遷——以東勢地區為例」：

本文依據陳紹馨教授臺灣社會發展歷程的觀點，以東勢地區為例，從行政制度與社會組織的推展與建立的過程，觀察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鄉村社會的變遷。清代後期的地方社會組織，是自主性的，以血緣關係與地緣關係整合。殖民政府的統治，一方面透過嚴密的行政系統控制社會的底層，一方面透過各種官方監督下的各種組合，形成超血緣、小地緣關係的團體，把地方的水利、金融各種資源納於其控制下。因此，街庄役場、警察官吏派出所、公學校成爲改造、控制臺灣社會三大象徵。

18.黃世孟（臺大建築與城鄉所教授）：「新高港都市計畫與臺中港特定區計畫規畫範型之比較分析」：

本文以「臺中港」（日據時期稱「新高港」）爲例，從「規畫理念及程序」及「計畫內容及發展模式」兩個向度，分析因不同規畫理念所規畫完成的都市計畫。研究指出：新高港及臺中港都市計畫均明確界定爲「工業都市」。從都市規畫範型源流之分析比較中，可知新高港的規畫是取範當時日本本土的產業都市；而一九六〇年代在聯合國規畫顧問指導及影響下，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全盤否定一九四〇年代新高港都市計畫案，而採用了土地使用「住商分離」、交通規畫「人車分離」、田園都市的「鄰里單元」的一九五〇年代流行於西方的都市規畫理論。

據稱，會議議程之安排，原則上將同性質之論文安排於同一場次，並依該歷史事件發生之先後安排前後場次，以方便討論。然由於種種因素，例如報告主題之臨時更動、報告評論人之不克於某些場次出席，致使在議程的安排上不能盡如原理想，是較遺憾之處。

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議

黃 繁 光*

由淡江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議」，如期在本（81）年6月26、27兩日，假該校校本部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本次研討會的目的，在探討中外歷史之間的發展關係，特別以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所產生的交互影響，為討論重點。會議在淡大校長趙榮耀博士主持開幕式後，隨即展開二天九場的研討，共有一百多名中外學者專家與會討論。除本國學者之外，尚有遠自法國、日本、韓國，以及香港、大陸等地區的學人參加。

會中總共發表23篇論文。其中研討內容與近代中國有關者，計有18篇，茲將其作者、篇名與論文要旨，簡介如下：

1. 水野明：〈張作霖與日本之間的「滿蒙懸案交涉」〉

張作霖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實屬錯綜複雜。在1927年「東方會議」後，日本政府田中義一內閣，先後派遣多名官員，運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向張作霖展開了索取「滿蒙特殊權益」的交涉。本文即在探討張作霖為限制日本人、朝鮮人在東三省的侵略活動，所發布的有關政令、法令、訓令，諸如嚴禁日人商租中國土地、禁止日人租借家屋營商、取締不法朝鮮人移住等等。正因張作霖有如此嚴厲的限制，終使日本人無隙可乘，也使「二十一條」內容中有關「南滿洲及東內蒙古」的部分，形同廢紙，埋下了日人對張作霖的恨惡。

2. 光島督：〈川藏邊界的糾紛與英國的調停（1914~1918）〉

作者近來從事清末民初時期有關西藏問題變遷之調查研究工作，故得以詳細查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典藏之欽命外務部庶務司清檔專檔（1904~1912），以及中華民國國務院檔、外交部檔案內之西藏專檔、西藏

* 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議約檔案之第一冊至三十九冊（1911～1919年底），並根據上述檔案資料，探討中國北京政府、川滇駐邊軍隊、拉薩地方政府及英國駐華使節等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即是此次考察的部分結果。

3. 胡春惠：〈萬寶山事件所引起的中日韓糾紛與交涉〉

「萬寶山事件」之發生，乃因韓國移民東北問題未獲妥善解決所致。本文析論問題發生之背景、事件中之韓僑角色、韓境內之排華行動，及問題發生後之中日交涉。文中並指出日本於交涉之初，便藉口1909年「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之簽訂，乃表示中國已承認韓僑之墾居土地所有權為由，欲進一步與1915年中日有關南滿、東蒙之居留地權混為一談。亦即日本欲對中國在外交上，先行佔壘，這種作法是「萬寶山事件」之交涉，中日雙方不能達成協議的癥結所在，也是韓國本土發生排華暴動的底蘊。

4. 孫若怡：〈清初中法文經關係——康雍乾三朝〉

本文主要內容分為三部分，即：(一)早期中法關係發展的背景；(二)中法雙方互動的交點——教務與商務；(三)中法雙方之相互影響，特別著重譯介著作、天文地理、政治外交、藝術、思想等方面的交流和影響。本文歸結出，早期中法關係的開展，始於傳教事業的使命感與商業利益的追求，其後透過許多學藝俱佳的耶穌會士之真誠與努力，促成了中西歷史上成績斐然的文化交流經驗。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法國政府有計畫的遴選、訓練與派遣使華人員，暨耶穌會士肯深入古典中國文化精神所產生的貢獻，不啻為日後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式。

5. 莊吉發：〈從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看《得勝圖銅版畫》的繪製〉

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之中，最具意義者，應屬平定準噶爾及回部叛亂的戰事（1755～59）。經過這兩次戰爭，大清掃平了天山南北二路，並將其地收歸版圖，這對國家民族的擴大與鞏固，貢獻至鉅。本文在探討清廷用兵西陲得勝後，高宗下令供職內廷的西洋畫家郎世寧等多人，描繪戰圖稿樣十六幅，送往法國，採用銅版畫的方式來鑄刻和印刷，前後歷時十年之久，才全部完工運回北京。全部《得勝圖銅版畫》之製作，不但融合了東西繪畫的風格，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下的產物，而且對盛清宮廷繪畫，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故實深具時代意義。

6. 野口鐵郎：〈媽祖信仰之傳播日本與琉球及其現狀〉

近世以降，中國與海外交通之際，伴隨著中國人航海而成為其航海安全之守護神者，乃為天妃媽祖。本文在考察媽祖信仰傳播至日本本土（南自鹿

兒島縣，北至青森縣），與琉球中山國之背景和過程，以及其後續發展之差異，乃至目前信仰現況等問題，加以比較研究。

7. 陳三井：〈中法斷交前的一段外交秘辛——法國代表團的艱困訪華行〉

1964年1月27日，法國戴高樂政府宣佈與中共建交。法國在建交前，戴高樂曾於同年1月19日，派遣私人代表貝志高（Zinovi Pechkoff）與紀業馬（Jacques Guillermaz）兩人來臺北，晉見先總統蔣中正，面遞戴高樂親筆函。貝志高等一行來華任務的真象為何？本文作者考察紀業馬的回憶錄《一生為中國》，訪問當時外交部長沈昌煥及駐法公使代辦兼翻譯陳雄飛，並參考各項有關資料，針對這一段外交秘辛，作一較為深入完整的研究，以期獲得歷史的原貌。

8. 陳捷先：〈三田渡「大清皇帝功德碑」樹立小考——兼論清初中韓關係〉

滿洲人興起於東北之初，與朝鮮的關係，一度極不和諧，甚至以兵戎相見來解決雙方的爭端。清太宗繼位後，即曾兩次用兵朝鮮，一為「丁卯之役」（1627），一為「丙子之役」（1636）。朝鮮不敵，終於締結城下之盟，清韓的封貢關係，也由此建立。本文在考訂清太宗崇德元年「丙子之役」後，朝鮮政府為感念清大汗皇太極的「功德」，特在漢江南岸三田渡地方，樹立紀念碑的一段經過，以及巨碑上兼書滿蒙漢三種文字的史料價值，兼論及清初中韓關係發展上的若干問題。

9. 張存武：〈第一次韓美戰爭及中國的反應〉

許多外國學者以為中國與其屬國的關係，僅限於禮儀及貿易方面，並無實質的軍政外交意義。事實上，中法的「甲申之役」、中日的「甲午之役」，都是中國為衛護其對越南、朝鮮的宗主權而戰的。況且在此之前，1866年法國侵韓、1871年美國侵韓時，中國雖因新敗於英法聯軍之役，無力軍援朝鮮，但清廷仍明勸法美戡兵，並暗示朝鮮機宜，而韓方也隨時奏報軍情，請求指示或令侵略者退兵。本文乃就韓美交兵，考其成因，述其經過，以彰顯清廷的反應，也就是表明中韓宗藩關係中的軍政意義。

10. 黃元九：〈壬辰倭禍與東北亞世界的大變局〉

本文在闡釋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半島的「七年戰爭」（即「壬辰倭禍」，1592.4~1598.11），對東北亞韓國、中國、日本、琉球等國，在政治、社會、經濟上的巨大影響，尤其是對封建構造所產生的衝擊。今（1992）年，適逢「壬辰倭禍」400周年的日子，值得重新審視此一重大的歷史事件。

11. 黃啟臣：〈清代前中期的對外貿易〉

清代前中期對外貿易是不是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呢？本文析論清朝前中期的196年期間，除了當中有38年實行海禁或部分海禁之外，其餘158年間的對外貿易，乃是實施「開海貿易、設關嚴格管理對外貿易的政策」。正因如此，清代前中期的對外貿易，無論就貿易港口、貿易國家、商船數量、商品種類與流通質量等方面的擴大或增加，都明顯出現持續發展和成長。本文指出清代此期對外貿易的四大特點為：(一)英美等西方國家成爲主要貿易對象；(二)進出口商品的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三)建立近代式海關嚴格管理對外貿易；(四)廣東對外貿易代表了中國的對外貿易。

12. 趙令揚：〈論鄭和下西洋之原因〉

鄭和下西洋之原因，過去九十年來眾說紛紜。然而鄭和七次率領艦隊訪問西洋，他每次出海應有各自不同之目的。如指第一次而言，其目的應爲尋求海上結盟，牽制帖木兒勢力之擴張，以期減少對明的威脅。本文即在分析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遣燕王、寧王守邊的動機，並敘述明初對帖木兒認識的程度，和帖木兒軍事力量何以會引起朱元璋的重視，以及「靖難之變」後，朱棣仍長期親自駐守北邊的事實。由此可見太祖、成祖對邊事之重視，也可知二帝對帖木兒勢力的防備，應爲當時重要的使命。

13. 鄧元忠：〈1853年間美國對太平天國的期望〉

1853年尚屬中美關係的初期，雙方來往的管道十分閉塞，相互之間的認識也甚淺薄。但因當時在華的美國人，眼見太平天國在軍事上的成功，又認爲太平天國崇奉著基督信仰，因此，許多美國人都對太平天國表示十分友善。本文即在探討太平天國運動的發展，到了1853年期間的情勢，促使美國傳教士對太平天國充滿新希望，點燃了美國商人、官員對華的熱烈期望，也引起美國亟盼調整中美關係的企望。因而美國對太平天國的期望，也轉變成美國人在中國積極尋求擴展機會的意向。

14. 鄭樑生：〈明代中日兩國外交管窺〉

明代中日兩國의 正式邦交，始自惠帝建文三年（1401），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遣使上書大明皇帝。本文析論日本之所以派遣貢使到中國，固由於對中國有經濟上的倚賴，但明朝也需要日本當局取締倭寇，以及當時東亞國際情勢的發展等因素，都是促使日本成爲中華世界帝國一員的重要契機。永樂年間之中日兩國關係，乃宗主與附庸的關係，此時日本的事大思想相當濃厚。惟至宣德以後，日本的來貢，則一味追求貿易之利，這個時期來華的日

本貢舶，由於日本國情的變化，實無法代表日本當局，而淪為權門與豪商的獨佔事業。因此，明朝既無法透過朝貢貿易制度，來要求日本禁戢倭寇，也無法透過日本國王——幕府將軍，將日本約束在華夷體制的秩序之中，故自嘉靖中期以後，明廷對於日本的來華朝貢，便已日趨消極。

15.澹台惠敏：〈近代國際法之傳入中國及其深遠影響〉

許多學者認為國際法之傳入中國，始自1864年美傳教士丁韋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翻譯出版美籍學者所著《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一書。實則早在1847年之前，林則徐即已主持翻譯瑞士學者所著《萬國法》(*The Law of Nations*) 一書的部分章節內容。本文旨在考察近代國際法最早傳入中國的經過，比較林譯國際法與丁譯國際法之異同，並分析林譯本對近代中國以及海外地區的影響，歸結出林則徐將近代國際法引入中國，對於近代中外關係的發展，實具有深刻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16.簡筌簧：〈抗戰前日本對內蒙古的侵略與百靈廟戰役——民國 22 年至 25 年〉

民國17年(1928)全國統一後，國民政府將內蒙地區改建為行省，內蒙各盟旗有所不安，起而爭取自治，此一行動，正好被日本的分割滿蒙計畫所利用。本文在探討日本以軟硬兼施的手段，步步逼迫國民政府退出內蒙，極力拉攏蒙人，組成「內蒙軍政府」，其目的在牽引內蒙繼「滿洲國」後，成為日本傀儡政權。日本的此一野心，終致導發了「百靈廟戰役」，國軍擊潰了內蒙偽軍，不但首度有效制止日本的對華侵略行動，也點燃了中國蓄勢待發的抗日民氣。

17.Michel Cartier：〈十七至十八世紀早期的中法經濟關係〉

18.Sylvie Pasquet：〈十九世紀緬甸對中國朝貢的一些特殊問題〉

本次會議除由淡江大學鄭樑生教授帶領歷史系同仁，負責全程會務外，並獲得日本筑波大學歷史暨人類學系、愛知學院大學文學研究科等學術機構協力合辦。會議之進行，十分暢順，與會專家學者咸認為會中所發表的論文，大多具有堅實的證據和客觀的結論，研究成果相當豐碩，頗能產生學術交流的功用。惟有四位大陸學者，因其出境手續趕辦不及，未能親自到會參與，只得臨時改託他人代為宣讀論文，至為可惜。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

簡 笙 簧*

國史館主辦，以討論中華民國重大個案史事為宗旨的「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於本（八十一）年八月六日至八日，在臺北市金華街政治大學公企中心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三天，共有學者專家一六五人與會。

大會於八月六日早上九點半，在國史館館長瞿韶華主持下舉行開幕典禮。瞿館長在致詞中表示：修纂「中華民國史」是歷代國史的延續，是國史館最重要的職責。但要修好「中華民國史」卻不容易，既要「方以智」的記注，又要有「圓而神」的撰述，如果引用清代學者章學誠的話，則既要能使「往事不忘」，又要能使「來者興起」，這才是真正的「中華民國史」。有關編修此次大會主題「中華民國史專題」工作，瞿館長亦表示，自七十四年起，國史館擬定了「編撰中華民國史計畫綱要」，除承傳歷代史法，有政紀、志書、傳記、圖表等體裁外，另有專題一項，為應用新史學方法的「紀事本末體」，而這次討論會的目的，即藉由各位學者專家慎選的題目，就革命建國以來重要史事撰成的論文，經過宣讀、講評及討論後，為修纂「中華民國史」的重要參考。由於這是第一次舉辦，所以不設主題。

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以大會貴賓身份致詞時，對於編撰「中華民國史」的方向表示：「史」的解釋「右手持中」也好，「持筆」、「持鑽」也好，「持簡冊」、「持盛算之器」也好，指的都是忠實而客觀的記錄，而這些都是修纂「中華民國史」的基本義例。修纂「中華民國史」是要靠全體史學家努力，沒有黨派成見，不分種族、地域、男女、老少，凡正確記述我全民堅苦卓絕、開國建國、致力現代化的史事、史實，都應該在采擇編撰之列。蔣秘書長最後祝大會圓滿成功，國史館修史有成。

討論會的主要活動，是論文的宣讀與討論，大會共安排十場二十八篇論

* 國史館史料處處長

文的宣讀與評論，由於與會人員包括國內各研究機構及大學共四十一個單位的專家學者，對於同一問題，有不同意見與觀點，是一種正常現象，因而每場均有非常熱烈的討論，在此即不再贅述。現將二十八篇論文主講人、題目及論文重要內容略述如下：

1. 郭鳳明：「楊毓麟的革命觀」

湘人楊毓麟於清末參加推翻滿清政府活動，其革命策略有：(一)建立民族國家，以漢族為主，再融和他族；(二)革命應由知識份子的中等社會來主導，並由他們來革新上等社會，提携下等社會；(三)革命必經暴動、破壞，然而破壞必須具一定的目的；(四)為了避免湘人成為列強及清廷的奴隸，湖南必須獨立，進而促成他省獨立，中國即可以建國。楊毓麟革命策略，其後成為華興會的重要革命策略，其主張激烈革命手段，也為革命派所採行。

2. 陳孟堅：「民報與清末革命」

清末，保皇黨與革命派在海外爭奪華人社會的資源，最初革命派居於劣勢，及至一九〇五年八月革命黨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創刊了《民報》，提出三民主義和五權分立的建國理想，切合嗚呼望治的華僑心理後，不但擊敗保皇黨，更進而激起海內外澎湃的革命風潮，終於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建立中華民國。

3. 蕭良章：「論洪憲帝制運動發生之原因」

本篇主要在揭發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是有詳細計畫，而非臨時起意，且老謀深算的袁世凱在發表帝位的矯令中，注入些模稜兩可文字，以預留帝制不成，回任大總統職位的退路，最後仍不容於國人，遽然暴斃。

4. 呂實強：「胡適的教育思想」

胡適教育思想的基源來自杜威的實驗主義和教育哲學、易卜生的個人主義及有關中國的傳統思想。胡適教育思想重點有四：(一)教育為立國的根本，但教育的基礎在個人；(二)教育應保持其獨立與自由；(三)擬訂學制，發揮教育功能；(四)特重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

5. 陳哲三：「中華民國大學院與大學區制之研究」

民國十六年至十八年間，蔡元培等人推行大學院與大學區制，其目的在於戰亂之中，爭取教育獨立，使教育正常發展。然由於與訓政精神不合，經費籌措困難，兼以學界派系傾軋，在短短兩年即告結束。

6. 陳重光：「廣西國民基礎教育運動及其成效」

民國二十二年廣西省提倡國民基礎教育，以實現廣西省自衛、自給、自

治的「三自政策」，其實施六年的成果包括：學校與學生數的激增；掃除文盲全國之冠；師資培訓全盤規劃；教育經費大幅增加。其最顯著功效，即抗戰興起，廣西省即能迅速動員，投入抗戰。而教育部亦參酌廣西的實施辦法，頒佈「國民教育實施綱領」，使廣西國民基礎教育制度，推行於全國。

7. 遲景德：「曾琦政治思想述論」

曾琦為中國青年黨的發起人，其政治思想是現實的反應，包括：(一)提倡國家主義，要國民團結一致，內求國家進步，外禦異族侵略；(二)反對共產主義，認為十六年國民黨的清黨，為北伐成功的主要因素；(三)反對一黨專政，主張一切以民主為依歸，以法治為條件。

8. 呂芳上：「五四時期學界的新舊衝突——以民國九年的浙江一師風潮為例」

本文以民國九年浙江第一師範學潮為例，指出學潮的發生，表面上是學生為校長經亨頤的去留與教育當局的抗爭，實質上是五四時期新舊文化思想的衝突問題。學潮的結果，表面上學生似乎取得了勝利，但學校、老師、學生及社會都付出相當的代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學潮可以鍛鍊學生，也成了師生走向政治的轉折點，浙江第一師範風潮後，師生的分途發展，正可說明此一事實。

9. 徐鰲潤：「戴傳賢對民族國際推行的貢獻」

民族國際即孫中山先生所言，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之意。戴傳賢於民前七年在東京聆聽中山先生演講，即對民族國際有所啟發。本文寫作，即就戴氏對民族國際之認識、推動及貢獻，加以闡述。

10. 陳立文：「抗戰時期中國對收復緬甸之外交努力」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日軍入侵緬甸，切斷中國當時最重要對外交通要道滇緬公路，中國亟盼與英、美合作，收復緬甸，雖經兩年外交努力，但在英、美重歐輕亞的全球戰略下，此計畫終歸失敗。本文即對此段艱辛外交歷程，作一敘述及剖析。

11. 唐啟華：「北伐時期的北洋外交——北洋外交部與奉系軍閥處理外交事務的互動關係初探」

本文係參引中國及英國外交檔案，以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北伐期間，北京政府在外交表現為經，以軍閥與外交部在處理外交事務上互動關係為緯，探討北洋外交的特質。一般而言，北洋外交部注重全國性、長期的利益，努力超然於國內黨派政爭之外；軍閥則注重本派系、短期內的利益。但因軍閥

擁有實力，一方面在意見衝突時迫外交部暫時屈服；另一方面在意見相合時，又可迫列強對外交部稍作讓步。因此軍閥和外交部在此期間，實為一種有衝突又有合作的關係。

12. 蔣永敬：「國民政府實施訓政的背景及挫折」

訓政源於孫中山在同盟會時期的約法之治，其意在皇權既倒，則須伸民權以節軍權。因而孫中山在其《建國大綱》中所規定訓政時期工作，是由下而上，由縣而省而中央，是以民治為基礎。惟國民政府在北伐後所實施訓政，是由上而下，而且祇在中央，不到省縣，是以黨治為構想。此一構想與孫中山原意相違，但係為當時形勢所迫。因在當時軍權決定一切情形下，民權既不可期，惟有希圖以黨權平衡軍權，以黨治取代軍治，未嘗不是較為切合實際的選擇。但不幸國民黨本身四分五裂，互相對抗；黨人間意見分歧，且又依恃軍人為工具，因而欲藉訓政提昇黨權來消滅軍權，是很困難的。

13. 林泉：「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初步研究」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於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通過重要議案計有(一)推舉蔣中正為總裁，確立領袖制度，穩定黨的領導重心；(二)組織國民參政會，以統一國民意志，增加抗戰力量；(三)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團結革命青年、力行三民主義、捍衛國家、復興民族為宗旨；(四)制定抗戰建國綱領，一面抗戰，同時建國。此一大會，與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一全大會，均為劃時代的重要會議。

14. 方仁：「孫科與制憲國民大會」

民國二十二年元月，孫科擔任立法院長，負責制憲國民大會有關法規及憲法草案的研擬，並於民國二十五年完成「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即所謂「五五憲草」。抗戰勝利後，孫科參與政治協商會議，順應世界憲政思潮，察納各黨派意見，其後完成中華民國憲法制定工作。總計孫科參與主持制憲工作前後十四年，對中國憲政推動，有其貢獻。

15. 卓遵宏：「金融恐慌與中央銀行的發展」

民國二十三年美國實施購銀政策，國內巨額白銀外流，造成空前的金融恐慌，政府除遂行法幣政策外，並擴充中央銀行資本，使為全國資本額最大的銀行，並賦予領導法幣發行的重任，中央銀行利用此機會，逐步擴展業務，邁向銀行之銀行的地位。

16. 莊焜明：「資源委員會與抗戰時期民營廠礦之內遷」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軍興，資源委員會負起國家工業建設的重責大

任，亟力遷移上海地區廠礦至西南西北後方。本文即就廠礦內遷運動之發起、遂行及其貢獻，加以闡述，最後肯定上海民營廠礦的內遷，是資源委員會對戰時中國的一大貢獻，不但直接幫助戰時中國的物力與財力的需求，且也展現了中國人的抗戰精神。

17.葉健青：「中國航空公司的創辦——中國民航的開端」

民國十八年四月，中美合辦中國航空公司，為中國第一家民航公司。中航營運，最初幾年都處於虧損狀態，靠交通部的津貼補助，至二十三年才轉虧為盈。及二十六年抗日戰起，沿海及陸上交通為日軍封鎖，其後中航以重慶為中心，擔負起飛越喜馬拉雅山，突破日軍封鎖，運送抗戰所需物資至大後方，可說功不可沒。

18.劉鳳翰：「南京臨時政府軍事實況」

南京臨時政府，為時甚暫，僅六個月，所有軍事實況，因未造成氣候，故少被人注意，但它是中華民國軍事史的開端，研究中華民國軍事史必須從此開始。本文計分十節，就臨時政府軍令軍政系統，參謀本部及大本營，陸軍部的組織，中央直屬各師的分析，海軍部與所轄艦艇，南京留守府與各軍的建立，軍事用費概況，光復各省的軍隊等方面，將南京臨時政府軍事實況加以敘述及論斷。

19.劉筱齡：「中日武漢會戰論述」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日本大本營下達漢口作戰命令，企圖侵佔當時中國戰時政治、軍事與交通臨時中心的武漢，以瓦解中國抗日意志。中國為貫徹內陸持久作戰及消耗日軍戰力，於武漢外圍地區與日軍作戰五個月後，自動放棄武漢，轉進重慶，建立抗戰根據地。本文就武漢會戰中日雙方戰略與部署，來論述會戰經過與得失，以說明此次戰役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20.高純淑：「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國民黨的東北黨務」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日本手中，中國國民黨為適應現實環境，繼續發展東北黨務工作，先後成立東北黨務辦事處及東北黨務專員辦事處，來蒐集情報，聯絡同志，破壞日偽，為收復東北作準備。本文即就東北淪陷後，中國國民黨在東北發展黨務的艱辛、奮鬥與犧牲情形，作一探討。

21.梁惠錦：「戰時兒童保育會」

抗日戰爭期間，兒童由於逃亡及求生能力薄弱，傷亡慘重。為了挽救此批民族幼苗，中國婦女們在蔣宋美齡領導下，組織兒童保育會，負起搶救兒童的責任，以延續民族的命脈。本文即就兒童保育會成立經過、組織概況、

工作情形等方面，來探討抗戰時期婦女的難童保育工作。

22.邵銘煌：「汪精衛政權參加『大東亞戰爭』之經緯」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引發日本陸軍部所稱的「大東亞戰爭」，做為日本友邦的汪偽政權，自始表示參戰意願，初未獲日本許可，嗣經年餘的爭取，才得日本首肯。本文就汪偽力爭與日本同甘共苦的原因、行動及日本由推諉而至應允之過程加以敘述。最後指出汪政權參戰雖是自主的決定，但決定權操在日本手中，答允汪政權參戰與否，亦完全以日本利益為依歸，而非對汪政權意願的尊重。

23.孫若怡：「一號作戰期間中共的活動企圖」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至十二月，日本為打通由東北、華北、華中到中南半島的陸上交通線，發動所謂「一號作戰」，國民政府受到抗戰以來前所未有的重大損失，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和外交上，均陷入了最險惡的局面，也為中共的坐大提供拓展的契機。本文即從一號作戰期間，中共的活動，來說明其欲奪取政權的企圖，及為何國民政府「贏得了戰爭，失卻了和平」。

24.王成勉：「馬歇爾使華調處——第一階段之研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馬歇爾 (Gen. George C. Marshall) 奉美國總統杜魯門之命來華調處國共和談，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歸失敗。但就馬歇爾使華第一階段，亦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六年三月間之調處成果而言，的確也為中國帶來了和平的遠景。本文即參照中美雙方檔案、史料及有關學術著作，對馬歇爾使華的第一階段調處成效，重加評價。

25.張玉法：「國民政府時期山東省的行政人員與行政效率」

本文係以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四年山東省的公務人員為例，從國民政府對公務人員選用、訓練、考核、獎懲等方面，來探討地方公務人員的素質及行政效率，最後指出論者謂國民黨在北伐完成後，即趨於保守、腐化，但從山東的行政人員和對行政效率的要求看來，並無這種情形。

26.陳三井：「白崇禧與二二八事變」

二二八事變爆發後，國防部長白崇禧奉蔣主席之命，來臺巡視宣慰，停留半個月，建立了中央與地方士紳間的溝通橋樑，對於淡化省籍嫌隙，以及情感的撫慰作用等方面，均產生積極作用。但本文亦指出，由於白氏奉命來臺，在權限上僅係「權宜處理」，未握尚方寶劍，加上與蔣主席微妙關係，以及必須隨時與陳儀協商，個人角色的突出發揮，亦有其侷限。

27.賴啓：「臺海戰爭述略——從民國三十八年古寧頭戰役到四十七年金廈砲

戰」

民國三十八年冬，中華民國政府撤出大陸，退據舟山、金門、臺灣諸島，共軍繼續追擊，十年間，先後發生金門古寧頭、登步島、大擔島、南日島、湄州島、東山島、一江山等戰役，以及金廈砲戰與多次海空遭遇戰等臺海戰爭。共軍除奪得一江山小島外，其他戰役多失敗，使中華民國政府得以臺、澎、金、馬為基地，繼續推行憲政、發展經濟，獲致世界重視的成果。查時傑：「四十年來的臺灣基督教會」

本文將臺灣光復迄今四十多年來的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發展與演進，分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百廢待舉時期，民國三十九年至五十四年發展時期，民國五十五年至八十一年停滯與復甦時期等三期，作全面的回顧。最後指出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對淨化社會、洗滌心靈、關懷原住民等方面，其貢獻是值得肯定的。

柏克萊「文化、宗教與中國經濟發展」會議

葉文心*

這個會議於今年2月26日至28日在柏克萊舉行，由加大東亞研究所籌備召集，議程三天，所提論文總共十四篇，參加討論及列席者包括柏克萊及加大 Davis、Santa Cruz 兩校區之各系中國問題研究者近三十人。這次會議為今後柏克萊與臺灣學者一連串學術會議的首次，日後將輪流在臺北及柏克萊召開，活動經費來自教育部，以擴大及加深雙方的學術接觸為目標。會議前後各項儀式，出席者柏大方面包括田長霖校長、李遠哲教授、丁邦新教授，臺灣方面包括教育部趙金祁次長、北美協調會舊金山文教處李振清處長、加州大學臺灣校友會總幹事中山工技院院長吳建國等人。可謂盛會。

此次會議議程，讀者可以參閱本文附錄，這裏僅就會場討論所呈現的重點，作簡單地補充。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就文化價值與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蕭新煌首先指出，昔日中國經濟發展陷入逆境，中外學者援引韋伯對基督教新教精神及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紛紛歸罪於儒家倫理社會價值之有礙中國經濟現代化。現在東亞四小龍締造「經濟奇蹟」，中國大陸沿海省份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學者們又紛紛歸功於儒家傳統文化價值及家族結構。這兩種對中國文化截然不同的看法，所反映的顯然就是對文化問題認識上的欠缺，以及對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掌握之不足。由此推論，今後研究上有待進一步了解的問題，一是這半個世紀來中國地區經濟發展具體的軌跡及明確的特質，包括法律結構（見蘇永欽文）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見 Benjamin Ward、顏建發文），以及所謂「資本主義」內容更精確的認識（見 David Johnson、Gary Hamilton、Dilip Basu 等文），另一則為對文化內涵及變化的全盤深度探討，包括若干文化特質的恒常性（見黃光國文）、經濟思想在不同歷史背景之下的轉變（見林滿紅文）以及經濟變遷對文化價值的轉化力（見葉文心文）。

經濟發展跟中國政治文化之間有什麼關係？中國近百餘年經濟現代化的努力，是在政府干預規劃的框架之中進行的，還是靠家族社團民間力量推動完成的？經濟發展在政治演變的過程中有些什麼作用表現？商人團體或工人運動是二十世紀轉換中國政治結構及政治文化主要的推動力量嗎？

關於這些問題，會議討論的重點圍繞於近時在美國學界風行一時的「公民社會」這個觀念上。「公民社會」的形成，原為德國歷史哲學家 Habermas 所建立的一理念形態，用於概括十八世紀西歐所出現的政治社會中的某些特質。在中國史的領域中，近年由於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饒維廉(William Rowe)在研究十九世紀漢口社會時加以引用，而流行漢學界。饒氏的觀點，主要謂漢口八大行在商業上的組織，已具有中產階級市政自主、市民自治的雛型，紳商之於政府，已有相當的獨立權。由此推而廣之，清代中晚期以後商業大城市中的中層社會，可以作為帝制專政崩解之後中國建立新政治秩序的中堅發源力量。饒氏此說，與 Mary Rankin 對於太平天國以後浙江士紳在地方上活動的研究，及 David Strand 對於一九二〇年代北京法團的研究相呼應，於是「公民社會」在中國史一時蔚為學界風尚。

柏克萊討論會上，針對此「公民社會」之說，由魏斐德教授(Frederic Wakeman)提出一篇措辭頗為強銳的論文，將饒氏所申概念及所引證據逐條檢視，一一加以批駁，指出饒氏立論自相矛盾之處，以示「公民社會」在中國之說無以成立。魏文由葉文心評述，指出即令饒氏所引之證據誠如魏文

所示，不足以證明其所謂十九世紀中國嘗有公民社會出現之傾向，此非即謂「公民社會」概念所牽出的問題在研治中國史上毫無意義。「公民社會」一辭本身定義多端，含意複雜，運用於中國歷史，誠然不免徒然增加許多描述及分析上似是而非、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之不必要混擾，而十九世紀末期以來，中國政治體系之中政府與民間社會相對權力關係的消長依傍，比之於清代中晚期，確實有重大的性質上的轉變，其中牽涉及城市中產階級、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的勃興，新式學校、出版事業、新聞事業、法團社團等之興起，比之帝制時代，政治權力在社會中的分配、社會成員參與公眾事務的程度確與昔日大有不同。魏氏之文，誠然足示饒氏立論之粗忽處，然而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文化權力結構的變化，亦急需一套新的描述語言及分析觀念，以助學者更貼切符實的掌握新舊之間的銜接交替。

綜合會議討論，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以及現代中國新生力量之來源為與會多數學者關注的問題。在這個範圍之內的討論，亦因與會者從不同角度考慮而有所進境。傳統並非一脈相傳、內容單一之物，更非僵化的信條慣例（林滿紅），現代文學即使以傳統風格面目出現，也可以使用傳統語言負載非傳統的意義（吳茂生）。舊有的價值觀、社會制度可以創造出新形式的社會（Hamilton, Basu），新的社會往往是在舊形式的約制之下成形的，新的社會人本身也常是許多舊價值的追求者及傳承者（斐宜里Perry）。此外，以中國之大，新與舊在文化上的交遞，不得不因地域性、社會形態之不同，及性別上的差異而在變化上呈現多元多樣（Susan Mann），這也是不可不注意的。

這個會議的討論，極有助於對許多中國近代史上的大問題在思索上的深刻化及細膩化，這是值得記述的。

附錄：柏克萊會議宣讀論文題目及作者

1. Elizabeth Perry: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Chinese Labor"
2. Su Yeong-chin: "Some Weberism in Confucianism: Observ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s Legal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3. Dilip Basu: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Hong

Kong Case”

4. Gary Hamilton: “Overseas Chinese Capitalism”
 5. Hsiao Hsin-huang: “Business-State Relations and Business Culture in Postwar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6. Frederic Wakeman: “Reflections on Civil Society and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7. Lin Man-houng: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ift of Dominance Among Intellectual Currents and Change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8. Susan Mann: “The Women’s Work Ethic in Chinese Society”
 9. David Johnson: “Studying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10. Ng Mao-sang: “Popular Fi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Republican China”
 11. Wen-hsin Yeh: “Urban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s in Taipei: Drinking in the 1980s”
 12. Benjamin Ward: “Traditional Beliefs and Chinese Communism”
 13. Hwang Kwang-kuo: “Equity and Humanity: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14. Yan Jiann-fa: “Structural Limi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Mainland China”
-

莫斯科「中國民主和人權問題（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末）」學術座談會

葉文基 (Peter M. Ivanov) *

幾年前討論人權問題（無論在中國或在蘇聯）還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今天俄國剛剛開始其民主化過程，學者也特別注意各國思想家的民主與人權的

* 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處主任

概念。雖然中國的民主傳統並非深厚，俄國漢學家對它的興趣特別大，因為他們像別的國家的中國專家一樣，想要試圖預見大陸的將來。在莫斯科談中國民主尤其意義：過去兩個社會主義帝國有很多共同點。但是在革命前的歷史有區別。

參加者的主要結論如下：

1. 近代中國追求民主的思想家（絕大部分）企圖把西方民主理想和中國的傳統合成起來。

2. 連最開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好像胡適之先生及其同情者是惟一的例外）在內，大家都想國家是為百姓帶來幸福的最主要工具，而政治或知識精英是那個工具的發動機，因此民主主義實際上是民本主義。

3. 近百年史證明：中國大陸不能立即變成西方式的民主國家。這並不意味著人民對政治制度的態度是滿意的。但是極少數人靠現代民主手段來爭取民主。同時最近復活了很多抵抗當局壓迫的傳統方式。

4. 追求自由者甚麼時代都很少，但其活動的影響有時十分宏大，中國的民主化途徑又長，又難。

此次座談會所宣讀的論文，就有以下各篇：

1. 格魯什洋 (Yu. M. Garushyants, 東方學研究所)：民主與人權在近代中國社會和政治思想的地位。

2. 博羅赫 (女) (L. N. Borokh, 東方學研究所)：梁啟超「新民說」中之法律觀點。

3. 伊萬諾夫 (P. M. Ivanov, 東方學研究所)：二十和三十年代中國小黨派對民主和人權的理解。

4. 霍赫洛夫 (A. N. Hohlov, 東方學研究所)：清朝時代的法律：調查方式和審判專橫。

5. 佳普金阿 (N. I. Tyapkina, 東方學研究所)：個人和中國傳統法律。

6. 皮薩列夫 (A. A. Pisarev, 亞非學院)：中共與三十和四十年代農村政治改革。

7. 科濟列夫 (V. A. Kozirev, 亞非學院)：二十世紀初中國地方自治：是否民主烏托邦？

8. 卡爾涅耶夫 (A. N. Karneev, 亞非學院) 梁漱溟的「鄉約」概念。

9. 穆格魯津 (A. S. Mugrusin, 遠東研究所)：經濟改革和中國大陸農村的民主化。

10.庫列紹夫 (N. S. Kuleshov, 遠東研究所)：向龍挑戰：中國和西藏人權。

11.季卡列夫 (A. D. Dikaryov, 東方學研究所)：中共是否侵犯藏族人的生育權。

12.切爾卡斯基 (L. E. Cherkasskij, 東方學研究所)：艾青對作家創作自由的理解。

13.熱列霍夫切夫 (A. N. Zhelohovtsev, 遠東研究所)：蘇聯和中國大陸「集中營文學」比較分析。

14.加利諾維奇 (Yu. M. Galenovich, 遠東研究所)：「河殤」電視系列片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宣言。

15.庫茲涅佐夫 (V. S. Kuznetsov, 遠東研究所)：當代中國生活中的宗教因素。

16.馬斯洛夫 (A. A. Maslov, 遠東研究所)：八十年代中國秘密社會、宗教和憲法權利：官方與邪道關係的範式。

17.西涅茨卡亞 (E. A. Sinetskaya, 東方學研究所)：五十年代中國大陸勞動人民的民主概念。

18.烏索夫 (V. N. Usov, 遠東研究所)：六十年代初中共領導人怎麼理解民主？

19.奧夫奇尼科夫 (Yu. M. Ovchinnikov, 遠東研究所)：「北京之春」和中共中央三中全會。

20.利特維諾娃 (Yu. G. Litvinova, 東方學研究所)：天安門慘案和中國人權：評國際特赦組織資料。

21.杰柳辛 (L. P. Deliusin, 國際經濟與政治問題研究所)：中國大陸關於政治改革的爭論。

22.馬雷舍夫 (V. F. Malishev, 俄國外交部)：從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律的角度來看中國人權問題。

23.貝爾格爾 (Ya. M. Berger, 社會科學訊息研究所)：中國的自由主義和人權。



學術演講

Russian Historical Tradi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Robert O. Crummey*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its Russian core occupy the center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The rapid and bewildering changes taking place there raise many questions, among them the nature of the Russian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its continuing power to shape people's ideas and actions. Russians in all walks of life and foreign scholars debate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nation's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y argue whether a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can overcome a heritage of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and limited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rights and find sources of entrepreneurial initiative in a society which has all too often viewed individual prosperity as destructive of the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As recent examples remind us,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any nation or people are both stimulating and dangerous. Gross oversimplifications are unavoidable. In order to avoid extremes of arbitrariness and caprice, any discussion of this type must follow certain rules. In my comments, I intend to observe the following. First, my objective is to discuss several central features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tradition. My remarks do not apply to other nationalitie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would seriously misrepresent

* Robert O. Crummey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Dean of the 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a panel 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on November 2, 1991.

their unique traditions. Secondly, I am basing my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heartland of the former USSR in the Muscovite and early imperial periods, the mid-fifteenth to mid-nineteenth centuries. My remarks fit the more recent experience of the Russian community much less closely and leave unexamined many significant politica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hirdly, my remarks must be understood in light of implicit comparison with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 While I claim no expertise in either, my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has led me to select certain features of Russi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discussion.

Finally, the topic on which Professor Liu and I have agreed to reflect obliges us to consi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terms which evoke an idealized pattern of Wester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s I understand the term, "modernization" includes the shift from an agrarian to an industrialized economy; mas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life; judicial norms and procedures that govern the lives of all citizens; and education for all, founded on a modern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No existing society entirely lives up to this definition. Reforms are attempts to approach these goals, particularly political and judicial, by incremental steps rather than through a revolutionary rej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rder.

Let me begin by pointing to the geographical and geopolitical circumstances which, in my view, helped to shape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heartland in the Middle Ages. The historic core of the Russian empire, Moscow and its surroundings, lies considerably to the north of most of the main political centers of western Europe and East Asia.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e are relatively unfavorable. Summers are warm, but short. Moscow enjoys only 150 frost-free days per year on average and severe frosts sometimes occur unseasonably late in the spring or

early in the fall. Winters are long and harsh. In most regions, the soil is relatively infertile. Insofar as we know, the yields of staple grains were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in the more favored areas of western Europe. As a consequence, until modern times, the historical core areas of Russia supported a comparatively sparse population, consisting primarily of subsistence farmers in small villages scattered in the forest. Moreover, we must remember, most of the areas over which the princes of Moscow extended their control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had even less favorable conditions than the region around the capital. The population of this forbidding area waged a continual struggle for physical survival.

The infertile northern forest offered advantages which the warmer and potentially more fertile grassland did not—relative security from invasion. The Russian heartland forms part of the great Eurasian plain and has no natural frontiers. Moreover, for millennia, East Slavic agriculturalists came face to face with a succession of pastoral peoples who dominated the steppe.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Russian lands into the Mongol empire and their subsequent liberation were the most dramatic expressions of the ancient struggle of peasant against herdsman, of farmland against grassland.

Russia's geopolitical position meant that life was a constant struggle for survival in the military as well as the literal sens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corded history of the East Slavic peoples, the primary—indeed, virtually the only—task of the ruling princes was the mobilizing of fighting men and the collection of revenue to pay for war.

Mobilizing the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of a naturally poor country required the creation of a rudimentary, but ruthless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Between 1300 and 1600, the ruling house of Moscow created just such a system of government. Step by step, the Grand Princes and Tsars absorbed the other East Slavic principalities into their domain, transformed the nobility into their servitor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a simple stat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rulers were aided in their task by the absence of any doctrines of individual or corporate rights or well-organized social centers of resistance. At crucial moment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moreover, they received the political support of the leaders of the only organization which extended across the East Slavic lands,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In addition, as the process of state-building neared completion, ecclesiastics provided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for a process that had begun as a pragmatic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earned clerics wove doctrines and symbols borrowed from Byzantium and Latin Europe into an ideological system which legitimized the prince of Moscow as the defender of the true Christian — that is, Eastern Orthodox — faith. At their most extreme, these doctrines restated in Russian terms the medieval Christian doctrine of universal empire: in an abstract sense, at least, the Tsar assumed the role of shepherd and suzerain for all Christians.

The ceremonial and ideological trappings of the state underwent radical change in the reign of Peter the Gre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reafter,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justified their policies as necessary for reasons of state, not the defense or furtherance of Orthodoxy. Like the rulers and their courtiers,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took on the outward appearance of their central European counterparts.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pretension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erial bureaucracy grew, its objectives changed very little. Maintaining the empire's military strength and domestic security remained its primary goals. The army's success in battle was the main measure of the system's health. Only after the Great Reforms of the 1860s and 1870s did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become an important goal of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and judiciary.

The society which officials administered had a remarkably simple

structure. For nearly a millennium, from earliest recorded times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wo groups or classes dominated society — warrior-nobles and peasants. As in many other societies, the nobles exercised dominant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owned much of the land of the realm — a privilege they shared with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and the monasteries. Between the mid-fifteenth and mid-seventeenth centuries, several important processes took place simultaneously. Noble laymen and the church took control of more and more land and the peasants who lived on it. Governmental policy was partly responsible: beginning in the late fifteenth century, the royal administration systematically distributed populated lands to lesser nobles on condition that they perform military service to the ruler. Over the next two centuries, this system of conditional tenure, known as *pomest'e*, spread throughout the Russian heartland. Peasants remained free of noble control only in the most remote and least fertile regions of the country. Moreover, by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Muscovit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treated the inherited ancestral estates of the nobility as though they were held on conditional tenure, confiscating them if their owners did not serve to the monarch's satisfaction.

These developments took plac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lmost continuous, exhausting wars. Year after year, noble warriors reported for annual duty. Their peasants had to contribute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in two ways — by feeding and equipping their lord who fought and by paying taxes to the royal treasury. The former was no easy task, particularly for the peasants on small estates. The addition of rapidly rising taxes made the peasants' burdens intolerable, particularly in times of bad harvest.

These rapidly increasing pressures and conflicts led to two catastroph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irst, the death of the last tsar of the Riurikid dynasty and a succession of natural disasters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society known as the Time of Troubles (1598-1613). Rulers succeeded one another in rapid succession, lesser nobles, peasants and Cossacks rose in revolt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order, and foreign powers intervened in these domestic conflicts in pursuit of their own objectives. Only the patient efforts of a coalition of Russian nobles, townspeople and ecclesiastical leaders and the exhaustion of domestic rebels and foreign invaders allowed the traditional leaders of society to reestablish the monarchy under the new Romanov dynasty and restore social order. Second, as order was restored, the nobility, particularly its poorer members, dema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guarantee their control over their peasants by prohibiting the latter from leaving their villages and repatriating any who fled. After some resistance, the government of Tsar Alexis instituted serfdom as part of the Law Code of 1649. Stripped of both their legal rights and the practical safeguard of flight from their lord's estates, the peasants gradually lost all means of resisting the demands of the state and the nobles and, by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had reached a level of social and legal degradation that differed little from plantation slavery in the New World.

So far, we have made no mention of merchants and townspeople. In the centuries after the Mongol invasion, historians usually argue, the cities of the Russian heartland exhibited little of the vitality and none of the political and juridical independence of their counterparts in western Europ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great commercial city-states of Novgorod and Pskov, medieval Russian cities and towns served more as administrative centers and garrisons than as centers of commerce and artisan production. After they conquered Novgorod and Pskov at the turn of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the rulers of Moscow gradually transformed these once-booming commercial cities into typically subservient administrative centers. As recent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artisans did produce a variety of goods for local consumption and merchants trad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Western Europe. Even after we accept these valuable correctives, the rad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life in Russia and western Europe remain striking.

One of the many explanations for the comparative weakness of urban life and institutions in medieval Russia lies in the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 the leading merchants. In their struggle to mobilize the resources of a poor country, the tsars and their advisers drafted merchants to serve as tax farmers and viewed the urban population as its primary source of indirect taxes. Tax collecting in Russia was apparently a losing proposition since the collectors had to pay the government its anticipated revenue in advance, then attempt to collect the same sums and more from a poor, scattered, and wily population. The burdens of service help to explain why prominent Russian merchant families of the Muscovite period rarely retained their wealth and social prominence for more than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These conditions also explain why,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the merchants, instead of advocating urban liberties, begged the government to prohibit all urban tax payers from leaving their registered places of residence, a demand which became law in the Code of 1649. In other words, the leaders of urban society took the lead in its enserfment.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 societies in Europe and the Near East, the ruling elite of medieval Russia displays curious and apparently contradictory qualities. Most of the prominent officials of Muscovite Russia were the descendants of warrior nobles and spent much of their careers as military commanders. At the same time, by the late fifteenth century, the princes of Moscow had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that all nobles owed them life-long service. Several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reinforced this policy. The custom of partible inheritance and the poverty of the Russian heartland forced even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lans to look to royal service for prestige and for opportunities to replenish their families' economic fortunes.

As servitors, Russian nobles were generalists. Although family tradition and training made them warriors, they beg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mov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field and the chancery. They offered the crown a family tradition and expectation of leadership. Since they had little formal education, however, they probably depended on the skill of a small, but growing cohort of bureaucratic officials, recruited mainly from the lesser nobility and the clergy, who had learned the routines of administrative paperwork as apprentices. These patterns characterized Russia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for roughly three centuries, from the mid-sixteenth to mid-nineteenth century. Only toward the end of the period did Emperors attempt to establish minimal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for high administrative office.

In what sense, if any, can we speak of a Russian aristocracy? As one might expect, prominent clans of distinguished lineage frequently remained in high office and guarded their wealth and social standing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In that limited sense, they constituted an aristocracy. Their power, however, rested, not on a foundation of legal rights or corporate organization, but on an intricate network of personal and clan relationships which bound them to successive monarchs and to one another. Moreover, until 1762 at the earliest, the members of the ruling elite could not escape the obligation to serve the state. Incapacity or refusal to serve would doom even the best-born to political extinction, poverty and social obscurity.

Until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wo institutions — the noble estate and the village commune — dominated the society of the Russian heartland. Although one can speak of the existence of a proto-bureaucracy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t consisted of a substantial group of officials and clerks in Moscow and a handful of semiliterate clerks in each of the main provincial towns. In much of the countryside, the noble estate was both the primary source of social cohesion and, in practice, the lowest echelon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Especially during the heyday of serfdom, 1649-1862, landlords had absolute legal authority and practical control of their serfs and it was through them and their stewards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had access to the peasants on their estates. Many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which followed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serfs in 1862 can best be understood as attempts to find substitute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untryside.

Peasant life centered on the village. Unlike agriculturalists in some other societies, Great Russian peasants have traditionally lived in concentrated settlements rather than on isolated homesteads. In many regions, including those areas in the north and east of the Russian heartland to which serfdom never spread, villagers developed a strong sense of solidarity and intric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handle their affairs in common.

Observing peasant practice, many Russian and foreign writers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village commune provided 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a collective tradition and spirit, intrinsic to Russian culture. The workings of the village commune may, in fact, have more mundane origins. Beginning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t the lates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dealt with peasant villages as units, making all villagers collectively responsible for the payment of taxe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If any individual failed to pay taxes or engaged in banditry, royal officials held the entire village responsible. Thus governmental policy created or reinforced the tendency to conduct all village affairs in common, inclu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farmland and the choice of crops.

Governmental practice strengthened a defensive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villagers. Living by subsistence agriculture in a harsh environment, peasants had to struggle simply to survive from year to year. Moreover,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made them suspicious not only of tax collectors and recruiting agents, but also of any of their fellow peasants who stepped over the boundaries

established by traditional practice. In a word, village tradition provided security in a hostile na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t also severely limited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and gave rise to the suspicion that anyone who took steps to improve his own life must, in some undefinable way, be harming his neighbor. This long-established attitude -- the "culture of envy," as one contemporary commentator calls it -- remains a powerful force among ordinary Russians today.

Until the last century, the most important force shaping the cultures of the East Slavic peoples was Eastern Orthodox Christianity. From the moment of the official conversion of Kiev Rus' in about 988, Eastern Orthodoxy determined the basic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East Slavs. The conversion gave them the Scriptures, theological and moral teachings, and patterns of worship which all Christians share. Adherence to the Eastern Orthodox branch of Christendom had the effect of linking them to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the South Slavs and separating them from neighbors who adhered to other denominations and faiths such as Roman Catholicism and Islam.

In other respects,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conversion was distinctly limited. First of all, historians debate the speed and extent to which the masses accepted and began to practice the teachings of the new faith. Without doubt, pockets of pre-Christian religious practice survived in the countryside for centuries after the official conversion and, throughout the East Slavic lands, popular religious practice wove elements of Christianity and pre-Christian belief and practice into a complex and flexible system.

Second, in the realm of high culture, the conversion had the paradoxical effect of isolating the East Slavic lands from the wider world. As elsewhere, the local branch of Orthodoxy worshipped in an exalted variant of the local language and, over time, established its own autonomou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By the time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Muscovite state, Russian Christians had little

contact with their Greek brethren, to say nothing of Roman Catholic Europe or the Islamic world. Th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heritage of classical Greece, very much alive in Byzantium, had virtually no impact on the Russian lands.

The central features of Orthodox piety are corporate worship in the Divine Liturgy and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the individual believer toward union with God. Although heirs and defenders of the moral teachings of Christianity, Orthodox leaders promulgated no highly developed moral codes or guides to individual conduct. Indeed, from an Orthodox point of view, elaborate codes of rules or sets of moral admonitions smack of legalism and threaten the free play of the Spirit. Medieval Russian believers of all classes found examples of Christian conduct in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The most exalted of these texts, however, provided more help in escaping from the temptations of earthly life than in living a morally upright life within society.

To be sure, Russian Orthodoxy has its own traditions of moral criticism and resistance to the established powers in church and state. The "fools in Christ" of late Muscovite times had the customary right to remonstrate the Tsar. The so-called "non-possessors" of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criticized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and monastic leadership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great monasteries' large landholdings and the resulting oppression of the peasants contradicted Christian ideal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subsequent centuries, the Old Believers, in rejecting the reformed liturgy of the official Orthodox Church, insisted on rigorous observance of the traditional Russian Orthodox forms of worship and stressed that all believers must live a disciplined moral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se dissenters within Russian Orthodoxy never developed a clear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s duty to resist illegitimate or ungodly power. The Old Believers used the traditional images of martyrdom — passive suffering for Christ — to describe even their most energetic acts of protest or resistance to the ruling powers of

imperial Russia.

With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ruling elite of the Russian lands, new currents appeared, beginning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is respect, the reign of Peter the Great (1689-1725) marks a watershed, for the reforming Emperor decreed that all of his leading subjects must adopt the outward manner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s and took many steps, such as the founding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to forc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Europe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life. As we know, the initial impact of his reforms was literally skin deep. A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sed, however, more and more Russian nobles and other intellectuals thought of themselves as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y learned to speak French, read the latest Western publications and, in many cases, shape their lives to the moral teachings of the newest creeds such as Freemasonry.

In a very real sense, then, Russian high culture was a local variant of modern European cultural life. This variant had several frequently observ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Petrine reforms, Russian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troubl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have been separated, by economic and social privilege and style of life, from the masses. Whether or not their circumstances differed greatly from those of intellectuals in other societies, they certainly thought so. Moreover, as Russian intellectuals themselves have observed, leading Russian thinkers have often adopted European theories and ideologies and advocated them in a particularly uncompromising, fanatical manner. Finally, much of Russian intellectual discourse fo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has centered on the place of Russia and its cultural tradi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Anyone who has lived among educated Russians can testify th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still widely present today.

Our discussion has identified a few central features of Russian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ormative centuries of

the Muscovite and early imperial periods. These include the continual struggle for survival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nation and the resulting need to create a rudimentary, but ruthlessly effectiv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o mobilize the material and human resources of society. In their efforts to mobilize the nation, the rulers encountered no well-organized corporate groups and faced no legal traditions which defended the collective rights of their most powerful subjects. Moreover, the histor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akness of the merchants and other middle groups in society prevented them from resisting the government's demands or challenging its pretensions. Over the centuries, the peasants, until very recently the considerabl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suffered economic and legal degradation and, in response, developed elaborate mechanisms of mutual support and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For quite different reasons, all of the main groups in society developed techniques of self-defense that crippled the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to arbitrary authority indispensable to modernization. Finally, in spite of its many admirable features, the Eastern Orthodox high culture of medieval Russia did little to provide believers with a sense of civic responsibility or guidelines on being a virtuous and productive citizen although it did offer limited possibilities for protest or resistance to ungodly authority. 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variety of Western European theories filled this vacuum in the lives of the small intellectual elite, but served also to isolate them from the mass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whom many of them aspired to serve. Only recently have we seen evidence of the closing of the gap separating the intelligentsia from other social group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ivil society" embracing millions of people. This change, in large measure, explains the dizzy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of the last few years.

I trust that these brief remarks help to illuminate some of the central features of the Russian historical tradition as it took shape

from the rise of the Muscovite monarchy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age which, in my view, occurred in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As recent events in the Soviet Union demonstrate, no nation is imprisoned in its history. Radical changes can and do occur.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mative power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remains strong and societies return to deep-rooted traditions, particularly in times of crisis. Some of the traditions, habits and attitudes which I have noted will undoubtedly reassert themselves, perhaps in new forms, as long as the Russian nation survives.

* * *

從變法維新的觀點看俄國傳統

谷蘭美著 劉廣京節譯

本文討論的俄國傳統以俄羅斯民族之傳統為限，不包括前蘇聯的其他民族。本文討論以十五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為範圍，注重俄國歷史與中國歷史及西歐歷史可資比較的發展。所謂維新或現代化一般乃以西歐為典型的發展，應包括工業化，民主化，國民參加政治，平等享受法律程序，及以科學為基礎的教育。這些理想事實上沒有任何國家曾完全做到。變法(reform)含蘊漸進的，步步為營的改革，尤其注重政治與法律的革新。

從變法維新的觀點看俄國傳統必須先注意到地理因素。俄國的位置在地球北部，緯度偏北，夏季非常短，農業環境不好，土壤也比較貧瘠。農田分布在森林之間，人口密度比較小。距莫斯科較遠的地帶尤其如此，主要的問題是如何繼續生存。

俄羅斯的核心地帶並無天然防禦線，在東邊常受游牧民族的侵略，蒙古帝國的侵略便是最顯著之例。俄羅斯的統治者必須組織軍隊，籌集餉項。治軍與籌餉是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在 1300 至 1600 之間，俄羅斯的統治者吞併了東部諸蕃，原有的貴族成為他們的巨屬，國家行政已奠立了基礎。在這過程之中，並沒有人要堅持個人或集體的權利，沒有受到有組織的抵抗。在十四、十五世紀緊要的關頭而且受俄國教會——就是東正教在政治上的支持。

到了十六、十七世紀東正教建立了一套理論，認為莫斯科的統治者負有保護東正教的責任。沙皇也就成爲他們心中的基督教的保護者。俄國的意識形態和各種禮儀到了十八世紀初年在彼得大帝的治下，有重要的變化。這以後他們認爲國家比宗教重要，政治目的比較保護宗教爲重要。俄國的制度開始與中歐各國的制度接近，但是國家的主要任務並沒有改變——仍然是維持軍事力量 and 內部的治安。要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沙皇政府纔考慮到司法與行政都要注重人民生活問題。

俄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其實很簡單。在十九世紀以前的一千年內，只有兩個重要社會階級——就是兼爲武士的貴族和農民。政治與行政的權力由貴族所獨佔，而貴族同時又是大地主——除了貴族之外教會和寺院也是地主。十五世紀中期到十七世紀中期，俄國的貴族和教會所控制的田地和農民越來越多，低級貴族爲國王服兵役，可以得到田地的酬報。田地上的農民也就歸他們所有。只有在距俄羅斯核心地帶比較遠的，更貧瘠的地方纔仍有自耕農的痕跡。到了十六世紀後半期，原來的貴族也受到同樣的待遇。他們如果不爲國王好好地服務，原有的土地便要由國家沒收，更談不上財產權了。

在這同時，俄國不斷參加戰爭。貴族要從軍，農民不但負擔貴族的供應，而且要繳納國家的稅。這種雙重負擔越來越重。到了十七世紀初期，流里吉德（Riurikid）王朝末代的時候，達到極嚴重的天災，整國社會頽於崩潰，進入所謂「暴亂時代」（Time of Troubles, 1598-1613）。低級貴族、農民、和哥薩克騎兵紛紛叛變，中歐的國家乘機窺伺。羅曼諾夫（Romanov）王朝好容易纔擡頭，收拾殘局。社會秩序是恢復了。但是貴族，尤其是比較貧窮的貴族，要政府保證農民不許離開原住的鄉村，已離開的要由國家派警察抓回來。阿里錫斯（Alexis）沙皇於 1649 年發布法律條文，建立農奴制度（serfdom）。農民失去了離開領主田產的權利，也就無法與國家及貴族對抗了。俄國的農民到了十八世紀末社會地位與法律地位之低可以和新大陸殖民地的奴隸制度相比較。

農民如此，那麼商人地位又如何？除了 Novgorod 和 Pskov 這兩個城邦之外，中古時代的俄國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和駐紮軍隊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沒有獨立的地位，與西歐城市不同。十四、十五世紀之間，莫斯科國王佔領了這兩個城邦之後，他們也就成爲一般的行政中心，也就開始蕭條了。新近有人研究發現當時因爲有當地消費的需要，手工業製造的種類不在少數，與中歐及中東之間經常有商人從事貿易。但是俄國城市生活與西歐比

較則瞠乎其後。這中間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俄國政府對於商人的政策。俄國政府把城市看為一個間接稅收的來源，要商人來包稅，而且按期要商人先繳整筆的數額，然後再由商人向居民征收。莫斯科巨商的社會地位很少能維持三代以上。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商人甚至要求政府下令不許有納稅義務的居民遷移戶口——這也就是 1649 年法律的規定。這時俄國的商人不但不要保障城市居民的權利，反而要奴化城市居民了。

以上所講的俄國當時的社會結構，現在進一步討論各社會階層的氣習和文化特徵。和西歐與近東都市不太一樣，莫斯科王國的官僚多半都是貴族武士的後代，也多半都有長期的軍事經驗。十五世紀晚期國王規定所有貴族都要終身服役。其實在當時的分家財的制度之下，鑒於俄羅斯核心區域一般的貧窮，縱是最著名的貴族也必須經由為國王服務之路來保持聲譽，重整家業。

這些臣屬於王國的貴族並無任何特長，十六世紀他們不是在軍區就是在首都政府服務，來往頻繁。他們所受的正式教育很有限，要倚賴一些數目不多的官僚為顧問。這些顧問多半出身低級貴族或教士，受過公文程式的訓練而已。從十六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差不多三世紀的情形就是這樣，要到十九世紀中葉沙皇纔規定高級官僚應有的學歷。

俄國有沒有貴族呢？有高貴封爵的大家族同時有做大官的資格，一代復一代照顧他們自己的財富和地位。但是他們的地位並不是建立在法律權利和集體組織的基礎上，而是靠個人之間與家族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靠他們與國王之間的關係來維持。最晚到 1762 之前，貴族有為國家服務的絕對義務。如果拒絕服務，就是出身高貴的貴族在政治上也就毫無勢力了。

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俄羅斯核心區域有兩個基本制度，其一是貴族的家園 (estate)，其二是鄉村的公社。如果我們可以說十六世紀末已經有類似官僚制度的組織，所指的就是在首都莫斯科的一些官員與胥吏，以及各省的城市裏一些半文盲的胥吏。在農村區域，貴族的家園是社會凝聚力的焦點，也就是最低一級的政府機構。尤其是 1649 至 1862 之間農奴制度盛行的時期，地主有絕對的法律權力控制農奴。政府和農奴之間的接觸也都要經由貴族的家園。1862 農奴解放之後的各種設施應該可以說都是在尋覓可以替代貴族家園的機制。

農民生活以鄉村為中心。大俄羅斯地帶的農民多半聚集於村落而非分散居住。有許多地方，包括俄羅斯核心地帶的北部和東部，從來沒有實行農奴制，鄉村農民頗為團結，經由一種很複雜的制度來處理公共事務。

有一些史家（包括俄國和非俄國的史家）認為鄉村公社是俄國文化特有的集體精神的具體表現。其實鄉村公社的來源頗為具體。最晚到了十五世紀，俄國政府施政便已經以農村為單位，全部居民都要負責集體繳稅並維持法紀與秩序。如果有人不繳稅或有搶劫行為，王國的政府要全村的居民負責。村民本來已集體地處理全村的事務，包括買賣農田與選擇種植品，更加上政府要責成全村負責，這種集體的趨勢就更加強了。

同時政府的政策又使鄉民的態度更趨於消極。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內，鄉民年復一年要大力奮鬥纔能生存。政府要他們集體負責，他們對收稅或募役的人員更為猜忌，甚至對稍為動作越軌的同村農民也存忌心。換句話說，俄國鄉村的傳統在惡劣的自然與人為的環境內有鞏固安全的作用，但是對於個人主動性和創造性的行動則絕不鼓勵，而且認為任何採取步驟改善環境的人對於鄰居的人必會有某種的損害。這一種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所謂「妒忌的文化」（culture of envy），就是在今天俄國平民社會中還是一種重要的現象。

俄國的基督教東正教在十九世紀以前是左右文化的最重要的力量。公元988年 Kiev 的俄羅斯人接受了基督教之後，東斯拉夫人的文化認同基本上取決於東正教，和拜佔廷帝國和南斯拉夫比較接近，和一些鄰近的崇奉羅馬天主教或回教等教的國家則較疏遠。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則俄羅斯之皈依基督教在文化上的作用極為有限。歷史學家曾經研究俄羅斯民眾接受基督教的速度和普遍性。俄國正式皈依基督教時，有一些小區域內原有的民間宗教仍然存在。整個東斯拉夫地帶基督教與前基督教的因素在民間宗教裏有交互的影響，內容頗為複雜。

從另一方面來說，俄羅斯之皈依基督教反而使東斯拉夫地帶和外面的世界隔絕起來。各地的東正教用方言傳教，各地的教會組織各不相同，各自獨立。莫斯科王國成立之後，俄國的基督徒與希臘的基督徒都很少接觸，更談不上與羅馬天主教或回教溝通了。古典希臘的文學、哲學遺產在拜佔廷帝國非常活躍，但對俄國則無影響。

東正教的宗教生活注重以祈禱文為中心的集體禮拜，及個人超越的神秘經驗。東正教雖然繼承基督教的倫理，而且也曾為基督教的倫理辯護，但是東正教並未揭示足為個人指引的倫常法則，從東正教的觀點甚至可以說倫理法則近乎「法律主義」，對於靈性反而有害。俄國中古基督教徒最崇拜的是聖者（saints），但是最崇高的宗教文學只注重如何逃避人世的誘惑，而不注重如何在社會上做正直不阿的人。

當然俄國東正教傳統裏，也有在道德方面對教會與政府的威權提出批評的傳統。例如莫斯科時代晚期的「信仰基督的愚人」(Fools in Christ)運動，主張對沙皇提出諫諍。十六世紀早期的「非占有者」(non-possessors)運動批評大寺院擁有大量土地，壓迫農民，不合基督教的理想。自十七世紀起，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始信徒」(Old Believers)運動，反對東正教修改過的禱文，主張恢復原有的禮拜儀式，每個信徒都要嚴守道德上的紀律。但是這些東正教的異議份子從來沒有討論基督徒對於不合法或背叛上帝的威權，應用什麼方法來抗拒。他們心目中對於俄羅斯統治者最有力的抗議，也只是模仿耶穌的默默受難，消極抵抗而已。

俄羅斯的精英分子自十七世紀後半開始有些新的思潮。大彼得(1689-1725)一朝是一個分水嶺。這一位沙皇下令施行西法，要民間的領袖衣食住行要模仿西歐。他創辦了國家科學院，要民間領袖在思想學識等方面西化。其實大彼得的變法方案的初步收穫極其膚淺。但是在幾十年之內，卻有許多俄國貴族和知識階級自認為乃屬於歐西的社會。他們學會了法文，看歐西最新的書，其中有人採用歐西共濟會(Freemasonry)的道德觀。這樣說來，俄國的高層文化已成為歐西近代文化的一部份。其結果是大家常常說的俄國思想的特徵。自從大彼得變法以來，俄國知識分子對於他們自己享受社會、經濟特權和一般羣眾隔離太遠，深感愧憾。無論俄國知識分子是否處境大為不同，他們自己認為是不同的。俄國知識分子自己也承認他們不但常常接受歐西的思想，而且拳拳服膺，具有強烈的狂熱精神。過去的兩百年內，俄國知識分子而且特別關心俄國及俄國文化傳統在國際上的地位。這些特徵到目前還存在。

本文主要討論了俄國在莫斯科時代及帝國早期制度和文化的若干特徵，包括個人和民族不斷為生存而奮鬥，同時必須創建一個簡單的、無情的行政制度以動員人力物力。俄國的統治者在動員的過程間並未遭受有組織的抵抗，當時也沒有法律傳統來保障人民中有勢力者的權利。俄國商人或其他中間階級都比較軟弱，使他們無法抗拒政府的要求，向政府挑戰。而居大多數的農民則在經濟上和法律上都被迫而居於低下的地位；他們祇能靠複雜的機能以集體決定的方式彼此支持。俄國社會的不同階層由不同的原因，採取了不同的自衛方法，而結果同是破壞了個人的主動精神，使人無法抗拒強橫無理的威權；而抗拒強橫的威權，正是現代化所必須的條件。我們同時還要指出，俄國的東方正教雖然有許多令人欽慕的地方；但是以東正教為中心的俄

國中古文化並不能推動信徒的公民責任感，也不能指引信徒為既有道德又有生產力的公民。到了十八世紀，歐西的理論填補了總數不多的知識分子心裏的空白，但是同時卻使他們孤立於其他人民（也就是知識分子想要服務的的人民）之外。要到最近的幾年，我們纔看到俄國知識分子與其他社會分子之間的距離確實縮短的證據——最近纔有這種由千百萬人形成「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跡象。

本文希望能有助於對於十四世紀與十九世紀之間俄國歷史傳統的了解。依我的看法俄國要到十九世紀中葉纔真正開始現代化。蘇聯最近的發展表示任何國家都不祇是歷史的囚徒。蛻變是可能的，而且是已有的事實。但是歷史經驗影響至為巨大。任何社會逢到危機就可能回到根深蒂固的傳統。祇要俄羅斯民族仍存在，上文討論的傳統、習慣與態度之將重新呈現，似無可置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出專刊

(67)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

李孝悌著 精350元 平300元

本書主要是利用報紙等資料，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全書除了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重新觀察「舊王朝」末年的一些新興事物與現象外，也試圖說明世紀初「啟蒙志士」的主張、作法和日後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Chinese and Russian Traditions Juxtaposed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Kwang – ching Liu*

The defini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call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reasons why breakthrough in this regard was difficul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eed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empirically through the sources regarding the movements that failed – the self-strengthening and reform movemen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urt-sponsored New Policy (*hsin-cheng*)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My assignment today is to offer preliminary comments on Professor Crummey's masterful summary of the Russian tradition, to see whether the latter is relevant to inquiry regard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Professor Crummey's view, modernization includ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emocracy, equality within a legal order, and an educational system based on modern science. Fe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rummey acknowledges, have met all these conditions. Yet in the case of Russian history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trends were, on the whole, toward the exact reverse of these qualities. Autocracy, serfdom and an other-worldly religion that neglected this-worldly altruism were characteristic of Russian society at least until the Petrine reforms of the early eighteenth

* Kwang – ching Liu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and a member of the Academia Sinica. A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a panel 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on November 2, 1991.

century. To view Chinese history from this perspective may illuminate certain themes that are not usually emphasized in the current historiography.

There is a basic difficulty in comparing Russian and Chinese history. The autocratic state-building process in Russia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may find more exact parallel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between the eighth and the third centuries B.C.) in ancient China, when rival states strained their resources in war, when peasants were virtual serfs, and when bureaucracy began to supplant aristocracy. Since this panel is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nd since som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ntemporaneous Russian and Chinese societies is valuable, if only to point up some contrasts, I shall attempt to discuss the Ming-Ch'ing period up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or Crummey's analysis of the Russian tradition. The Ming-Ch'ing period, which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Third Chinese Empire, comprising the Ming (1368-1644) and Ch'ing (1644-1911) dynasties, has sometimes been described as Early Modern China. The question may be asked, however, whether it was modern at all -- whether it could be more accurately designated simply as Late Imperial China. I find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aspects of Professor Crummey's Russia regarding which comparison may be made with China of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These are: 1)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y on history; 2) autocracy and its impact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lite; 3) social structure; and 4)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1.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ina lies to the south of Russia in latitude. Its length and breadth include a great variety of climate and topography. The parts of China suitable for farming on the whole enjoy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 than those of Russia, yet agriculture in China is not

without serious limitations.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rainfall in North China is unreliable, and drought is a frequent occurrence. The Yellow River has frequently flooded, and the Huai River also. North China is blessed with the famous loess soil; millet, wheat, and other dry-farming crops were extensively cultivated, forming the basis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South and Central China, rainfall is on the whole plentiful. Although the soil in these agricultural areas is inferior to the loess soil of North China, the extensive use of fertilizers -- in the lower Yangtze area, the use of "green fertilizers" (*lü-fei*) as well as manure dates back at least to the Eastern Chin period (317-419)¹ -- as well as irrigation canals, ditches, and ponds made possible ric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growing of sideline crops. Beginning in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double-cropping of rice (or of rice alternating with another crop such as wheat) was increasingly practiced in South and Southeast China. Silk had always been a cottage industry. Beginning in the Yuan period (1279-1367), cotton as a crop was widespread and domestic cotton-spinning and weaving became increasingly common.

While life for the peasants seems to have been on the whole less austere in China than in Russia, survival was nonetheless often a problem for the Chinese peasant household. Rapid increase of population (from about 80 million in 1393 to 400 million in 1850) made possible extraordinary application of labor to farmwork, including reclamation of hilly land at the periphery of each province, as well as development of faraway regions by peasant migrants to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China, eventually also to Manchuria and Taiwan.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per acre production of grain increased during the Ming-Ch'ing period, but owing to the growth in population, per capita production declined, resulting in a

1 Li Po-chung, *T'ang-tai nung-yeh ti fa-cha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Nung-yeh ch'u-pan she, 1930), 29, 41-42.

deterioration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² It was difficul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o expect the peasantry to contribute to innovation in their own governance.

The peasant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s was in fact often a negative one. Many lived in abject poverty; those who struggled to survive famines would sometimes join a rebellion. For the sake of social stability as well as its own survival, the state had to maintain a large standing army. In the 1340's, under Mongol rule, the Yellow River had flooded and the Grand Canal was silted up. Severe drought ravaged the Huaipei (northern Anhwei) area. Rebels of the Robin Hood type or of millennial persuasions contended with each other and Chu Yuan-chang (r. 1368-98), who eventually built up a base in Kiangsu and Anhwei, put together the most formidable military force of the time, enabling him to defeat other rebel armies as well as the Mongols. During the three decades after his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in 1368, the officials and commanders who had helped Chu consolidate the empire were eliminated by him one after another, each purge often involving the execution of hundreds who were alleged to have participated in plots against the emperor. Chu's persecution reflects a powerful paranoid personality of Maoist proportions. In order to comprehend his behavior as emperor, however, the historian will perhaps need to consider the extreme severity of the natural disasters that visited the Huaipei area -- the environment of Chu's youth and early manhood in the mid-fourteenth century.

The early Ming period calls to mind another factor in China'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 the harassment and threat emanating from the nomadic peoples beyond China's inner Asian frontier. Not all of China's inland invaders were simply nomads -- some of these

2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1969).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ribal people had settled down in borderlands and had adjusted to the life of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s.³ Typically the nomadic chieftains learned to govern these borderlands through a local Chinese bureaucracy – the most successful cases being the rulers of the Liao (Kitan) and Chin (Jurchen) dynasties that governed north China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part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ies (960–1279).⁴ Both Liao and Chin may be described as sinicized alien dynasties, but this characterization does not apply to the Mongol Yuan dynasty (1279–1367) which governed the Chinese empire through Mongol and Central Asian administrators as well as some northern Chinese who had accepted Mongol rule. The Mongol dynasty in China cannot be accurately described as having been sinicized, yet i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arly Ming institutions, at least those of the Hung-wu (1368–1398) and Yung-lo (1403–1424) reigns.⁵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Mongol leaders returned to the steppes and reverted to their nomadic way of life and warfare; the Ming continued to have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e Mongols. This threat explains why the Ming capital was moved to Peking (to be closer to the strategic line of defense) and why a large army and a centralized government were both necessary. Even before their breach of the Great Wall frontier to assume imperial rule in Peking in 1644, the Manchus had acquired experience governing the Chinese in southern Manchuria through Chinese officials subservient to them. The Manchu ascendancy is explained by their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Banner forces which

3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1 edition), chapters 8, 17. See also Thomas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9).

4 See, *inter alia*, Jing-shen Tao, *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fic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5 See, *inter alia*, Edward L.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1355–143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68-70, 139–40.

included Mongol and Chinese regiments. Having founded the Ch'ing dynasty, the Manchus themselves were increasingly sinicized during the K'ang-hsi (1662-1722), Yung-cheng (1723-35), and Ch'ien-lung (1736-1795) reigns. Yet through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Manchus still hoped to maintain their own military culture of cavalry and archery.

2. Centralization and Autocracy

In his examination of autocracy in the Russian tradition, Professor Crummey has stressed the superior military force of the Muscovite princes as well as the Romanov tsars after them who not only could browbeat the aristocracy but could offer grants of vast estates from the farmland that the state controlled. The nobles were thus transformed into servitors and bureaucratized. To find an exact parallel of such a process of state-building, one needs perhaps to explore early Chinese histor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722-481 B.C.) and the Warring States (403-221 B.C.) periods. Comparison may also be made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regime and the magnate familie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D. 317-589). By the Ming-Ch'ing period, it can no longer be said that imperial authority was maintained by dint of military force or of the landed wealth under its control. Both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bestowed titles upon princes and tributaries. In the early Ming, imperial princes were given large territories as fiefs, yet the feudal age did not reappear. A centralized bureaucracy under a monarch had long been the accepted system, and the imperial monarch had a pivotal place in it. What form, then, did monarchical autocracy take in the Chinese as compared with the Russian system? Surely this is a crucial point in any comparison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traditions.

Ever since the Ch'in (221-206 B.C.) and Han (206 B.C.-A.D. 220) dynasties, the imperial monarch occupied a uniquely sacred

place in society and cosmos. (As early as the Western Chou period,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versal kingship had been evident. Only the Chou king was entitled to worship Heaven, whereas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the feudal hierarchy under him were entitled to worship their immediate ances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ystem of ritual primogeniture). Under the Han the theory developed that the imperial monarch played a crucial role among the cosmic three powers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ity. The emperor occupied a sacred space. Such a world view, as reinforced by the powerful linkage between filial piety (*hsiao*) and loyalty to the monarch (*chung*), was to survive the impact of Buddhism and religious Taoism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The Han world view and ethics were reinforced by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to form an orthodoxy cherished by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lite⁶ -- a system of belief that played into the hands of imperial rulers who won the realm by military force but governed it through the championing of moral norms.

Among China's imperial rulers, Chu Yuan-chang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Ming, r. 1368-98) was second to none in tyranny except perhaps for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 (r. 246-210 B.C.). As shown above, Chu Yuan-chang's purges often caused the loss of hundreds of lives at a time. Officials suspected of disloyalty or corruption were tortured in open court.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a position of influence in the government of previous dynasties, was abolished in 1380. The Ming founder governed not only by terror but also by the inculcation of moral and behavioral norms. He invested and legitimized a host of gods of the popular pantheon, while he strictly prohibited the heterodox millennial beliefs that he had known well as a Buddhist novice in his youth. Popular orthodoxy, like

6 Kwang-Ching Liu, "Socioethics of Orthodoxy: A Perspective," in Idem,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53-100.

mainstream Buddhism and Taoism, was seen by the Ming founder as a force "implicitly assisting the imperial order" (*an chu wang-kang*), a phrase he used in his famous essay on the three religion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⁷

It was impossible for all monarchs to be as energetic as the Ming founder, or the third Ming emperor, Yung-lo (r.1403-24), who could boast military exploits. The fifth emperor of the dynasty, Hsuan-te (r.1426-35), still took government seriously, but few of the later monarchs cared to perform such a pivotal role. Cheng-te, the eleventh monarch (r. 1506-21) spent days at a time at his zoo near the palace, where he practiced the taming of tigers and leopards. When the emperor neglected the affairs of state, power fell into the hands of such grand secretaries as Yang T'ing-ho (1459-1529) and Chang Chü-cheng (1525-82). (The Grand Secretariat, although a part of the "inner court," could coordinate with the "outer court" through high civil officials.) But even Yang T'ing-ho and Chang Chü-cheng had to have allies among the eunuchs who controlled access to the monarch. Wei Chung-hsien (1568-1627), the most notorious of the Ming eunuchs, indeed served in high posts in the outer court as well, while the T'ien-ch'ü emperor (r. 1621-27), an amateur carpenter, busied himself with the ax, the saw, and the paintbrush. There were upright officials at court who remonstrated with the throne and criticized Wei Chung-hsien vehemently. Some of these courageous officials were members of the famous Tung-lin Academy, which stood for governance by the morally good people and who sought higher offices in order to exert moral influence. The Tung-lin partisans were in the best tradition of 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s. What they contributed, however, were only brave words of remonstrance; they never doubted the sacred role

7 *Ming Tai-tsu yü-chih wen-chi* [Imperially authored writings of Ming Tai-tsu] (reprint, Taipei: Hsueh-sheng, 1965), 11:8-9.

of the imperial monarch⁸; their guiding principles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democracy.

Imperial autocracy was even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which governed by patronizing Confucian principles and rituals. A recent work that covers the sources from the palace archives both in Taipei and in Beijing concludes that the Grand Council (*Chün-chi ch'u*), although founded during the Yung-cheng reign (1723-35), actually enjoyed little decision-making power--that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monarch himself. Beginning with the Ch'ien-lung reign (1736-95), however, the power of the Grand Councillors increased. Although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Grand Council were guided by audiences with the monarch, the latter's vermilion pencil was more frequently employed simply to approve the edicts or rescripts drafted by the Grand Councillors.⁹ Nonetheless, the Grand Councillors were themselves appointed by and subject to dismissal by the monarch--or the empress dowager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The Grand Councillors were in no sense representative of any civic body. To be sure, the idealists among officials in Peking--for example, the famous *Ch'ing-liu* (Purity) partisans of the 1860's and '70's--did not hesitate to criticize the court's policies, for example attacking Ch'ing policy toward Russia, France, and Japan as too conciliatory. The young zealots who could boast *chin-shih* degrees and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were for war with any or all of these powers! Like the Tung-lin partisans of the late Ming, the Purists of the late Ch'ing set great store by Confucian ethics, as well as the dynasty's ancestral laws. Nonetheless, the Purity partisan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did represent " public opinion " within

8 Lin Li-yueh, *Ming-mo Tung-lin yun-tung hsin-t'an* [A new study of the Tung-lin movement in late Ming], Ph.D.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984.

9 Beatrice S.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the circles of metropolitan bureaucracy. Peking officials of this type did play a part i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the 1890's; not a few such officials were persuaded by the ideas of K'ang Yu-wei (1858-1927) to move closer to the advocacy of political reforms.¹⁰

3. Social Structure

In his discussion of Russia's traditional society, Professor Crummey finds essentially only two classes -- nobles and peasants. Merchants were in no sense independent of the tsarist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in China, there were essentially also only two classes -- namely, the official-gentry and the commoners. Gentry is the somewhat arbitrary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rm *shen-shih*. *Shen* was defined as "official who resides at his native place." The category includes not only retired officials and those on leave, but also holders of the *chü-jen* or other degrees that qualified them for official appointments. Those who possessed only the *sheng-yuan* degree, which did not enable the degreeholder to qualify automatically for official preferment, were described as *shih* (literati). But the combined term *shen-shih* did not necessarily exclude *sheng-yuan*. A *sheng-yuan* could be regarded as *shen-shih* (gentry) depending on whether he had enough wealth in combination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to give him local influence.

There was impressiv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Long-distance trade developed; many merchants had become rich, yet they did not constitute a social class. This was partly because of the social values that put a premium on scholarly and bureaucratic achievement. The merchant's status often lasted only for one or two generations; the sons of merchants had the advantage of being taught by highly paid tutors. Once they had

10 K'ung Hsiang-chi, *Wu-hsü wei hsin yun-tung hsin-t'an* [A new study of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Changsha: Hunan Jen-min, 1988).

received training in the classics and in essay-writing, they seldom aspired to pursuing the business life. As such a merchant's son, Shen Yao (1798-1840), has written: "In ancient times, the son of a scholar could become a scholar, but in latter times, only the son of a merchant can become a scholar."¹¹ Sons of merchants would adopt the gentry lifestyle; they becam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gentry through marital and lineage connections. Professor Crummey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Russian merchants, having undertak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llecting urban taxes, requested the state's prohibition of the urban dwellers' changing domicile--in effect enserfing themselves. Under the Ming dynasty, responsibility for taxes was also tied to registration under the census. Commoner-merchants who wished to avoid corvée service would have to strive for connection with the gentry. Chinese merchants often took the initiative in business and in welfare and other public services, but unlike the bourgeoisie of western Europe, they did not aspire to a voice in government.

Professor Crummey points out that the Russian peasants were accustomed to collective deliberation within the village commune, yet this institution fell short of self-government. At the end of the Time of Troubles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the tsarist state, at the behest of the aristocratic landowners, used police forces to compel peasants who left their original domicile to return to their native place. The Russian peasant not only had to pay rent to the landlord and taxes to the state; he did not possess personal freedom, and in this respect was comparable to the slaves in the Americas. Throughout the length of Chinese history, the peasants' condition was often no better than that of serfs, although from Han on the prevailing system was not to tie the farmers to the land. It has been

11 Cited in Yü Ying-shih, *Chung-kuo chin-shih tsung-chiao lun-li yü shang-jen ching-shen* [Early modern Chinese religious ethics and the merchant's spirit] (Taipei: Lien-ching, 1987), 97.

determined that domestic slavery amounted to less than one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in Han times.¹² There was slavery in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the Period of Disunity (317–589) and under Sui (581–618) and T'ang (618–907). There was also slavery under alien rule, that of the Liao (907–1122), Chin (1122–1234), and Yuan (1271–1368) periods.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the tenant/servant system that smacked of slavery was widespread, as well as indentured domestic servitude. The tenant/servants “tilled the lord's land, were buried in the lord's hills, and lived in the lord's houses.” They enjoyed some protection, yet were demeaned in status.¹³ In 1727 the Ch'ing emperor Yung–cheng's edict of manumission raised the status of the pariah people to enable them to enter into marriage with ordinary people and to take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tenant/servant system continued to exist, however, in a few known cases such as Hui–chou (in southern Anhwei).

The principal problem of the Chinese peasants was, however, not the status of dependency, but poverty. Since population continued to grow while technology remained constant, greater input of labor did not increase output proportionately.¹⁴ There was the problem of involution – the per capita production declining despite the increase of total output. The problem of livelihood and of economic security

12 Tung–tsu Ch'ü, *Han Social Structur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107–112; C. Martin Wilbur,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43).

13 Yeh Hsien–en, *Ming–Ch'ing Hui–chou nung–ts'un she–hui yü tien–p'u chih* [Rural society and the tenant/servant system in Hui–chou during the Ming–Ch'ing period] (Anhui: Jen–min ch'u–pan she, 1983). Sources cited by Yeh indicate that the system existed in at least nine provinces, although the documentation cited for each province amounts to no more than two or three references. See pp. 232–33 and note 1. On Chinese bondservants of the Manchus, see Jonathan D. Spence,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14 See especially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Idem,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varied from region to region and from place to place. In more prosperous areas, such a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enantry was widespread yet there were restrictions on transactions involving land. Although the subsoil rights of farmland could change hands frequently, the "surface rights" could only be sold to neighbors or kinsmen and then not irretrievably; the seller would retain the right to redeem the land, thus giving the tenants a degree of security.¹⁵

4.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Professor Crummey offers profound comments o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ussian tradition. Unlike Catholicism in western Europe, the Orthodox church in Russia supported royal prerogative almost unconditionally.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Russian tradition were not quite unified, yet the Muscovite kings regarded themselves as defenders of the faith, and Russian Orthodoxy exalted the tsar as head of a unified state. This rationale for political power did not change until Peter the Great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turned to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western Europe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state power. Yet the goals of the autocracy in Russia did not really begin to change until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unity of state and doctrine has long been China's heritag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when Confucianism was honored by the imperially appointed erudites and the value of the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 discounted, orthodoxy was clearly defined. In the subsequent epochs that saw the ascendancy of religious Taoism and of Buddhism, the priests and the monks still honored the ruler, perhaps in a way comparable to the Russian church's regard for secular authority. Beginning with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lassical teachings as interpreted by the Neo-Confucians dominated the literati ethos through the syllabus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religion of

15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107, 157-59, 309.

the Chinese — their ultimate concern — was dominated by the unilateral obligations of subject to monarch, child to parent, and wife to husband. The interconnectedness between filiality and loyalty to the monarch was clearly expounded in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Great Treatise" of the *Book of Changes*.¹⁶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through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neage organizations, values consonant with doctrine — loyalty to the monarch, filial piety, and chastity of wife and widow — were propagated through literary forms such as fiction and drama and increasingly permeated popular culture.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was gradual but inexorable.

With Christianity, state and church could be separate yet co-exist: "Render un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 and un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 But the further injunction was to "love thy neighbor as thyself" — religious faith must be accompanied by human concern.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of Orthodoxy in Russia, Professor Crummey has stressed the shallowness of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Russian society. Early i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hurch, liturgy in the vernacular languages allowed elements of the pre-existing popular religion to persist in an admixture with Christianity. The Russian church had very limited contact with the Orthodoxy of Byzantium, to say nothing of the Catholicism of the West. Except for its emphasis on collective worship, great store was set in Russian Orthodoxy on spiritual life of a supramundane kind. Regarding the conduct of this life, obligations to society beyond certain etiquette and self-discipline were not required, to say nothing of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civic realm.

The Chinese religious and ethical doctrines were, of course, very different from Christianity. The concerns of the Chinese were principally in regard to this life and the secular world. The

16 Liu, "Socioethics as Orthodoxy," 55-62, 73.

Confucians exalted the virtues of filial piety and concern for humanity (*jen*). Taoist ethics were centered on the self, while Mahayana Buddhist compassion provided a profound basis for altruism. As to the diffuse popular religion, the deities worshipped by the masses did not require a radical change in inner life.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does not challenge the Confucian norms of ethics, yet it goes beyond them in invoking a benign, motherly sympathy or the heroism of knight-errantry. Chinese popular beliefs do not seem to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civic virtues. Faith in a deity varies in proportion to the latter's efficacy (*ling*), that is, its seeming efficacy. The individual worshipper actually has a choice among a number of deities to which to pay obeisance.

Professor Crummey has also discussed minority traditions within Russian Orthodoxy which departed from the norm of the church in proposing remonstrance with the crown or protest against the monasteries' exploitation of the peasant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Old Believer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erely called for return to the original Orthodoxy and strict moral discipline. Regarding resistance to inimical forces of the world, they merely advised quiet endurance, like Christ's acceptance of suffering. Such Russian tradition seems to be socially very negative when compared with the views of responsibility cherished by the Wang Yang-ming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that emerged in the late Ming. The latter persuasion, which stressed action as well as knowledge, was perhaps more amenable to democratic change, although the Wang Yang-ming school constitutes only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prospects of modernization.

Professor Crummey's discussion of Russian cultural tradition is not confined to religion. He recalls that there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rofound stirrings in the thought of the Russian elite. Peter the Great's reforms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introduced to Russia scholarship and institutions of western

Europe in a way that seemed at the time to be superficial. But within a century a new self-consciousness appeared among Russian intellectuals. They became international in outlook, yet they affirmed their own identity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y were preoccupied, moreover, with the deep gap between their own way of life and that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y were tormented by a deep sense of guilt.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o,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 Were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similarly possessed by a sense of guilt? Did such contrition add to the pathos and ardor of their lives? Schola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recently found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lassic Russian novels,¹⁷ but the question remains open as to the earlier period.

In his analysis of the Russian tradition, Professor Crummey has found that initiative was lacking both in upper-class aristocrats and lower-class peasants; the merchants, too, did not exert an influence independent of the state. As compared with its Russian counterpart,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was vast and intricately organized. The fiscal system, especially, was based on outdated formulas, making impossible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for growth.¹⁸ Yet there was initiative among those officials who were intellectuals and guided by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y aspired to opposing political power in the name of moral principles. Like its Russian counterpart, however, the Chinese tradition was devoid of the concept of civil rights either for the individual or for corporate entities. In law as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re was no effective basis for checking arbitrary power. "Heaven sees as people see, Heaven hears as people hear,"

17 See Mau-sang Ng, *The Russian Hero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18 Ray Huang (Huang Jen-yü),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See also this author's *China: A Macro History* (Armont, N.Y.: M.E. Sharpe, Inc., 1988) and other writings.

Mencius had taught. The theory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undoubtedly had an ameliorating influence on policy; yet it did not provide a legal framework for a loyal opposition. Remonstrance was permitted, but often at the memorialist's peril.

As compared with their Russian counterparts, Chinese peasants perhaps demonstrated greater initiative, in improving their families' lot and in joining rebellions that proclaimed "obedience to Heaven's will." Professor Crummey cites a modern scholar who points to "a culture of envy" among Russian peasants. They were loath to see fellow villagers act to improve their lot beyond such action as village conventions would permit. Although the existing view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has not been nearly so harsh, books have been written on the allege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of weakness in confronting authority and of inertia in responding to the need for political change—the isolated cases of peasants joining in a rebellion notwithstanding.¹⁹ Scholars who hold such views of political culture include especially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²⁰ but similar views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have been expressed in the famous television program, *Yellow River Elegy* (*Ho shang*), show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1988 before it was proscribed.²¹

19 See my article "World View and Peasant Rebellion: Reflections on Post-Mao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0 (1981): 295–326.

20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revised edition of this book is now available). See also the same author's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ter 7. For a discussion, see Frederic Wakeman, Jr., "Kuan yü kuo-min hsing ti t'an-so" [Explorations i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ed., *Chung-kuo ch'uan-t'ung wen-hua ti tsai ku-chi* [A reapprais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Jen-min ch'u-pan she, 1987), 159–89.

21 Su Hsiao-k'ang and Wang Lu-hsiang, *Ho shang* [Yellow River elegy] (Taipei edition, 1988). See also, for example, Min Ch'i, *Chung-kuo cheng-chih*

Is there a *Yellow River Elegy* in Russia today? How do the Russian intellectuals in 1992 see their imperial tradition? Professor Crummey's paper has not dealt directly with the changing outlook in Russia today; however, he does refer to the emergence of a Russian "civil society," on which the shadows of an intractable past are still cast. I can say without hesitation that a civil society is in existence in Taiwan today. Chinese tradition has gone through a structural change here and is modified beyond recognition. Has a civil society also appeared across the Strait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en overcome on the mainland? I do not know.²² One looks eagerly for sign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cross the Straits, but at this writing it seems to be impossible to predict when this would occur.

wen hua -- *Min-chu chu-i nan-ch'an ti she-hui hsin-li yin-su*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 the sociopsychological factor in the difficult birth of democracy in China] (Kunming: Yunan Jen-min ch'u-pan she, 1989).

- 22 For recent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stressing market economy and legal system, see articles by Shih Yuan-k'ang in the Hong Kong journal *Erh-shih-i shih-chi*, 6 (Aug. 1991), 105-120; and by Wang Shao-kuang in *Ibid.*, 8 (Dec. 1991), 102-114.

* * *

從俄國傳統看中國傳統

——從谷蘭美先生的文章說起

劉 廣 京

自變法維新的觀點看中國傳統是一個很複雜的學術任務。中國近代史中本來就有變法不易成功、傳統難於突破的問題。從自強運動、戊戌維新、清末新政的史料裏，有系統地檢討這些運動失敗的原因，似乎還有許多學術工作可做。但是今天我的任務主要是針對谷蘭美先生對俄國傳統的分析，來吸取一些可以和中國傳統互相比較的事實。谷先生認為現代化應包括工業發

展、民主政治、國民平等享受法律秩序，及以科學為基礎的現代教育。谷先生認為世界上能達到這些條件的國家不多，但是近世史上的俄羅斯於十四至十九世紀發展其特殊的文化與政治，和上述現代化的條件相去太遠，在政治和社會結構上都有與現代化背道而馳的發展。我們將中國自明代初年至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之前的歷史和當時俄國的歷史比較，似乎可以突顯一些重要事實，足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參考。我今天簡短的發言便是以這些事實為範圍。

谷先生這篇精彩的報告似乎可以從下列四方面來討論。其一是地理環境對俄羅斯歷史的影響。其二是俄羅斯的專制政治，特別是沙皇對貴族的控制。其三是俄羅斯的社會結構。其四是俄羅斯的宗教與政治文化。我們就這四點討論中國傳統，似乎可以注意到一些通常被忽視的事實。

一、地理環境

我們要注意把中國歷史和俄羅斯的歷史比較，有一個根本的困難，就是中國歷史發祥較早，在十四世紀以前，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我們在中國歷史裏尋找和俄國近世史可資比較的事實，就會聯想到紀元前數百年春秋戰國時期一些國家的內政問題和社會問題。但是今天我們的集會由近代史研究所主持，討論的範圍是近代早期的歷史。所謂早期近代史，主要是明清二代的歷史。把明清的歷史和同時代的俄國比較，顯然有許多結構上的不同，但是也不是沒有可比較的地方。谷先生所說地理環境對政治的影響，就是可以比較的一個例子。

中國在緯線的位置是在於俄羅斯以南，幅員很大，東西南北的地形和氣候不同。宜於農業的地帶並非如所想像的廣博，但與俄羅斯對比，條件顯然較為優越。中國的農業環境也有許多限制。就氣候與土壤而言，華北因為雨量不可靠，時常有旱災之虞，同時因為黃河常常氾濫，又有水災之憂。淮河流域也是這樣。但是儘管如此，華北（包括關中平原）有肥沃的黃土，農業仍能發展。至於長江下游、中游，以及四川省及東南沿海，因為雨量充足，土壤雖不能與華北的黃土比，但是自東晉以來，長江流域等地區的農民大量利用肥料，^①又有溝渠池塘的蓄水、輸水工程，稻田產豐；宋代以降的品種改良使每年有兩次以上的收成（例如，兩次稻米收成，或稻一次、麥一次）。這些區域的農田又適宜於經濟作物，如蠶桑與棉花；男耕女織，生計比較容

^① 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頁 29, 41-42。

易維持。但是，整個說來，各地農民仍面對著生存的問題。明清人口長期增加的趨勢使人均產量難於增加，而且還減少。^②各地農民雖然盡量改善土地利用；但是必須離鄉背井，移殖於各省邊區及邊遠省份的農民數目不斷增加。明清二代雖然農業生產並非全無進展。^③但是農民生計艱難，就難希望他們在政治上有創新的貢獻了。

事實上，農民對政治的貢獻主要是負面的。農民在生存線上掙扎，遇到天災則除了餓死溝壑之外，就有或揭竿而起，或隨眾作亂的事。政府方面便需要相當規模的軍隊，以維持社會的穩定。元代到了十四世紀中葉，黃河下游及淮北一帶饑荒，造成羣雄並起的局面。後來農民出身的朱元璋雄踞一方，創立新朝代，主要靠軍隊的武力。明代創立之後，朱元璋剷除當初為他立功的文武大臣，反映朱元璋多疑而又殘酷的性格。但是歷史學者似乎必須自十四世紀中葉淮北非常嚴厲的天災說起，纔能解釋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後的心理狀態。

我們必須注意到中國歷史上另一個極重要的地理因素，就是中國的內陸邊疆屢受外族的侵擾——這些外族主要是游牧民族，一部份在邊境地帶住下，儘可能控制當地的農業人口。部落的酋長也利用中國人來收稅。^④北宋時代的遼和金顯然已經漢化頗深。但是蒙古人佔領全國，主要依然倚賴游牧部落的武力，又利用色目等人辦捐稅，漢化的程度不深。蒙古王朝的作風對於明代政治的影響是很顯明的。明代洪武、永樂兩朝的制度頗有沿襲元代制度的跡象。蒙古人退出中原，恢復游牧生涯，不時入侵，明初諸帝不能不以大軍抗拒，這也可能是促使明代中央集權的原因之一。至於滿洲人入關之前已經學會了經由漢人官吏控制遼東的農業人口，而八旗的實力仍是他們奪天下的憑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雖然漢化漸深，但是滿洲人的騎射文化一直到十八世紀他們還是要儘量維持的。

② 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1969).

④ Owen La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1 edition), Chapters 8, 17. 參閱 Thomas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9).

二、中央集權與專制政治

谷蘭美先生討論俄國傳統的專制政治，指出莫斯科時代的王朝和後來的羅曼諾夫沙皇都擁有壓倒形勢的武力，並控制面積頗廣的土地，不但可以用武力來控制當時的貴族，而且可以以頒賜土地為引誘，使貴族為王室服務。這種王權（或皇權）與貴族對抗的情形，中國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和後來的南北朝時代都可以說也有過。但是到了明清時代，皇帝便不能只靠武力和土地的佔有來維持威權了。明代和清代都有封藩的政策。明初的皇子和少數功臣，多少都曾有頒封的土地。但是封建時代在中國早已過去。在郡縣制度之下施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在明清官僚政治中，皇權到底是重要到什麼程度呢？中國傳統中的專制政治採取什麼形式呢？要說清這一點，中國和俄國（以及西歐國家）在歷史上的比較纔能夠有意義。

皇帝的地位自秦漢以來已經有神秘的、獨尊的地位。（其實遠在西周時代，王室的地位已非一般公侯伯子男的家族可比。只有周王可以祭天，其他貴族只能依宗法制度祭直系的祖先。）在漢代有系統的宇宙觀裏，天子的地位可以說是執天、地、人三才的把柄；雖然不是神，卻有神聖的身份。這種宇宙觀和漢儒的綱常名教理論合起來；忠孝並稱的觀念歷南北朝隋唐的大動盪仍未消失；再加上宋代儒學及史學家的渲染，也就成為精英分子的信條，被憑武力興起的帝王利用了。

中國歷史上的暴君，秦始皇以後明太祖應首屈一指。他誅伐功臣，被株連而遭刑的，每次以百千人計。中國自漢以來的政治制度，宰相（或稱中書省）為外朝百官之首，雖須奉承皇帝，但仍有習慣上之權力。明太祖廢宰相的制度，於祖訓中載明，不許後嗣的君主恢復這個制度。明朝的皇帝，自明太祖起便以嚴酷的刑罰對待士大夫（包括所謂廷杖）。明太祖用恐怖政策來治理國家，而且要控制人民의思想和信仰。他以皇帝的地位，冊封百神。當時為人迷信的神祇，不論是佛、道或是正派的民間宗教，在象徵的層面上，好像都承認皇帝和官僚制度。正如明太祖在《三教論》裏說佛道的正宗都是「暗助王綱」，也就是說三教都承認皇權之為天經地義。^⑤

事實上在一個朝代裏不可能每一個皇帝都有朱元璋的能力。明代的洪武、永樂二帝確有才幹能夠擴張專制政體，但是後來的皇帝便很少能如此了。明朝第五代的宣德皇帝還算是對政事有興趣；後來的皇帝如正德，整天

⑤ 《明太祖御製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65 影印），卷 11，頁 8-9。

歡喜玩，曾造一座動物園，讓他在那裏馴服虎豹。在這種情形下，朝廷上的文官，尤其是內閣大學士，實際權力便大為增加。明代的名臣楊廷和、張居正就儼然以大學士的身份操與宰相相似的權力。但是晚明除開張居正在位時之外，實際上的決策、用人之權常常落到宦官手裏。天啟一朝因為皇帝歡喜做木匠，整天拿著斧鋸和油漆的刷子，大權落到著名宦官魏忠賢手裏。當時翰林院、御史臺都不乏正直的官員，上疏諫諍。著名的東林黨人便是憑義理和原則，要在朝廷裏爭取善人（君子）的勢力。^⑥東林黨人是知識分子關心世事，力爭上游的道義結合，但是東林黨人充其量也只能「匡諫」人君，對於皇帝的神聖地位，沒有質疑，也就難於為民主的先聲了。

中國專制制度到了清代而益牢固。近來有一部新書，用臺北和北京兩處的古宮檔案研究軍機處的創立與演變；所得的結論是康熙、雍正二帝親政非常精勤，雍正時已設立的軍機處其實並沒有決策之權。但是從乾隆朝起，軍機處草擬的諭旨，皇帝大多數都由硃筆照准。軍機大臣雖然秉承皇帝面授的旨意，實際上的權力已經相當大。^⑦但是軍機大臣的人選是由皇帝（或後來的太后）決定。他們不能說是代表任何民間團體。後來同治朝（其實咸豐朝已如此）京官中的清流分子常常批評中樞的政策。但是所謂「清議」態度激昂，在外交政策上常主張不惜一戰。他們的主張常常不切實際，而且和明代的東林黨人一樣，注重本朝的祖法和儒家的禮法。但是他們總算是代表京官中一部分的「輿論」，後來對戊戌年前後的變法運動頗有作用，^⑧顯然有一部分京官願意接受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思想。

三、社會結構

谷先生討論俄國專制政體之下的社會結構，認為俄國在十八世紀以前基本上只有兩個階級，就是貴族與農民；商人不能獨立，只能算是王權的附庸。明清時代的中國社會，其實也只有兩個階級，就是官紳與平民。紳是紳士，到了明代定義很清楚：官之居鄉者曰紳，而有舉人功名的人，因為有做官之資格，也可以稱為紳。僅有生員資格的人只能說是士了。但是紳士兩字合起來則指地方有地位、有勢力的人，縱使沒有做官的經驗，也因為與官有關係而有勢力。生員究竟應算是平民，或因其有勢力而稱曰紳士，則因地因

⑥ 林麗月：《明末東林運動新探》（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84）。

⑦ Beatrice S.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⑧ 參看孔祥吉：《戊戌維新運動新探》（長沙：湖南人民，1988）。

時而不同了。

明清時代中國商業發展頗為可觀。經商致富的人數目不小，但是商人還不能自成一個階級。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人的社會價值觀特別注重讀書中舉；商人的身份多半只是一兩代的事。商人子弟讀書的機會好，多讀經書，多作文，這些子弟便不想做商人了。清代的沈垚（1798～1840）說：「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⑨商之子許多人接受紳士的生活風格，經過婚姻、宗族等關係和紳士階級打成一片了。谷先生指出俄國商人包完城市居民的稅，於十七世紀中葉竟要求政府禁止城市居民遷移住處，可以說是商民自願奴化。明代的包稅制度和居民的戶籍也有連帶關係。商民要避免服役便須爭取紳士的地位或關係。中國商人在營業及公益事業上常常採取主動，只是在政治方面沒有採取主動，不能和西歐的中間階級比較。

谷先生指出俄國農民雖然在鄉村公社裏有集體商議的制度，但是沒有自治的效果。到了十七世紀中葉暴亂時代結束之後，沙皇政府應貴族地主的要求，用警察的權力捕捉擅離原住鄉村的農民，解還原住的鄉村。農民向地主交租，又須向國家納稅，其人身之不自由足稱農奴，可以與新大陸的奴隸比較。中國傳統的農民也有與農奴地位近似的情形。但是漢代的奴隸嚴格說來數目尚不及人口總數百分之一。後來南北朝隋唐的寺院中有奴隸，遼金元等外族統治之下也有奴隸。明清仍有佃僕制。佃僕世代「種主田、葬主山、住主屋」，雖有一些保障，卻只有賤民的身份。這種事例全國至少有九省有之，每省卻只有兩三處見於史料。^⑩清雍正皇帝於1727年頒「開豁賤民」的諭旨，嗣後有些地方（如皖南的徽州）仍有佃僕制，但此種事例不多。農民最大的問題不是人身地位，而是貧窮；在人口眾多的情形下，耕田和紡織手工業，儘量多投入人力，但是人均產量總是下降，生活程度也是下降。全國各地的情形，並非一樣。比較富庶的核心地帶，例如長江三角洲，儘管農民中佃農佔很大的百分比，因為依習慣田產的「田底」買賣頗為頻繁，而「田面」或「田皮」則不常出賣，即使出賣要先讓給族人和鄰里，而且買主要允許賣主贖回，不能「絕賣」。這樣耕田的佃戶就可以較有安全感了。^⑪

四、宗教與政治文化

^⑨ 轉引自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1987），頁97。

^⑩ 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僕制》（安徽人民，1983），頁232-33，註⑩。

^⑪ 參閱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pp. 107, 157-59, 309.

谷蘭美先生對俄國的宗教和政治文化有很精闢的觀察。俄國的東正教和西歐的天主教不同，對王室極為擁戴。雖然嚴格地說來，俄國並沒有做到政教合一，但是莫斯科的王室以宗教的保衛者自居，而東正教的神學則擁戴沙皇為統一帝國之首。十八世紀的大彼得皇帝主張西化，用西歐國家的理論來為俄國皇權辯護。但是俄皇窮兵黷武的政策一直到十九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纔真正有變化。

中國自古就有政教合一的趨向，到漢代罷黜百家、尊崇儒學，這個趨勢更為顯明。後來魏晉、南北朝、隋唐，道教和佛教盛行，而正派的道士和和尚大體上還是擁戴皇權，略與俄國的東正教相似。宋元以後儒家的經典經由考試制度，支配士大夫的宇宙觀和倫理觀。中國人的終極關懷——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宗教——就是綱常倫理。忠孝的義務互相聯鎖，《孝經》和《易經·繫辭》裏講得很清楚。隨著明清考試制度和宗族組織的發展，忠孝節義等觀念為士大夫及其家屬的規範，也漸漸深入民間了。

依照基督教的教義，政教可以分立而並存：「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但是，「愛上帝就要愛鄰舍的人」，宗教信仰必須表揚於倫理的關懷。谷先生討論東正教在俄羅斯的發展，則認為基督教的影響力不深。俄國人接受東正教之程度很有限；各區域方言不同，原有的民間信仰仍以不同的方言表現。俄國的東正教和拜佔廷的東正教很少聯繫，和西歐的天主教更形隔絕。俄國的東正教除注重集體的禮拜外，則注重個人超人世的精神生活，至於此世的一生，則除開要遵守一些最起碼的紀律外，並不注重社會上的義務，更談不到公民的職責。中國的傳統無論儒家思想和佛教都與基督教不同。中國人對此世最為關懷。儒家注重孝和仁，佛教注重憐憫眾生，和俄國東正教相形之下，似乎皆較為積極。反觀中國的民間宗教，只要人虔誠崇奉，可以不必注重內心生活或精神生活。中國的民間信仰富容忍性，承認儒家道德卻同時注重慈愛的性格和俠義精神。中國民間宗教雖然未必注重公民道德，但信仰以靈驗為歸依；諸神只聽人選擇而已，倒有一點尊重個人的傾向。

谷先生討論俄國傳統的宗教曾提到東正教內為數極少的宗派。早期有人主張應對王室提出諫諍，也有人批評東正教寺院之壓迫農民。但是十七世紀成立的原始信徒（Old Believers）主張恢復東正教的原貌，嚴守道德上的紀律，對於如何抗拒不良的勢力，則只勸人倣效耶穌，默默受難而已。這和明清儒學之注重踐履或主張知行合一，相形之下，則似乎較為消極，離政治上

的創新尤遠了。

谷先生討論俄國文化傳統，指出宗教不是唯一的因素。俄國統治階層的精英分子到十七世紀末已有新的動向。十八世紀初葉大彼得的西化運動，要模倣西歐的學術文化，在當時看來，頗為膚淺。但是西化運動在一世紀之內竟造成知識分子的新自覺：對外而言，於向西歐學習之外要肯定俄國文化的國際地位；對內而言，則自慚於特權階級的生活方式，對於本國社會高層低層之間的鴻溝深感不安。這種精神與中國知識分子向來的自覺竟有近似之處。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憂國憂民。人民大眾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使知識分子有無從擺脫之責任感。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自己不務實際的生活是否益發問躬有愧？是否因內疚而對人對事益發熱情？近來學者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發現至少在小說的範圍內，有受俄國十九世紀文學影響之處。¹²

谷蘭美先生檢討俄國傳統自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的政治文化，指出無論是上層階級的貴族或下層的農民都缺乏主動力。少數的商人也只藏身在皇權之下，低聲下氣，無所展布。和俄國傳統比較，中國的官僚體系更複雜，而且更強固。財政系統尤其是公式化，不足以動員民力。但是官僚中之為知識分子者倒頗有主動力，憑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要以道統和政統抗拒。但是中國傳統和俄國傳統一樣，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權利的觀念很淡薄，無論是在法律上或在政治制度上，對於武斷的政治勢力，皆無法制衡。谷先生指出有些研究俄國民間社會的學者認為俄國農民有一種「妒忌文化」，同住鄉村的人不願意看到其他村民不顧傳統的約束，自謀出路。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人，雖然沒有這樣苛刻的看法，卻有人強調中國人崇拜權威，心理上有倚賴性，同時則對政治上的創新沒有興趣，也不敢有興趣。堅持這種看法的人以美國的政治學家為多，¹³但近似的論調在大陸上三、四年前出版的《河殤》裏已經有表達了。¹⁴

¹² Mau-sang Ng, *The Russian Hero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¹³ 最顯著的例是白魯詢 (Lucian W. Pye)。他所著的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8) 最近有修訂版問世。另見他所著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七章。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對上述看法的述評，見所著「關於國民性的探索」，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1987），頁 159-89。

¹⁴ 蘇曉康、王魯湘：《河殤》，1988版。參看閔琦：《中國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

俄國有沒有《河殤》？當代俄國的知識分子對他們自己的傳統如何解釋？谷蘭美先生這一篇文章並沒有詳論當代在變遷中的俄國思想。谷先生認為近年俄國確有巨變，「公民社會」的輪廓已在俄國出現，只是傳統的陰影仍然存在，不易消滅。就當代中國而言，我們可以毫無猶豫地說：今日臺灣已經有公民社會的實現；中國傳統雖在臺灣仍保存，但在臺灣的中國傳統似乎已有結構上的變化。當前的大陸是否也有公民社會的發展，是否仍為中國傳統負面的政治文化所支配，就要看今後的發展了。^⑤我們只能拭目以俟大陸公民社會的出現，卻無法預知其何時實現了。

^⑤ Civil society 可譯為「民間社會」或「公民社會」，亦可譯為「市民社會」，以突顯其社會、經濟、法律等方面之條件。參閱石元康：「市民社會與重本抑末——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障礙」，《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6（1991年8月），頁105-120；王紹光：「關於『市民社會』的幾點思考」，同上，期8，（1991年12月），頁102-1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論文集

- | | | |
|------------------------|--------|--------|
| ① 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 精 500元 | 平 450元 |
| ②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 精 700元 | 平 600元 |
| ③ 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400元 | 平1200元 |
| ④ 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300元 | 平1100元 |
| ⑤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400元 | 平1200元 |
| ⑥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400元 | 平1200元 |
| ⑦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500元 | 平1300元 |
| ⑧ 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 精1500元 | 平1300元 |
| ⑨ 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 | 精1100元 | 平1000元 |
| ⑩ 中國現代化論文集 | 精1200元 | 平1100元 |
| ⑪ 近代中國科技史論文集 | 精 450元 | 平 400元 |
| ⑫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二冊） | 精1600元 | 平1400元 |

函購八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wer Yangzi Education and the Lower Yangzi Educated Elite, 1895-1911

Barry Keenan*

After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wo periods of government-sponsored expansion of loc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ccurred in the late-Qing. One was the Tongzhi policy of expanding charitable public schools, and local academies, which focussed initially on the 1864-1874 decade. The second followe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ne Hundred Days of Reform in 1898 and continued until the fall of the dynasty in 1911.

In the forty years after 1864, the cadre of academy-educated members of the local elite increased steadily. The revival of academies and public charitable schools in Jiangsu expanded the opportunities and initiative of the educated elite in local areas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growth in activism by the educated local elite became clear in developments after 1895. Following 1895, the right to organize associations of educators, and the rights of nonofficials to manage the plethora of new public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ere gradually assumed by the local educated elite, and indeed acknowledged by the state in 1906.

The conflicts within the *shenjin* (gentry lapel) stratum from 1901 to 1911 which emerged at the subcounty level, revealed the underside of China's "blue collar" crime, in which the peasant was often the

*Barry Keenan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Denison University in Ohio. He presented this lecture in June, 1992, while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This material will appear in Chapter 5 of Barry C. Keenan, *Academy Revival and the Manage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65-1911*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Copyright 1992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ultimate victim. With local institutions of education expanding, resource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hem were not easily extracted locally. Yet despite tax and religious resistance groups, the local educated elit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nd managed schools, formalized countywide organizations of educators, and continued to expand the number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y managed.

The Japanese military blow in 1895 stunned the centralized government, and forced it to release its control over many national institutions. Inspired, in part, by the need for radical change after the Japanese defeat, decentralizing reform initiatives were begun in 1896 but were viciously repressed after the Hundred Days of 1898. Despite national-level repression however, regional officials and local elites were impelled of necessity to expand their range of activities as crisis management discontinued many central government functions—until the New Policies attempted to reimpose them in 1901.

The birth of the first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Shanghai, for example, resulted from the inability of Qing officials, after the war with Japan began in 1894, to carry out long-standing projects already underway, such as widening narrow streets to increase public safety. The 1894-95 war diverted the time and resources of national officials in charge, with the result that by default and for the first time local figures organized and ran the new Shanghai city council. The political crisis itself also stimulated changes in education. In 1896 there existed in Shanghai a branch of the strident, self-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 *Qiangxue hu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elf-strengthening). In the next few years several early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also formed—fueled by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Japan and by Shanghai students at the new *Nanyang gongxue* (Nanyang public school). Sheng Xuanhuai (1844-1916) set up this school in 1896, and the former Longmen Academy student, Zhang Huanlun who himself had a fully classical education, became director in 1897.

M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ocieties, and clubs were founded in

Shanghai a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fter 1895. After the repression of the reformers of 1898 most continued to exist inconspicuously, and with no national support. Then, after 1900, local educators formed new organizations in Shanghai at a surprising rate. While most of these organizations were without explicit political platform,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set up at all indicated the increased role of local elites in education.

In 1902, for example, a Shanghai Education Society (*Hu xuehui*) formed with monthly contributions required of its members. They established a charitable elementary school, a physical education society, and a night school which taught a wide spectrum of subjects. In 1905 the society was joined by another, staffed primarily by former Longmen Academy which would eventually combine with the *Hu xuehui* in 1908 to form the Shanghai County Educational Society (*Shanghai xian jiaoyu hui*). The 1905 society was called the Education Research Society (*Jiaoyu yanjiu hui*) and was cofounded by Yuan Xitao (b. 1865), a Longmen Academy student who had been important in Longmen's own transformation into a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the preceding year. From 1906 to 1911 the extraordinary proliferation of these associations, so many of which had connections to 1890's *xuehui* (study societies), reveal an all but irrepressible organization of Jiangsu's local educated elite.

In short, a sense of national crisis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1895 defeat by Japan posed issues of restor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similar to national priorities in the 1864 to 1874 decade. In both periods the power of the Lower Yangzi educated elite expanded unnaturally fast because of state policies. But during the fifteen years from 1896 to 1911 the Lower Yangzi educated elite began acting as a group, and institutionalized their power. The difference in the 1896 to 1911 period was that the Lower Yangzi educated elite also organized.



學人簡介

湯 志 鈞

楊 志 遠*

湯志鈞先生是當今治中國經學史的知名學者。先生1924年生於江蘇武進（今常州市），母親莊氏，為清代今文經大師莊存與的六世族孫。湯先生自小在母親的督促下，打下深厚的舊學底子。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常州淪陷，湯先生全家避居河口鎮，次年，中學復校，但先生不願受奴化教育，乃從賀懷伯先生讀國學，錢栗孟先生學英文、數學，二年後，赴上海租界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由唐文治先生創辦），通過考試後，從蔣伯潛先生、唐文治先生治國學，二年級分科時，湯先生選擇了「史地科」，從呂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王蘧常、郝昺衡、夏承燾、胡士瑩、錢仲聯諸先生學習，尤受呂思勉、周谷城、周予同三先生的影響甚深。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租界區為日軍所佔領，許多教授離去，學校的課程，因而有變化，湯先生於是輟學返鄉，並在中學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湯先生再赴上海，入復旦大學，於1947年一月畢業。在1940年到1950年間，湯先生除注釋了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第一冊外，又寫了《荀子學案》和《史漢異同舉隅》，此外，《中國經學史》也寫到隋唐，並專門寫了一本《清代經今文學史》，另有《莊存與年譜》、《莊大久評傳》。1951年，再度回到常州教中學，教授語文、歷史，並擔任市歷史教研組長，側重在中國近代史，由於興趣，湯先生由今文經學而研究康有為、戊戌變法，由古文經而研究章太炎、辛亥革命。1953年，發表了有關戊戌變法的論文，1955年，第一本論文集《戊戌變法史論》由上海羣聯出版社出版，另外，如《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及一些論文，也是湯先生在常州期間陸續完成的。

1956年，經呂思勉及周予同的推薦，湯先生通過國務院招聘委員會，調到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為李亞農先生，副主任為周予同

* 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先生），初至時，湯先生經常同呂思勉先生往來，《戊戌變法史論》便是呂先生親自審閱的。1958年，上海歷史研究所由中國科學院改屬上海社會科學院，湯先生除纂集近代上海的資料書籍外，也參加了《辭海》的編訂，並協助周予同先生寫有關中國經學史的條目。1961年，「試行本」出版後，湯先生曾至鄭州拜訪嵇文甫先生，在成都向蒙文通先生請教有關章學誠的思想，並在武漢向譚戒甫先生請益。在《辭海》的編纂中，湯先生也發現了一些經學中的問題，因而寫了一些論文，和周予同先生共同署名發表，又因《辭海》的編纂亦涉及考證，而湯先生素對古文經學的治學方法感興趣，故把過去累積的章太炎佚文和圈點的《太炎文錄》整理、標點校勘後，於1961年完成了《章太炎政論選集》，另有《章太炎年譜長編》的初稿。

1964年，先生下鄉「四清」，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然而他並未因此而中斷研究工作，反而利用油燈在夜裏整理資料、文稿，或待休假時返滬增刪，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湯先生和周予同先生合署撰著的〈博士制度和秦漢政治〉、〈王莽改制和今古文問題〉等文，被打成「大毒草」，遭到討伐，成爲「黑幫」，但幾次抄家，也不能阻止湯先生對學術的熱愛與追求，往往在抄家後，湯先生取下未乾的封條，偷偷的把書取出，趕緊閱覽與抄寫，待黎明時，再貼回封條，如此日復一日，湯先生累積了不少札記，其後，在農村「五七幹校」，以及工廠「戰高溫」仍不忘讀書，在那苦難的歲月中，湯先生體現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傲骨與不屈的精神。1972年，湯先生仍在工廠「勞動」，不久被宣布「解放」，並參與二十四史的《宋史》標校工作，此書曾由聶崇岐先生、羅繼祖先生初標過，湯先生和張家駒先生任「通讀」，另有十餘人參與。1978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恢復，湯先生被調回歷史研究所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主任，1982年，任副所長，一度至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兼課，並至南京、山東、武漢、廣州各大學作短期講演，1983年十一月，應國際交流基金會的邀請，至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講學和研究，時約半年。1985年一月，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講學旬日，同年二月，又應美中學術交流會之邀，到美國講學和研究，先後在加州柏克萊，戴維斯校區，以及史丹福大學、華盛頓西雅圖大學、密西根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和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作過報告。

湯先生治學，雖有良師益友的啟發與激勵，仍不斷的自我暗中摸索，數十年如一日，先通後專，由博返約，努力耕耘，鍥而不捨。他認爲青年學子，在史學的領域中，要堅持兩點，一曰，持之以恆，二曰，持之有故。持

之以恒，才能不受外在事務的干擾，而影響做學問的興趣，珍惜有限的生命，堅持自己進取的方向，最後必有所成。持之有故，才能不下妄語，歷史的研究是實事求是，詳細的檢視資料，去偽存真，多作札記、筆記，以養成習慣，從原始的資料著手，加以整理排比，以期能持之有故。1992年三月，湯先生應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及中文所之邀，來臺做短期的專題討論，二個多月的時間，湯先生深厚的國學基礎，以及對史料的掌握，都令學生由衷佩服，往往一堂課下來，同學們的筆記上已抄滿湯先生所徵引的資料，那種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的功力，亦令在座的韓籍同學讚佩不已。湯先生為人謙虛、隨和，談到近代經學的發展，便久久不能自己，說到激動處，精神便為之一振，連帶的也感染到周遭的人，而引發共鳴，深有大師的風範。湯先生喜夜讀，學生凡登門造訪者，莫不熱情相待，諄諄善誘，對於後輩，湯先生常以自身治學的經驗相告，並多所勉勵，其風趣而不失長者威嚴的談吐，使人有如沐春風之感也。

湯志鈞先生論著目錄

一、主要編著

1. 《戊戌變法史論》，1955年上海羣聯出版社出版。
2. 《戊戌變法史論叢》，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上、下），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1982年增訂本。
4. 《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下），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
5. 《章太炎年譜長編》（上、下），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
6. 《康有為政論集》（上、下），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
7. 《戊戌變法史》，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8. 《康有為與戊戌變法》，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
9. 《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康有為和章太炎》，1990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10. 《乘桴新獲》，1990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11. 《中國近代の思想家》，與近藤新康合作，1985年日本東京岩波書店。
12. 《近代中國の革命思想と日本》，日本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二、主要論文

1. 〈論康有為《大同書》的思想實質〉，《歷史研究》，1959年11月號。
2. 〈試論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江海學刊》，1962年10月號。

3. 〈仁學版本探源〉，《學術月刊》，1963年5月號。
4. 〈康有為早期的大同思想〉，《江海學刊》，1963年10月號。
5.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學術思想評價〉，《文史哲》，1964年第2期。
6. 〈章太炎與反袁鬭爭〉，《文物》，1976年9月號。
7. 〈章太炎和孫中山〉，《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3輯。
8. 〈近代史學和儒家經學〉，《學術月刊》，1979年3月號。
9. 〈論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2輯。
10. 〈論時務報的汪、梁之爭〉，《歷史學》，1979年第2期。
11. 〈戊戌政變後的唐才常和自立軍〉，《近代史研究》創刊號，1979年。
12. 〈關於戊戌變法的評價問題〉，《人民日報》，1980年6月30日。
13. 〈清代經今文學的復興〉，《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4. 〈大同書手稿及其成書年代〉，《文物》，1985年7月號。
15. 〈五四運動和經學的終結〉，《中國哲學》，第3期。
16. 〈龔自珍和經今文〉，《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7. 〈章太炎的社會學〉，《歷史論叢》第一輯，1980年。
18. 〈關於亞洲和親會〉，《辛亥革命叢刊》第一輯，1981年。
19. 〈論康有為與保皇會〉，《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8輯。
20. 〈戊戌維新與孔子改制〉，《中華學術論文集》，1981年。
21. 〈章太炎在臺灣〉，《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4輯。
22. 〈章太炎與館森鴻〉，《歷史論叢》第三輯，1983年。
23. 〈章太炎的「割辮」和「解辮髮」〉，《上海圖書館紀念論文集》，1983年。
24. 〈康有為與經今文〉，《近代史研究》專刊《近代人物論集》。
25. 〈論陶成章〉，《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1輯。
26. 〈魏源的變易思想和詩、書古微〉，《求索》，1984年第5期。
27. 〈康有為和經古今文學〉，《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28. 〈伊藤來華和戊戌政變〉，《江海學刊》，1985年第1期。
29. 〈近代經學的特點〉，《中州學刊》，1985年第1期。
30. 〈近代經學的發展和消亡〉，《歷史研究》，1985年第3期。

三、和周予同先生合著

1. 〈經、經學、經學史〉，《文匯報》，1961年2月3日。
2. 〈關於中國經學史中的學派問題〉，《學術月刊》，1961年3月號。
3. 〈王莽改制與經學中的今古文問題〉，《光明日報》，1961年5月16日。
4. 〈有關經學史的幾個問題〉，《文匯報》，1961年11月19日。
5. 〈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
6. 〈博士制度和秦漢政治〉，《新建設》，1963年1月號。
7. 〈從顧炎武到章炳麟〉，《學術月刊》，1963年12月號。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陳 國 棟*

「史景遷」是我的耶魯老師 Jonathan D. Spence 給自己取的中文名。這是一個非常貼切的名字。司馬遷是我國最出名的史學家，但他不以其史學成就而永垂不朽，他更因《史記》一書的生花妙筆而傳誦至今，且將流芳百世。景仰司馬遷的史景遷絲毫不辜負他的名字，一方面在史學上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貢獻，他方面也因他流暢的文筆與優美的風格而廣受讀者的好評。我們從他大部分著作都在精裝本出版後的短短時間裏就有平裝本上市，而且一印再印，就可看出他受歡迎的程度了。

史景遷現年五十六歲。他於一九三六年出生在大倫敦區西南郊外的薩瑞郡 (Surrey County)。大學時代分別待過溫徹斯特學院 (Winchester College) 與劍橋大學克萊亞學院 (Clare College)。一九五九年獲得歷史學文學士學位，持美侖獎學金 (Mellon Fellowship) 到耶魯大學研究院當耶魯與克萊亞的交換學生。這一年，恰巧瑞梅琍 (Mary C. Wright) 和她的夫婿瑞特 (Arthur F. Wright) 從史丹佛被挖角到耶魯來，一時成爲耶魯盛事。幾乎對中國史一無所知的青年史景遷也就跟著一班仰慕者去上瑞梅琍的研討課。瑞大師要他寫一篇有關中國士紳 (gentry) 的文章作爲期末報告。史景遷在劍橋當然唸過英國史，加上他自己又是英國公民，便想當然爾地以爲中國士紳與光榮革命以來的英國紳士大概相去不遠，應當是一羣擁有土地，住在城堡，勇武好戰的貴族階級。仔細研讀了張仲禮的《紳士研究》(1955) 後，卻發現其中另有文章，於是激起了他對中國史的興趣，希望跟隨瑞梅琍從學。瑞梅琍遂幫他順利地轉成以中國近現代史爲主修的研究生。一九六一年，取得碩士學位。一九六五年，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曹寅與康熙皇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帝》，在周汝昌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成功地把「紅學」的研究轉型為「曹學」。①這部論文隨即獲得了一項極高榮譽的論文獎（The 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並且立即由耶魯歷史系出版（Yale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Miscellany 85），而他也極難得地獲准留校任教，從此就沒有離開過耶魯。當瑞梅珣於一九七〇年過世時，他順理成章地繼承了她在大學部和研究所的「中國近現代史」（Modern Chinese History）課程。一九六八年升任副教授，一九七一年升任正教授。從一九七六年起，他更獲得了亞當斯歷史講座教授（George Burton Adams Professor of History）的殊榮。多年來，他也一直兼任耶魯大學部杜艾忒學院（Timothy Dwight College）的院士。有一陣子（1983~86）也擔任過歷史系系主任。但他的興趣似乎不在行政工作方面，他還是較偏愛閱讀、講學與著作。

史景遷在大學部開的中國近現代史是耶魯頂熱門的課程。這兩年才開一次，一次一學期的課，每次選修的人數都超過五百人。差不多每兩個大學生就有一個修過他的課。上課時，法學院大講堂總是濟濟一堂，擠到有人得抱著圖板，坐到窗櫺上聽他演講。不過，如果有人認為這是耶魯學生對中國近現代史多所偏愛，那就未免失之臆測了。事實上，許多學生都承認：他們是上史景遷，而不是上中國史。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有這樣大的魅力呢？

高大的身材，早禿的頭髮，隨意、自在而瀟灑的穿著，笑起來眯著眼像煞聖誕老公公，史景遷的形象是蠻吸引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的。不過，把五、六百個興趣不同的大學生湊在一個講堂裏，而能讓他們以高度的熱忱來聽課，課後又興奮得自動起立鼓掌，那就全靠一付特殊的本事了。

耶魯大學部的學生，如同一般的美國大學生，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知識是極其貧乏的。事實上，養尊處優的美國人對於他國歷史文化的興趣大致上也不大。在一般美國人的歷史知識範圍內，除了美國本身的歷史外，大概就只對歐洲歷史還有一些常識。對中國歷史，陌生國度、陌生時代的事事物物，他們不但興味索然，而且也無從進入理解異國文化的情境。史景遷深深瞭解此一狀況。他的教學與撰述其實也就是針對這樣的問題而出發的。

史景遷的中國近現代史課程每週三次，每次五十分鐘。兩次拿來演講，

① 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聯經，1978），頁8，16及頁35，註②。

一次拿來放幻燈片或錄影帶。一學期中，用來演講的場合大約有二十次，講明末直到目前近四百年的歷史。牽涉到的每一個人名、地名、制度或事件，對他的聽眾而言，幾乎都是前所未聞，穿耳即忘的。史景遷並不期望學生們在聽完演講過後還記得什麼。他的演講主要在點出該段史實的特殊意義，尤其是在幫助學生導入理解相關問題的必要情境，激發學子探索該項主題的熱情。他的利用圖片或影像也是出於同一目的。因此，他的演講中，經常會來一段小說、散文或詩歌的朗誦，利用文學的魅力、文字的誇張與語言的情感把學生的情緒激盪到一個高點，讓他們事後還想對同一主題增加一些瞭解。這點，史景遷也有很好的安排。

學生們被要求唸一本厚厚的教科書（以前是用徐中約，現在當然用史景遷自己的著作），並且去上助教的複習課。由助教按照他發給學生的「重要名詞」（稱為 ID-identification）逐一為他們解說每個人名、地名、制度或事件的內容及意義；並協助他們建構自己的歷史知識。此外，為了在枯燥的歷史問架上賦予活潑的肌肉與神髓，學生還被指定閱讀四至五本小說或報導文學（*reportage*），幫助他們進入歷史背景的情境，以建立思考基礎的想像空間。

史景遷的教學，目的在提供不具中國史背景的美國學生一些有骨有肉，並且兼能豐富他們知識與文化內涵的訊息。他的撰述也呈現出相同的取向。同行的學者不難發現：史景遷除了經常撰寫書評，偶爾發表紀念性的文章外，極少有學術性的單篇論文。他的單篇論文中，〈康熙帝的七個年代〉（1967）與《康熙自剖》（1974）一書的內容大都重複。因此知名的論文其實只有〈清代鴉片吸食考〉（1973，1975）一篇。這篇文章提到清代鴉片價等黃金，具有準通貨的功能；又提到適量的鴉片無礙健康，吸食鴉片的罪惡主要是這種行為所引發的道德問題。這樣的觀點頗有新意，也受到相當的重視。

但是，史景遷不愛寫看起來較科學的單篇論文，他偏好撰述洋洋灑灑、文學味道濃厚的書。寫書，而不是書籍形式的專刊（*monograph*），對史景遷而言，可以照顧到史實的多面性與複雜性，並且能以更活潑、流暢的表達方式引領讀者到達可以「同情了解」閱讀對象的境界。

他的這種寫作態度多少受其教學經驗的影響。但遠在有教學經驗之前，他的《曹寅與康熙皇帝》（1966）一書已透露出這種傾向的端倪。《意欲改變中國的西洋顧問》（1969）則確立了此一風格。等到《康熙自剖》一書出

版，受到熱烈的歡迎之後，他更相信他的抉擇正確，力行不悔。然而，許多人不免好奇：他何以形成這樣的態度呢？他從那兒得到這樣的靈感呢？我想，美國史學界的風氣給了他的思索相當大的激盪。

美國學術界的史學研究在一九七〇年左右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往後二十餘年的研究與寫作產生了兩大影響：一則是史學研究中不再有所謂的「主流研究」，再則是歷史敘述的技巧再度受到重視。

所謂沒有「主流研究」，並不是說史學研究缺乏一種潮流，而是說歷史學家關懷的對象變得十分廣泛，對很多的問題都有人感興趣，研究的主題自然也就失去了集中性。這種現象用余英時先生的話來說，是：

所有的研究方向都分散了，可以用「羣龍無首」來形容目前的狀態。

不過，很重要的一個現象是，現在歷史的發展研究方向，注重個人在歷史中的定位，可以說是「平民的歷史」。^②

在一個價值多元化的時代，不管是研究者（歷史學家）還是讀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個人偏好的對象上。如果說歷史撰述就是「人類論往事」（man on his past），歷史研究是探討人類在過去時空中活動的軌跡，那麼，現在與過去的研究、撰述都免不了以人為中心。所不同的是，過去所關心的人是曾在歷史過程中扮演過重大角色的少數個人（余英時先生稱之為「帝王將相」），而現在受到重視的還包括形形色色，或平凡無奇、或顛沛失志、或與時相連的種種人羣。歷史學家與廣大的讀者有興趣於瞭解這些人的遭遇、心態以及他們與週遭環境的互動關係。換言之，隨著現代人對自我角色的自覺，他們對歷史上可認知的同類人羣也產生了高度的興趣。這樣的興趣把歷史學推展到一個廣闊而多姿多采的境地。史景遷在這樣的潮流中也把注意力放到不同的人羣或人物上面。除了作為教科書的《追求現代中國》（1990）外，他的每一本書都是一個傳記，或一堆交錯的傳記。故事的主人翁有中國人，有外國人；有帝王將相，有革命家，有傳教士，有凡夫俗子，乃至於有社會的畸零人。但是史景遷講述這些人的故事，重點卻不在告訴我們傳主有何豐功偉業，平生有那些可稱道的事跡。他的目的是在描繪這些身份、地位絕然不同的人物或人羣，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個人稟賦與遭遇的條件之下，怎樣去生活，怎樣去體現他們生命旅程的問題。

影響史景遷寫作態度的另一項美國史學風氣的轉變是歷史敘述的技巧再

②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第 26 版，〈訪余英時院士談史學研究趨勢——社會發展帶動歷史研究取向〉。

度受到重視。自從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提倡的史學革命以來，史學界把注意的焦點放到如何把這門學問建立得更像是一門科學的問題上。借助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工具，本世紀的歷史學家致力於用更科學、更周到的方法來分析過去的史實。這樣的態度基本上不差，但實踐上有所困難，更嚴重的是想把史學科學化的企圖，尤其是希望史學也能如科學一樣發生作用的企圖，根本使得歷史學是否有獨立作為一門學問的必要遭受到質疑。這點與本文無直接關聯，故而暫且置之不論。但是史學科學化的另一項後果卻是學者把注意力放在分析問題上面，而忽略了文字的風格與寫作的技巧，使得歷史論著的專門性提高，而可讀性減少。一方面不再有傳世之作（因為新的論文若在方法或材料上有所突破，便自然而然地取代了舊有的論文），一方面也喪失了廣大的讀者。針對這樣的困境，一九七〇年代的學者也有所反省。芝加哥大學就在那時候出版了一套「英國歷史文學經典名著」(Classics of British Historical Literature)，主編者 John Clive 的「編者序言」明白地指出了這方面的顧慮。他說：

歷史書要能存在超過它所屬的世代，必須要寫得令人難以忘懷。傑出的英國史家，如 Clarendon, Gibbon, Carlyle 和 Macaulay 等人，所以至今仍然不朽，不僅是他們對其主題的積累的歷史知識有所貢獻，而且也因為他們同時也是風格的大師與文字的藝術家所致。再者，即使是二流的史學家，如果他們還值得流傳，也只有讓人家讀起來有些樂趣才有可能。^③

一方面有人這樣提倡，一方面重視寫作技巧的書較易得獎，同時也或多或少受到法國「年鑑學派」(the *Annales* School) 的影響，雖然沒有鳴鑼響鼓的吶喊，重視敘事式歷史的作風，在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卻也無聲無息地蔚為風氣。而史景遷早在一九八〇年就被明白地指出，在東亞研究的領域上，他掌握著這股風潮的大纜。^④

在重視形形色色的人物與重視寫作技巧的時代風氣影響下，史景遷恰如

③ 見 John Clive ed.,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Selected Writing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 vii. John Clive 的主張另可參考他的, "Why Read the Great Nineteenth-Century Historians?," *American Scholar*, XLVIII (Winter, 1978-79), pp. 37-48.

④ Michael Kammen, "The Historian's Vocation and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9-30.

其分地發揮了他的才華。拋開純屬文學的修辭功夫與個人氣質所造就的風格不說，史景遷撰述的特色在於他提供給讀者的不只是一些高潮或反高潮的事件，而且竭盡所能地呈現給讀者去體會、去感受這些事件的，兼具有形與抽象要素在內的，整組場景 (setting)。當必要時，他也適時地更換道具，讓讀者的心思隨著他筆鋒的轉向，進入不同的情境，而強化閱讀的效果。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拿他的小書《胡若望的疑問》(1988)，看一看史景遷怎樣縷述故事的主人翁江西人胡若望從在廣州替教會看門，到跟隨耶穌會士赴歐，歷經期待、受騙、遺棄、誤會、折磨與突然獲救的變化；穿越不同地理、文化與精神的空間，而止於胡若望竟對何以有這一串遭遇的，讓讀者自尋回答的，疑問。故事中場景的更換星流雲轉，但讀者並不難一口氣終卷。這是因為史景遷敘事時早將事件與場景作了最佳的結合。

史景遷能辦到這點，不光是他有才華，而且與他吸收知識的方式有關。我們前面提到過他常寫書評。這些書評不只登在學報上，也出現在《紐約時報》書評專刊、《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等通俗報刊上。評介的對象不但包含各式各樣的歷史書，而且也包括了文學、藝術與民俗等多方面的著作。這表示他閱讀的範圍十分廣泛。事實上，見諸書評的作品也只代表少數他讀過的東西。個人所知，只要與1600年後中國歷史文化有關的著作，不管是書籍還是論文，甚至包括未出版的學位論文，只要是用西方文字書寫的，他大概都加以瀏覽或詳讀。這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在中國研究上的起步較晚，駕馭中國文字的能力略嫌不足。借助廣泛地閱讀二手研究，他仍然能夠適切地掌握學術界的動向，採擷其精華。另一方面，耶魯的研究生也有助於他的博聞。他們不但為他作研究史的回顧，解讀中文資料，而且從與學生的交談中史景遷也常常深入地瞭解許多特殊的主題。歷史的主題多如牛毛，史景遷相信從事專題研究的學生在該研究上的知識必定遠超過他，而他也樂於和他們討論，幫他們疏解思考上的盲點，並享受教學相長的樂趣。透過閱讀與交談兩種極普通的方式，史景遷穩穩地掌握了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綱目與細節。有了廣博的知識作基礎，加上敏睿的智慧的調理，是以創作出一部部情實並茂的佳作。

史景遷早享盛名，每一書出，讚美與揄揚的文章紛紛出籠，而各種獎勵也接踵而至。這不但使他的書更加暢銷，而且有助於他確立在學院門牆內的地位。在一個以學術論文的多寡評量學者敬業程度的時代，他獨能解脫此項枷鎖，而作他風雨名山的事業，可以說是一大福氣。獎金與版稅 (royalty)

更使他成爲難得的富有學者，使他一方面經常能向學校辦理休假，免於因教學工作而造成時間的割裂；另一方面更有能力到世界各地從事旅行研究，搜集資料並體察民情世故，藉以豐富他的寫作內容，可說是另一大福氣了。1988年，他更錦上添花地得到一項數額極高的麥克阿瑟獎金 (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ellowship)。在連續五年中，他共可得到爲數三十一萬美元的獎金，供他任意支配，也不限定他從事那一方面的研究或撰述。因爲這個獎金的目的就在使「特殊有才華、有前途的個人」免於金錢上的壓力，而能隨心所欲地從事他認爲他該做的事業。麥克阿瑟基金會宣告史景遷爲一「特殊有才華、有前途的個人」，因爲他「將原創性的史學見解與敘說故事的文學稟賦結合起來，使他的著作在描繪人物與情境一事上予人以小說式的感覺。」，正適切地說出了他的貢獻與努力的目標。

除了麥克阿瑟獎金之外，史景遷歷年所獲得的各項榮譽，重要的還有：

1. William C. DeVane Medal of the Yale Chapter of Phi Beta Kappa, 1978.
2. Guggenheim Fellowship, 1979.
3. The Los Angeles Times, history prize, 1981.
4. The Vursel Prize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 1983.
5. 獲選爲美國學術院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院士，1985。

史景遷，雖然並不脫離美國歷史學發展的潮流，卻是美國史學界的異數。他不愛寫論文，不參加大型學術會議，不作計畫，也不到其他學術機構當訪問學人。教學之餘，他寫書。他作研究，也是爲了準備寫書。他追求的是廣大的讀者與立言的不朽。他，很特別。

史景遷教授主要著作目錄

1. Jonathan D. Spence,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1988.
2. Jonathan D.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3. Jonathan D.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New York: Vintage, 1975.
4. Jonathan D.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8; New York 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1980, 1981, 1983, 1984, 1985, 1986 and so forth.
 5.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6. Jonathan D. Spence,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1; New York 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2, 1983 and so on.
 7. Jonathan D.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4; New York 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5.
 8. Jonathan D. Spence, *The Question of Hu*.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8.
 9.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10. Jonathan D. Spence, *Chinese Roundabout*.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11. Jonathan Spence, "The Seven Ages of K'ang-hsi, 1654-1722,"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2 (1967).
 12. Jonathan Spence, "Das Opiumrauchen im China der Ch'ing-Zeit (1644-1911)," *Speculum*, XXIII:4 (1973).
 13. Jonathan Spence, "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14. Jonathan Spence, "Mary Clabaugh Wright, 1917-197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1 (November, 1970).
 15. Jonathan Spence, "The Explorer Who Never Left Home-Arthur Waley," *Renditions*, 5 (Autumn, 1975).
 16. John K. Fairbank, Jonathan Spence and Denis Twitchett, "Arthur Frederick Wright (1913-197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VI:3 (May, 1977).
 17. Jonathan D. Spence, *Tai ping Rebellion* (tentative title, work in progress).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

本（八十一）年七月二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於該所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由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劉廣京主持，出席人員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新亞研究所教授全漢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孔復禮（Philip A. Kuhn）、國立臺灣大學教授王曾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李國祁、國立政治大學教授王壽南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陳三井，列席人員包括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李崇道及近史所研究員王樹槐、陶英惠、魏秀梅、許雪姬。經過半天的討論，會議達成了以下幾項綜合結論：

一、關於發展方向：

1. 近史所多年來在既有學術傳統下，加上新史學方法之運用，研究趨向與研究成果，已為國際史學界所公認。研究領域多元化，學術研究自由化，均值得肯定。

2. 近年來兩岸學術交流日趨密切，為配合此一趨勢，近史所宜：

(1) 把握時機，開展中國大陸東北、西北、西南、東南區域之研究；過去完成之區域現代化研究成果，也可考慮繼續進行第二步的追蹤研究。

(2) 研究時限可以放寬，上溯至十六世紀，下伸至一九三七年之後。

(3) 考慮逐步與大陸史料或研究機構合作，例如由交換資料、合作出版史料開始。

3. 以近史所已建立之學術研究基礎與人才，可以考慮集眾學者之力，編纂一部大氣魄、通論式的「中國近代史」鉅構。

二、關於人才培育方面：

1. 隨著時局的變化，近史所宜積極開展中俄關係史研究，俄文人才之培

育，刻不容緩。

2. 肩負中國近代史研究人才的培植任務，宜考慮編列預算，提供大學博士生研究獎助及博士後短期研究之設置。

3. 所內赴國外進修人員的派遣，宜以年輕、可塑性強、具有研究潛力者為首選；研究助理亦不妨多注意訓練工作。

4. 為擴大研究陣容、加強研究內涵，呼籲增加研究經費及研究員額之配置。

三、關於國際學術交流方面：

1. 加強與俄國學術機構之學術交流。

2. 與大陸史學對等機構或大學加強合作交流，如人員互訪、出版合作等，在現有條件限制下，亦可考慮透過第三國（地區）進行雙邊實質的學術交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兩種□

膠澳專檔（光緒二十三年——民國元年）

十六開 一冊 422頁 精裝400元

保薦人才、西學、練兵（光緒三年——民國元年）

十六開 一冊 201頁 精裝300元

□目錄彙編兩種□

外交檔案目錄彙編

十六開 二冊 734頁 精裝1000元 平裝900元

近史所檔案館藏中外地圖目錄彙編

十六開 二冊 1446頁 精裝2800元 平裝2700元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

呂 芳 上*

一、緣 起

相對於歐美的學術界，婦女研究在中國是落後的；同樣，在婦女研究的領域，相對於社會學、人類學，中國婦女史的研究，更是起步遲，基礎弱。許多歷史學者有這樣的自覺：婦女史的研究，在學術研究中，似乎一直未曾獲得應有的重視；鑒於社會學、人類學在婦女研究中的快速發展，歷史學者也不能沒有這樣的思考：缺少歷史研究脈絡的婦女學，是不是有足够的深厚根基？婦女史研究的不足，是不是增加共同領域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的困擾？中研院近史所對婦女史有興趣的同仁，有鑑於此，決心結合中外學者一塊做一些婦女史研究奠基的工作。

過去幾年，歷史學者如張玉法、李又寧、成露茜、鮑家麟等教授，都曾注意到中國婦女史的研究，他們都做了些開創性的工作，例如婦女歷史資料或論著的出版，這當然有助於婦女史研究的開展。此外，臺大人口中心的「婦女研究室」及清華大學的「兩性與社會研究室」，的確得風氣之先，推動了婦女研究，不過他們多半偏重在婦女現狀的探討，在個人的力量仍屬有限，不同領域學者從事不同工作的限制下，如果能以歷史的研究機構結合羣力，做些史料集中、提供研究便利、承擔國際間學術研究溝通管道的工作，不是更能帶動婦女史研究的風氣，更能有助於學術性的婦女研究的建立嗎？這一構想獲得志同道合學者們的支持，於是展開了這一婦女史的研究計畫。

二、合作機構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歷史悠久，資料浩瀚，實際上一個研究計畫不可能處理上下五千年的婦女史，選定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一六〇〇～一九九〇）的中國近代婦女史為範圍，也等於是一個紮根的工作。這個計畫幸運的獲得了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也很高興的得到了同行學者的鼓勵和協助，從民國八十一年七月起展開為期三年的第一期研究計畫。

這個研究計畫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主持，組主任王樹槐教授擔任主持人，所內的研究人員呂芳上、張瑞德、游鑑明參與了研究計畫的推動。國外，在美國的三所大學三位知名的學者，也熱心的參加這一研究計畫，他們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的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系的成露茜教授，和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系的鮑家麟教授。這個計畫盼能透過人員與資料交流互訪，合作推動研究及資料與目錄編印，達成國際學術合作的目的。

三、研究計畫的目標和內容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的最初構想，是成立婦女史研究室，不過，不論資料的搜集或研究的成績，實際上需要長期的努力才能表現出來。對社會的貢獻來說，個人的研究成果固然很重要，但為社會建立一長久性的研究環境，也很重要。因此這項計畫的最大目的，一在建立一長期性的婦女史研究中心，一在聯絡海內外研究婦女史同好，共同研究。前者的重點在資料的調查與蒐集，後者在出版專刊，發表論文，交換資訊。在這一長遠的目標下，第一期三年，著重研究基礎的奠定，具體的工作是：（一）網羅研究人才、聯絡學人，以中研院近史所為中心，聯合各研究機構對近代中國婦女史有興趣的學人，定期舉行座談會，共同交換研究心得；或舉辦學術演講，進行學術交流。（二）在資料的搜集方面：一方面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蒐集國內外，包括歐美、大陸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史的專書、檔案、報刊資料，充實研究室的典藏，便利學者的研究；另一方面進行中文、英文、日文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資料目錄的調查與編輯，在財力許可的情形下，予以出版，作為研究的基本工具；此外又計畫就已搜集的史料，進行整編，選擇出版重要史料，作為研究的基礎。（三）為促進研究計畫的推展，自第一年起，每年定期出版《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專刊一種，內容包括專題研究、研究概況介紹與書評等項，作為學術研究溝通的橋樑；創刊號預定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出版。第

二期的另三年計畫，如果仍能得到財力的支援，則以第一期的成果為基礎，結合中外學者力量編寫一本新的、大部頭、學術性的「近代中國婦女史」，應非難事。同時為了檢閱兩期的研究計畫成果，如果能在第六年召開一個以「近代中國婦女史」為主題的國際性學術會議，預料必可掀起婦女史研究的熱潮。

四、期 望

中國婦女史的研究是一個長期性的工作，必須仰賴多數學者共同參與，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的推動，或許只是一個起步，參與研究計畫的同仁深切盼望獲得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與迴響，歡迎有共同興趣的學者主動與我們連繫，我們也歡迎有更多的學者投入這一研究領域，從資料交換和學術研究心得交流中，為中國婦女史的研究，開創出一片新天地。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公開徵稿

- 一、本刊於每年六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年三月三十一日。
 - 二、本刊為一國際性的學術刊物，園地公開，凡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史之中、英、日文論著（不超過二萬字）、學術討論（不超過一萬字）、研究動態（五千字為原則）、書評（三千字為原則）等，均所歡迎。論著請依照一般學術論文加註格式撰寫。
 - 三、來稿以未曾刊載於其他刊物者為限；如經發表，版權即屬本刊所有。
 - 四、來稿一律交由本刊編輯委員會聘請專家學者審查。
 - 五、來稿如因時間過遲影響出版進度，本刊編委會得斟酌情形，將該稿移至下一期出版。
 - 六、來稿刊出之後，一律贈送本刊五冊，論著另贈送抽印本二十冊，不另致稿酬。
 - 七、來稿牽涉版權部份（如圖表及較長篇幅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同意，本刊不負版權責任。
 - 八、來稿請註明姓名、工作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號碼，以便聯繫。
 - 九、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收。為恐稿件遺失，請自備底稿。
-

菲律賓華人史料基礎調查與蒐集計畫

朱 滋 源*

一、計畫緣起

去年（1991）陪同陳三井、張存武兩位先生，到東南亞六個國家，做華人研究概況的調查訪問，調查的首站，為菲律賓。其後，依次訪問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最後抵達越南。^①由於菲律賓是訪問的第一站，再加上六百年難得一見的因緣——自西元 1380 年爆發以來，已沉寂無聲的 Pinatubo 火山，就在我們抵達的那一天爆發了。其規模之大，「氣勢」之雄偉，令人歎為觀止。火山的灰燼沖上雲霄，竟能飄過南海，落在中南半島上。而冒險起飛，從灰燼中穿過的飛機，其引擎竟然快速失靈，不得不立即迫降！由此二端即可明白其威力。這個特殊的因緣，使我們不得不在菲律賓多停留兩天，前後總共六天的訪問，也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去了解菲律賓的華人史料與史學概況。其中，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其為由紀亞遜博士（Dr. Serafin Quiason）所領導的國家歷史館（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簡稱NHI）以及施洪玉華女士（Teresita Ang See）所領導的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Kaisa Para Sa Kaunlaran）。

數度造訪國家歷史館之後，我們對於該館的規模、陣容與功能，有了初步的認識，^②知道它在菲國扮演許多重要的角色。其歷史資料庫（Historical Data Bank）藏有自一八五〇年代至今的歷史及文化書刊、手稿，以及報章剪報。所用文字，英文為65%、菲文為20%、西班牙文為15%。^③但因當時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① 陳三井、張存武、朱滋源：〈東南亞六國海外華人研究概況調查報告〉，《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12，民國 80 年 9 月，頁 62-79。

② 同上，頁 65-66。

③ Rosalina A. Concepcion et. al. eds. *Philippine Archives Directory*, Manila,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Arts, 1991, pp.31-32.

該館紀亞遜館長適巧出國，未得謀面。兩個月之後，紀亞遜博士來華出席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我們終於碰面了，並邀請他到中央研究院來參觀與訪問，使他親眼看到各方面的實況，加深對本所的認識與信心。返國之後，經張存武先生熱心連繫與邀請，同意參加兩國之間有關菲華史料的調查與研究工作。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是一個具有長遠眼光與寬闊胸襟的民間自願團體。其成員多係「第三代」的華裔青年，^④人數超過百人，平常從事公益事業，其中有一部分是文教工作，包含研究與調查關於菲律賓華人的情況，並翻譯或撰寫相關著作，加以出版。他們熱誠、紮實，在董事長施洪玉華、會長鄭光森、秘書長吳文煥的合作領導下，做了許多事，也出版了許多書。施洪女士繼承先夫施振民先生遺志，研究與教授菲華歷史，在非國極受重視，並於前些時候獲得當時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夫人頒獎，為非國近兩年所選出十大傑出婦女之一。^⑤吳文煥先生為 Metro Bank 分行經理，並兼世界日報主筆，亦為難得一見的熱心才子。去年（1991）十一月，該會並出面邀請 De La Salle 大學，合辦一個大型的國際研討會，以“Changing Ethnic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Minority”（「變化中的族羣認同和關係：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為主題，展開一連三天的討論，深入而熱烈地探究存在於「華人」、「華僑」、「華裔」等名詞裏頭的許多曖昧而敏感，又急待解決的難題。^⑥

張存武先生認為這兩個機構，雖然一個是公家單位，一個是民間社團，但在研究的潛力上，均極雄厚，前者為非國官方的一個層次相當高，人員也不少（約有一百多人）的機構，而且本身握有史料、史蹟之維護大權，又能統領非國史學界羣賢；後者懷抱類似宗教家的高度熱忱，立志為菲華的歷史，了解菲華對當地的回饋與貢獻，以及菲華地位的提昇而努力。在華裔青年聯合會辦公室之中，更可以看到學術耕耘的成果：所出版之著作，有若干頗值參閱。因此，自去年秋天，會同筆者積極展開聯繫工作。並於十一月

④ 所謂菲律賓華人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陳守國教授曾加以定義。請見：Antonio S. Tan,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 1946-1984,”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79-189.

⑤ 施洪玉華女士原任教於 De La Salle University，目前執教於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中國研究中心。該大學簡稱 Ateneo University。

⑥ 本所張存武先生與政大江炳倫教授均參與此會。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創於一九八七年。

間，正式向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提出申請，做為期兩年的史料調查與蒐集工作。

本案經蔣經國基金會於本年四月間通過後，本人也協助共同擬訂細部着手方案，其中包含預算的重新編列。^⑦並由張存武先生，親自多次以電話、傳真兩途徑，密切與菲方連絡。以下是計畫的概要介紹。

二、計畫概要

一、計畫時限：1992年7月—1994年6月。

二、研究人員：

計畫主持人：張存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協同主持人：

1. 紀亞遜 (Dr. Serafin D Quiason)

菲律賓國家歷史館館長 (Executive Director,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Philippines)，兼教育文化部次長，暨文化暨藝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Chairman,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

2. 施洪玉華 (Teresita Ang See)

Ateneo University 講師；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董事長。

3. 吳文煥 (Go Bon Juan)

世界日報社主筆；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秘書長。

4. 朱滋源

此外，另在菲國聘有若干協同工作人員，負責編輯、訪問、錄音、翻譯、電腦輸入、攝影或會計、出納等工作。有的並非全職，有的亦非固定，而是臨時助理。

三、合作機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菲律賓國家歷史館、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四、計畫原旨：本計畫擬就菲律賓做嘗試性研究，以為未來長期研究海外華人之先聲。

^⑦ 本計畫編訂過程，曾經朱麗蓉小姐、張建球先生協助。

以菲律賓華人研究作為第一步，其原因有多層：(一)菲律賓是中國與東南亞地區通商最早的地區。西班牙統治後將美洲貿易與中國貿易聯結起來，從而完成了歐美亞的環球貿易圈，而關鍵在於華人的前往呂宋貿易。中國貨自呂宋進入美洲，美洲銀子亦由之大量入華，形成明清時期以銀兩為通貨的交易方式，並促成康雍乾的盛世。這一環球貿易關鍵環節值得重視與研究，然至今尚無人深入探討；(二)除了二次大戰時被日本佔領之外，菲國曾被西班牙、美國先後統治，為期三百多年。這是東南亞其他地區少有的經驗。西班牙及美國對寓菲華人政策之異同，對菲華社會有何不同影響？是很好的比較研究主題。這一特點，只有古巴華人可比；(三)由於中菲貿易數量較大，華人寓菲歷史亦久，血統與文化彼此均有深遠影響。這是歷史研究挖掘難盡的豐富寶藏；(四)近數十年來菲國政府也從事排華，然程度、手段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不盡相同，結果也不一樣，值得比較；(五)臺菲距離近，臺北至馬尼拉飛行時間僅一小時，合作研究聯絡方便。

鑑於歷史研究（或任何科學研究）均賴堅實資料。本計畫既屬初創，為以後研究鋪路，故從史料蒐集整理開始。由於菲律賓華人頗多，與當地往來亦久，散佈亦廣，其史料數量之龐大，極易想見，故而提出兩年為期的史料蒐集計畫。

五、原訂蒐集對象與工作步驟

菲華史料約可分為下列九類：

1. 房舍、墓、碑等建築（以各地華僑義山為重點）；
2. 墓誌、碑銘、題記（以各地華僑義山、會館、學校為重點）；
3. 移民、捐獻、稅課、商業等檔案（在各地的檔案館）；
4. 教會之洗禮、婚喪紀錄（在各地寺廟、教堂及私宅）；
5. 法院判文（在法院之檔案庫）；
6. 日報、期刊（在各地僑社會館）；
7. 會館、學校文書（在各地僑社會館、學校）；
8. 私人信函（在會館及私宅）；
9. 長者經歷（以口述訪問方式來收集）。

據初步了解：菲華公墓（即「義山」）有十七處，宗親會有三十一個，同鄉會兩百個以上。如馬尼拉的義山公墓，墳墓「多采多姿」，其建築材料及式樣均富歷史性、宗教性以及地域性色彩。各地所藏檔案教會紀錄，溯自西班牙殖民時期，下至美國統治時期。其他各式資料、文物古蹟所涵蓋之範

圍，上自西班牙殖民時期下至一九八〇年代；地域上，則包括呂宋、宿務、民答那峨等六、七千個島嶼。

工作步驟，分臺北與菲國現場兩方面，同時進行：

(一)臺北方面 將收集有關菲華的文獻（大陸學者正在編纂古書中的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料）、論文，準備於數量足夠時，刊印論文集，同時尋找與菲華有關重要人物，作口述歷史訪問，並經常赴菲與合作單位共同工作，以熟悉有關事務及人事，了解其蒐尋方向，具體掌握進度。

(二)菲國為田野工作現場。工作之推展，擬依位置遠近分為三階段。首先針對大馬尼拉地區。其次到呂宋其他區域，最後才赴其他的重要外島。於建築，則記錄其地點、結構、建材、歷史沿革；於重要文物，或拍照、或揚印、或抄錄；當地所提供之史料，則予複印，必要時製成膠捲；相關人物則順便口述訪問。在菲國所得全部史料均複製兩份，並分類彙整，裝釘成冊，並編製目錄。兩份史料，一份運臺北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另一份置菲國國史館或菲華青年聯合會，供進一步研究之用。此外，為明確掌握進度，將製成工作日程表，按日記錄在何地，訪何人，看何物，蒐集到何項資料等等。必要時並繪製史蹟所在的地圖。

工作開始時邀請參與蒐集此類資料之人員，召開小型會議，俾統一實行步驟。年度結束及結案之時舉行檢討會議，並逐年撰成工作報告，以為紀錄，作為來年賡續推動的基礎。

三、計畫初步推展情形

七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主持人張存武先生，由筆者陪同前往菲國實地調查與會商。這一十三天之中，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大馬尼拉地區，除訪問宗親聯合總會、商聯總會、善舉公所、華僑義山、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Philippine University、崇仁醫院、菲中發展資源中心、文化暨藝術委員會、中正學院、檔案管理局等地之外，曾六度與國家歷史館密集會談，並簽訂“Memorandum of Agreement”乙份，以及其施行細則（Minutes）。（本份細則仍在制訂當中。）為使檔案製作得以順利進行，亦由菲方兩個合作機構，另與國家檔案管理局（Records Management and Archives Office）簽訂合同，責成該局全力配合，以製作有關華人檔案之膠捲。

另外亦撥出兩天時間，飛赴菲國第二大城宿務，做為期兩天的訪問。兩

天之中，以訪問宿務中央大學及東方學院爲最重要。中央大學校長 Auguste W. Go 亦爲華人，出身法學界。該校目前並無中國研究之部門，但已設有日本研究中心。東方學院之內，有華人教師近百人，如能善與連繫，教以方法，或將可成爲當地蒐集史料的一股力量。此外，還拜訪聞名海內外的華僑史專家，高齡近九十的陳烈甫教授，以及另外兩位高齡僑領，^⑧ 爲將來的口述訪問鋪路，並與當地張氏宗親會熱心僑領多次會談。

經過一十三天的面對面會商，已與菲方三名協同主持人達成數項共識。在史料的調查與蒐集方面，分成四大方向同時進行。

第一：製作檔案膠捲。首先，將檔案局已製成 35mm 之膠捲：Chinos y Padrones de Chinos 西文檔案 118 捲複製寄臺；其次爲菲律賓大學已製成膠捲之華僑義山墓碑名冊，亦複製送臺；再次則新製 Anfion（鴉片）檔 63 捲；Parian de San Jose 1 捲；最高法院暨司法部有關華人移民的判決文及決議函件。其他檔案中，有關華人者爲數極眾，俟上述諸檔製作完成之後，再行挑選。

第二：翻譯。上述各檔案中，將擇其重要者優先譯出。由於菲方目前似無自西班牙文直接譯爲中文之人才，因此所有西文資料只能譯爲英文。

第三：墓碑、墓誌銘等之拍攝、紀錄、編號與搨印。將從馬尼拉北部的華僑義山著手，挑選具有代表性者，逕行登錄並輸入電腦，其中樣式特殊者更加以拍照。所拍照片，以固定的尺寸沖洗，同時裝釘成冊。搨印方面，由於缺乏這方面技術，目前尚無法展開。

第四：口述訪問。分由施洪玉華、張素玉兩位女士，或以華語，或以英語，擇華人或與華人有密切關係的非籍元老，從事歷史性深度訪問錄音。並由助理人員加以紀錄整理。

除了上述四大方向之外，其他有關的蒐集工作，亦將視實際需要來進行，例如舊報紙相關報導的剪輯也必需進行。

臺北方面除成立史料中心及資料庫之外，聘請林淑慧小姐，協助蒐集有關菲華文獻及檔案，予以編目，並接洽熟知菲華歷史之人士，進行口述訪問。

^⑧ 王津滙老先生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現任東方學院董事長。林威碧老先生二次大戰後期亦曾參與血幹團抗日活動。

四、結語：預期之效果

由於是首次與菲方合作，且牽涉菲國官方及民間團體，使本計畫一開始進行，即遭遇若干可能的困難。但任何研究計畫無不存在若干難題，如何解決難題，也應該是計畫的一個部分。以下簡單敘述：

可能遭遇的難題方面，主要有以下數種：

1. 對象過於龐大。前已言及非華史料極多，如此龐大的數量，不可能在兩年之內蒐羅殆盡。

2. 方向不易確定。在每種史料均極豐富的情況下，先從那裏著手？就變成立即遭遇到的難題。

3. 人手不易齊整。菲國雖然工資低廉，但從事華文研究的人才極缺。本計畫又需要對中文及非華歷史熟稔之助理人員，以判斷墓碑等的重要性，紀錄元老華人的回憶，如此高等之歷史人才，在年青的第三代非華之中極為少見。

4. 菲國官方配合不易。菲國國史館參與本計畫者，均係該館專職人員，其如何「撥冗」投入本計畫，殊難明確。

5. 菲方兩個團體能否合作無間，亦無把握。

6. 主持人長期在臺，菲方協同主持人在資料現場所生任何問題，均難以立做最有利於本所的判斷。

7. 菲人素有樂天放任之本性，不若華人積極進取，其工作之進度與效率，能否令本所滿意，亦在未定之天。

以上是初步接觸之後所發現的主要難題。面對這些難題，我們在馬尼拉的時候即加以分析，並即時提出若干防患未然的方案，茲簡述如下：

1. 施洪玉華女士將成為非方的主要實際負責人。施洪女士熱心、誠懇、負責，且對非華歷史最有研究。如果她能實際挑起重擔，則以上大部分問題均可迎刃而解。七月間她曾經告訴筆者，她十分重視這個計畫。等八月下旬「青蕾待放」舞臺劇結束，她就會全神投入這個計畫。由於她自從一九七〇年代即開始注意非華的歷史，^⑨八〇年代開始，復在 De La Salle University

^⑨ 施洪玉華女士曾於1974年國際會議上發表“Research Studies on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the Philippines: A Selected Survey”一文，深入介紹與檢討相關著作，頗見功力。

與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講授菲華歷史，^⑩ 如果眞的全力投入，將是本計畫的福氣。

2. 吳文煥先生及 Dr. Quiason 兩人亦不可或缺。吳先生人極熱誠、爽朗，翻譯與撰寫有關菲華歷史的學術作品相當之多，^⑪ 在白天、晚間上班餘暇，希望他能多投入，以爲翼助。Dr. Quiason 深受菲國史學界以及總統羅慕斯所倚重，希望他的開明領導，能帶動國史館、檔案局、最高法院圖書館、菲律賓大學等史料中心與學術機構，來全力配合我們。

3. 以條約明示對方。菲國獨立之前，深受西班牙及美國政治文化影響。如能將所有約定形諸文字，或易責成依約行事。爲此，Memorandum of Agreement 以及其施行細則之制訂殊屬必要。

4. 我方負責人定期赴菲，親自參與現場之調查與研究。並於在臺時間，隨時與施洪女士保持密切連絡。

此爲提供長期研究的基礎性史料收集工作。經此努力之後，除所獲資料可供研究外，對菲華史料分佈地點、史料現狀，得到明確之認識，自有助於未來的繼續發掘與研究。華僑教育爲華僑社會的大事，本計畫將特別注意，將僑教目前的問題加一探究。同時發掘可供未來研究之專題，並鼓勵新人從事人物、企業、學校等之誌傳。

菲華歷史也是菲國史之一部分，惟該國目前財經困難，無力從事資料蒐集，本計畫的實施，無異資助其蒐集整理有關資料。未來我國及菲國的非華研究將因此而日趨興盛。尤有進者，此工作不祇有助於我國與菲國學界人士接觸，研究菲華問題，而且可以擴充到其他領域，研究別的問題，甚至整個東南亞的問題。總之，菲國緊鄰臺灣，雙方文化學術理應密切聯繫。利用菲華這一臍帶關係，進行學術合作，希望能夠成爲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

^⑩ 施洪女士在 Ateneo University 開設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課程。講授菲華歷史，共分九段：1. 史前時期，2. 早期關係，3. 西班牙統治時期，4. 革命，5. 美國佔領時期，6. 日本佔領時期，7. 戰後，8. 當代菲華社會，9. 展望。

^⑪ 吳先生譯者包含：1. Edgar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菲律賓生活中的華人(1850-1898)，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及世界日報社，1989。2. Khin Khin Myint Jense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American Regime, 1898-1946*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56), 美統時期的菲律賓華人(1898-1946)，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及世界日報社出版，1991。去年在馬尼拉舉辦國際學術會議，他也提出論文乙篇，討論海外華人的歸屬問題。

辛亥灤州起義史料的搜集與整理計畫

唐 向 榮*

灤州起義是辛亥革命之重要組成部份，是孫先生及中國同盟會對北方革命之全局性部署。孫先生題詞稱：「灤州大計」，「建不世勳」，民國史籍亦稱灤州為「當年舉義之聖地」；評價之高，絕無僅有。

但，起義之鎮壓者袁、曹之流後竊據總統，對起義之宣傳，一再封禁屠戮，加之八十年來種種歷史之曲折（略），致使業績隱而不彰，民間久已湮滅。史籍偶有言及，亦寥寥數語，且異說紛呈，成為大陸近代史研究中一個長期忽略之課題。

1960年，向榮受冀東兩位八旬前輩（原縣志總修及編修）之病危重託，含淚執手，講述第一代共和志士之忠貞與犧牲之慘烈，囑我「務必詳為稽考，留之後人」。向榮遂考察遺踪，訪求老者，搜集文獻，歷時六年，於1965年冬寫出23萬字史稿。

不幸1966年夏「文革」浩劫驟起，心血被毀，且從此長期蒙冤。

逆境中，以司馬遷痛遭刑辱而發憤治史之精神自勉，怒書「今日不愧，明日不悔」，決心從頭考撰。乃由鄉親學友資助，走東北，下泰山，跑京津，訪寧滬，四處挖掘，一一考辨，艱辛歷盡，歷經十年，至1975年年底又完成35萬字二稿。

誰料1976年七二八唐山大地震（唐山原為灤州一村鎮，後立市相鄰，距我縣縣城百里），房屋倒塌，史稿及數箱資料被泥水浸泡，大部爛為紙坨。

一場痛哭。但我中華史家，自有風骨。先哲談遷痛失書稿而立志重撰，後學以此自勵，乃咬牙抹淚，再度搜求考察。

幾度反復，大有助益。向榮因而深化了史識，錘煉了史筆，坐實了史證，理清了史脈，諸多幼稚淺薄之處得以自我否定，悟出了起義史料中大量

* 作者任職於唐山市文史資料委員會

訛誤舛錯之由來與背景，察明了不少疑似之跡與公認之說，其實乃來自有意作偽或無稽訛傳。

1978年「三中」全會以後，當局決心「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向榮亦獲平反，至縣中執教。為專心治史，於1988年到政協從事文史研究至今。總計32年來，挖掘清廷檔案、民國檔案、外交檔案、早期報刊、信函電文、官書野史、三親回憶等有關史料900餘份，考辨各種異說、疑案1200餘項，寫出史稿及論文100餘萬字、若干重大史實、史隱、史疑、史異、史證，為八十年來首次發現或予確認。在此過程中，得到海內外賢達之鼎力相助，終生難忘。

1991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前夕，向榮提出四項建議：1.刊印灤州起義專題史料；2.拍攝電視文獻資料片；3.籌建起義紀念物；4.舉辦起義故地八十年來之首次紀念，並禮請部份起義志士後人蒞灤赴會。在市縣當局大力支持下，一一落實，當地民間之湮滅狀態至此結束。

《辛亥灤州起義》研究雖經多年，但出書倉促，而且因經費所限，需要由53萬字、122幅照片截印20萬字及40餘幅照片，校對也匆忙之極，故仍需修訂。

此外，尚有下列必要課題：

- 1.《辛亥灤州起義資料匯編》及注，約50萬字。
- 2.《辛亥灤州起義史料考異》，約25萬字。
- 3.《辛亥灤州起義志士傳略》，約15萬字。
- 4.《辛亥灤州起義圖錄》，約400幅。
- 5.《辛亥灤州起義電視文獻資料片》，已拍四輯，應續。
- 6.《灤州兵諫始末考》，約20萬字。
- 7.專題性課題，約50餘項。如《孫中山先生與灤州起義》、《胡鄂公〈實錄〉辨偽》……。

以上各項，積32年之歲月，已分別完成工程量之60%，70%，80%甚或90%，待進一步考補之後，基本可使近代史研究之中此項空白性課題得到初步清理。

目前，向榮亟需臺灣學者的協助，如蒙提供史料或賜予指導，至為感謝（通訊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新城灤城路4號）。

大陸學界關於南京大屠殺問題的研究

孫 宅 巍*

大陸學者對於南京大屠殺問題的系統研究，始於六十年代初。那時，由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部分師生進行了調查研究，編寫出一本供內部交流用的小冊子《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一九七九年，該項成果經過修訂，付諸刊印，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了交流。

八十年代，結合對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和抗日戰爭爆發五十周年的紀念，在廣泛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專著以及史料集、檔案集、圖片集。這些成果的出版，開始顯示了大陸學者對於南京大屠殺問題研究的整體力量和力度。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陸學者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開始向著專題、個案的方向，深入進行。如對於死難人數、南京人口和安全區等問題的專題探討。這一勢頭，預示著近年內將會有更有份量、更具權威性的論著問世。

在大陸已經問世的研究成果中，按其類別，情況如下：

1. 專著類

由「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編著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全書共十七萬五千字，是目前流行大陸的最具權威性的一部著作。該書共分十章，系統論述了南京大屠殺發生的背景，日軍燒、殺、淫、掠的暴行，以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書前有南京市長張耀華親撰的序言，書後附有遠東、中國兩法庭對日本戰爭罪犯判決書的正本。

由南京大學高興祖所著《日軍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上海人民出

*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是《祖國叢書》中的一種，共七萬字，書後附有大事年表。該書文字生動、簡練，雅俗共賞，具有普及教育的功能。

胡菊蓉著《中外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關於南京大屠殺》（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出版），共十五萬七千字，是《大學生知識叢書》中的一部。該書著重論述中外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戰犯的審判，正文之後附錄了有關的審判文件。

由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的《史料選輯》（代第四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專輯），是一本只有八十五個頁碼的小冊子，一九八三年八月在內部發行，後為日本學者全文翻譯，出版了日文本。該專輯中所輯錄的史料，有專業工作者對檔案資料的加工整理，有對報紙報導的轉載，還有對活著的見證人的專訪。由於該書問世較早，曾在南京大屠殺研究中產生較大影響。

此外，由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編著的《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暴行》（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一月出版）和由禹碩基、楊玉芝、邢安臣主編的《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暴行》（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版）二書中，都有專門篇章，論述南京大屠殺。

2. 史料類

最為流行、發行量很大的史料集，是由「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和南京圖書館合編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全書共輯錄各類史料三十五萬五千字，分為「國內人士紀實」、「外籍人士紀實」與「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證言」三個部分。其中前兩部分，搜集了以往報刊、書籍中已經發表過的珍貴史料；最後一部分「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證言」，是對於活著的見證人的調查訪問筆錄，首次公之於世，引起了國內外有關人士的廣泛重視。

利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南京市檔案館的館藏檔案選編而成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共搜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檔案資料五十五萬六千字，是一部具有權威性的檔案資料集，也是迄今為止公布的有關南京大屠殺專題最為集中、完整的歷史檔案資料。

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主辦的《民國檔案》雜誌，起到了向讀者傳遞最新發現的有關資料信息的作用。該刊在一九九一年第三期中，首次公布了一批最新發現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其中包括：郭沫若的《為日寇暴行告

全世界友幫軍人書》；金陵大學非常委員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間致日本大使館的函件一組；南京大屠殺中部分遇難同胞名錄，計一百零九名。

在圖片資料方面，較為完整的圖片集，是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和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聯合編印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照片集》。該照片集於一九八五年八月印行，共收入各種珍貴照片一百三十三幀。這些照片，有些是侵華日軍為炫耀「武功」，自己拍攝的；有些是外籍人士拍攝的；有些是受害者自己收集保存的；也有些是近年向受害者、幸存者採訪時拍攝的。此外，由鄭震孫主編、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三月出版的《日本侵華圖片史料集》中，也搜集了十幀有關日軍攻陷南京和在南京的暴行照片。

3. 論文類

近年來，大陸學者在出版專著、史料、檔案的基礎上，寫出了一批較有深度的論文，從不同的方面，將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加以深化。這些論文，著重圍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研究和論述：

第一，系統駁斥少數日本右翼分子妄圖否定南京大屠殺存在的謬論。如：高興祖的《「南京大屠殺」的史實不容抹殺》（《日本問題》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和張益錦的《南京大屠殺史實不容否認》（《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八日）等。這些文章，以確鑿的資料，從整體上批駁了少數日人妄圖為南京大屠殺罪行翻案的謬論。

第二，科學論證遇難同胞人數達三十萬人以上。遇難同胞的人數界定，是對這一慘案研究的基礎，也是迄今為止圍繞南京大屠殺問題爭論的焦點。鍾慶安發表的《關於南京大屠殺中我遇難同胞總數的考證》（《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孫宅巍發表的《關於南京大屠殺屍體處理的研究》（《南京社會科學》一九九一年第四期）、《三十萬南京同胞被屠殺的史實豈容否定》（《抗日戰爭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等文章，均運用大量檔案和口碑資料，通過關於現場屠殺的記載與屍體掩埋數字的考證，認定南京大屠殺中遇難同胞的人數達三十萬人以上。

第三，紮實探討南京大屠殺發生時的南京人口數。鑒於少數日人，別有用心地把淪陷時的南京人口，歪曲為只有二十餘萬人，因而對於當時南京實有人口數字的研究，便顯得尤其重要。鍾慶安在《關於一九三七年南京淪陷前夕人口的考證》（《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一文中，通過對原始檔案的分析，認定南京淪陷前夕的總人口數，最少為五十五萬人，其中城

區約為三十六萬人（含安全區約二十萬人）；城外約為十九萬人。孫宅巍在《南京大屠殺與南京人口》（《南京社會科學》一九九〇年第三期）一文中，則將南京淪陷前夕的人口分解為常住人口、滯留守軍和流動人口三部分，認為應有常住人口五十萬人以上、滯留守城官兵約九萬人、流動人口數萬人，總數應在六十萬人以上。

第四，實事求是地評估安全區在南京淪陷之初所起的作用。安全區的設立，是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孫宅巍在剛剛發表的《試論南京大屠殺中的「安全區」》（《南京社會科學》一九九二年第五期）一文中，針對以往人們對於安全區的安全功能估計不足的問題，在大量研究、引用安全區檔案資料的基礎上，認為：就安全區沒有能夠完全阻止日軍的侵入與濫施暴行來說，它並不安全；就安全區與非安全區相比，難民們多了一層保障，少了一份侵害來說，它又是安全的。很難想像，如果當時沒有安全區存在，日軍的暴行還要肆虐到什麼程度。孫宅巍斷言，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將愈加發現，南京安全區在南京大屠殺事件中的巨大價值。

4. 翻譯類

毛良鴻、朱阿根翻譯的日本著名史學家洞富雄所著《南京大屠殺》（決定版·南京大屠殺），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於一九八七年八月出版。它是日本學者對南京大屠殺真相進行系統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它的翻譯、出版，幫助了中國學者和人民，瞭解日本國內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看法；為史學界和廣大讀者進一步研究、瞭解這一事件提供了有益的資料。

由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翻譯的日本拓殖大學講師田中正明所著《「南京大屠殺」之虛構》（「南京虐殺」の虚構）一書，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這是一部為日本侵華、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罪行翻案的反面教材。該書的翻譯、出版，幫助中國讀者瞭解了日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妄圖歪曲南京大屠殺真相、否定南京大屠殺事件存在的卑劣伎倆。

此外，馬慶平、萬高潮等，翻譯了英國《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記者廷珀利（Harold John Timperley）於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著作《侵華日軍暴行錄》（*Japanese Terror in China*），由新華出版社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出版。該書的重譯問世，彌補了人們不容易尋找到四十八年前版本的不足，使這部集中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的著作，再次廣泛在專業研究人員和讀者中傳播。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的《南京大屠殺與三光作戰》（南京大屠殺三光作戰，日本森山康平著，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出版)、周曉萌翻譯的《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南京大屠殺……》(侵掠——中國戰線從軍記者の證言,日本小俣行男著,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等書中,也揭露了大量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資料。

綜觀大陸學術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碩果累累,成績矚目,目前正方興未艾。筆者認為,大陸在這方面的研究中,具有以下明顯的特點。

第一,對死難同胞人數,認識上逐漸趨同。

對於南京大屠殺中的死難人數,抗戰勝利前後及五十年代初,各種不同的傳播媒體會有不同的報導,少至十餘萬人,多至四五十萬人。在戰爭狀態下,以及尚未開展系統研究的時候,出現這種混亂的現象,不足為奇。但是,死難同胞的人數,受到各種檔案資料記載,當時的環境條件,尤其是南京淪陷前夕人口數的制約,把它估計少了或者估計多了,都會出現邏輯上的混亂和矛盾。大陸學術界近年來,已逐步將這一認識統一為「三十萬人以上」。這個數字,最初出現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戰犯谷壽夫的判決書中。對這個數字的確認,反映了臺灣海峽兩岸學者和人民的共識。同時,經過大陸學者的反復論證,認為這一估計,是科學的,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第二,充分利用了大陸得天獨厚的資料寶庫。

南京大屠殺這一悲慘事件,發生於大陸的南京,因此,在南京、北京等地,有大量與這一事件有關的檔案資料可供調查、挖掘;同時,在南京城郊,還有一千七百餘名幸存者、見證人健在。大陸學者充分利用了這一有利條件,發現了許多極有價值的原始檔案資料,如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埋屍統計表,按月、逐日填報,詳至人畜兼計,總共收埋了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具屍體;日軍戰俘太田壽男的供詞,披露僅由他與另一名軍官安達少佐負責處理的屍體即達十萬具之多。這些新資料的發現和公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對於遇難總人數的科學界定,有極大的幫助。在活著的見證人中,有一百〇八人的證言,已經整理發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領導和專家,還於一九九一年暑假期間,組織了八十所中學的二千四百多名高中學生,對一千七百餘名目前健在的見證人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和訪問,為進一步整理他們的證言資料,打下了基礎。

第三,論述問題持科學的、客觀公正的態度。

大陸學者即使在尖銳批駁妄圖為南京大屠殺罪行翻案的文章中,也保持了冷靜、科學的說理態度,不以謾罵代替學術上的爭論,堅持以理服人,擺

事實、講道理。對於國民政府當年對日本戰犯的判決，不因政治觀點上的分歧和對立，而將其否定；相反，注意了維護中國政府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尊嚴。在最重要的遇難總人數的估計上，採用了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認定。在處理屍體問題上，根據檔案資料記載，日軍、偽政權、慈善團體和私人分別處理了十五萬具、七千四百餘具、十八萬五千具和三萬五千具，若簡單相加，僅此四類已經掩埋、處理屍體三十七萬七千餘具，如再加上個別掩埋、未被發現、未加統計的屍體數，本可以認為遇難同胞的屍體總數已達四十萬具以上。但是，大陸學術界在研究中，冷靜考慮到各類統計數字之間的交叉，以及屍體的重復收埋等情況，仍然認定當時有記載的處理屍體總數在「三十萬具以上」。對於安全區及其國際委員會的作用，也能在指出由於日軍野蠻，安全區內一樣發生了許多暴行的基礎上，肯定國際朋友主持正義、積極工作的精神，以及其對難民的重大保護功能。

哈佛大學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 學報簡介

張 力*

今年春天，美國哈佛大學出版了第一卷第一期的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這份期刊的前身，就是二十年前休刊的 *Papers on China*（關於 *Papers on China*，請參閱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出版的本研究通訊第九期，林滿紅之專文）。擔任該刊編輯與出版顧問的 Philip A. Kuhn（孔復禮）和 Peter K. Bol（包弼德）兩位教授，特爲此一最新問世的期刊撰寫序文，現譯如下：

自1947年至1971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即今日之費正清中心）出版了 *Papers on China*，這份年刊蒐羅了哈佛大學研究生的專題討論課的學期報告。當時近代中國的研究方興未艾，*Papers on China* 及時刊載了一些最新的研究。主要的中國研究學府中的研究生，是探索此一新興領域的要角（也可說是不可或缺的一羣）。另外，*Papers on China* 爲正在接受學術訓練的學生，提供一個初次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表著作的園地，讓他們瞭解到自己的論文會在課堂外發生影響，進而使其產生一種專業責任感。

在 *Papers on China* 休刊後的二十年內，雖然近代中國研究的領域日漸成長並趨於成熟，但是某些舊的狀況依然持續，而新的機會也出現了。清代和民國檔案的開放，意味著研究生仍然是探索此一領域的先鋒。儘管各種學報到處可見，但以一种較非正式的媒體早些刊出研究成果，其效益依然不減。

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是近代中國的研究與早期中國的研究，更加緊密的結合。我們愈益感覺到必須超越傳統的歷史分期，從更長遠的時間架構來看中國的社會與制度。宋史專家可以和明清史專家交換意見，也可以和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的專家討論更深遠的問題。

基於以上原因，我們相信此刻正是推出 *Papers on China* 續刊的良機，並名之為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第一期所刊出的論文來自包弼德所授之「宋史專題討論」和孔復禮所授之「中國檔案研究專題討論」兩門課的學期報告。未來我們有意收錄哈佛大學有關其它時段中國史專題討論課的學期報告。

過去出版的 *Papers on China*，係由東亞研究中心的專職人員編輯，而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 則全由學生組成的編輯委員會負責編務。編輯工作有助於專業學者的訓練，辛勞的編輯們將會記得這份期刊是一坦率批評與耐心容忍的競技場。

評論過最初的專題討論課論文之後，我們身為顧問的工作大致限於挑選要發表的論文。

負責第一期實際編輯與出版工作的研究生 Caroline Reeves (李嘉倫) 小姐指出：一九九一年春天，孔復禮教授首先提出出版 *Papers on China* 續刊的構想，後由參與編務的同學共同決定新刊物名為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自今年起，每年春天出刊一期，出版時間約在亞洲學會年會稍前。所刊論文以有關中國歷史的專題討論課學期報告為主，其他課程，如人類學、社會學等，如有採歷史方法撰寫之論文，亦在考慮之列。當代中國之研究，並不屬於收錄範圍。孔復禮教授運用歷史系辦公費的一部分，作為第一期的出版經費。首期印行一百五十份，照定價出售，現正徵求世界各地的研究機構和學者訂閱，預計將來會擴大發行量。

本刊顧問孔復禮和包弼德兩位教授，仍將擔任以後幾期的顧問；而各期

主題有關課程的教授，亦將加入顧問陣容。下一期的編輯工作，將由另一批研究生負責，俾輪流吸取經驗。

新出刊的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 亦和其前身 *Papers on China* 一樣，不重精緻裝訂與封面設計，但由於以電腦處理稿件，編排更顯美觀大方。作者採用拼音系統或 Wade-Giles 系統，聽任自便。刊於第一卷第一期的論文共有七篇，其中四篇係清史研究，論文作者及題目分別依序如下：

1. R. D. Belsky, "Bones of Contention: The Siming Gongsuo Riots of 1874 and 1898"
2. Ping-tzu Chu (祝平次), "Factionalism in the Bureaucratic Monarchy: A Study of a Literary Case"
3. Richard S. Horowitz, "Bannermen and Soldiers: Wenxiang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Peking Field Force (*Shenji Ying*) 1860-1866"
4. Seungjoo Yoon (尹聖柱), "Hsieh Ts'an-T'ai's Abortive Uprising of 1903: A Case for the Rise of Non-Gentry Social Elites in Late Ch'ing Coastal Chin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出專刊

(66) 清代之迴避制度 魏秀梅著 精350元 平300元

迴避制度，旨在防弊。防止官吏因同宗、同鄉、同年、同門等關係而徇私，有礙於執行公務。此為我歷代人事制度之特色，極具重要性。而清代之迴避制度，其規章是凝聚和體現了兩千年中該制度的得失利弊，其中不乏可俾今日作經驗教訓者，如今日之任官、考試及審案制度，仍受其影響。本書除前言、結論外，共分六章，第一章至第四章為任官迴避，詳述清代任官除籍貫迴避、親族迴避、師生迴避外，其他如凡曾經商省份、遊幕地方及揀選人員等皆有迴避規定。第五章為清代科舉文場迴避，包括親屬迴避、籍貫迴避、閱卷迴避、磨勘官迴避及命題迴避。第六章為清代審案迴避，凡官吏於訴訟人內，有血親、姻親、師生等關係者，或舊為上司，與本籍官長有司，及素有齟齬者，於審案時必須迴避，故迴避之範圍最廣。但總所有任官、考試、審案等迴避規定而言，無論何種迴避，執行時，君主個人皆可以變通，並非一成不變。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史料介紹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

——兼述高平叔對蔡元培著述的編印

陶 英 惠*

編者：孫常煒

書名：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

頁數：例言 1 頁、照片 8 頁、目錄 37 頁、正文 1258 頁。

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0 年（1991）4 月初版。

一、前 言

有關蔡元培先生的著述，在臺灣輯印成冊的第一本是孫德中教授所編《蔡元培先生遺文類鈔》，於 1961 年^① 1 月由臺北市復興書局印行，全書共 600 餘頁，40 餘萬字，除附錄外，共選錄蔡元培言論著作 150 篇，分爲九類。當時，政府播遷來臺未久，圖書資料十分缺乏，對於蔡元培的遺文，苦無專集可資參考，故該書出版後，大受歡迎。惟所收錄之著述太少，孫德中乃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不斷的廣事蒐求，又集有相當數量，正擬再編印成書行世，不幸於 1967 年夏遽歸道山，遺命由其姪孫常煒續成，而於 1968 年 3 月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名《蔡元培先生全集》，全書厚達 1760 餘頁，約 160 餘萬言。因爲要配合蔡元培百歲誕辰紀念，匆促付印；且孫常煒接編未久，對蔡元培之生平事蹟及著述尙不熟悉，所以錯訛甚多。當時海峽兩岸處於隔絕狀態，有關蔡元培之檔卷均留在大陸，在史料嚴重不足之際有此成績，已屬難能可貴，故學界對這本錯誤百出之全集（以下簡稱《正編》），曲子諒解，只是在參考引用時，須特別小心考證。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① 本文爲與大陸所印蔡元培之論著一致，將民國紀年皆換算爲西曆紀元。

1977年，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舉行專題人物——蔡元培先生座談會時，參加座談的王世杰、蔣復璁，均曾談及《正編》不僅不全，而且錯訛甚多，對於研究蔡元培生平志業的人，頗多不便；楊亮功則呼籲趕快重編一部完整的文集；筆者也在會中建議再廣事徵求，於《正編》之外，如集有相當數量，可編印《續編》、《三編》或《四編》。^②直到1991年4月（實際上稍晚），孫常煒獨力編輯的《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以下簡稱《續編》），仍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確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不料翻閱之下，則非常失望，其錯訛之多，較《正編》更為嚴重！

二、高平叔編印蔡元培著述的成果

在評孫常煒《續編》之前，容先介紹一下在大陸上對輯印蔡元培著述最有貢獻之高平叔教授以及其豐碩成果。

高教授原名乃同，字平叔，抗日戰爭時撰文多署名平叔，遂以字行。現年80歲，為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擔任中國近代史教學和以研究蔡元培為重點的科研工作。他曾追隨蔡元培工作多年，由蔡口述的《蔡子民先生傳略》有兩部分，一為從誕生到1919年，由黃世暉筆錄；一為從1919年到逝世，則由高平叔所完成。1935年，高奉蔡託代為編訂《文存》，已收集了大部分文稿，並經蔡閱過，旋因抗日戰爭爆發，文稿散失，事遂中輟。高在1943年編印之《蔡子民先生傳略》鉞言中，認為：「生平遺憾，還有過於此者否？」並云：「將來，事實許可的話，我仍願完成那未完舊願。」^③

高平叔是一位信守諾言的人，他一直念念不忘要彌補《文存》流產的缺憾，完成蔡元培生前對他的重託。自從1979年定居天津以來，便將全部心血投入了這項艱鉅的工作，曾多次分赴上海及紹興蔡元培的故居以及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1980年2月，所編《蔡元培教育文選》及編著的《蔡元培年譜》（以下簡稱《高譜》）分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及中華書局同時出版。《高譜》雖然著墨不多，但對蔡一生的重要事蹟，均有扼要敘述，他不僅採用了大量第一手史料，並有許多是初次公開、至為珍貴的，每條之後，都註明來源，由這些線索，學者自可得到按圖索驥的便利。

^② 見《傳記文學》，第31卷，第2期，座談會紀錄，1977年8月1日出版。

^③ 1943年3月，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

《高譜》只是他在編輯全集的一項副產品，1984年9月，《蔡元培全集》（以下簡稱《高全集》）第1～4卷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8年8月，第5～6卷問世，至1989年7月，第7卷也告出版。原來預計印行8卷，後因故縮編為7卷。

由於學界需求頗急，又預知全集無法迅速一次印出，高平叔遂另外趕編一套蔡元培論著專集。全集係按原著撰寫時間先後編次，而專集則照原著性質分類編選，將性質相同者各輯為一冊，分由幾個出版社印行，以應急需。截至目前為止，專集已出版8冊，茲開列如下：

1. 《蔡元培論科學與技術》，石家莊市，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2. 《蔡元培政治論著》，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3. 《蔡元培哲學論著》，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4. 《蔡元培語言及文學論著》，石家莊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5. 《蔡元培美育論集》，長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6. 《蔡元培教育論集》，長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7. 《蔡元培史學論集》，長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8. 《蔡元培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此外，預計尚有《蔡元培書信選》未出版。專集與全集縱橫配合，相輔相成，學者在應用時，將更便利。

高平叔對蔡元培著述整理、編印之辛勤，由上述成績單，可見一斑。他在編印工作忙碌之餘，同時又撰寫了至少21篇以研究蔡元培為主的學術論文，都30餘萬言，在各學術期刊發表。這些具體的事實，證明他沒有辜負50年前蔡元培的重託！人生真是難得有這樣一位知己！

蔡元培生前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已經發表過的，散見各報章期刊等，在歷經變亂後，逐一蒐尋，已屬不易；而未經發表的原始材料，除四處奔波找

尋外，尚需經過認真反覆校勘、分段、標點、謄抄等繁複的程序，方能定稿，在爬梳的過程中，要付出多少時間與心血！其鏗而不捨的精神、一絲不苟的負責態度，不能不令人敬佩！

三、「掠美之嫌」風波

孫常燁在所編全集之外，又編著了一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以下簡稱《孫譜》），上冊於1985年6月由國史館出版後，因為大量抄襲《高全集》中之原題、原文及註腳，又不註明出處，使高平叔辛勤所得的成果，被人輕易的掠美，自然非常憤怒，其旅居香港友人、人物傳記名作家關國煊深為抱屈，曾以〈詳列資料來源，避涉掠美之嫌〉為題，在《傳記文學》第48卷第3期（1986年3月號）頁101~102，予以嚴厲譴責。

《高全集》第1~4卷之版權頁雖印為「1984年9月第1版」，可是實際印成的時候，則已是1985年4月底了。其出版時間與《孫譜》如此接近，而且當時海峽兩岸尚須間接郵遞，如何斷定《孫譜》係抄襲《高全集》？高平叔於1985年12月10日〈致海外友人書〉中，曾道出其中秘辛，高函云：

去年〔1984〕底，孫常燁通過其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工作的內姪張學舒來函，說孫的夫人回國探親，託代購拙著。我以為孫是一個正人君子，以為孫是一個學術中人，故以以文會友的態度，將所有已發表的拙作贈送給他。當時拙編《蔡元培全集》尚未印出，我特地懇請印刷廠立即趕印出四本樣書（在公開發行半年以前），交孫的夫人帶往港臺。^④

高平叔的古道熱腸，卻換得不少苦果，當非始料所及！

四、對《續編》的評論

孫常燁在取得《高全集》先睹為快的便利後，除大量照搬在其《孫譜》中，自然也是他《續編》的重要來源之一。據筆者的統計，《續編》中除第1輯著述之部所收錄的3本專書、第6輯附錄紀念論文10篇外，第2~5輯共收錄單篇文章或函件計522篇，其中至少有36篇是與《正編》重複的，扣掉

^④ 《傳記文學》，第48卷，第3期，頁101。

重複者，尚有486篇。在這486篇中，孫常焯註明錄自《高全集》第1～4卷或《高譜》者為213篇，未註明錄自該部分而與之相同者為201篇，其餘的72篇，有34篇已收在《高全集》第5～7卷，在未收錄的38篇中，高平叔之所以不採用，可能是基於下列三種原因：(1)無法確定是否為蔡元培屬草的函牘及章程，(2)未經蔡元培署名也無明文記載說明為蔡元培所撰者，(3)根本不是蔡元培的著作。再者，第1輯中之3本專書，至少有兩本可能是採自《高全集》，其理由詳見下文(一)之1.及2.兩條，此處不贅述。

由上述統計數字可知，《續編》的486篇文章中，竟有414篇與《高全集》第1～4卷有關，高平叔所贈送的四本樣書，的確幫了他一個大忙。而孫常焯因為沒能早日看到第5～7卷，在這三卷中共收錄1497篇，孫常焯憑著個人的多方蒐集只得到72篇。相較之下，高平叔的貢獻則更令人敬佩！

《續編》在《高全集》的堅實基礎上，再度與世人見面，理應有更好的成績，事實卻大謬不然。由於錯誤太多，無法一一列舉，茲就所見及之重大錯誤，分別以舉例方式說明如下，藉免以訛傳訛。

(一)任意竄改原題或原文

《高全集》在遇到未經發表的原始材料時，因為有的本無題目，高平叔乃酌加題目，並說明係編者所加；原有題目如不貼切時，則稍予修改，惟仍說明原題及修改之理由，以示負責。《續編》則不照此規矩，不僅題目任意改動，原文也間有刪節之處。茲舉例如下：

1.頁237～240〈殿試策論對〉，曾全文照抄在《孫譜》上册，頁58～62，其中有錯誤、竄改之處，關國燿在上述之文中曾一一指出，不料《續編》仍未加改正，不知是沒見到關文抑存我行我素之心態，不肯認錯，而受害的仍是讀者。

2.頁394〈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將來〉，原文計約1200字（標點不計），孫君竟刪去1000餘字，剩下的尚不足200字。其出處既然註的是原來發表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為何不錄全文？經查對後，發現乃抄襲《高譜》頁118，其所以不願坦承沒見到原刊物，顯然在表示自己蒐羅之富；殊不知欺名盜世之結果，適得其反。

3.頁400〈高劍父之正反〉，與上條相同，係採自《高譜》頁130，又註原發表之《藝術建設》創刊號。原題目為〈高劍父之正反合〉，孫君刪去「合」字，大失原意；而所錄存的文字，尚不及原文之半數。

4. 頁452~454〈南開學校致詞〉，原題爲〈蔡子民先生演說詞〉，由周恩來筆錄；《高全集》卷3頁45改題爲〈在南開學校歡迎會上的演說詞〉，較原題更一目了然。孫君是否找到了原來發表的《校風》第67期，不得而知；但將題目改成〈南開學校致詞〉，則有欠妥當。又故意刪去筆錄者的名字，將誤導讀者這是蔡元培親自撰寫的講稿。頁455~457〈南開學校聯合講演會致詞〉，與此情形完全相同，不贅。

5. 頁524末行，提及德國哲學家尼采 Nietzsche，原稿脫一字母「Z」，《高全集》卷4頁51，特在〔 〕內註明正確的拼法，孫君不諳此種學術文章的慣例，乃排成了「Nietsche（或Nietzsche）」，將使讀者誤以爲尼采的名字有兩種拼法，有無「Z」字母均可，雖僅爲一個字母之差，卻是嚴重的錯誤；而孫君所擅加的「或」字，更爲識者所竊笑！

6. 頁544〈民族自決〉，見《高全集》卷4頁76~77，題目爲〈在高麗代表招待太平洋教育會議會員時的演說詞〉，意義非常清楚。孫君註明採自《高全集》，而擅自改題爲〈民族自決〉，其出處則任意改作「民國十年八月高麗太平洋教育會議招待會致詞」，與原意大相刺謬，若不讀原文，將誤以爲是在高麗舉行的太平洋教育會議……。

7. 頁580第八行「鍛鍊周內」一語，孫君認爲「恐排印有誤」，實則並無錯誤。此語之典故，係來自《漢書·路溫舒傳》：「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謂深文之吏，巧入人罪之意。

9. 頁597第7行「然而也必擇其相宜之點」句下脫約700字，割裂得不能卒讀。

10. 頁652~653〈五四紀念並慶祝革命政府成立致詞〉，據1933年5月4~6日《申報》之報導，該會係上海大中學教職員聯合會及大中學生聯合會所發起之各文化團體舉行的五四紀念大會，孫君竟在題目中妄加「並慶祝革命政府成立」字樣，不知有何實據？

11. 頁720〈節譯德國柏格森哲學導言〉一文，蔡元培於1921年10月4日譯畢，發表於同年12月1日出版之《民鐸》雜誌第3卷第1號頁1~11，題目爲〈節譯柏格森玄學導言〉，全文約6000字，孫君所錄者尙不足300字；其出處雖註《民鐸》，實則抄襲《高譜》頁59。《高譜》將此文誤作1921年2月譯，題目中之「玄學」誤爲「哲學」，惟在《高全集》卷4頁84~93中已經更正；孫君不採用高平叔所送改正的全文，反沿用既錯又不全的《高譜》，豈不可怪！

12. 頁751〈馬克思傳序〉，係錄自《高譜》頁98。高平叔僅摘記要點數句，並非全文。緣該譜於1980年2月印行時，禁忌甚多，高平叔不得不將在政治方面比較敏感的語句，如「研究馬克思，不必即信仰馬克思」予以刪除，以免買禍。實則撰寫年譜，不是編輯文集，也沒有全文照錄、以壯聲勢的必要（《孫譜》恐怕是一個例外）。1977年11日1，劉真在《傳記文學》第31卷第5期頁66~68發表〈研究與盲從——對蔡元培先生一篇序文的感想〉一文，即係以此篇序文為例，除刊出全文外，並將蔡元培的墨蹟手稿製版刊出。孫君不採用此全文，而摘錄《高譜》刪節之殘稿，除了孤陋寡聞外，真想不到有何道理！

13. 頁810〈致夫人黃仲玉函〉，原函500多字，收在《高全集》卷2（孫君誤作卷一）頁470~471，孫君則刪減成只有100字。這種不認真、不負責、任意割裂的做法，實在愧對高平叔在其所編全集正式出版前以樣書相贈的美意。

14. 頁987第三行之易培基，字寅村，蔡元培手稿筆誤為「培因」。孫君不察，認為「因」乃「其」之誤。不僅未改對，反而錯上加錯。

15. 頁1148~1149〈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章程〉，本來在章程之前，尚有提案文；章程之後，則附有人選；孫君將前後均略去，只刊章程條文，使讀者無法了解其來龍去脈，也不明白為何列在蔡元培的全集內。

（二）編造撰稿時間及出處

《續編》所註的出處，體例極不一致，其列示的順序，大致為撰稿時間、發表的書刊、出版日期。惟多半不齊全。如頁474註為《北京大學日刊》第318號，經查該期，根本未刊〈教育之對待的發展〉一文；又如頁505~507〈美術與科學的關係〉一文，原刊民國10年（1921）2月22及23日出版之《北京大學日刊》第813及814兩期，孫註為「民國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學日刊》第八一三號」，登了兩天只註一天，而且時間錯亂。頁897乾脆只註《北京大學日刊》，連號數也省了。頁999則只有《胡適來往書信選》一個書名，頁1135只有《上海時報》一個報名，連年月日也都予省略，實在是罕見的事。孫君又喜用「同上」，如果只有兩篇的出處相同，第二篇用「同上」尚不難查到，如頁203~298的60篇文章，均錄自《高全集》第1卷，要查第60篇的出處，需要向前一直翻到第204頁，不知要浪費多少時間？諸如此類不守學術行規的例子太多，茲就較嚴重者舉例如下：

1. 頁3~103《中學修身教科書》一書，《高全集》卷2頁169~255，係據商務印書館1921年9月印行之第16版訂正本，所謂訂正本，為蔡元培取第16版1本所修改者，高平叔於修改處均加腳註說明，是忠於原作者而又負責任的做法。孫君頁103所註之出處為民國九年九月訂正本，民國九年九月是否印過訂正本？有待查考；至少蔡元培在第16版親筆所修改者，孫未作任何說明。

2. 頁104~119《學堂教科論》一書，很明顯的是取自《高全集》卷1頁139~152，但未註明；《高全集》在頁139腳註中說明該書為光緒27年9月石印本，惟於頁152註出處時，則照大陸書刊慣例換算為1901年10月出版。孫君不察，在《續編》頁119註出處時，則糅合陰曆之年「光緒27年」及陽曆之月「10月」，製造混亂及錯誤。

3. 頁299~301〈辛亥那一年〉一文，係蔡元培於1936年應《越風》雜誌編者之請而撰寫的，回憶其在辛亥年（宣統三年）時個人的一些經歷和見聞，在10月10日出版的第20期「辛亥革命紀念特刊」頁1發表。孫君大約未覓得該期雜誌，乃信手將撰稿日期就題目中之「辛亥那一年」，望文生義換算為「宣統三年九月」，完全未加思考。

4. 頁306〈輓陳其美聯〉，第一聯孫作「民國五年五月十八日」撰，殊誤。此為陳其美在滬被刺殞命之日，直到1917年5月13日，其靈柩歸葬湖州碧浪湖，假上海打鐵浜蘇州集義公所開弔時，蔡元培方撰此聯輓之，怎可將陳死亡之日作為撰聯之時間？

5. 頁307〈輓李蔚然聯跋〉，顯係抄自《高全集》卷3頁56，其出處高註為「據蔡元培撰書《挽李封翁蔚然聯跋》刻石」，孫為表示自己蒐羅之富，並非取自《高全集》，乃將出處簡化為「撰書刻石」，以這樣拙劣不通的文字掩飾，定使讀者如墜五里霧中。

6. 頁311~312〈夏瑞芳傳〉，此文原收錄在魯莊（雲奇）編《一百名人家政史》（內頁及書邊之書名作《古今名人家庭小史》）頁42~43，《續編》雖註取自《古今名人家庭小史》，實係抄自《高全集》卷3頁228~229，此可由下列幾點證明：(1)原文未分段，也無新式標點，高酌予分段並改為新式標點，孫則亦步亦趨；(2)高編脫訛之字，孫也照誤，如原文「君亦數數購之，然不敢輕於付印」，高本脫一「敢」字，孫本也照漏；又如原文「售數遠遜」，高本誤作「售書遠遜」，孫亦照誤；再如末句「雖謂君永生不死可也」，高本脫一「君」字，孫本也沒有「君」字。(3)原文「競譯日本

書以求售」句中之「競」字，高本用簡體字「竟」，孫不識此字，乃植一相似之「竟」字。此外尚有一些高本未錯而孫本誤植者多處，不再一一列舉。像這樣只有一千字的短文，孫本竟錯訛連篇，讓讀者怎麼能相信如此不負責任的編者！

7. 頁346~353〈中國教育的發展〉，見《高全集》卷4頁469~476，孫在文末所加之三行按語，即照抄高之腳註，惟將譯者趙念渝、校者趙傳家二人名字均略去，而又不作任何說明；原文係用英文撰寫、印行，如果不經翻譯，孫是如何排成中文稿的？

8. 頁463~466〈歡迎法公使柏卜〉，原刊《北京大學日刊》第161及162兩號，《高全集》卷3頁178~180稍有刪節，註明採自161號而漏掉了162號，《續編》則均照此錯誤的排印，未提162號。由此可以證明孫君根本未查閱《北京大學日刊》。

9. 頁521~523〈中國文學的沿革〉，係採自《高全集》卷4頁47~49，卻註出處為《高譜》，也未註明頁碼。殊不知《高譜》只是摘記要點，並未全文照錄。

10. 頁611~613〈處理退還庚款的備忘錄〉，原係用英文撰寫，由趙念渝譯為中文（見《高全集》卷4頁479）。孫為規避取自《高全集》，逕註英文稿之出處，所排者卻是中文稿，不僅編者高平叔要喊冤，譯者趙念渝、校者許鳳岐也要大聲抗議。

11. 頁616~617〈旅法中國美展招待會致詞〉，原刊《東方雜誌》21卷16號李風〈旅歐華人第一次舉行中國美術展覽大會之盛況〉^⑤之報導中，此演說為1924年5月22日在籌備委員會宴請中法政學界於紅樓時所講。孫君未看清楚李風之報導（或根本未看此文），誤植為5月23日講；其出處又不願註明抄自《高全集》卷4頁483~484，而誤抄頁483該文首頁標題上方或上頁（482）另外一文末之出處《冷月畫評》，其粗心大意，真令人為之氣結！

12. 頁622〈蘇浙皖三省聯合〔會〕記者會致詞〉，題目中刪一「會」字，其意義則大有出入。孫註出處為「同上」，即《高全集》卷4，實為抄自《高譜》頁82。高在年譜中僅摘記要點，而全文則收在《高全集》卷5頁79~80。至於致詞之時間，《高譜》繫於1926年5月，全集則改署1926夏，均誤，周天度已在〈《蔡元培年譜》若干史實訂誤〉^⑥一文中指出，正確的

⑤ 1924年8月25日出版，頁30~36。

⑥ 1987年1月《近代史研究》，總37期，頁281~287。

時間應為1926年11月30日。孫則置於「民國十三年五月」，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民國十三年五月，蔡元培尚滯留法國，如何能在上海舉行記者會？大約是將「1926年」換算為「民國十三年」了。

13.頁641~642〈中華職業教育社大會致詞〉，其出處註的是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記〕事》，丁書係一記載有關教育重大事實之工具書，文字簡潔，絕對沒有收錄過任何一篇全文，自然也沒有收錄這篇演說詞。經查其真正的來源，乃是隴西約翰所編《蔡元培言行錄》^①第6部分：演說，頁156~158。

14.頁667〈王光祈追悼會致詞〉，係抄自《高譜》頁128，只是節錄致詞大要而已。孫君不肯承認抄自《高譜》，而出處則用其腳註，此種瞞天過海的取巧做法，定會引起高平叔的憤怒！《高全集》卷6頁31已收錄了全文，可供參考。

15.頁687〈講義錄序〉一文之撰寫時間，《高全集》卷1頁156採用西曆1901年12月12日，孫將年份換算為光緒27年，月日則完全照抄，未加換算。

16.頁701〈重印明於越三不朽名賢圖贊序〉之出處，孫註為《北京大學日刊》第89號，該號為1918年3月12日出版，蔡序為1918年4月15日撰寫，自不可能登在該號，孫之出處純屬編造。請參《高全集》卷3頁155~156。

17.頁702〈北大分科戊午同年錄序〉，係抄自《高全集》卷3頁183，惟孫註為「民國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學日刊》第一七四號」，完全不提《高全集》。經查《北京大學日刊》，第174號為6月28日出版，6月26日出版者為第172號，兩號中均未見刊載此序，證明孫註皆係虛構。

18.頁767〈剡山二戴兩書院學約〉之撰寫時間，《高全集》卷1頁93註為「1900年2月27日」，並在當頁下方腳註中說明陰曆為「光緒26年正月27日」，應可省卻孫君換算之勞，照抄即可；不料他仍然用陰曆之年（光緒26年）及陽曆之月日（2月27日），弄得不中不西。

19.頁771〈上皇帝書〉之撰寫時間，《高全集》卷1頁99註為「1900年3月」，並在腳註中說明為「光緒26年2月」，孫也是採陰曆之年與陽曆之月份，與上條犯了同樣的錯誤。

20.頁1023~1024〈呈請將內閣檔案撥為北大史學材料〉一文之出處，孫註為「民國十一年五月十二日《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記〕事》頁一六

^① 1931年，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五」。經查丁書此頁所記為民國十七年之事，根本不是十一年；再查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條，則全無記事，證明純屬捏造。實則係抄襲《高全集》卷4頁198~199，其所根據的是〈蔡元培呈文抄留底稿〉，故文末有蔡元培所書「文牘課即照繕呈部」之批語。孫既然不是根據抄留底稿，就不應將這交繕的批語也排印出來，結果為自己的抄襲行為露出了馬腳！

21.頁1063〈為浙江水災急募賑款啟事〉，係一開會通知。很清楚的說明「定於十二月二日」開會，請北大浙籍教職員等屆時到會籌商辦法，不可能如孫君末行所註遲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請參考《高全集》卷4頁289。

22.頁1187~1188所附〈副館長袁同禮談話〉，係1933年8月3日袁氏返北平時對記者之談話（見教育部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戊編頁378~379），孫在文末之出處籠統註為「民國二十二年〔1933〕七月五日申報」，七月五日的報紙怎麼會登八月三日的談話？時間錯亂得太不像話。

（二）正、續編重複收錄

不同的人為蔡元培編文集，重複收錄其文字是理所當然的事；同一編者，為了不同的目的和需求，所編不同的蔡元培文集，亦會有重複的情形，如高平叔所編的全集及各專集，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孫常煒所編的《蔡元培先生全集》在出版12年之後，因為有關史料的陸續出現，再為之輯印續編，是值得肯定的事；不過，既然是新出現的史料，為什麼已經收在《正編》中的文章，再在《續編》中重刊？而《正編》中的錯誤，也未在《續編》中作任何更正，如頁1024~1025〈教育行政大綱序〉，原文約400字，竟漏掉180字，令人無法卒讀，筆者曾在《傳記文學》第31卷第2期明白指出，似此應重刊者反而不重刊，令人費解！據筆者初步統計，《續編》中至少有36篇是已經收在《正編》的；而重刊的結果，不僅未將原來錯了的加以改正，有些原來對的，卻重刊了另一篇錯的，甚至連紀念文也重複了一篇，是最不可寬恕之處。由正、續編重複的情形，似可說明：孫君之《續編》，只是以高平叔的成果作底本，自己很少下過真工夫。茲將重複者分別說明如下：

1.頁360〈輓孫中山先生聯及祭文〉，見《正編》頁581~582，該文的撰寫日期雖未留下記載，但繫於中山先生逝世的當天，則是不正確的。

2.頁364〈西湖博覽會開幕頌詞〉，見《正編》頁899~900，分在「言論與演說之部」，《續編》則改置「論文與雜著之部」，前後分類標準不一

致。

3.頁473~474〈教育之對待的發展〉，見《正編》頁493~495，此文原收在蔡元培審訂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⑧（以下簡稱《新潮社本言行錄》）中，撰寫日期為1919年2月，《正編》誤置1920年，《續編》已予改正，惟其出處註為《北京大學日刊》第318號，經查該期日刊，並無此文；而正、續編的分類，前後也不一致。

4.頁478~479〈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第一次期滿式致詞〉，見《正編》頁750~751，《續編》只是多附了一份可有可無的「第一次期滿式獲證書者名單」而已。

5.頁481〈五四以來的回顧與展望〉，見《正編》「論文與雜著之部」頁519~521，《續編》則改置「言論演說之部」。該文初收在《新潮社本言行錄》頁284~287，題目為〈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正編》即據此轉錄的，重複收錄後反而製造了一些不可原諒的錯誤：(1)題目竄改得不成樣子，原題很清楚的表示出檢討去年（1919）五月四日以來……，孫改得失去原意；(2)原文約有1,100多字，不知為何刪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350餘字；(3)《高全集》卷3頁384~385此文之出處為《新教育》2卷5期，孫也照此註，但由其未全文照錄，證明他根本未見到該期雜誌；(4)該文撰寫及最初發表的日期應為1920年5月，不是1月，詳見周天度〈《蔡元培年譜》若干史實訂誤〉一文。

6.頁565~569〈我們的政治主張〉，見《正編》頁351~353，列在「論文與雜著之部」，未注出處；《續編》改置「言論演說之部」，不妥。按：該文係由胡適起草，據《胡適的日記》^⑨1922年5月11日記云：「做一篇〈我們的主張〉，是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半夜脫稿。翌日借蔡元培家開會，修改了幾處，商定列名人，於14日《努力週報》第二期發表。

7.頁592~594〈不合作宣言〉，見《正編》頁541~543「論文與雜著之部」，《續編》改在「言論演說之部」，只是改了一下題目而已。

8.頁629~633〈全國教育會議開會詞〉及所附〈閉會詞〉，見《正編》頁819~823。兩篇講詞均收在中華民國大學院編《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丁編頁1~3及7~8。令人不解的是《續編》中之開會詞謂錄自該會議報告，而閉會詞則不用此最可靠之會議報告所載之稿，竟捨近求遠採用報紙所發表

^⑧ 1920年，北大，新潮社編印。

^⑨ 手稿本，第三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17日出版。

者，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他未看到該報告，只是信筆而註罷了。更可笑的是閉會詞末行所云：

會後即在中大一字房前攝影，以誌紀念，並由招待員預備馬車，請各代表赴莫愁湖遊覽。

這顯然是記者採訪報導的語氣，並非蔡元培演說詞的一部分，他竟不加任何說明，也一併照錄，妄畫蛇足。

9.頁683~684〈東西學書錄序〉，見《正編》頁925，乃錄自《新潮社本言行錄》；《續編》則改註最初刊載之《東西學書錄》，原書係光緒25年出版，孫誤作光緒20年。蔡元培又於光緒28年（1902）10月為增版《東西學書錄》作序，孫在初版序後之按語中已經提及，並引錄一段序文，惟無全文。經與《高全集》卷1頁87之注腳核對，方發現其來源。《高全集》未收錄全文，其所引者見拙編《蔡元培年譜》上册頁110，已將「不可俚指頭」句中之「頭」字改正為「數」；而下句「自是以往」則誤為「自是而往」，孫也照錯。拙編的錯，高可改正；高編的錯，孫則照抄。編者是否認真負責，相較之下，立見分曉。

10.頁688~691〈文變序及目錄〉，見《正編》頁925~926，只是未附「目錄」。

11.頁747〈題北大民國十四年哲學系級友會紀念刊〉，其出處竟然註的是根據《正編》的手稿墨跡，難道就忘了在《正編》頁955~956也排了釋文？其粗疏若此，尙復何言！

12.頁888~889〈徐秀鈞墓碑〉，見《正編》頁691~692，列「論文與雜著之部」，十分妥當；《續編》則改置「函電公牘之部」，不知其分類有何標準？尤有進者，《高全集》卷3頁237~238收錄此文時，很規矩的註明採自《正編》，不料孫在《續編》之出處，則又根據《高全集》，真令人啼笑皆非！

13.頁914〈致全國學生聯合會等電〉，見《正編》頁1110，此件連標點在內也不過150字的電文，《正編》竟有三處錯誤，《續編》只改正了一處。

14.頁1104~1106〈創辦國立藝術大學之提案〉，見《正編》頁1148~1150，該案係以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名義提出，未見署名人。

15.頁1110~1111〈修正大學院組織法〉，見《正編》頁1136~1137，係錄自《國民政府公報》第36期，是最可靠的來源；《續編》則改採不甚可靠

之報紙，而條文之前三行文字係抄自《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28年1月27日條^⑩，但不註明，以致其中「於本日公布」之「本日」變得毫無意義及不可解；至於條文後之7行文字，則係抄襲逢甲大學陳哲三教授所著《中華民國大學院之研究》^⑪頁51，此為其分析修正重點之研究結晶，孫一字不易（包括一個錯字）照抄，也不作任何說明！這樣東拼西湊的編法，令人無法分辨何者是蔡元培的著作，何者是編者拼湊的！

16.頁1112~1114〈修正大學區組織條例〉，見《正編》頁1135~1136，未附「大學區組織表」。《續編》在條文後之12行文字，係抄襲陳哲三《中華民國大學院之研究》頁77~78，此乃其對條文經詳加研究後之心得，比較修正前、後有何不同，分析修改的重大意義。不料他耗費心血所得到的成果，竟被孫君任意割裂後排在此處，卻無隻字說明；若不詳加核對，將誤以為這是「條例」的一部分，或為孫之獨到見解。更荒謬的是將陳哲三上書頁81之「大學區組織表」，也巧取之作為附錄；殊不知陳書所列之「組織表」，係參照數度修改後之結果而整理出來的，並非僅根據這一次修改的條文而列，如第5~7條，大學區設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擴充教育三個「部」，而「組織表」中則已明顯的改「部」為「處」了。這種生吞活剝式的掠奪行為，而又張冠李戴，證明他是一個完全未受過學術訓練的人。

17.頁1125〈覆朱家驊電〉，見《正編》頁1151~1152，未註出處；《續編》之出處，則編造為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證明他既未看過丁書，也未見到原刊該電文之《大學院公報》。

18.頁1131〈提議全國註冊局改隸，其收入逕歸大學院〉，見《正編》頁1152，係錄自最為可靠的《國民政府公報》第48期，《續編》則改採不甚可靠之報紙；《正編》的標題非常周延，一目了然；《續編》則改得不知所云。

19.頁1132~1133〈呈送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修正草案〉，見《正編》頁1153~1155，採自《國民政府公報》第48期，《續編》則誤為第40期。

20.頁1135〈為解決中山大學經費困難之提案〉，見《正編》頁829，前後又分在不同的類中。

21.頁1141〈僑委會委員提名名單〉，見《正編》頁830，又是前後分類

⑩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份》，1978年7月6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印行。

⑪ 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12月初版。

不同。

22.頁1142〈致國際聯盟及美國總統電〉，見《正編》頁1157，採自最可靠的《全國教育會議報告》（該電係蔡元培以全國教育會議議長名義拍發），《續編》則改採報紙所發表者。

23.頁1152~1155〈對於青年運動之提案〉，見《正編》頁823~827，前後分類之標準又不相同。

24.頁1169〈致李宗仁電〉，見《正編》頁1268，發電日期誤為「民國十五年八月十日」，應為民國18年5月10日。

25.頁1170〈覆傅斯年等函〉，見《正編》頁1291，繫於「民國二十七年」，殊誤；因為函中謂楊銓（杏佛）已取銷辭意，仍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而楊已於民國二十二年遇刺身亡了。

26.頁1195~1197「覆何炳松函」，見《正編》頁1272。何炳松字柏丞，是否一作「伯誠」，不詳。《正編》未附十教授宣言，《續編》則附的不全，此宣言很容易找到，既然附刊，為何又不照刊全文？後半段為何刪去？也不說明理由，實視編全集為兒戲！

27.頁1226~1230附錄之〈悼蔡元培先生〉一文，見《正編》頁1353~1357，係用筆名「余毅」發表，《續編》則用其本名「顧頡剛」重複收錄。紀念蔡元培的文字甚多，此篇重刊的目的，如果只是為了讓讀者知道「余毅」即「顧頡剛」，則未免太浪費篇幅了。

28.頁600~607、695~696、703~704、749~750、893、908、1109、1126~1128、1191~1194等九篇，均已收錄在《正編》中，茲不詳述。

四值得懷疑的幾篇文章

為前賢編全集，在史料鑑別、選錄標準方面，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續編》而言，其態度顯然不够嚴謹，茲舉下列數篇為例作一說明。

1.頁356~357〈中國美術展覽會徵展覽品啟事〉，原啟並未說明由何人屬草，是否可列為蔡元培之著作，頗值得商榷。按中國美術展覽會，係由留法美術界同學所發起，並聯絡留學德、比、英、意諸國美術界協助組成，推林風眠、林文錚等十一人為籌備會員，主持其事。時蔡元培正旅居法國之史太師埠（Strasbourg），因被推為名譽會長，似不太可能由名譽會長撰稿。又搜集展覽作品，自1923年底即已開始著手，至1924年2月正式成立籌備會，向外界發布公啟，加徵作品。展覽會於同年5月21日開幕，孫君將撰寫

啟事的日期作爲5月22日，絕對是錯的，不可能在開幕之翌日才公告徵集展覽品。啟事之首句，應爲：「中國，美術古國也。」孫君排作「中國美術，古國也。」如此斷句，實在不通。

2.頁402~409〈十年來之中央研究院〉，此文收在《革命文獻》第53輯頁443~450，其出處爲《中央週報》第469期。孫君究竟採自那個本子，不必深論，惟有兩點必須說明：(1)原題爲〈十年來之國立中央研究院〉，他刪去「國立」二字，不知是爲了簡潔？抑不知當時該院的正式名稱是冠有「國立」二字的，直到1954年12月28日公布修正「中央研究院組織法」時才刪去。無論是那項理由，這樣任意竄改一篇正式文章題目的做法，令人不敢苟同。(2)該文並未署名，是否應收在蔡元培全集中，不無值得商榷之處。照一般慣例，此類工作報告性之文字，多由業務承辦人或秘書將各項資料彙齊後連綴成篇，經機關首長過目後畫行。若因蔡元培爲該院院長，而這類文字都照收的話，其全集的厚度將大爲擴增，僅《革命文獻》第53輯中，就可找到同類的文字9篇。

3.頁638~639〈全國教育會議閉會宣言〉，此次所舉行者爲第二屆全國教育會議，議長爲時任教育部長之蔣夢麟，據1930年4月23日《申報》報導，該項宣言之起草委員共有五人，爲：吳敬恒、楊銓、陳布雷、孟憲承、陳德微，由陳布雷主稿，與蔡元培完全無關，不知孫君何所據而編入全集？

4.頁1190〈發起國人自編英文中國年鑑〉，據1934年4月27日《申報》第10版報導云，蔡元培與李煜瀛、史量才、陳立廷等，最近在滬發起一英文中國年鑑社，業已開始工作，並刊登其編輯緣起。惟並未說明該緣起由何人執筆，孫君爲何收錄，亦未作任何交待。

5.頁1166~1168〈確定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係1929年3月25日中國國民黨第3次全國代表大會第11次大會所通過者，國民政府於4月26日公布。至於爲何收入蔡元培的全集？未作說明。文末所註「頁789」乃「827~828」之誤。

五、結 論

爲前賢編全集，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不僅是對他表示敬意；更重要的是使其思想、言論等智慧的結晶長久保存下去，供後人研究與借鏡。孫常偉從事此項工作，竟是這樣草率、粗疏，實在有負其叔父之重託。至於承印的

商務印書館，蔡元培自1902年擔任該館編譯所所長起，到1940年在香港病逝為止，一直維持著深厚的關係；按常理，爲之印行全集，應極爲慎重；事實也不然，乃不經審查，率爾付梓。此舉不僅愧對蔡元培，而爲害學界尤大！商務印書館在遷臺之前，其出版品向以嚴謹聞名，如今各種條件均較那時爲佳，而印行的品質卻每下愈況！使人對該館之前輩——也都是蔡元培的老友——如夏瑞芳、張元濟、高夢旦、王雲五等，當年慘澹經營、所建立的國際盛譽，不禁更加懷念與崇敬！同時也對目前印行此種弄虛作假、粗製濫造之書籍，以欺矇讀者，並自損信譽，則深感遺憾與惋惜！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4月10日在大陸成立之全國性的蔡元培研究會以及許多關心蔡元培著述的學人，又組成了「蔡元培文集編輯委員會」，推高平叔教授爲主編，在《高全集》和《專集》的基礎上，約請專家學者，再分頭廣泛蒐集尚未收錄的原著，詳加註釋，編輯一套大型的《蔡元培文集》，爲深入研究蔡元培生平、思想者提供更詳盡的史料，並使廣大讀者閱讀時獲得更大的便利。此一大型《文集》，係按性質分類，預計先出版10種14卷，由編輯委員會的成員分別承擔各卷的編註工作。茲將各卷文集名稱及編註者姓名、職銜列表如下：

高平叔主編：《蔡元培文集》總目錄

| 卷別 | 文集名稱 | 編註者 (及現職) |
|----|-------|----------------------------|
| 1 | 自傳 | 高平叔(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蔡元培研究會副會長) |
| 2 | 教育(上) | 梁柱(北大教授、副校長) |
| 3 | 教育(下) | 梁柱(北大教授、副校長) |
| 4 | 美育 | 王世儒(蔡元培研究會辦公室主任) |
| 5 | 哲學 | 趙光武(北大哲學系教授) |
| 6 | 政治、經濟 | 蕭超然(北大政治系教授、系主任、蔡元培研究會總幹事) |

| | | |
|----|--------|----------------|
| 7 | 史學、民族學 | 張寄謙（北大歷史系教授） |
| 8 | 語言、文學 | 段寶林（北大中文系教授） |
| 9 | 科學、技術 | 孫小禮（北大自然科學史教授） |
| 10 | 書信（上） | 高平叔 |
| 11 | 書信（中） | 高平叔 |
| 12 | 書信（下） | 高平叔 |
| 13 | 日記（上） | 高平叔 |
| 14 | 日記（下） | 高平叔 |

全部預計在400萬字以上。俟上述 14 卷出齊後，再視陸續發現與收集原著的數量，繼續編註第15卷、第16卷……，作為補遺。關於每卷的主要內容及編註經過，將由各卷編註者在「後記」中敘述。全部文稿的編註工作，現已接近完成階段，並已洽妥由臺灣一家頗具規模、熱心學術之出版社印行。相信這是有關蔡元培著述最為完備、最負責任的一次總整理，也是學術界所期盼的一部《蔡元培文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名人日記

王世杰日記 手稿本 10册 精2000元 平1500元

徐永昌日記（一～二） 木刻本 2册 精800元 平700元

徐永昌日記（三～十二） 手稿本 10册 精4000元 平3500元

函購八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胡適佚信六封箋注

張 挺* · 江小蕙

前 言

這六封胡適佚信，是江小蕙在整理父親江紹原藏書過程中陸續發現的。特加以注釋，為海內外胡適研究工作者提供一點原始資料，並為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聊竭芹獻之誠。

胡適與江紹原是安徽同鄉，胡是績溪上莊人，江是旌德江村人。兩人又是親戚，胡的夫人江冬秀女士是江紹原的同族女姪孫；就這一點而言，江雖比胡小七歲（胡生於 1891 年，江生於 1898 年。），卻是胡的長親。但另一方面，從江曾就讀於北大哲學系而言，胡又是江的老師。後來，則是同在北大任教的同事。但更重要的是，彼此在學術研究課題的某些方面有著共同的興趣。

胡適是自稱有「考據癖」的人，而江紹原對於民俗和迷信問題的研究也需要做認真的考據工作；因而在學術研究方面彼此互相關注，時常書信往來，相與切磋琢磨。同時，作為啟蒙家的胡適，對於江紹原在揭開禮教習俗與迷信的神秘面幕，還事物以本來面目的研究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例如他在一次題為「圖書使用法」的講演^①中就曾談到：「像我的朋友江紹原從小問題做起，專研究鬍子、頭髮在中國歷史上的迷信，^②成爲一個系統，於是兩千五百年的東西都活了。」

抗戰軍興和抗戰勝利以後，兩人天各一方，不復再通音問矣。1962年胡適逝世於臺北，1983年江紹原逝世於北京，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差幸尚有新發現的胡氏這些寸楮零箋，為兩位學人的交往留下一點雪泥鴻爪，或尚可聊供研究工作者參考耳。

1990年 9 月於北京

* 青島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教授

① 指江著《髮鬍爪——關於它們的迷信》一書。

② 見 1925 年 4 月 23 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

胡適致江紹原信（六封）

（一）1929年9月21日信①

你的《英吉利謠俗》②及劍岳③的《粵歌一斑》，④都已收到了。現正代詢出版事，決定後當奉告。延遲之咎，千萬請恕。北上過此，⑤幸來談。

適

十八·九·二十一

注：

- ① 此係明信片。自上海極司非爾路49號A胡宅寄往杭州下板兒巷15號江宅。時胡適因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董事會董事，定居上海。江紹原時任中央大學院特約編纂員。
- ② 《英吉利謠俗》：全稱為《現代英吉利謠俗及謠俗學》。後於1932年6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發行，周作人作序。
- ③ 劍岳：廣東興寧人，本名不詳，「劍岳」為筆名。除《粵歌一斑》外，還著有《鄉居隨筆》。
- ④ 《粵歌一斑》：劍岳編的一本客家民歌，其中包括兒歌、情歌、丐歌等民謠。
- ⑤ 北上：指江紹原即將自杭返平，回北京大學任教。

（二）1930年2月2日信①

新月書店②擬出一部歌謠叢書，擬名為《新國風叢書》。③內容專收各地歌謠與相關的材料。我想請你作編輯，曾有信寄北平，來信未提及，似未收到此信。想已失落了。原信提及的幾點，大概如下：

- (1)叢書性質（已見上）
- (2)不買稿，但給版稅，百分之十五。
- (3)編輯人或你一人，或你我二人。

為名譽的，但稿件皆由編輯人決定去取。編輯對於某書有作序或注釋的工作時，酌送此種書的版稅百分之一、二。

(4)已得各書如下：

- ①英吉利謠俗
- ②粵歌一斑

③閩南歌謠

④豫南歌謠

此事乞賜一信。劍岳先生能允版稅問題否？

何時過杭，乞見訪一談。④

祝

雙安

適之

注：

- ① 此係明信片，自上海胡宅寄往杭州下板兒巷 15 號江宅。時江紹原已回平任教，家眷仍寓杭。
- ② 新月書店：新月社創辦的書店。1928年成立於上海。以出版並發行《新月》月刊和新月社同人的著作為主要業務。
- ③ 《新國風叢書》：此書名稱不見於 1988 年 9 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民間文學辭典》，似未成書。
- ④ 何時過杭，乞見訪一談：指劍岳何時過杭而言。

(三) 1932 年 4 月 12 日信①

紹原兄：

今午因英使館約吃飯，回來也許稍晚，故草此信通知，請你在五六時來談，② 以免相左。並乞原諒。

適之

十二日午

注：

- ① 胡適於 1930 年辭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等職務，携眷北上，定居後門內米糧庫 4 號。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繼而兼任文學院院長。江紹原亦於 1931 年舉家自杭遷平，定居後門內後局大院 5 號，先後在北大及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哲學系任教。此信係由胡宅專送江宅。
- ② 來談：指胡約江來談關於遼江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編譯委員會編譯《世界宗教史》一事。

(四) 1932 年 5 月 6 日信①

紹原兄：

送上改定的辦法，② 乞酌奪回示。圖書館保證書，③ 我不知其重要，故

一時疏忽擱置，現已寄去了。

德文信奉還。匆匆問

早安

適之

二十一·五·六早

注：

- ① 信由北平南長街22號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專送北平後局大院5號江宅。
- ② 改定的辦法：指胡對江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譯《世界宗教史》的計畫所擬的改定意見。其中規定全書約七十至八十萬字，於1934年9月完成，每千字稿費十元。該書版權歸編譯委員會所有。
- ③ 保證書：指胡為江寫的向國立北平圖書館借書的保證書，便於江在編譯《世界宗教史》時借用所需要的書籍。

(五) 1932年6月17日前信①

紹原兄：

謝謝你送給我的《鞭策》16期的論文。② 謝謝你改正我的《迷忌》界說。我的本意自是如你所說，要把 tabu③ 包在 magic 之中。page 126 所舉界說，當時確實也想到應加入「不用」「不行」的字樣，一時躲懶，就忽略了。

很盼望你的《吉祥說》④ 早日寫成。

敬問雙安

適之

注：

- ① 此信由北平米糧庫4號胡宅專送北平後局大院5號江宅。信末未署年月日。據1932年6月17日江紹原致周作人信內所說：「日前為《鞭策》寫一篇短文——《同胡適之先生討論〈迷忌〉》」的話判斷，則胡適寫此信的時間當為1932年6月17日前。時江紹原仍繼續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任教員並兼任中法文化交換出版委員會特約編纂。
- ② 《鞭策》16期的論文：《鞭策》周刊1932年2月在京創刊。它是由北大、中法孔德學院、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的幾位教師所辦的一種同人刊物，由同人輪流擔任編輯，主要成員有徐祖正、黎子鶴、楊震文、嚴既澄、江紹原、楊堃、董人驥等。其第16期的論文即《同胡適之先生討論〈迷忌〉》一文。
- ③ “tabu”：即 taboo，意為某些原始民族的禁忌。“magic”，意為魔法、巫術、原始迷

信行爲。

- ④ 《吉祥說》：江紹原於當年六月開始撰寫的一篇論證「祥」字本義的論文。江認為「祥」字的本義並非「福」、「善」或「吉祥」之意；而是「恭順於鬼神」之意。相當於拉丁語“reverentia”、“religio”和希臘語“Hybris”。中國古籍中的「祥於鬼神」、「祥所從事神也」，即用「祥」字本義。

(六) 1932年9月11日信①

紹原兄：

前天冬秀說起公送王麟石夫人②祭幛的事，敬擬字樣，但頗覺多窒碍，不易措詞，尤不易稱呼。所以令秀送給伊家「禮部公」③審查修改，千萬乞酌奪。匆匆問

雙安

適之

二十一·九·十一

注：

- ① 信封已佚，按寫信年份此信當係由北平米糧庫4號胡宅專送北平後局大院5號江宅。
② 王麟石夫人：王麟石及其夫人生平不詳。
③ 伊家「禮部公」：指江紹原。因江冬秀係江紹原同宗，故稱「伊家」。當年北大和語絲社某些人常戲以舊時或封建時代官職相稱或稱呼他人。如稱周作人為「總長」，稱張鳳舉為「鳳威將軍」等，此稱江紹原為「禮部公」係因江當時研究禮俗，連續在報刊上以《禮部文件》為題發表文章，並在北大曾專門講授「禮俗與迷信研究」課題之故。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五部檔」簡介

高純淑*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皮藏史料豐富，久為史學界所稱著。惟限於政策考量或人力不足，尙有大量史料保密年限未屆，或整理不及，未能及時公開，以應研究需要。黨史會為順應國內外史學界開放史料的潮流，

*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審

爰就庫藏史料中，選擇「上海環龍路檔案」、「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簡稱「漢口檔」）及「中央特別委員會農民等五部檔檔案」（又稱中央前五部檔，簡稱「五部檔」）等三種檔案，集中人力先行整理，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起開放參閱。其中五部檔，自開放以來，調閱者甚多，使用頻繁，特爲之介紹。

民國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廣州舉行，會中決議於中央黨部分設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婦女部、調查部、軍事部等一處八部；並推定各部部长：譚平山長組織部，戴季陶長宣傳部，鄒魯長青年部，廖仲愷長工人部，林祖涵長農民部，曾醒長婦女部，許崇智長軍事部，中央黨部之組織大定。迨後因事實上之需要，曾次第添設二部：一爲海外部，林森長之；二爲實業部，汪精衛長之。其中實業部爲六月十六日增設，十月二十日改爲商民部，伍朝樞爲部長。然不久商民、調查二部撤銷，仍維當初一處八部之原狀。

五部檔卽是民國十三至十六年間，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商民等五部的原始檔案，多係毛筆原件，數量相當龐大，共計一六、四三九件，其中工人部居多，達六、三九四件，其餘各部數量相當平均，都在兩千件以上，農民部爲二、五六九件，青年部爲二、二一〇件，婦女部爲二、〇八四件，商民部爲二、〇二一件。另有一、一六一件史料，或涉及兩個部以上，或爲五部以外其他各部會，如組織部、民眾訓練委員會的檔案。

按史料性質，可粗分爲組織、會議、財務、紀律、糾紛、計畫、報表、文書、人事等九類。組織類包括籌備經過、組織章程、選擇會址、人員就職、黨費徵收等相關史料，計四、二六五件；會議類包括會議通知、記錄及提案等相關史料，計七四三件；財務包括經費籌措、核撥、收支報告及預算等相關史料，計一、二八二件；紀律類爲取締非法組織、懲戒失職黨員等相關史料，計一二二件；糾紛類爲處理各種糾紛之相關文件，計三、七七四件；計畫類爲各種工作計畫、大綱、草案，計三四五件；報表類包括例行工作報告、突發狀況的調查報告，及各種名冊、統計表，計二、〇九八件；文書類包括各種宣言、書告、通告、通電、通訊，計八一七件；人事類包括黨員撫卹、嘉勉，及推介工作等相關史料，計二、九九三件。詳細統計數字如下表：

| | 工人部 | 農民部 | 青年部 | 婦女部 | 商民部 | 其 他 | 合 計 |
|-----|-------|-------|-------|-------|-------|-------|--------|
| 組 織 | 1,589 | 588 | 621 | 446 | 741 | 280 | 4,265 |
| 會 議 | 183 | 97 | 142 | 141 | 123 | 57 | 743 |
| 財 務 | 369 | 250 | 232 | 236 | 162 | 33 | 1,282 |
| 紀 律 | 44 | 13 | 12 | 12 | 6 | 35 | 122 |
| 糾 紛 | 2,543 | 407 | 347 | 144 | 295 | 38 | 3,774 |
| 計 畫 | 72 | 54 | 66 | 62 | 51 | 40 | 345 |
| 報 表 | 542 | 464 | 330 | 338 | 280 | 144 | 2,098 |
| 文 書 | 118 | 129 | 79 | 95 | 24 | 342 | 817 |
| 人 事 | 934 | 567 | 381 | 610 | 339 | 162 | 2,993 |
| 合 計 | 6,394 | 2,569 | 2,210 | 2,084 | 2,021 | 1,161 | 16,439 |

綜觀「五部檔」的內容，實為研究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中央或地方的組織，及各地羣眾運動的重要史料，值得史學界予以重視。當時主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者，多為共黨分子，已往由於史料缺乏，研究此一問題者，往往只能參考大陸方面資料，隨著「五部檔」的公布、運用，當有助於釐清事實。

更正：本刊第十三期「新書評介」欄刊載杜榮佳先生評介一文，出現部分錯誤，更正如下：

197 頁第一段第五行 Wolfram Eberhard 誤植為 Welfram Eberhard，第六行 Liu Wang Hui-chen 誤植為 Lisa Wang Hui-chen。197 頁第二段第八行及 198 頁第一段第六行 Johanna Meskill 誤植為 John Meskill。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 保存與整編概況（十一）

莊 樹 華*

農林部：林業、墾殖業機構

本期所介紹之農林部檔案以林業機構及墾殖機構為主。

（一）林業機構

農林部所從事的林業建設內容包括：舉辦林業實驗、整理保護天然林、經營發展水源林、營造經濟林及推廣造林等工作。而推動此一工作之專業機構大致上有：（一）林業實驗方面：主要以中央林業實驗所為主，其下分造林研究、林產利用及調查推廣三組，並附設林業試驗場。（二）整理保護天然林：計有秦嶺、洮河流域、岷江流域、青衣江流域（後併入大渡河國有林管處）、大渡河流域、祁連山、金沙江、雅隴江流域等國有林區管理處，各區主要工作為禁止濫伐林木，補植更新、訓練林警、清理業權、勘查森林、測算材積等。（三）經營發展水源林：水源林區方面計有長江水源林區管理處漢水分區（併入秦嶺林管處）、贛韓兩江分區（併入東江水土保持實驗區）；黃河水源林區管理處有涇水分區（併入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及洛水分區（併入秦嶺林管處）；珠江水源林區管理處有紅水河分區（併入西江水土保持實驗區）；水土保持實驗區有甘肅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西江水土保持實驗區及東江水土保持實驗區。（四）經濟林及造林：於貴州錦屏設立第一國營經濟林場，經營換取外匯及建築用之油桐杉木為主；陝西隴縣設立第二國營經濟林場，以經營軍工用材之核桃板栗為主（後併入秦嶺國有林管處）；第三經濟林場設立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廣東樂昌，以經營醫藥用原料之香樟厚朴桉樹爲主，第四經濟林場設於廣西龍州大青山，主要生產藥用之瘧疾特效藥及軍事用途之橡膠等熱帶林木，另於民國三十一年於湖南洪江設立民林督導實驗區，以試行督導提倡民營森林之方法，待有成效即督促各省仿照推行。茲將各單位檔案內容簡介如下：

1. 中央林業實驗所：現存檔案共73函（1941～1949年），除中央林業實驗所本部資料44函外，另有其他附屬機構，如華南林業試驗場（5函），華北林業試驗場（8函），常山種植實驗場（15函）、東北林業試驗場（1函）。檔案內容有：組織章程、總務、人事、業務、經費、工作報告等類。

2. 國有林區管理處：(1)秦嶺國有林管處，21函（1941～1948年）：組織、總務、人事動態、1941～1948年經費、林地產權清冊、勘查林地報告。(2)洮河國有林管處，15函（1941～1948年）：組織規程、人事、經費、林權登記表、工作報告。(3)大渡河國有林管處，9函（1941～1946年）：組織規程、總務、人事、經費、會計報表、勘查報告。(4)青衣江國有林管處，6函（1940～1946年）：組織、人事、會計、業務計畫。(5)岷江國有林管處，6函（1941～1945年）：組織、人事、經費、支出憑證簿、業務、工作報告。(6)祁連山國有林管處，14函（1941～1946年）：組織成立、人事、經費、森林調查報告、林警總隊。(7)金沙江國有林管處，4函（1942～1946年）組織、人事、經費、業務。(8)雅隴江國有林管處，2函（1943～1946年）：組織、人事、經費。

3. 水源林區及水土保持實驗區：(1)長江水源林區漢水分區，2函（1942～1944年）：組織、人事、會計、業務。(2)贛韓江水源林管處，6函（1943～1947年）：人事、會計、工作報告。(3)黃河水源林區管理處洛水分區，3函（1942～1946年）：組織總務、人事、經費、業務。(4)珠江水源林區管理處紅水河分區，3函（1942～1946年）：組織、人事、經費、工作報告。(5)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15函（1942～1949年）：組織規程、總務、人事任用及動態、各年度經費報表、工作計畫及小龍山天然管理處。(6)西江水土保持實驗區，11函（1942～1949年）：組織、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7)東江水土保持實驗區，4函（1946～1949年）：組織、移交、人事、經費、業務。

4. 林場方面：(1)第一國營經濟林場，16函（1941～1948年）：組織章程、總務、人事、經費、生活補助費、支出憑證簿、業務及工作報告。(2)第二國營經濟林場，10函（1941～1948年）：組織、總務、人事任審、經費、

業務、工作報告。(3)第三國營經濟林場，15函（1941～1948年）：組織、總務、人事、經費、生補費、公糧費、支出憑證簿、業務、工作報告。(4)第四國營經濟林場，10函（1940～1947年）：組織移交、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5)洪江民林督導實驗區，11函（1942～1948年）：組織、人事、經費、業務、工作計畫及報告。

(二)墾殖業機構

農林部墾殖建設之主要內容包括辦理國營墾區、督導省營民營及社團營墾區，調查荒地及訓練墾務人員。抗戰軍興，中央為收容難民增加生產起見，由各有關部會辦理國營墾區，農林部於1941年2月設立墾務總局負責綜理並指揮監督所有國、民營墾務。所設立的國營墾區有：陝西黃龍山墾區管理局，陝西黎坪墾區管理局，甘肅岷縣墾區管理局、甘肅河西關外墾區管理局，甘肅河西屯墾實驗區管理局、西康西昌墾區管理局、金佛山墾殖實驗區管理局、貴州六龍山屯墾實驗區管理局、江西安福區管理局、福建順昌墾區管理局、河南伏牛山墾區管理局、西康泰寧墾區管理局，四川東西山屯墾實驗區管理局、四川雷馬屏峨墾局以及西北移民辦事處。以上皆成立於抗戰期間，至1945年後裁撤，1946年後與國防部合辦東北、洞庭屯墾局、贛北、川東、關中屯墾處。茲將各機關之檔案內容介紹如下：

1. 墾務總局，44函（1940～1945年）：組織沿革、移交清冊、總務、各級人員人事任用、墾殖經費、生活補助費、帳簿、支出憑證簿、工作報告。

2. 陝西黃龍山墾區管理局，33函（1940～1947年）：成立移交、章則條例、總務、人事概預算、貸款、難民收容及登記、墾民貸款借據副本、業務計畫、工作報告。

3. 陝西黎坪墾區管理局，15函（1940～1946年）：組織、職員任用動態、預算概算、各項經費、貸款契約借據及分戶帳簿、業務法規、墾民業務、統計調查及工作報告。

4. 甘肅岷縣墾區管理局（改稱甘肅河西關外墾管局），12函（1941～1945年）：組織沿革、總務、人事、概預算、經費、各種補助費及公糧費、會計報表、會議紀錄、業務、工作計畫報告。

5. 甘肅河西關外墾區管理處，5函（1944～1947年）：組織沿革、職員任用、人事動態、薪俸考核、經費、公糧費、生補費、會計報表、業務。

6. 甘肅河西屯墾實驗區管理局（1944年改稱河西永昌墾管局），10函（

1942~1944年）：組織沿革、總務、人事、經費、生補會、會計報告、工作計畫、會議記錄。

7.第二國營農場（後改組為四川雷馬屏峨墾局），4函（1941~1942年）：沿革、總務、人事、經費、會計報告、會議記錄。

8.四川雷馬屏峨墾區管理局，8函（1942~1946年）組織沿革、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會議記錄。

9.四川金佛山墾殖實驗區管理處，20函（1941~1946年）：組織、移交、總務、人事、經費、會計報告、貸款、支出憑證簿、業務、會議、工作報告。

10.貴州六龍山屯墾實驗區管理局，16函（1941~1947年）：成立、結束、移交、總務、人事、經費、支出憑證簿、業務、工作報告。

11.江西安福墾區管理局，15函（1941~1948年）：組織沿革、總務、人事任用、薪俸考核、經費、業務法規、會議、工作計畫及報告。

12.第五國營耕牛繁殖場（併入江西安福墾局），3函（1941~1943年）：組織沿革、總務、人事、經費、業務。

13.福建順昌墾區管理局（後改稱福建濱海墾局），4函（1942~1947年）：沿革、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14.福建濱海墾區管理局，4函（1944~1947年）：沿革、總務、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

15.河南伏牛山墾區管理局，1函（1943~1945年）：組織、人事、經費、事業、工作報告。

16.西康泰寧墾區管理局，1函（1944~1946年）：沿革、人事、經費、工作報告。

17.西北移民辦事處，7函（1942~1947年）：原稱西北移民拓集處，民國三十二年改稱西北移民辦事處，承辦墾民訓練、運送、調查統計，招募等工作。檔案內容有組織沿革、人事、經費、業務、工作報告，移民清冊、墾民異動表、西北公路局辦理墾民運輸等。（下期待續）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新書評介

嚴復與福澤諭吉。王中江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

1969年8月我曾遊日本東京的慶應大學，今讀王中江《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啟蒙思想比較》，始知福澤諭吉創辦慶應義塾大學，功勳堪比英國邊沁創立倫敦大學、中國馬相伯建立復旦大學。王著由指導教授張岱年作序，原為博士論文，分為時代、文化、思想、實踐四篇，值得關懷中日文化者閱覽。頁2解「西洋」為印度洋，不如說婆羅洲以西的海洋。他首先比較兩國悲劇性的閉關鎖國，同樣直接由於天主教輸入和對外貿易的發展。關於乾隆帝與日本中華主義始祖山鹿素行不約而同排斥異邦貨物，可參考劉梅琴《山鹿素行》（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頁146引日本國學四大家之一本居宣長〈直毘靈〉的荒謬譬喻：

比如，猿見人，笑無毛為人之恥，為云吾為有毛之物。強求細毛以見，競如。不識貴在無毛，不異痴人乎！

多毛的猿象徵盛行的中國道學。本居宣長對異邦文化的激烈否定，簡直逼近中國的楊光先。儒學沾溉日本，豈容一筆抹殺！詳見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日本儒學淪為禪宗附庸，似歐洲中古哲學降為神學奴婢；日本產生神儒佛三教一致論，相當於中國的三教合一論，僅以神道教代替道教。初期佛儒凌駕神道，後來神道壓倒佛儒，表現日本文化獨立。至於日本哲學史，王中江君翻閱永田廣志《日本哲學思想史》和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近代日本思想史》首卷等中文書，以及十多本日文書。我認為王守華、卞崇道《日本哲學史教程》（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與鈴木正、卞崇道等《日本近代十大哲學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也可觀，「十大」包含福澤諭吉。他受尊為日本的伏爾泰，王中江君有精詳解釋。頁45述津田真道區別虛實兩學，虛學指佛學及陽明學之類，實學包括西洋哲學、經濟學及自然科學，可知津田真道遠視中國哲學。頁53講嚴復「在揚武軍艦實習時，船長是英人德勒塞，但是附上「船長」原詞 Commander 而欠德氏原名，我相信是 Dreiser。王著頗用史華慈《尋求財富與力量——嚴復與西方》的中譯本《嚴復與西方》，幸能糾正譯者滕復等對作者中文名

字的錯譯——許華茨，可惜王君未能運用牛仰山、孫鴻寬編《嚴復研究資料》（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商務，1982）及成曉軍《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曾國藩指導吳汝綸，正是嚴復的師祖。我的短文〈嚴復之師吳汝綸〉，收在拙著《明清思想家論集》（臺北：聯經，1981）。桐城派陣容強壯，無奈王氏中肯指出：「啟蒙陣容不够強大」（頁50），雖有頁78提到的郭嵩燾。福澤諭吉閱《左傳》十一遍，顯露對春秋時代魯國政治的濃烈興趣，未知嚴復是否只讀一遍。幾道僅曾留學英國近三年，眼界狹於潛心荷蘭學術（1854~59）然後遊訪歐美（1860~67）的福澤諭吉。然而道德情操方面，嚴氏未嘗主張侵略，遠勝福澤支持擁護日本企圖瓜分中國和佔領朝鮮的野心及戰爭。福澤的擴張主義，我認為直追英國培根的殖民主義。余麗嫦《培根及其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附錄〈培根在中國〉介紹嚴復與梁啟超，尚未在正文批判培根的殖民主義。

「有趣的是，日本在江戶時期吸取了儒家思想中的華夷觀念，形成了神夷之辨。」（頁80）中日同患自我中心主義。準確些說，它是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章太炎極端反滿族的民族主義，通過辛亥革命實現了。」（頁85）須知章枚叔非倡極端大漢族主義或漢族沙文主義，而僅反對滿清的暴政。反清的譚嗣同視道為用、器為體，王君看出這體用觀恰與張之洞中體西用說相反。剛巧日本亦有「和魂洋才」論取代「和魂漢才」論。「日本的很多家庭中還是神佛共存，典型地反映出日本人的折衷主義性格。」（頁94）某日本學者應邀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雙週會演講，宣稱日人甚至信奉多種宗教，期望列位教主神佛庇佑。史家新井白石（1657~1725）最早提出「和魂洋才」觀，也喜愛自然科學。孟子說君子有三樂，洋學家佐久間象山卻標舉五樂，後兩項是：「西洋自然科學高度發達，生於此世，知孔孟不知的道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賅。因以澤民物，報國恩。」（頁96）其實孔孟身後近二千年，洋學方才傳入。索性說「知孔孟程朱陸王不知的道理」吧！儒學亦能澤民物、報國恩啊！當然科技始能改善物質生活。「和魂」原與科技無關，只是「尊崇明、淨、直的精神和尚武的風氣」（頁97）。尚武乃浩劫的禍根。

嚴又陵慨嘆秦以來君主皆屬竊國強盜，我推測他受清初唐甄感染。「西學眼藏」（頁121）一詞，流露嚴氏譯孟德斯鳩《法意》時期對佛教的興趣。他像胡適尊重中醫，而福澤厭棄漢學（包含三教）與中醫。前句必須補充王

著。福澤對廿四孝的抨擊，上承趙翼而下啟魯迅。「福澤說新教是爭信仰自由，正中鵠的。」（頁 148）記得黑格爾講過宗教改革旨在自由，可能啟迪了福澤。我懷疑尼采的反宗教哲學，薰染福澤苛斥崇拜古代者為精神奴隸。不錯，「日本的西化是吞吐式的，……善於變通和靈活……（華人）對西方近代文化的反應遲鈍」（頁149~150）。王中江概括嚴復與福澤對西方文化的共同體認為三項：自由與多元化、厚今薄古觀、權利與自我意識。在中國，王充最先厚今薄古。頁 173 謂胡適、任繼愈等堅持儒學為宗教，我感覺唯科學論也似宗教。王中江所讚「科學主義」僅指崇尚科學，尚非偏激。頁 177 引嚴復〈救亡決論〉「氣學出於亢倉」，宜註明亢倉為《莊子》的庚桑楚。傳說他是老聃的隱君門徒。唐玄宗封為洞虛真人。同頁用培根口號「知識就是力量」，須知早於培根一千五百年的王充已出此言。頁 187 述理學將「物」歸結為「事」。我想到物必朽壞而事無所謂朽。但是無物則無事，事乃物之關係史。懷特海和羅素的中性一元論，便以不朽的事為非心非物的中性實體。「必須轉向自然，去讀自然這部無字之書」（頁 188），讓我追溯清初曲江（今廣東韶關）人廖燕（柴舟，1644~1705）《二十七松堂集》卷 5 〈答謝小謝書〉：「無字書者，天地萬物是也。古人嘗取之不盡，而尚留於天地間，日在目前，而人不知讀。燕獨知之讀之，終身不厭。」嚴復未必讀過廖燕作品，卻頌大自然道：「佛所謂牆壁瓦礫，皆說無上乘法也。」用以闡釋培根（倍根、貝根、柏庚）的窮理觀。現代美國學者哈里士《宇宙與人》竟對達爾文、赫胥黎等的進化論開了倒車，回歸中古神學的設計論證，臆斷上帝創世。（見 Errol E. Harris, *Cosmos and Anthropol: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 New Jersey &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1991）。佛教未斷言佛陀創造無字天書，難怪嚴復晚年信佛不信耶教。在〈老子評語〉，他等同西哲「第一因」、《周易》「太極」、老子的「道」與佛家「自在」或「不二法門」，容忍「不可思議」的佛家神秘主義，接納斯賓塞式的不可知論而非無神論。

福澤與嚴復對宗教採取功利主義態度，然而福澤不皈依佛教，死後始獲法號「大觀園獨立自尊居士」。他倆傾向主智主義（intellectualism），嚴復等《嚴復與西方》不宜譯它成理性主義。王君指出他倆非倡非道德主義，僅倡非道德中心主義。我提供另兩詞「非泛道德主義」及「反唯道德論」。頁 226 徵引意大利柯羅齊（Croce）之語，宜依朱光潛最後譯作《新科學》等

書作克羅齊，克氏私淑維柯（Vico）而批判黑格爾。嚴復不排斥耶教，他的孫女嚴停雲說：

老人家篤信佛理，但從來沒有排斥其他的宗教。他把父親的小名叫普賢，幼穉的二伯則有個名兒是文殊，四叔是基督門徒的約翰，五叔叫做福烈。我的二姑母璆篤信天主，年輕輕的當了修女。但先時祖父給她的別名是華嚴。後來我用華嚴為筆名，二姑母對我說：現在華嚴兩個字就歸你用吧。人家要是問起，就說有大華嚴和小華嚴兩個人好了。

（臺北《光華》第 67 期，1990 年 10 月）

王中江君可能未見華嚴〈吾祖·嚴復〉一文，但知嚴氏宗教觀是多元的。他偏愛《華嚴經》，非因經名有嚴字，而因充滿理趣、美感的神秘主義。對於他，唯識宗太繁瑣、天臺宗太辯證、禪宗太簡易、淨土宗太顯淺、律宗太苦行。還是代表智慧的文殊和代表宏願的普賢兩菩薩比較可愛。我欣賞王著結論：「在中國，思想自由還沒有真正得到保障，敢於批判與善於批評的氣氛還不存在。……適合思想家創造活動的條件和環境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十一億人民仍需新穎的啟蒙運動，根治怠惰與懦怯。康德也曾譴責世人懶懦始需啟蒙。（見范韋士《怪誕的命運：康德的形上學與世界史》Peter D. Fenves, *A Peculiar Fate: Metaphysics and World-History in Kan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25）

嚴復兒女全用單名，部首為玉，所以我不信某教授所言嚴靈峯先生是其子。《詩經·秦風·小戎》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儒家及嚴復都頌君子溫潤如玉。學醫的福澤輕視文藝。嚴復家族不然，又陵高足伍光建是翻譯家，其子伍蠡甫教授仍在復旦大學指導研究生，精研西方文學批評與中國繪畫史，兼擅長繪水墨畫。伍氏應邀赴中文大學演講，比較中西繪畫，曾向我憶述童年見嚴復相貌堂正，後來嚴、伍師徒同居考獲翰林銜。王著宜提伍光建。它英文錯字多，中文勘誤如下：

| 頁 | 誤 | 正 | 頁 | 誤 | 正 |
|-------------|--------|------|--------|------|------|
| 7, 342 | 和迂哲郎 | 和辻哲郎 | 59 | 68 歲 | 67 歲 |
| 17 | E. 卡西勒 | 卡西勒 | 60 | 讓退學 | 讓退學 |
| 24, 26 | 譚詡同 | 譚嗣同 | 71, 93 | 梁瀨溟 | 梁漱溟 |
| | 候官 | 侯官 | | 張君勳 | 張君勳 |
| 27, 28, 216 | 慧星 | 彗星 | 77 | 劉獻延 | 劉獻廷 |
| 45 | 山崎暗齋 | 山崎闇齋 | 80 | 神夷之辯 | 神夷之辨 |

| 頁 | 誤 | 正 | 頁 | 誤 | 正 |
|-----|-------|-------|-----|------|------|
| 82 | 蔑視 | 蔑視 | 242 | 相封性 | 相對性 |
| 89 | 校頒廬 | 校邠廬 | 243 | 政休 | 政體 |
| 96 | 兼該 | 兼該(賅) | 250 | 與接為構 | 與接為遘 |
| 98 | 夏目瀨石 | 夏目漱石 | 255 | 劉春峰 | 劉青峰 |
| 106 | 楊廣先 | 楊光先 | 256 | 鄒雍 | 邵雍 |
| 110 | 有機機 | 有機體 | | 无世運會 | 元會運世 |
| 132 | 論辨 | 論辯 | 259 | 楠本正成 | 楠本正繼 |
| 135 | 反感中醫 | 對中醫反感 | 268 | 賁荀 | 賁荀 |
| 154 | 阿樂卑斯山 | 阿爾卑斯山 | 297 | 荀緘 | 荀緘 |
| 167 | 追達/追俗 | 通達/通俗 | 304 | 物竟天擇 | 物競天擇 |
| 188 | 赫胥 | 赫胥黎 | 314 | 郭頤頤 | 郭穎頤 |
| 195 | 朱晤菴 | 朱晦菴 | 325 | 陸王心學 | 陸王心學 |
| 197 | 太易 | 太極 | 332 | 大觀院 | 大觀園 |
| 201 | 可神道 | 可是神道 | 340 | 贏得 | 贏得 |
| 219 | 施瓦茨 | 史華慈 | 341 | 此田大作 | 池田大作 |

王中江書頁81引水戶藩士會澤正志齋的話「朝氣、正氣是為陽」與「暮氣、邪氣是為陰」。他可能受老子影響，倡陽生、陰殺；或受董仲舒濡染，倡陽善、陰惡。嚴復晚年不再抨擊德國民族性，而激賞德國強人政治，且向法家哲學讓步，意味著肯定必需的陰惡（殺）。留學德國的宗白華，更為敬畏德人強悍剛毅，遂闡揚德國美學。

□香港大學·王煜□

革命與立憲*。潘英著。臺北，谷風出版社，1988年11月，235頁。

該書為一書評集，收集了作者對環繞著清末民初「革命與立憲」一主題的四十五本書所做的評論，其中除了少數幾本西文的中譯本之外，①其它均

*本書承墨子刻教授(Prof. Thomas Metzger)推介，文成又蒙指正，謹此致謝。

① 中譯西書有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Harold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Chun-tu Hsüeh, *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以及李文葆的梁啟超(Joseph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等書。

爲國人的作品，內容包括有關孫中山者十部，梁啟超者十一部，另外則是有關黃興、宋教仁、胡漢民、朱執信、康有爲、張謇等人的書；就出版年代來說，有些書是本世紀初葉的作品，有些則爲最近十、二十年在臺灣出版的著作；就性質而言，有些是歷史當事人的自述、史料集，有些則是詮釋性的史學著作。爲什麼作者會把這些書放在一起討論而不選擇其它的書？我覺得其中有一個理由可能是因爲在一九八〇年代，它們被放在臺北的幾間大書店中的同一個書櫃上。因此這些書也可以說代表了近年來在臺灣對此一主題所能聽到的主要聲音。作者有意將它們放在一個固定時間點上（1988？），讓它們彼此辯論，他並以一個統一的觀點對這些書學術貢獻的高下算一個總帳。

該書的特色是以書評集結成書的方式來表達作者對此一主題的觀點，這在臺灣史學界中是十分少見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個「異數」。在西方學術傳統中「書評」(book reviews) 以及「書評論文」(review articles) 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只要出版一本新書幾乎都會有好幾篇評論，而研究領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則有書評論文作整體評估。以研究亞洲史的重要期刊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爲例，每一期幾乎有近一半的篇幅是書評與書評論文；而且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利用每季出版的《書評引得》(*Book Review Index*) 找到所有的評論，十分方便。而這又涉及西方學界強調累積學術成果與溝通辯論的觀念，凡立一說，大多會先評論已有的成就，再強調自己的看法與前人解釋的不同。總之，後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每人不必從頭作起。可惜這一套學術規範在臺灣史學界還沒有受到完全的肯定。臺大黃俊傑教授曾說臺灣史學界像一個籃球場，場上有人赤腳，有人穿球鞋，有人穿皮鞋，還有人穿釘鞋，話雖有趣卻點出了一個相當可哀的現象。潘氏一書的出版在此學術背景下是很有意義的，我們很希望看到更多類似作品的出現，對已有的史學貢獻做進一步的反省與評估。

但遺憾的是此書仍有許多技術性的缺點，例如作者對每一本書只列出著作者、書名與出版社，而缺乏出版時間、地點、版本、頁數等其它資料，更沒有書目、索引等，再加上一些排版上的錯字，給人一種不够精細的感覺。當然這些「特色」可說是臺灣出版界所共有的缺點，並非全爲作者之過，然而如果作者與出版商能互相督促，就此力求改善，則造福讀者不淺。

上述這些技術性的缺點實際也反映了一個根本的觀念問題，由於忽略了出版時間，作者將過去近一世紀間所出版的書做一平面處理，使讀者完全看不到學術的演變與承襲。因此作者如能加上時間的面向，甚至分析地理或研

究羣體等因素的影響會使研究的主題變得更清楚。此外作者完全以臺灣書肆上所能找到的「一部分」的書當作評論對象，而不談外文或大陸的作品也顯得視野過於狹窄。當然此書並非一組織嚴謹的專著，如此批評過於嚴苛，但如能進一步完成一部如馬若孟 (Roman Myers)、墨子刻 (Thomas Metzger) 的書評論文或柯保安 (Paul A. Cohen) 的專書那樣檢討美國漢學界研究典範之演變的作品則是我們所樂見的事。^②

作者忽略各書的時間面向其實是理解的，對他來說，大多數他所評論的書都被框在一個我稱之為「革命典範」的研究取向之內，而只有「極少數」的人能有打破這個正統觀念或政治神話而公允地研究這一段歷史。綜合作者的觀點，這一「革命典範」有以下幾個重點：

一、盲目崇拜孫中山，一切成就歸之於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革命活動。

二、極端譁言革命陣營內黨派的分歧與人際的衝突。例如不重視與中會時孫中山與楊衢雲的分裂，同盟會時章炳麟與宋教仁對孫的非難；忽略光復會與華興會之角色等。

三、以為「革命」是好而「君憲」是壞，並抹殺或塗黑立憲派人士的貢獻。最好的例子是對1905至1908年左右《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辯論，採取民報作者本身的評估，認為「民報全勝，梁棄甲曳兵」。

總之作者強烈質疑「民國史就是革命黨史」的觀點。指出應客觀研究孫中山以外的領袖、同盟會以外的黨派，尤其應肯定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後來進步黨人在歷史上的貢獻。這些觀點其實並不新穎，以中研院近史所為主的「南港學派」以及許多外國學者均以此取向治清末民初歷史。在作者所稱許或部分稱許的史家中史扶鄰與薛君度是國外學者，^③而張朋園、張玉法、朱滋源與呂芳上則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員。但作者以書評的方式卻能以十分具體的例子指出這些觀念在臺灣學術界與教育界所曾具有的影響力。

② Roman Myers and Thomas Metzger, "Sinological Shadows: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2): 87-114. (此文在《食貨雜誌》上有中文翻譯) Roman Myers, "How Did the Modern Chinese Economy Develop? A Review Artic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3 (1991), 604-628.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③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外國學者之中潘氏贊許史扶鄰而貶抑李文葆；然而在國外，許多學者却對李文葆有很高的評價，許之為莫札特式天才人物。

以這種反「革命典範」的標準來評量，作者多次討論到近史所出版的專刊或同仁的作品，他以爲元冰峰的《清末革命與君憲之論爭》以論爭之中革命黨大獲全勝，「是革命宣傳品」（頁231）；而朱滋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以同盟會在排滿情緒上適合當時年輕人的胃口，但在政治、社會理論上落後「是當時的真像」（頁24）。作者又以爲張朋園先生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肯定梁氏貢獻，是「一部難得一見的好書」，但他對張氏將梁指爲本質是革命黨人，則以爲是「受某種意識型態左右」（頁163）；對張氏《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深入探討立憲派之角色，作者十分稱讚，以爲該書是具有空前貢獻的好書（頁219）。此外對張玉法先生所著《清季的立憲團體》與《清季的革命團體》也是讚賞有加，認爲張先生能注意到主流以外的人際衝突與黨派競爭，「粉碎許多革命神話」，是一個「真正的學者」（頁121、123）。這些評估都反映作者反對以國民黨主流派爲中心的民國史觀。

作者以書評的型式主張打倒偉人神話、掙脫意識型態的束縛、要求「還給歷史真像」等不僅只具有史學上的意義，其本身更代表了一種「解嚴後的心態」。我認爲此書與大學校園內批判理論、解構主義的盛行，小劇場等後現代主義的表演藝術以及激昂的政治反對運動等現象屬於同一「思想的氣候」（climates of opinion），^④代表了解嚴之後在不同層面上「邊陲」對「核心」的反撲。就此而言這一本在1988年，也是解嚴後一年所出版的書評集實際上本身也參與了另一個時代的會話，由此可見史學研究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緊密關連。

作者的另一貢獻是一些比較零散的史學上的論斷，這顯然是由於作者對這一段史事的高度熟稔，因此往往能見人之所未見，這些小地方實應細心體會。以他對梁啟超的思想之意見爲例，他認爲雖然表面上梁氏自稱思想「流質易變」，實際終其一生有一貫的基本信念，此一信念是和平改革，但不排斥激烈的革命手段。以此觀點來看梁氏思想的發展，他認爲梁氏在1903年以後趨於保守固然與其美國旅行的經驗有關，但是主要是因爲有兩個潛在的因素：

梁氏心中若沒有其他潛在因素，遊一趟美洲，縱然有所見、有所聞，言論應該也不可能發生如此大的改變，……我們以爲梁氏言論轉變的潛在因素有二：其一，梁基本上是一爲君憲及和平改革主張者，革命

^④ 這是 Carl Becker 的用語，見氏著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31.

只是他不得已而行之的「最險之著」與「最下之策」。其二，自立軍之役的失敗雖促使他走上革命之路，但革命的動亂卻又爲他所目睹，心理上無疑已蒙上一層陰影；等到某一情況出現，使他感覺這一「最險之著」確實危險，這一「最下之策」確實最下，這一陰影無疑地又促使他回到他原來的主張。（頁183）

作者上述的論斷雖嫌籠統卻很有見地，同時他更進一步肯定蕭公權在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序所言，梁啟超與孫中山不能合作原因雖多，但思想的歧異是很重要的一點。這些論斷都是了解梁氏思想的關節，而與本人最近對梁氏《新民說》之分析不謀而合。事實上根據拙文，梁氏在赴美之前所撰《新民說》中已有保守傾向，強調人性的幽闇面、政黨政治是小人的競爭、惡法亦法，反對社會福利政策與不切實際的全面更新等，美國之行只是進一步強化他原有的看法而已；同時這些植根於梁氏思想中的保守與調適的觀念與孫中山的思想格格不入，這種基本信念上的衝突是不容忽略的。

整體來說，此書雖有瑕疵，但能自圓其說，且有獨特見解，可讀性很高，惟間或有些過度情緒性的字眼，有失史學上敦厚平和之旨，似宜避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 謝國興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年。

區域——尤其是內陸省區的現代化歷程，是目前大陸與臺灣史學界共同關注的課題。謝國興先生近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以下簡稱《安徽》）的問世，無疑爲這個熱門課題增添了一部渾厚精彩的力作。

《安徽》一書在架構上雖然與該所「區域研究」的其他著作類似，但仍儘可能地突顯安徽地區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展現的重要風貌。所謂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作者將其化約爲「致富求強，追求平等自由的過程」（2頁），亦即近代中國「發展與變遷」的主要形貌（3頁）。本書除前言與結論外，共分五章，每章各有小結，均係環繞「發展與變遷」立論。

在第一章《背景分析》中，作者以爲，傳統安徽的產業結構仍停留在小農經濟生產的階段，工商活動只能維持小區域內自給經濟之格局，產業結構繼以自發的產生根本性革命（75頁）。並且由於賦稅用度、政府功能、自然

環境（包括地理與交通）以及觀念習俗諸方面的不足，使得安徽在資本積累與技術改革這兩個由農業社會向工商經濟轉型的重要條件上，俱感缺乏。因此，除了傳統物產中米、茶兩大項資源具有一定的外銷優勢外，傳統安徽「對於適應現代的急劇變遷，似無特別有利之處」（74頁）。此外，作者還著重指出，正當中國在嘗試其現代化的初步努力，亦即開始洋務運動之際，整個安徽卻捲入太平天國戰亂達十年之久，這對於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不能不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從而使得安徽地區的現代化進程，較之鄰近沿海省區，呈現出起步稍晚的態勢。

既然傳統安徽現代化的內在因素並不特別豐富，作者便將注意力投向外圍環境，在第二章《外力衝擊》裏，作者介紹了西方列強在皖省的傳教、通商（包括讓劃租界）、開礦諸項活動，以及在這些活動後面隱然體現的西方文化背景，通過這些活動，使得安徽官紳民各階層直接面對西方的衝擊。外力衝擊對於傳統中國的現代化，究竟是阻力、助力還是驅力？史家歷來各有持論，張朋園認為：「西力衝擊是中國不得不走向現代化的驅力。」在自身動力與外來衝擊何者重要方面，張氏進一步闡釋說：「外來的衝擊重要，傳統的變遷十分緩慢，外來的衝擊迫使不得不變而且必須及時求變，否則將面臨求生存的困難」，他並且認為「外來的刺激是求變的決定性因素，至於是否能及時現代化則屬自身的作爲了」。^①《安徽》一書，對於外力作用採取了明顯的肯定：「無疑的，外力衝擊是皖省近代歷史發展的一大動力」（107頁），爲此，作者在書中還舉出二個例子：（一）在爭回銅官山礦權的交涉中，全省紳民一致認識到利權必須操之在我，與光緒初年動輒反對開礦形成強烈對比（95頁）；（二）由創辦《安徽俗話報》，評論時政，喚起危機意識所表現出的現代性思想觀念的啟迪，均可以說明爲適應外力衝擊下的急速社會變遷，安徽本身所做的反應與調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謝先生把近代安徽這樣一個內陸省分所受外力衝擊的內容，分爲兩方面：一爲來自北京中央政府推行新政的各種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因革損益之政策性指示；一爲西洋經濟文化勢力的伸入。他以爲，清末安徽對現代化的肆應與調整，主要動力來自中央的指示與奉行，具體表現爲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面推行「新政」，謝氏將此喻爲「間接受西力衝擊」（106頁），並在後面三、四、五各章中一一詳

^①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架構與發現〉，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

述。之所以將這種間接衝擊作為安徽地區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原因在於自1860年代以迄清亡為止的皖省政治領導階層，少有開創性和積極主動的作為，多為奉命唯謹的傳統官吏。這番區分和論述，確實頗有見地。

作者在第三章中，通過對於政制變革、官僚系統、財政收支、政治參與狀況、司法與警政等方面的考察，描繪安徽地區這一時期政治現象的發展過程與本質，作者的結論是：如果以西方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標準評判，安徽這一時期的政治發展是反現代化的（246頁）。這一結論基本符合當時安徽的歷史情況，然而，作者在探討這一時期政治遲滯甚或逆向發展的原因時，不免也含有一些顯然牽強的因素。

第四章《經濟現代化》是全書的重心所在。作者以為，經濟發展是帶動社會全面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因此，經濟現代化的程度與成就，也就成了現代化與否的重要判準（249頁）。他參照經濟史家羅斯托（W. W. Rostow）的說法，以為十九世紀後半期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安徽經濟，處於剛從傳統社會起步、進入過渡期的階段（250頁）。由於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這一時期安徽出現了「傳統性社會與現代經濟活動同時存在」的現象，並具體表現在諸如經濟行政與經濟政策法規的頒行、人才使用、基層建設（包括金融、水利、交通、電信）、農業與農技、工商外貿、礦產開發等各個方面，書中均有大量具體入微的描述與豐富的資料統計。在該章小結中，謝先生進一步以為，（一）「近代安徽經濟發展得以朝現代性方向開展，係政府部門與對外貿易兩項因素共同影響」（466頁）。就前者而言，謝氏認為「在愈是工業後進的國家，推動現代經濟發展，政府部門所扮演的角色愈重。」（271頁）書中並以祁門紅茶的產銷為例證，作了具體的分析。再就後者而言，謝氏以為，安徽在1937年以前以農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雖然農產年有大量出口，仍無法積累充足的資金，以供發展工商之用，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復無足夠的購買力以消納工商產品，……因此，在對外貿易上，原料性商品為出口大宗，進口品中洋、土棉貨始終居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省無特別發達的工業，蕪湖、蚌埠則只有一點工商社會的浮光掠影。（467頁）

（二）「農業問題無法有效解決，是安徽經濟現代化困難的癥結。」謝氏認為其具體表現，一是農業技術改良遲至1930年代才真正開始，正值大力推進和初見成效之際，旋為抗戰爆發而阻止；二是安徽在近代曾有兩次解決土地分配不均之機會，即太平天國以後和1930年初期，但格於形式，均無成就。他進而指出，1930年代的農業問題，實為安徽經濟問題之核心，就此而論，

安徽的經濟發展問題，尚在起跑點上。這些觀察、分析和評估，從總體上大致為皖省近代經濟的發展廓出一個概貌。

在第四章的基礎上，作者隨之展開了第五章《社會現代化》的探討，這是一個涵蓋面極為廣闊的問題，在《安徽》一書中，被概括為人口問題、市鎮結構與都市化、新教育的頒行、社會變遷四個方面。

在人口問題上，作者以人口數量之相關問題為重點，附及人口素質。作者指出，道咸之交（1850年前後）為安徽有史以來第一次人口成長高峰，人口超過三千萬；咸同年間因太平天國戰爭，人數劇減，同治初不及1500萬；同光年間移民墾殖，人口漸增，至民國初年約超過2000萬。之後並無明顯增加，至1949年初全省人口總數未達3000萬，50年代至80年代，皖省人口增長進入第二個高峰期（年平均增長率為25.8%）。人口的大增大減，以及由於大量移民造成的人口成分驟然變化，是安徽近代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特徵。人口素質方面，謝氏以識字率為例，認為1930年代皖省城鎮識字率在35%，鄉村識字率在10%~15%，其中男性比女性高10%~20%（485頁），均係高估。作者以為「近代安徽人口變化的最大特色是成長緩慢，經過太平軍之役的大量減少之後，人口未能迅速恢復，較之江、浙兩省，尤其明顯落後，與近代江浙兩省經濟發展情況相比，皖省也顯然不如。」（585頁）

那麼，人口的壓力，對經濟發展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呢？具體而言，就是太平天國戰爭使江浙皖各省損失人口數千萬，此一事件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有何影響？李國祁以為（一）戰後人口壓力有助於資本積累；（二）戰後人口的遷入融合，造成浙江人活潑的性格，從事絲茶貿易，經濟因之繁榮。因此他較強調太平天國有益於現代化。而張朋園先生則持相反意見，他從「動亂是現代化最大的阻力」的角度出發，認為：（一），如果沒有亂事，或許會逼使過剩人口轉而從事工商業，尤其是浙江接近上海、寧波等通商口岸，轉變的可能性甚大。但是由於動亂導致人口減少，分到的田畝增加，便會因循傳統「重農輕商」、「安土重遷」的觀念。（二），動亂造成人們「前途未卜」的心理，會以為從事工商業沒有安全感，投資的意願可能就此打住或消失了。②

謝國興以為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經濟面臨轉型的時期，委實十分複雜。他以寧國縣為例指出，清末安徽人口適度減少可以緩和食眾的壓力，造成一時的富饒的現象。不過，這種富饒現象大概僅能容許在小農生產方式的自然

②同上。

經濟格局中發生，當農業商品化程度加深之後，小農就難以維持富饒了。」因此，他的結論是：「就長期而言，清末安徽人口的減少，似乎並未發生全面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現象，一方面是移民的補充，使人地比例仍維持著平衡甚至緊張的狀態，另一方面技術無改革，既無法提高單位面積生產力，反而可能因人口較少而減低總產量。」（585-586頁）

與人口問題緊密相關的是城市化與教育問題，前者是地區經濟發展的直接表現，後者則是人口素質及現代化建設中人才基礎的重要反映。

在市鎮結構與都市化問題上，作者以個案解剖的方法，具體分析了天長、鳳陽（蚌埠）、懷寧（安慶）、蕪湖、寧國等縣的市鎮結構及其都市化程度。他以爲近代安徽的市鎮與城市發展有三大特色：

一是整體而論，市鎮結構變化緩慢，至少在1930年代爲止絕大部份地區沒有特別明顯的分佈結構變化，主要原因是交通因素的作用尚在萌芽期，而經濟結構的傳統性質仍然濃厚。二是全省大城市少，城市人口比例低，只有省會（安慶）因政治文教之主導作用及蕪湖、蚌埠兩地因交通條件而有較明顯的都市化現象，但程度十分粗淺。三是市鎮的功能有由傳統性向現代性過渡的現象，不少市鎮由消費型開始轉向生產性功能。（586頁）

至於教育，作者認爲「它扮演的是推動社會變遷的動力，其作用隱而不張，影響卻十分長遠。安徽的現代教育與全國同一步調，均始於清末，北洋時期因受政治環境影響，歷程多難，品質自亦難以令人滿意。國民政府成立後，受教育人數有明顯增加，不過教育經費問題在1934年以前始終未能有效解決。受教育人口比例很低，就長期培養人才，改變社會風氣的作用而言，其效能與預期之間仍有一段距離。」（587頁）教育發展程度低的原因，作者在歷舉了機構與學制演變、學校設置與經費分配諸項問題後，特別指明了近代安徽教育環境中的四項不利因素：（一）高層教育行政主管更迭頻繁；（二）教育的泛政治化，且派系爭鬥不已；（三）政經社會條件不佳，天災人禍，經費匱乏；（四）學潮不斷發生。於此對於長期與整體的教育發展而言，自屬妨害。（參見 559-564 頁）

在「社會變遷」方面，作者饒有興味地舉出安慶胡玉美醬園和蕪湖明遠電燈公司兩家企業發展的例子，來說明從傳統社會向工商社會轉型中涉及經營管理層面變遷的問題。前者係從一個流動攤販成功的發展成爲一個多角經營的現代食品企業，後者則是一個現代企業在管理跟不上的情況下，經營困難。從胡玉美的發展經驗來看，傳統家族制度對於現代企業發展並未構成阻

力，甚至有所助益，關鍵在於這個傳統家族必須先經過制度化制約，具備類似董事會或股東會之功能，於是整個家族變成一個健全的公司，善加經營，方可大展宏圖。（573頁）

無獨有偶，我們從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萬靈先生對無錫榮氏企業的研究中，也可看到相似的結論。

而謝氏另舉蕪湖明遠電燈公司因經營不善，幾經周折，要義在於說明，舊有的傳統經營管理方式無法適應不斷變遷的社會形勢，專業化性質愈高的行業，愈需要真正的專家從事管理。（578頁）從此亦可看出，在安徽 1930 年代已露端倪的一個重要的趨勢是「工商界」必然成為社會的一個重要領導階層。

就整體而言，謝國興認為，安徽近代之發展與變遷，以清末光緒年間各項新政推行為發軔期，至1930年代，形式上雖有各式各樣的現代性作為，但均不免沉滯抑斂。作為現代化最重要基礎的工商業，由於國內外環境因素影響，如（一）安徽屬內陸省份，在長江中下游商圈中，居依附上海核心的邊陲（半邊陲）地位，交通條件遠遜江浙；（二）農業經營不易積累資金，淮系等官僚地主又多不願在本籍投資；（三）雖有豐富的糧食和經濟作物資源，但生產結構仍停留在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且農產品（如茶、米）在品質上無法與洋茶、洋米競爭。加以省級官僚因循保守，社會動盪不寧，人口素質、教育程度低下，更有外國帝國主義的直接侵入（尤以日本為最），打斷現代化進程。（參見589-596頁）因此，安徽這一時期仍處於低度發展階段。

最後，筆者認為《安徽》還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幾個問題：

（一）書中認為「安徽之政治區劃與自然環境不盡符合，亦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需要無關，但合皖南皖北兩種人文、經濟發達程度不一之地域為一省，當含有貧富調劑、文化相融之意義，不失理想區域規劃之本意。」（74頁）除了這一層意思之外，筆者認為，江淮之間自古為兵家必爭之要衝，每當王朝式微，往往以江、淮為界而出現南北對峙局面。因此，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央集權，總是採取跨江而治的辦法，建立行政區域，政治的考慮大於經濟的因素，綜觀長江流域諸行省之設置，莫不如此。

（二）近代安徽農業問題，尤其是土地問題之嚴重，作者在書中已有多處詳述，並提出安徽近代有兩次局部解決土地分配不均之機會，但缺乏具體成就。筆者認為其所指的第一次機會亦即太平天國戰後的一段時期內，土地關係多少出現了鬆動和調整。原有的世襲地主（如合肥地區自明末清初一直沿

承的龔、褚、解、唐等大姓)大量被殺或逃亡，而出現了一些新的軍功地主，最顯著的莫過於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淮系集團。與傳統的世族地主比較，他們較少封建性，而較多地具有「洋務」眼光和買辦性，其中相當一部份人向近代「工商」階層轉化。同時，太平天國戰後，皖省土地集中程度相對加劇，這也為積累資本提供了一定條件。遺憾的是，這些積累起來的資金並未有效地在本省投入且多數外流。

(三)皖省資金外流，自徽商產生即已開始，除了地理、交通等自然條件，筆者以為，還應該具體看是什麼人在掌握和使用資金。就近代而言，淮系在1870年代後，逐步取代湘系，成為全國性的政治軍事官僚集團，其從事洋務運動自然帶有全國性的眼光，投資重在沿海。而後的北洋倪氏集團，乃一地方割據勢力，其投資目標自然為發展地方實力而作打算。加以當時面臨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力東顧的有利時機，皖省經濟才出現一度繁榮的景象。要而言之，諸如淮系及稍後的北洋皖系等中央性集團的崛起，及其所從事的近代化建設，對本省助益不大，但以全國性的發展者，其作用不可低估。

此外，皖省近代人才輩出，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各個領域，有時甚至呈現出相當集中的地區性和家族性，與鄰近的江蘇、河南、江西諸省相比，十分突出。社會現代化歸根究底是人的現代化，《安徽》書中對人口問題、教育問題、管理機構的問題多有涉及，而對安徽近代人才羣的情況尚缺乏系統的研究與分析，這也是美中不足之處。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翁飛□

中國經濟100年のあゆみ——統計資料で見る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久保亨
著。東京：創研出版，1991年4月，135頁。

對於近代中國經濟史和當代中國大陸經濟的研究者而言，這本《百年來中國經濟的歷程——自統計資料所觀察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可以說是非常有創意的、有幫助的著作。因為作者經由細心整理過的統計資料，勾勒了自188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國經濟的整體面貌，包括：近代輕重工業、交通通訊業、礦業、電業、農業、商業、金融業、國際貿易、外資、財經政策等，並且大膽地提出了他的分期：(1)自1880年代至1910年代前半，特徵是對外貿易的擴大和外國資本的流入，亦即對外經濟關係主導經濟發展的時期，但同時國內也開始累積資本，因此中國民間資本和外資共同推動經濟發展；(2)自

1910年代後半至1930年代，此時期以輕工業爲主的進口替代工業發展迅速，幾乎達成輕工業產品的自給化，這是國內經濟主導的發展，中國民間資本所扮演的角色遠比外資重要（東北除外）；(3)自1940年代至1970年代，歷經了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冷戰等軍事緊張局面，所以特徵是以軍需工業爲主軸的重化學工業化（重工業的進口替代），對外經濟關係和國內商業金融業衰退，國家明顯地介入經濟活動；(4)自1970年代末至今，逐漸改進偏重重化學工業化的現象，農業和輕工業都有新發展，與歐美和日本的經濟關係亦急速擴大，民間企業開始復甦，外資亦開始投入。

此分期架構雖是到最後一章才出現的，但從前面七章有關農、工、商和金融業的分析中，已很清楚地看出作者對於這百年來經濟發展的掌握，是根據此架構而來的，亦即以外資、中國民間資本、國家資本的消長爲基軸，政府所採取的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政策不斷地重覆主導中國經濟的發展，無論實際政權的交替，卻和世界政治經濟情勢息息相關，也顯示出歷史的延續性。

由於是以統計資料來觀察，所以本書的一大貢獻是檢證了所使用的龐大的統計數據。但是也因爲側重數據，有時難免無法顧及隱藏於數據背後的當時的環境，譬如開墾事業（因擴大耕地面積而增加米穀產量，本書的頁74）所面臨的資金和人力問題以及國家和民間的功能和運作實況、農村經濟中非農業的比重逐增所帶來的農家經營問題、乃至農業與工業之間資金流通和勞力分配問題等。而最大的弱點是沒有看出區域性的差距，中國幅員廣大，各地區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景觀不同，在農業、工礦業、商業、金融業、交通電訊業和能源（包括電力、石油）都有其差異性，這本採取近乎 Albert Feuerwerker 的《The Chinese Economy》體例、而涵蓋時間更長、內容更豐富的書，卻因爲是以最近的日本、大陸和80年代以前的部分西方的相關研究成果爲基礎，所以忽視了在各產業中各地區的發展落差，以及因此所引起的近百年來中國經濟一直面對的困境，此困境應該也和中央政府的財政收支、經濟政策的決定過程有關，更與外國資本（包括日資）在1930年代以前（即本書第1、2期）以及1979年以後（第4期）的功能有關。

本書的第三期涵蓋了約40年的時間，在此時期，中國面臨了空前之變局，先有日本侵佔了大部分領土，繼而政權發生變化。在中日戰爭期間，淪陷區和大後方各有發展的特色，作者頗能兼顧，有助於大家對戰時經濟的了解。而1949~1978年的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既然側重於軍需工業爲主重的重化學工業，但在中央政府財政支出中軍事費的比重（頁107，表vii-1-5），

卻不到20%（1950~57年例外，為30%左右），意味著大陸財政部總合計畫司編的《中國財政統計》的奧妙；另一方面，行政費的比例極高，而經濟行政關係的支出亦高達總支出的60%左右，1980年代則下降到約50%，作者因此指出這是反映出國家角色在工業化中的相對低降，與個人經營和民間企業活動的積極參與，可謂相當精闢。但是，軍事費的比重則為尚待解決的問題，因為這關係著此時期大陸經濟的特徵與財經政策的確實掌握。

再者，由於根據統計資料，故作者難免太注重浮面的發展，而忽視了各產業內部的組織結構的變遷（例如華北織布業中線莊的角色隨著時代而變），生產結構和流通結構的剖析原本是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的一大特色，此書卻可以說幾乎沒有擷取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果我們（非居住於日本者）以為從此書能夠看到日本目前的近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業績的濃縮，那麼，難道傳統注重內部結構分析的方式已經發生「斷層」的現象嗎？

此書是作者根據他的教學講義修改而成，也無疑地是一本發人深省的學術論著，可以從繁多的統計圖表和簡潔扼要的敘述分析中，看到作者所下的深厚功夫及其理論基礎，更提示了一些尚待進一步深究的空間。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By Charles Hay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晏陽初一生對平民教育的貢獻是民國史上一個極為值得探討的課題。從他個人的背景而言，作為一個從教會學校出身、美國知名大學畢業的西式知識分子，晏陽初能一反當時歸國留學生「學而優則仕」的傾向，而深入鄉間奉獻，是令人欽佩的榜樣。從時代的背景而言，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代表了一個歐美思潮——和基金——洗禮下的一個救國救民運動。透過對晏陽初個人及其領導的「平教會」的研究，我們可以探討民國時期若干重大的思想史課題，諸如：歸國留學生、一九三〇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一個民間現代化運動的成就及其侷限等等。

Hayford 這本晏陽初的研究，以細膩的筆觸、體己的態度，勾勒出晏陽初從識字運動，推廣到以河北定縣為基地的全面性鄉村建設運動的發展過程。Hayford 認為晏陽初的想法和作法是典型的自由民主路線，但是他同時也強調晏陽初絕不是一個用美金鑄成的「美國貨」。他指出晏陽初和毛澤東

同樣地鄙視對中國無知的知識階級、同樣地認識到農民是建立新中國的基礎。晏陽初所代表的自由民主路線因此不是奴化地因襲西方的結果，而是創造性地汲取、發展屬於世界公器的想法和作法。用 Hayford 所籌造的名詞來說，晏陽初是「太平洋兩岸自由主義者」(transpacific liberals) 羣中的一員。

本書的討論分爲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先追溯晏陽初從四川成長、留學耶魯、到自願赴法在歐戰華工當中從事識字運動的經歷。其次，Hayford 把識字運動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之下來討論，特別是大、中學校學生和基督教青年會組織講演團和平民夜校的潮流。Hayford 認爲歷來對民國時期自由主義的討論過分強調其理論的傾向和外鑠的性質，而忽視了其行動性和本土化的面貌。接著，Hayford 討論「平教會」從都市轉向鄉村。一方面，他強調這反映了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浪潮之下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其影響所及到了連軍閥和國民政府都覺得不能置身其外的地步。另一方面，他簡短地勾勒出晏陽初赴美募款的活動，爲後文闡釋晏陽初和美國關係的討論留下一個伏筆。然後，Hayford 把討論轉向定縣的歷史、早期改革的努力、以及從李景漢的定縣調查來瞭解定縣的社會。

本書的第二部分討論鄉村建設運動和「平教會」在定縣的實驗。對於「平教會」所謂的「四大教育」，Hayford 先討論了其中的兩項：識字教育和——分析精闢的——衛生教育。接著，Hayford 把定縣的實驗定位在鄉村建設運動的潮流裏，同時並分析了左右兩派對定縣實驗的批評。他強調「平教會」對政權重要性的認識超過了早期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爲了證明「平教會」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準備與決心，他接著討論了「平教會」的生計教育和霍六丁縣長與地方勢力的周旋與最後的失敗。

抗戰時期的「平教會」、晏陽初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在美國的募款活動、以及「農復會」的成立是本書第三部分討論的主題。Hayford 在這個部分的重點與其說是「平教會」在抗戰時期的發展，不如說是以晏陽初在此時期的奮鬥來進一步地說明晏陽初對國民政府、對共產黨、以及對如何促進中國的現代化的看法。

綜觀本書的結構和論述的脈絡，Hayford 與其說是在爲晏陽初立傳、爲「平教會」紀史，不如說是試圖客觀地爲晏陽初和他的「平教會」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曲折歷程裏定位。他以體己之心來分析晏陽初的理想與奮鬥。在此同時，Hayford 也很成功地拿捏住他作爲一個歷史工作者的分寸，不溢

美、不濫辭。在這個意義下，Hayford 這本書是美國近代中國研究學界從「文革」以後重新解釋中國近代史這個大潮流下的一個產物。作者本人就坦白地承認「成王敗寇」的邏輯，他說如果這本書在一九六〇或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完成，他對晏陽初的評價很可能會在毛澤東之下（xv-xvi 頁）。雖然 Hayford 不像一些走向另一極端的學者那樣從負面的角度來衡量共產主義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但是，這股美國中國學界的新潮流讓他可以毫不畏縮地凸顯出晏陽初——那敗於共產主義手下的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社會的瞭解與貢獻。

在另外一個意義下，Hayford 這本書以含蓄、不露稜角的方式間接地反駁美國左派對中國農村的看法。他堅持用“farmer”——而不是“peasant”——一詞來稱呼中國農民。可惜 Hayford 並沒有為他的這個稱呼提出令人信服的論證。他所用來反對“peasant”這個馬克斯主義名詞的根據，不外乎是晏陽初本人對農民的「勤勞」和「自由」（141 頁）的讚美，以及——胡適會同意的——中國近世社會並非封建社會的看法（62頁）。

Hayford 這本書除了寫得細膩、體己以外，也很充分地運用了其他學者的著作，把晏陽初以及他的時代背景明白地呈現出來。其美中不足的地方可以分四點來談。首先，他所用的「自由主義者」這個名詞過於寬泛，幾乎到了只要不是共產黨、或蔣介石、或「C. C.」、或「藍衣社」的黨羽，都可以納入「自由主義」行列的地步。誠然，晏陽初和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由於說明的方便、或種種動機，常用這個名詞——特別是對他們的美國友人——來指稱所有反保守分子的中國人。但是研究者不能照本宣科，必須嚴謹的使用所有的名詞。

其次，本書沒有充分地討論晏陽初和美國的關係。儘管 Hayford 很令人信服地指出晏陽初的「自由主義」不是美國製，而是配合中國實情、創造性地汲取的。但是，無可否認地，晏陽初的「平教會」在經費上是極度地倚賴美國的資助——因此招來「金元鍍成」的非議。即使這種批評近乎極端，但是，晏陽初倚賴美國經費的這個事實，使我們不能不進一步地要求瞭解這個金錢上的倚賴關係是否也多少地影響了晏陽初在定縣工作的方向。Hayford 提到了晏陽初和洛克斐勒基金會以及米而班基金會（Milbank Memorial Fund）的關係，可惜他沒有利用這兩個基金會的檔案來進一步地探討晏陽初和美國基金會如何在意識形態、工作方針和方向上微妙的配合。

晏陽初與美國基金會的關係這個問題牽涉到另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

Hayford 本人也提到的「平教會」只知治標而不知治本的缺點——意即：只知去醫治「愚」、「窮」、「弱」、「私」的病相，而不知或不能去診治造成這些病相的大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Hayford 雖然承認這確實是一個「平教會」難以反駁的缺點，但是卻輕描淡寫地帶過這個問題。儘管我們可以毫無問題地接受 Hayford 的論點，認為晏陽初是創造性地把他的自由主義和中國的實情結合在一起。我們仍然可以堅持認為晏陽初治標的作法是整個「平教會」運動的致命傷。

「平教會」治標而不治本的這個缺點把我們引導到第四個批評。那就是定縣實驗失敗的原因何在？Hayford 雖然提到了河北當局的阻礙，但是把最大的原因歸結在日本在華北的滲透及其後來的全面侵略。「七七事變」的發生毫無疑問地把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的種種事業、運動化為烏有。問題是，沒有日本的侵略，定縣的實驗是否就可能成功？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不一定是肯定的。一如 Hayford 本人提到的，「華北鄉村建設協進會」——由洛克斐勒基金會出錢，定縣等六個機構所組成——根本無法取得河北當局的合作（178 頁）。Hayford 沒有進一步地指出，河北當局所提出的合作條件是：所有改革工作不可以和政府的法規和當地人民的利益相衝突。不管這些法規的內容如何，這些「人民」又指的是哪個階層的人，接受這兩個條件就等於承認現狀不容改變。如此改革還能有希望嗎？

□De Pauw University · 江勇振□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Edited by Ramon H. Myer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1.

這本論文集，是以 1989 年在史丹福胡佛中心舉辦的「中美大陸問題會議」裏所發表的論文編輯而成的。但是，編者馬若孟 (Ramon Myers) 則意圖以此文集，來探討由 1949 年到 1989 年，40 年來造成中共和國民黨在大陸和臺灣兩地區有不同發展成果的原因。編者想藉此來回答幾個問題：這兩個社會在發展上的不同，到底是程度的不同，或是性質的不同？這種不同是由環境的 (situational) 因素，或是體制的 (systemic) 因素造成的？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一方面可以讓我們更進一步瞭解這兩個社會的性質，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瞭解，主導這兩個社會的發展方向的主要因素有何

不同。但是，要能够完整地回答這些問題，卻需要有系統地利用歷史的和比較的研究方法來分析。然而，這本論文集似乎無法滿足這樣的期望。因為整本書裏，除了墨子刻(Thomas Metzger)和馬若孟所寫的導論有意把中華民國和中共的發展做比較研究之外，其餘十五篇會議論文都是以單一地區為研究的目標；其中關於中共的有十一篇，關於中華民國的則只有四篇。這在編輯上，不但所選文章的比重不均，所選文章和所訂目標也有不相吻合的缺憾。

編者大概也意識到這個缺憾，因此在導論中，他和墨子刻則努力要建立一比較研究的分析架構，然後把十五篇論文納入這架構中，並且用來證明他們的論點——也就是，中華民國和中共的發展是質的不同，而不是程度的不同；更且，是體制的因素佔主導的地位。暫且不論編者的這種做法，對於各篇論文的作者是否公平，我們還是先來瞭解編者如何展開他的問題意識(point of departure)，以及如何建立他的分析架構。

1988年8月 Paul Cohen 在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3, pp. 519-41) 上，發表了“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ohen 認為，由晚清到現代中國有兩種過程一直在進行著：國家的建造(state building)，以及威權體制的改革(authoritarian reform)。其中，威權體制的改革特別呈現出一種歷史的延續性。例如，由晚清到1949年以前，由自強運動者、慈禧太后(1898-1900)、袁世凱(1913-1916)、到蔣介石(1927-1937)等人所發動的改革，都具有一常被忽略的共同特質。這種特質，就是每當地方權力開始獨立於中央的支配(decentralization)，中央的領導人就會藉改革之名來重新鞏固中央政府的權威。Cohen 認為，鄧小平的改革，事實上是這一傳統的延續。

Cohen 在結論裏有一段話說，蔣介石在臺灣所推動的威權體制的改革所以能成功，是得助於一些有利的環境因素：如地方面積小，日本在殖民統治之後遺留下的資產，以及大量的美援等。而中國大陸在1949年之後，雖然早期一些阻礙國家權威伸張的因素被消除了，並不能推論說，鄧小平的改革會有同樣程度的成功。因為1980年代的大陸人口、官僚主義等問題，比以前還要嚴重。

墨子刻與馬若孟在導論裏指出，Cohen 過度強調了鄧小平改革和蔣介石改革的共通點、以及環境因素對臺灣的成功的貢獻，而忽略了中華民國在體制上根本就與中共不同。他們認為，那些象徵的——制度的因素(Symbolic-

institutional) 才真正決定了中華民國和中共在經濟發展上不同的命運。

墨子刻和馬若孟選擇了十個項目，如中央權力核心的特質、政府內部的結構、國家動員人民的程度、國家與國際社區的關係……等等，做為規範這兩個社會發展的基本架構。他們稱此基本架構為象徵的——制度的趨向，或是一種“package”。^① 他們認為，這兩個社會各自堅持的“package”有顯著的不同。更重要的，是這兩個社會的“package”和傳統文化不同的關係，決定了兩個社會不同的發展方向。

他們認為，傳統儒家文化是多面向的。第一，儒家文化中有強調轉化的(transformative) 一面，也有強調適應的一面；中共選擇了前者，而國民黨則選擇了後者。第二，儒家文化裏有主張中央集權(uninhibited center) 的一面，也有主張中央權力應受限制(inhibited center) 的一面；中共接受了前者，國民黨則接受了後者。第三，傳統文化裏也包括由民間宗教等所形成的大眾文化；中共企圖消滅它，而國民黨則抱著支持的態度。他們的分析模式可由底下的圖來表示：

| 象徵的——制度的趨向 | 和傳統文化的關係 | 結 | 果 |
|------------|----------|---|---|
| “Package” | + | 1.轉化的或適應的 2.中央集權的或中央權力受限的 3.消滅大眾文化或支持大眾文化 | 決定是否產生多元主義，祛中央集權，以及工具性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等構成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價值規範。 |

墨子刻和馬若孟認為，中華民國政府的“package”，以及和傳統文化的取捨關係，會很自然地開展出多元主義、祛中央集權(decentralization) 等價值規範，而這些價值規範又是達成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不二法門。墨子刻在他自己的論文裏也嘗試證明，四十年來在臺灣由五種主要論點混合構成的政治論述(political discourse)，不但有助於多元主義、以及實用主義(pragmatism) 的發展，而且對建造一有主權的政治中心提供道德的意義。由於這些都是達成現代化的要件，因此，也就解釋了為何中華民國能夠成功地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① Package 可譯為「成套的」，取喻於軟體電腦，如 dBASE, Wosd Star 等套裝程式。意思是，一件事情的發生，會自動地帶動其他相關聯的事情前後發生。

Cohen 在他的回應文章裏指出，墨子刻和馬若孟誤解了他那篇文章的意圖，因為他並不在比較這兩個社會在 1949 年以後的發展經驗。除此之外，墨子刻與馬若孟對於如何判定兩個社會的差異是性質的或是程度的，是來自環境的或體制的因素，並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也許他們所問的，是一個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我們可以質問：在墨子刻和馬若孟所建立的 packages 裏，國家與國際社區的關係到底是環境的、或者是體制的因素？另一方面，不同的 packages 會自然地採行傳統文化的某一特質，而排斥另一特質，是否說得通？而且是否可以用選擇的親和力 (elective affinity) 這種曖昧不明的概念來解釋？

費景漢先生的論文，也呼應了馬若孟以及墨子刻的論點。他反駁一般把中國的家長式統治 (paternalism) 對應於極權統治，把禮的觀念對應於社會地位的不平等的說法。他認為為臺灣經濟發展打下基礎的進口取代策略 (1950-1962)，就是家長式統治的成果。另一方面，他認為禮所強調的是自我的修養，也就是自我依賴的意思。因此，禮「鞏固了儒家傳統中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的政治文化」(頁109)。這種政治文化，優於西方福利國家思想下個人對國家需索無度的現象。因此，儒家的傳統價值不但和經濟的市場化、以及政治的民主化不衝突，反而更容易推動。

以上三位作者的觀點，基本上陷在「儒家倫理與東亞經濟發表的關係」的論述框架裏。他們所問的，也許是韋伯式的 (Weberian) 問題，但並沒有以韋伯式的方法來回答：也就是本文前面所提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方法。因此，他們的結論常呈現出以結果推斷原因，也就是事後聰明的毛病。又因為他們對於環境的因素避而不談，使得他們的推斷的基礎更顯薄弱。^②

由於以上三位作者所做的宣稱 (claims) 較為強烈，並且所處理的問題也和本書的書名較為接近，因此，用較大的篇幅來討論。但是，這並不意味其餘各篇文章不重要。論文集成的其他作者，則著重在由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的發展，來探討他們所研究的地區的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他們都不是從比較研究的觀點來寫文章，可是卻較能具體地提供我們找尋兩個社會之異同的線索。

譬如，由於四十年來臺灣和世界體系的關係產生變化，以及社會變遷促

② 請參閱陳其南著《家族與社會：臺灣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臺北：聯經，1990。黃仁宇先生在「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收入黃仁宇著《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1988，頁 93~139)，從世界史的觀點，指出了環境因素對經濟發展的重要貢獻。

成了新中產階級的興起，和新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呂亞力觀察到，國民黨政權已由一個極權的中央，轉為權力受限制的中央，然後再轉變為一「附屬的」中央（“Subordinate”）。同樣的，蕭新煌也認為，在1980年代，臺灣的「市民社會」已由消極轉為積極。

另一方面，Thomas Gold, Nicholas Lardy, Stanley Rosen, Harry Harding, 和 Andrew Walder 等人的論文，則認為在中國大陸，國家仍然佔著支配的地位，市民社會是否存在，也令人質疑。在開放改革之後，雖然經濟改革的步調加快，政治改革卻一直無法跟上。因此，表面上中共已在推動市場經濟，實質上，Lardy 認為，開放的程度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還要低。中共的國家企業仍在總體經濟中佔極大比率，私人企業或個體戶，則常在政策和執行不一致的情況下，窒礙難行。Yü Yü-lin 認為，中共政策的決定、以及權力結構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主要是受中央權力核心的路線鬭爭的影響。陳一新、吳安家、和 Joseph Fewsmith 的論文也分別指出，中共政治改革的目標，由於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地位、以及如何實踐的問題，一直無法達成共識，因此令人難以預測將來的走向。

由這些作者的論點，大致可以整理出兩個社會在某些特定方面的差異。但是，並無法幫助我們回答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亦即，這兩個社會的差異，是質的不同、或是程度的不同？是環境因素、或是體系的因素造成的？因為這些問題，本來就不是各個作者所要探究的。因而，導論中引用各作者的文字，就有「在脈絡之外」(Out of context) 來引申的問題。譬如，Thomas Gold 的論文雖然指出中共在開放個體戶這一政策上，常常有政策與執行不搭調的現象，他不見得就不同意 Cohen 的看法——亦即，臺灣經濟的發展主要來自有利的環境因素。^③

編者在導論中也提及，他們所強調的，是這兩個社會的差異性。但是，有些共同性所顯示的意義也不容忽視。例如，柯志明和 Mark Selden (1988) 比較研究資本主義臺灣 (1953-1960) 及社會主義中國 (1953-1957) 在工業化初期所採取的措施時，發現兩地在原始積累的策略上是非常類似的。他們所獲得的結論，是「官方所執著的意識形態……與所採取的發展策略，並無多大的關連」，這些策略的採行，「受經濟落後程度的影響並不下於所謂的

^③ 請參閱 Thomas B. Gold 著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 E. Sharpe, 1986.

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偏好」④。

此篇評論並不在否定導論所強調的體系的因素，對於社會發展的方向的決定作用。而是要強調，為了完整回答導論中所提的，以及諸如「為何這個社會的發展成功，而另一個社會卻失敗」的問題，必須以具體的歷史的——比較的研究為基礎。否則，我們就很容易陷入由結果來推斷原因的忙亂裏。或者是，當我們看到幾年前臺灣的六合彩及股票投機風潮，以及幾星期前，深圳地區的搶購股票的暴動場面，就會被「這兩種現象是質的不同，或是程度的不同」之類的問題所困擾。

本書在編輯上還有一小小的瑕疵，就是在作者介紹（contributors）部分，把作者陳一新（Edward I-hsin Chen）的背景資料張冠李戴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巨擘□

- ④ 柯志明和 Mark Selden 著「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以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臺灣為案例之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1（春季號），頁43。本文曾以“Original Accumulation, Equity,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s of Socialist China and Capitalist Taiwan”發表於 *World Development*, 14 (10/11), pp. 1293-1310. William Kirby 亦指出，這兩個社會至少在 1959 年以前所推動的工業發展政策，是以孫中山的實業計劃為共通的基礎。請參閱 William C.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July 1990): 121-141.

The Making of a Sino-Marxist World View: Perce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Dorothea A. L. Martin.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0.

本書是 M. E. Sharpe 出版社的現代中國專刊之一，作者 Martin 博士分析 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初、高中以及大學歷史教科書中如何以合於中國之用的馬克斯主義觀點來理解並闡釋世界歷史，同時也展現中共的世界史內涵受到政治運動、經濟政策、外交關係、世界史資料、學者素養等因素之影響。全書除前言、小注、書目、索引外，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緒言，作者在說明當代世界史研究與撰寫的情況、困難與問題之後，即交代以下各章的架構以及資料來源。

第二章說明中共史學界最近四十年間世界史的撰寫情形。在中國，撰寫

世界史勢須取材於間接資料：1949年以前主要依賴英、美的教科書，如周谷城之世界通史即是，儘管他有意脫離歐洲中心論，歐洲史仍占過多篇幅，因而以後曾備受批判；一九五〇年代的世界史撰寫主要是翻譯自俄國的資料，因而歷史的分期、史實的解釋等均採用蘇俄模式，許多觀點大致成爲以後世界史教科書的準繩。作者尤其留意中國史家對下列問題的處理與解釋：世界近代史的起點、人民在世界革命史扮演的角色、必須繼續革命以防止階級復辟的理論、中國在第三世界的領導地位等，因此特選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十九世紀法國巴黎公社、二十世紀第三世界爲本書第三至第五章討論的專題，以明瞭中國對世界史之運用。

第三章以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近代世界史爲標題，此次革命起初不受西方史家重視，在中國世界史裏的敘述篇幅與評價也歷經變化，儘管它在作爲世界近代史開端的地位自建立以來，迄今尚未動搖，但對此次革命期間農民扮演的角色，則由從前的肯定稱讚變成後來的頗受質疑；視階級復辟會危及中國的共產政權，這種曾是左傾革命時代鎮壓反革命理由的看法，現已漸遭淘汰；在對生產力落後和社會主義體制進步之間的矛盾，現已強調生產力的發展。

第四章標題爲巴黎公社的經驗，在美國著名學者所撰寫的世界史中，十九世紀後期的敘述重點是自由民主的改革，對巴黎公社至多是一筆帶過；在中國的世界史裏起初受西方資料影響亦忽略此事，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則定位爲世界史上第一個普羅階級建立政權的大事，提供社會主義民主方式的範例，其失敗原因及錯誤之處對日後社會主義革命尤其重要的啟導作用，俄國十月革命、中國1949年革命，都受惠於巴黎公社的教訓，因此認爲十九世紀時機尚未成熟的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終於水到渠成，符合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並藉以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地位。雖然其熱度及解釋的重點例如公社的特點、意義、措施等，屢隨政治運動而有變化，但在各級學校的歷史教科書裏，仍持肯定態度。

第五章討論中共世界史中的第三世界，亦隨著對世界的認識及在國際的地位而有變化。二十世紀的第三世界是全球史的一部分，與第一、第二世界形成整體有機的聯繫，因而在各國的現代世界史裏均占有比以往爲多的篇幅。但在一九五〇年代中共的世界史教科書裏，由於受俄國影響，仍以歐洲爲中心，並未多留意第三世界，後來撰寫的世界史教科書尤其二十世紀部分，才特別注重第三世界的亞洲。大體上，一九七〇年代以前，中共的世界史強調

第三世界的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也強調中國在亞非國家的領導地位。一九七〇年代以後，隨著中共與日本、美國關係正常化，深感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比反抗為重要，而且第三世界國家也不能合作無間，於是表現在世界史教科書裏的，雖仍提及第三世界的反帝國、反殖民主義，但似已不會去作更深入的處理，也不強調第三世界地區生產力的發展等事項，同時愈來愈多的資料使得新生代的史家在重新處理第三世界史時，較為強調其低度發展的系統過程，反而少注意抵抗帝國主義的方面。第六章為結論與新方向的展望，強調在大陸學者撰寫的世界史中，政治興趣對世界史教材的觀點、歷史解釋，乃至政治上的影響；展望未來，指出在研究中國馬克斯主義世界觀形成的領域裏，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及更廣闊的研究。

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以來，馬克斯主義成為最高的思想指導，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思想附屬於其下，形成其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歷史是達成思想教育的重要途徑，無論在本國史或世界史教材裏，馬克斯主義一以貫之的表現在時代分期、歷史事件的選擇、解釋，以至於用字遣詞，都充滿濃厚的馬克斯主義色彩。作者由一些大、中學的世界史教科書中選擇三個個案，探索其在四十年中表達、解釋的變動及原因，兼顧橫向與縱向的脈絡，可謂能提綱挈領。然而馬克斯主義的世界觀以及世界史觀遍布歷史教科書，作者僅由三個個案加以探討，而且這些專題侷限於近代，更令人有未窺全豹之憾，未能涵蓋本書副標題的範圍，作者雖亦在結論中提及此點，卻正是有些評論者深感不滿之處；所選個案的政治性極強，顯示作者極為重視大陸世界史撰者的政治興趣及考慮，卻不免忽略了所占篇幅不多的非政治方面變遷的意義。作者可能也忽略了探討傳統觀念對中共世界史撰寫表現的意識型態的影響，蓋在中共史家近數十年撰寫的世界史中，雖奉馬克斯主義為歷史解釋的主臬，傳統歷史觀仍應有其影響，亦即不全然是馬克斯主義理論的產物。再者，中學和大學的世界史教學目標和層次應該有所不同，作者未將二者分別討論，採取混合敘述，不易清晰分辨出二者解說重點的差異程度，例如中學的世界史及大學的世界現代史的下限不同，前者敘述到一九八〇年代之事，後者多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二者關於現代史可資比較之事即有不同。書中共附有八頁初、高中及大學世界史教科書封面及內文的插圖，可資參考，但對文中提及有些數字，例如提及從事中國史和外國史的教學研究者的比例為三分之二以上及不足三分之一，宜註明資料來源或以統計圖表說明，則可更為清楚。由於書中涉及的人名、書名很多，尤其是人名，並非每

位都像雷海宗、周谷城、周一良之有名，實需增列中文名詞詞彙表，以利閱讀及了解。至於一些音譯的不適當，屬於小瑕疵，在此即不枚舉。

總之，本書雖有若干不足之處，就世界史教學在當前世界各國都極受重視，蔚成世界史教學運動之際，本書之著作對增進了解大陸四十多年來世界觀及世界史教學研究情形的演變，自然頗有助益。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劉德美□

1. **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by Betty Peh-t'i Wei.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7, 299pp.
2. **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1918-1939**, by Harriet Sergeant.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Inc., 1990, 371pp.

It is almost axiomatic, these days, that Shanghai needs defining. Of the many books on the city that have appeared over the years, a fair number feature titles with a catchphrase appended after the academic colon. The same is true of non-scholarly works. It is as if authors of all backgrounds feel the need to crystallize an amorphous Shanghai into something solid, approachable: a metaphor. Few writers, it seems, wish to tackle the subject of Shanghai without showing us the color of their lenses.

There are numerous examples among English-language titles, many of which are cited as sources by the two authors under review here: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City of Lingering Splendour," "Shanghai: City for Sale," "Shanghai: The Paradise of Adventurers,"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Old Shanghai: Gangsters in Paradise."

Neither are Chinese authors immune from this functional reification of the city, as we see from Tao Juyin's "Gudao jianwen: Kangzhan shiqi de Shanghai" (Information from an Isolated Island: Shanghai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For many authors, then, the struggle is to come to grips with Shanghai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same spirit, we might say that a colorful

metaphor provides them with the key.

The two monographs examined here fit the pattern. Dr. Betty Peh-t'i Wei, in "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presents a broad history of the city for the general reader. Harriet Sergeant has written "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1918-1939", an impressionistic study of what she sees as the city's life and death.

Paired, the two books under review offer a modest glimpse of Shanghai from divergent vantage points. Dr. Wei is a scholar who chose the difficult task of synthesizing a constantly expanding body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Shanghai into a popular history. Ms. Sergeant is a non-academic writer who has contributed to numerous popular, serious publications. Within limits, some self-imposed and some reflected in their respective approaches, both authors succeed in conveying many of the complexities of Republican Shanghai.

* * * *

For her study, Betty Peh-t'i Wei draws from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Her bibliography lists a section titled "Sourc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but virtually all the monographs, articles, or collected works in the section appear to be in Chines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entry "Shang-hai yen-chiu," which despite its title is described as "a journal and other articles in Japanese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Shanghai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1942.

Wei has done a prodigious amount of culling from the literature. In her Foreword, she acknowledges her debt to and reliance on a number of Western scholars who have done seminal work on the city (Backus, Bergere, Coble, Elvin, Murphey, and Pepper). Since this is a book for the general reader, she has foregone footnotes, which makes it rather difficult to establish the extent of, or assess, her own research contribution.

The book contains a number of small errors, annoying but perhaps inevitable when trying to condense from a large body of primary and especially secondary materials. Professor E. Perry Link is, in con-

temporary parlance, "pluralized" into Links; Li Ta-chao appears in both text and glossary as Li Ta-chou. Liu Shao-ch'i is said to have gone to Moscow in 1921 as the correspondent of *Shen-pao*, which of course was one of the foremost purveyors in China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Presumably the gloss for "Morning Post" should be *Ch'en-pao*.

In addition, I do not think it is fair to say, as the author does, that "From the outburst of patriotism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hinese nationalism was born" (214). On the contrary, from the debates and actions of the late 1910s, nationalism was revived, and took on a more complex set of ideologies, and evolved as a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force. But Wei's analysis underplays nationalist—as contrasted with patriotic—issues and efforts which extend back at least to the Opium Wars and which re-emerged in various form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Overall, though, this is a useful if conventional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I propose here simply to review a few issues raised by Wei's approach.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s are particularly valuable since they trace the pre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help dispel the popularly held notion that Shanghai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hamlet on the Whangpoo alluvial plain before the 19th century. As Wei points out, Shanghai developed into a trade entrepot of some importance in the Southern Sung, in part due to the shift from inland to coastal transport of tribute grain.

Likewise, her presenta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into a major commercial center carries considerable detail, especially given the presumed non-scholarly audience. The discussions of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merchants and officials, and the struggles among the foreigners to solidify authority over land and the people, are balanced and informative.

Here, for example, is her reading of some of the motives underlying American and British debates over the Land Regulations of 1854,

and the extent of foreign consular power:

“With reasons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resounding in his mind, (American Commissioner Humphrey) Marshall rejected the idea of giving consuls, representatives of ‘king and parliament,’ any control in Shanghai. In this respect, he had the support of foreign traders of all nationalities. Powers allotted to the consuls, as a result, were curtailed. However, having a voice in government was consistent with contemporary American thinking, which was still equating taxation with representation. As a result, taxpayers and ratepayers in Shanghai gained legislative as well as executive powers” (71).

Wei leavens her rather prosaic writing style with tinges of irony. She notes, for example, that Commissioner Marshall rebuffed Alcock’s efforts to segregate Chinese from foreign residents in the Settlement: “He (Marshall) professed a distaste for racial segregation as it would ‘invariably result in racial prejudice’.”

Pointing out that Marshall was a Southern gentryman and member of the Confederate Congress, Wei adds: “It was interesting, not to say astonishing, that with his background that condoned slavery, Marshall would espouse such a view. . . His pronouncement against racial segregation in Shanghai must be interpreted as an expression of opposition to British policy rather than as a statement of moral principle. . .”

Wei, unlike many popular history writers, places her previous statements in context and offers reasonable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for events or processes. Here, she notes that American landlords benefitted “from renting tenement housing” to Chinese refugees from the Taipings. “Removing the Chinese to their own sector or outside the Settlement altogether would mean considerable loss of rental income to landlords, who enjoyed access to Commissioner Marshall” (72). This seems a plausible interpretation.

Less convincing is Wei’s treatment of the persistent, and problematic, issue of whether Shanghai was “Chinese” or “Western.” This question

is intended to be central to the book. The paperback edition's jacket notes, "The uniqueness of Shanghai lies in the fact that, although it was the presence of foreigners that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ity's development, it was a Chinese metropolis which retained its predominantly Chinese character" (emphases original).

Wei is less absolutist than the writer of the jacket copy, but is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 In her Introduction, she says:

"...there has been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that Shanghai was essentially a foreign creation. It is true that, initially, foreign rule provided the conditions for development but,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uniqueness of Shanghai was its predominantly Chinese character. No history of Shanghai, therefore, can be complete withou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Chinese as well as the foreign residents"(2).

I agree completely with the final sentence. As to the previous question, the point is, which Shanghai are we talking about, and when? As I have noted, Wei performs a considerable service in tracing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But it seems to me moot, and perhaps fatuous, to insist on trying to establish whether Shanghai was a (mostly) "Chinese" or (mostly) "Western" city. What is meant by those terms, anyway?

The fact that Fairbank's paradigm of a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West has been long superseded does not mean it has lost all value. Wei herself acknowledges this indirectly, titling one chapter "The Chinese Adjust to Living Among Foreigners." She might just as well have written another called "The Foreigners Adjust to Living Among Chinese." Many foreigners lived outside the Concessions; all foreigners had some dealings with Chinese. The existence of the comprador system, and later the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unicipal Council, suggest that foreigners had to deal with Chinese on compromise terms, rather than by pure economic hegemony. The foreigners stacked the deck,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in their favor, but

they were not hermetically sealed into their villas (especially those who did not live in villas), nor was their intercourse with Chinese static.

At the same time, a responsible historian cannot gloss over the preponderantly Chinese communities or sectors of Shanghai society to focus solely on the foreigners, and Wei does not. Sergeant, who is not a professional historian, often does, as will be discussed below.

The complexities of Shanghai's social history, then, cannot be reduced to simplistic notions of unilateral dominance or predominance. The interchange was fluid and variable; the city had both Chinese and non-Chinese components.

This is not to suggest that Chinese and foreigners understood each other well, or mixed freely. The issue really depends on which people or groups are being examined. I suspect the hybridization of cultures that evolved in the Twenties on many interacting planes—intellectual, social, popular culture—helped boost understanding in those sectors where it occurred. Hybridization may also have produced, as some scholars have noted, isolation and alienation of those whom it embraced, or who embraced it.

Wei is right to refuse to look at Shanghai from a single angle, and deserves applause for trying to counter popular, and perhaps scholarly, perceptions of the city as a foreign creation. But her book is filled, even dominated, by discus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Surely the nature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se relationships, and not the theoretical concern over an ill-defined issue of "predominance", are the more valuable focus of study.

*

*

Harriet Sergeant is a romantic, and as such personifies many of the Old China Hands who inhabit her city and book. Where she differs from many of her informants is in her fine appreciation of the ironies of Shanghai life and in her sentimentality. What she offers the readers is a would-be memoir, a tale of nostalgia which must, in her absence, be told by others. She would rather have told it herself.

But she first went to China "jus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so was forced to rely on a set of informants who are ageing. They are diverse, within limits. They are primarily but not exclusively expatriates, forced by economic or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nto exile. Under Sergeant's skillful questioning, they recall their own Shanghais, revived for an instant in bursts of vivid imagery, like the sunlit touchstones of our childhood. The one country he would truly like to return to, says Lord Bangor, "would be China. China as it was during the three years I spent there between 1933 and 1936... Always assuming it was still the way I remember it."

Therein lie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book. The memories of many informants are sharp, so crystallized around an incident or a way of life that they must have been reinforced through many retellings. Sergeant herself is aware of this. The book presents a series of vignettes and anecdotes which she arranges deftly in a sweeping narrative which flows from Life to Death of a city. The effect is cinematographic; it reveals a flurry of pinpointed framed images which, taken together, present a coherent if skewed vision of the city.

One difference between cinema and history as a narrative form is that history requires a sharper awareness and admission of one's own bias and a more critical use of data. Sergeant surely would acknowledge her bias toward the expatriates as informants, and she deserves commendation for attempting to probe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retro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the book has an auteur quality which seems less appropriate to a popular social history. What we really see a great deal of is the author, in her guise (she might say disguise) as cultural raconteur. She appears frequently, popping up at British country houses, prowling through Lord Kadoorie's Shanghai villa, Marble Hall, now the Children's Palace for gifted youths, peering down the alleys of the Old Chinese City, dining at the Hong Kong Governor's mansion.

As auteur, Sergeant suffers from an excess of Orientalism. She

turns both the expatriat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to exotic objects: "The Baron (Rothschild) was enchanted by the Chinese women—like exotic birds in their jewels and silks"(132). Foreigners, especially White Russians, receive similar treatment:

"(Princess Lyuba of High Wycombe) opened a dress salon... Helpful friends now filled Lyuba's life. She hung a huge mirror studded with pearls against the black velvet and a cut-glass ball from the ceiling. The theatricality of the decor and the youthfulness of its owner must have caught Shanghai's imagination. She (the Princess) assured me that 'everybody' came to the opening night"(56-57).

If she is often caught up by the recreated glamor, Sergeant is also sophisticated enough to probe beneath the surface. She writes sympathetically of the Chinese world which she can only approach tangentially:

"Only the desperate pulled rickshaws. It cost the rickshaw man one dollar to hire a rickshaw for twenty-four hours. Two men usually shared the vehicle in two shifts of twelve hours. On average they earned about sixty or seventy cents a shift. At the end of the time the puller often found himself without enough money to pay the contractor and eat. At the depot the contractors beat the money out of the reluctant puller, accusing him of hiding the coins in his clothes"(213).

Like Wei, Sergeant is capable of contextualizing. She notes that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missions to help rickshaw pullers, such charity

"camouflaged the real cause of the rickshaw men's distress; the high cost of renting a rickshaw. Every year the Municipal Council distributed ten thousand rickshaw licences to a monopoly group of rickshaw owners, many of whom were foreign. The registration plate cost five dollars. They were then sold and resold for up to five hundred dollars each. Even at that price

contractors made 'huge profits'..."(213).

On the level of personal essay, this bird's-eye technique works rather well, since it is wielded by a skillful writer. Sergeant's presence links various sections of the book, chronology, and narrative; it allows the connection of diverse elements. At a more theoretical plane, however, her authorial presence impedes because it is directly linked to her underlying construction of a romanticized Shanghai which is born, flourishes, and dies. The metaphor is flawed: what died was not Shanghai but certain imagined visions of Shanghai.

Since Sergeant was not there during the period she is reporting, she must turn to the verbalized memories of her informants.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personal memories are less reliable than written records. Both should be suspect, by both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historians. Because Sergeant wants to recreate a "lost" Shanghai, she seeks out primarily the informants who are 1) most accessible, and 2) most likely to share her romantic nostalgia. These are the expats.

What is missing from her expats, now drinking sherry and puttering in their gardens back Home (her capitalization), is a sen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city. What this seems to reflect, more times than not, is the relative homogeneity of the elite experience, and the shallowness of its residents. Such expats moved in a narrowly bounded world of their own making.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look at the foreign communities in toto, we see vast differences among their foreign inhabitants. The only thing a White Russian prostitute was likely to share with an middle-class Britisher was a bed, and maybe a sense of alienation. But there is little indication overall from Sergeant's upper-crust informants that even retrospectively, they understood much about the city, as opposed to the world, in which they lived.

This is probably one generalization that can be applied in reverse: many Chinese, whether living in the concessions or not, probably knew little of the nature of foreign life, beyond the contact of

proximity. The Twenties brought more and more access to foreign cultural visions and values.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 expanded, people traveled more, the print, broadcast, and film media carried sharper images of abroad. Perhaps it was not until the mid-Thirties, though, when there was greater socializing and mixing of the Chinese and the foreigners, as Sergeant points out, that there was much more chance for understanding.

In the end, Sergeant's portrait of the Chinese sectors of Shanghai relies on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ources. Regardles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author's intention, the effect is strongly one of a foreign observer peeping excitedly into a Chinese window.

In fairness, as an American stud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I want to raise a question: how many of us are or should be really immune from the impulse to do as Sergeant does, to revel in the unusual, to delight in the different? She at least provides a valuable sense of something—not of a “Chinese” or “Western” Shanghai, but of a re-conjured city as remembered by those foreigners who loved and hated it. Her imagined city lives, its residents, Chinese and foreign, seem real, if sometimes incredible. As scholars, we may strive to describe, analyze, and interpret without exoticization. But for those of us who grew up without immersion in one of the many Chines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how much of our delightful obsession with matters Chinese depends on a subtle romanticization? For me at least, it is an acceptable motivation: China deserves study because it is both familiar and different. How many of us would study Shanghai, if it looked like Phoenix?

□UC-Berkeley · David Fraser□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0年8月~1992年8月)

游 鑑 明* 輯

(1990) 8.1 由南開大學主辦的第2屆「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該校舉行，與會中外學者計有80餘名，提交論文約70篇，會期歷時4天（至8.4）結束。會中主要討論6項議題，茲如下述：(1)抗日根據地的開闢與形成問題；(2)毛澤東思想發展與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問題；(3)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問題；(4)抗日根據地的軍事鬭爭問題；(5)抗日根據地的政治結構與政權體制問題；(6)三、四十年代華北農村社會生活與秘密會社問題。

10.23 中國社會史第3次研討會在成都召開，來自各地之學者共計有130餘人，提交論文計80餘篇，該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國社會史研究與社會現實」，其中與近代中國史研究有關之論文計12篇，茲列如下：(1)唐力行：〈論徽商與明清徽州社會的家庭宗族結構〉；(2)王奇生：〈民國時期離婚問題初探〉；(3)王笛：〈清代縣府結構與知縣任職規律〉；(4)楊明：〈清朝禁賭議〉；(5)嚴昌洪：〈淺談近代的「三鳥」之害〉；(6)趙榮光：〈青樓與明清社會飲食文化〉；(7)沈傳經：〈論近代西北地區的哥老會〉；(8)楊天宏：〈義和團「神術」研究〉；(9)潘平：〈民國社會的一個側面——民國土匪研究〉；(10)李天綱：〈青紅幫與上海社會〉；(11)林正根：〈明清社會與土風〉；(12)徐永志：〈近代不纏足啟蒙思潮及其運動〉。會議歷時4天（至10.26）結束。

12.26 江西省社聯、江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贛州地區社聯與瑞金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縣社聯等聯合舉辦的「陳熾與戊戌維新運動研討會」，在陳熾的故鄉瑞金召開，會期3天，主要議題如下4項：(1)陳熾的政治改革思想；(2)陳熾的經濟改革思想；(3)陳熾與戊戌維新運動；(4)陳熾的階級屬性。

12.27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主辦、國史館、教育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世華聯合商業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協辦之第2屆「國際華學研究會議」，假臺北市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行，與會學者近百人。該會議的主題是：「中國人文科學研究（哲學、文學、史學）」，發表論文計37篇，與中國近代史有關之論文如下：(1)李紀祥：〈清初浙東劉門的分化及劉學的解釋之爭〉；(2)杜維運：〈萬斯同之史學〉；(3)王家儉：〈魏默深的史學〉；(4)陳三井：〈華法教育會的成立及其活動〉；(5)李雲漢：〈中國國民黨遷臺前後的改造與創新（1949~1952）〉；(6)李弘祺：〈高一志和他的「修身西學」〉；(7)王綱領：〈英美兩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回應〉；(8)陳重光：〈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及其鄉村實驗工作〉；(9)張壽安：〈『皇朝經世文編』禮政部分思想研究〉；(10)陳捷先：〈清世宗儲位密建法略論〉。會期共計3天（至12.29）。

(1991) 5.23 貴州師範大學等十個單位聯合主辦的「全國首屆比較史學學術討論會」，假貴州大學舉行，大陸各地專家學者約有48人與會，提交論文30篇，其中與近代中國史相關者7篇，分列如下：(1)周松柏：〈近代歷史比較研究法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的運用〉；(2)陳欽若：〈中國明末清初倫理觀與新教倫理之比較研究〉；(3)涂鳴臬：〈清末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及辛亥革命之比較論綱〉；(4)許序雅：〈傳教士對中西封建社會歷史進程的影響〉；(5)林懷亮：〈中日近代史問題比較之我見〉；(6)朱偉奇：〈德國1525年農民戰爭與明末農民戰爭綱領比較〉；(7)陳奇：〈會通中西、融鑄新學——評劉師培的「六經皆史觀」〉。會議歷時5天（至5.27）結束。

8.4 「蔣渭水先生逝世六十週年紀念暨臺灣史學術研討會」。假高雄縣政府會議室舉行，相關論文如下：(1)簡炯仁：〈日本帝國殖民統治與臺灣人〉；(2)張炎憲：〈1920年代的蔣渭水〉；(3)陳永興：〈臺灣抗日運動中醫生的角色〉；(4)吳密察：〈矢內原忠雄與蔡培火〉；(5)李篤恭：〈臺灣文化協會〉。

8.19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聯合主辦「一九九一年國際清史討論會」，在四川省崇慶縣召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日本與南韓的學者專家

計有 100 多位與會，會議宣讀論文計 70 餘篇，主要就清代邊疆史問題進行討論。

10.8 廣東華僑歷史學會在廣州市慶祝成立十周年並召開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就 4 項問題進行討論；(1)關於東南亞華人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未來趨向；(2)關於海外華文教育前景；(3)關於海外華僑華人文化心態和海外聯誼工作問題；(4)關於如何加強華僑華人問題的學術研究。

10.9 湖南省政協等 11 個單位聯合發起的「辛亥革命 80 周年全國青年學術討論會」於湖南師範大學舉行，與會者為來自中國大陸的近百名青年學者，提交論文計 81 篇。會議就「從清末社會看辛亥革命的成因」和「從民初社會看辛亥革命的結局」兩個題目展開討論。會期歷時 4 天（10.12）結束。

10.24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等 9 個單位聯合召開第 3 屆「國共兩黨關係史學術討論會」，假南京師範大學舉辦。會議歷時 3 天（至 10.26），與會學者專家計百餘人，提交論文 90 餘篇。會議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進行討論，並分為 3 項議題：(1)1922~1935 年的國共合作；(2)1936~1949 年的國共關係；(3)1949 年以後的國共關係。

10.29 中國大陸首屆「中國國民黨史學術討論會」，假上海師範大學舉行，會期 5 天（至 11.2）。與會專家學者共計 70 多位，提交論文 60 餘篇。會議之主要議題，有如下 4 項：(1)關於國民黨的性質；(2)關於辛亥革命與同盟會的幾個問題；(3)關於國民黨在大陸各個歷史時期的作用；(4)關於國民黨退臺後的歷史研究。

11.13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等 10 個單位聯合發起的「太平天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廣東茂名舉行，來自中外 160 多名專家學者與會，發表論文計有 110 多篇，大會歷時 4 天（至 11.6）結束，分別就凌十八起義、太平天國與中國近代化的關係、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客家人與太平天國革命的關係、太平天國時期的各地各族人民起義、太平天國歷史人物與海外及臺灣學者的有關論述等問題進行討論。

12.5 香港中文大學主辦、袁汝南堂宗親總會及泰國袁氏宗親總會贊助之「明末清初華南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在香港舉行，與會中外學者共計 30 餘人，提交論文 26 篇，該會議係以袁崇煥為主題，主要議題有 3 項：(1)對袁崇煥軍事韜略的評價；(2)袁氏籍貫的考辨；(3)袁氏在天啟人際關係的剖析。

12.6 湖北省經濟史學會假中南財經大學召開年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

「洋務運動與湖北經濟」。

(1992) 2.3 第23屆「中國：國家與社會研討會」，假莫斯科東方研究所連續舉行3天(至2.5)，會中宣讀20多篇報告，開幕前並出版兩本報告集，收錄80篇提要與論文，其中與中國近代史有關者，約計有27篇。

2.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沈松僑先生報告：「地方精英與國家權力——民國時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

2.23 香港珠海學院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爾敏先生演講，其講題是：「鴉片戰爭史實觀點之回顧與檢討」。

2.26 由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籌備召集之「文化、宗教與中國經濟發展」會議，在柏克萊舉行，議程三天(至2.28)結束，所提論文共計14篇，與會學者近30人。(詳情請參見本期學術會議)

2.27 美國華人歷史學會董事麥禮謙(Him Mark Lai)先生應臺灣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作專題報告：「十九世紀以來美國華人社會的發展」。

3.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美國俄亥俄州 Wright 州立大學歷史系袁清教授演講：「歐美對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趨勢」。

3.2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召開「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歷史社會學的探討」之小型專題研討會，假該所會議室舉行，與會學者約計70人，相關論文如下：(1)張維安、韓格里：〈傳統中國棉手工業的轉型〉；(2)文崇一：〈民營工業與中國早期的工業化〉。

3.29 臺灣史研究會主辦、李友邦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紀念籌備會協辦之「李友邦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於師大綜合大樓五樓會議中心舉行，邀請臺灣與中國大陸8位學者專家宣讀論文，報告人與報告題目如下：(1)戴國輝：〈李友邦與他的時代〉；(2)陳小冲：〈臺灣少年團述論〉；(3)陳映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性質論〉；(4)林真：〈臺灣義勇隊的籌組及在福建的活動〉；(5)尹章義：〈臺灣義勇隊與朝鮮義勇隊〉；(6)樓子秀：〈李友邦及義勇隊在浙江的抗戰活動〉；(7)王曉波：〈日據時期的臺灣抗日運動與獨立運動——論李友邦與臺灣獨立革命黨〉；(8)鄭梓：〈李友邦與光復初期「半山」之宦海浮沈〉。

3月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部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永發先生於11~15日前往訪問，並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紅太陽下的罌粟

花：延安模式和鴉片貿易」。

4.2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第 44 屆年會，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會期 4 天（至 4.5），其中與近代中國史有關之議題如下：(1) Radical Legacies within the Guomindang during the 1920's; (2) Role of the Family in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3)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y, 1885-1935; (4) Military Capacity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5) Elite Perceptions of the Peasants in 20TH-Century China; (6) Qing Literati; (7) Individual Papers: New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8) Discipline and Restrictions: The "Body" Politics of women, from Late Imperial to Republican China; (9) Society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Qing Sichuan。

4.7 第 3 屆「中國歷史文獻及中國史學研討會」假俄羅斯彼得堡大學東方系舉行，會議歷時三天（至 4.9），發表論文的漢學家有 20 多人，其中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論文如下：(1) V. Kolotov：〈越南南方歷史學家論孫中山的三民主義〉；(2) E. Chernykh：〈中國大陸歷史學家論中國蘇維埃區解決農業問題的看法〉；(3) B. Novikov：〈明清兩朝民間宗教教派歷史一種新的概念〉；(4) M. Chigrinskij：〈俄羅斯外交部檔案中的關於日俄戰爭時期臺灣起義的計畫之文件〉；(5) A. Khokhlov：〈沙皇俄國駐中國之領事情報(培養翻譯員的問題)〉；(6) A. Popov：〈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立歷史第一檔案館藏的關於 18~19 世紀蒙古上的清朝行政機構的資料〉；(7) N. Koroleva：〈Changshu 的 He Wuch'i 筆記中的關於太平天國之資料〉；(8) A. Ipatova：〈有關二十世紀時期的北京東正教館的新資料〉；(9) A. Pancov：〈據俄國及美國檔案藏的資料談中國「左」反對派的形成〉；(10) N. Novgorodskaja：〈清朝歷史家著作中的俄國形象〉。

4.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玉法先生應臺灣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作專題演講，講題是：「近年大陸學者對民國史的研究（1950~1992）」。

4.23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舉辦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梁其姿小姐發表演講，講題是：「『貧窮』與『窮人』觀念在中國俗世社會中的歷史演變」。

4.27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國立中正大學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教育部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聯合召開的「第一

屆臺灣經驗研討會」，假國立中正大學行政大樓會議室舉行，計有 14 名學者發表 18 篇論文，相關論文臚列於下：(1)溫振華：〈清代土牛界外的土地開墾——以東勢地區為例〉、〈日據時代高雄地區的人口流動〉；(2)柯志明：〈日據時期「米糖相剋」問題與臺灣農民〉；(3)林滿紅：〈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的商業關係〉；(4)古偉瀛：〈近百年來嘉南平原的水災：一個初步的量化分析（1890~1990）〉、〈嘉南大圳近七十年來的員工人事變遷（1920~1990）〉；(5)李豐楙：〈臺灣中部「客仔師」與客家移民社會——一個宗教、民俗史的考察〉；(6)康豹 (Paul Katz)：「光復後王爺信仰的演變——以東港東隆宮及臺北三王府為例」；(7)戴寶村：〈高雄港的建設與發展〉；(8)黃俊傑：〈黃金川的情感世界與現實關懷——以「金川詩草」為中心〉、〈戰後臺灣的儒家思想：特徵、研究方法及其傳播〉。

4.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湯志鈞教授演講，講題是「論章太炎的歷史地位」。

3~4 月 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康無為 (Prof. Harold Kahn) 先生於 3 月 20 日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研究一個月，並發表一系列之學術演講，其日期及講題分別如下：(1)4.2：「清代大眾文化與點石齋畫報」；(2)4.9：「當代美國三大史家的中國觀：P. Kuhn、F. Wakeman、J. Spence」；(3)4.17：「帝王品位：乾隆朝的宏偉氣象與異國奇珍」。

3~4 月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當代中國研究暨資料中心邀請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Sherman Cochran 先生，舉行一系列演講，日期及講題分別如下：(1)3.27：“Three Kinds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Part one: Chinese Businesses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China, 1880-1937;” (2)4.9：“Three Kinds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Part two: Western and Japanese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China, 1880-1937;” (3)4.16：“Foreign Commercial Penetration into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The Effects of Mass Advertising Before 1915.”

5.1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劉素芬女士報告：「近代渤海灣地區海運之研究」。

5.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杜德橋 (Glen Dudbridge) 先生演講：“The Problem of Gathering Historical Knowledge from Chinese Fiction”。

5.9 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美國黃興基金會、國史館及太平洋

文化基金會及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等單位聯合主辦之「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假政治大學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舉行。來自臺灣、中國大陸、日本和美國等地學者約百餘人與會，發表論文21篇，會期歷時2天（至5.10）結束。（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5.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研究座談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尙明軒與湖南師範大學文史研究所所長韋傑廷等主講。

5.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張瑞德先生報告：「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

5.15 俄國科學院遠東分院研究員鐵卡欽柯（Guennady I. Tkachenko）先生，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支持下，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研究一年，其研究題目為“Soviet influence in Manchuria (1917-1935).”

5.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約聘助研究員葉其忠先生報告，題目是：「生活與理想：張東蓀之『淑世主智主義』的人生觀」。

5.29 第35屆韓國「全國歷史學大會」，假韓國科學技術院舉行，並以「科學技術與歷史發展」為主題進行發表會，與中國近代史有關之論文如下：(1)吳金成：〈中國近世的社會變化和農業〉；(2)張貞蘭：〈楊光先的基督教批評〉；(3)朴基水：〈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夜廣西地方的社會、經濟狀況〉；(4)任聖模：〈滿洲國協和會的對民支配政策的實態〉。該會歷時2天（至5.30）結束。

5.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所長趙岡先生演講，講題是「清中葉糧食畝產量的變動」。

6.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般近代史組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兼亞洲研究學報（*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總編輯包德威（David D. Buck）先生演講，講題是：“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6.4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舉行學術研討會，由該所副研究員張炎憲先生發表演講，講題是：「歷史文獻上的竹塹社」。

6.12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臺灣光復初期歷史學

術研討會」，假該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第一會議室舉行。會期 2 天（至 6.13）。計發表論文 12 篇，分別如下：(1)黃俊傑：〈光復初期土地改革後自耕農保護問題之分析〉；(2)謝國興：〈由商而工：光復初期臺南幫的蛻變〉；(3)吳乃德、陳明通：〈政權轉移和精英流動：臺灣地方政治精英的歷史形成〉；(4)陳明通：〈派系政治與陳儀治臺論〉，(5)陳純瑩：〈光復後臺灣警政的接收與重建（1945~1946）〉；(6)游鑑明：〈日據時期培養臺籍女教師的搖籃——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1897~1945年）〉；(7)朱泓源：〈臺灣黃埔的搖籃——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950）〉；(8)查時傑：〈光復初期臺灣長老會的幾個家族〉；(9)顏清梅、古鴻廷：〈光復初期糧荒問題初探〉；(10)黃富三：〈「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二二八事件〉；(11)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衝突現象——以嘉義「三二事件」為例〉；(12)吳文星：〈「二二八事件」期間國民政府的因應與決策之探討〉。

6.1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該所副研究員顏娟英小姐報告：「殿堂中的美術——臺灣現代美術的萌芽（1920~30）」。

6.18 第十八屆「美國對外關係歷史家學會」(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年會，假 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 Institute 和 Vassar College 舉行，其中與近代中國史有關之講者及講題分別如下：(1)Judith Fay Kornberg,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licy Output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2)Hongshan Li, "The Boxer Indemnity Remiss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American Cultural Policy;" (3)T. Christopher Jespersen, Henry Luce,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Personality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World War Two;" (4)Patricia Neils, "The Impact of Henry Luce on America's Cold War in China;" (5)Yi Sun, "The 'Triangular Deal':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Morgenthau's Chinaaid Plan during World War II;" (6)Ren Donglai, "American Aid and the Sino-US Alliance against Japan, 1938-1945;" (7)Sayuri Shimizu, "A Bothersome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Problem of Trade with Communist China, 1952-1958;" (8)Candace Falk, "Emma Goldman's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the 1920s."

6.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該所訪問學人、美國俄亥俄州 Denison 大學教授秦伯理 (Barry Keenan) 先生報告：「清末長江下游地區教育的轉型與演變」。

6.25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舉辦學術研討會，由該所訪問學人、德國漢堡大學漢學系博士候選人魏君德 (Guenter Whittome) 先生演講，講題是：「臺灣戰後初期之史料探討」。

6.26 由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日本筑波大學歷史、人類學系和愛知學院大學文學研究科聯合召開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假淡江大學淡水校本部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中正紀念堂舉行，分甲乙兩組討論，會期 2 天 (至 6.27) 結束，計有 23 位中外學者發表論文。(詳情請參見本期學術會議)

6.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教授陳在正先生與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楊國楨先生演講，其二人講題分別是：「評中日北京專條」、「林則徐研究的幾個問題」。

7.1 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海外學術機構展開兩項共同合作的研究計畫，一是「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1992年7月至1995年6月)，另一是「菲律賓華人史料基礎調查與蒐集計畫」(1992年7月至1994年6月)。(詳情請參見本期研究概況)

7.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助理游鑑明小姐報告：「日據時期的臺灣女教師——以公學校為例」。

7.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暑期史料專題研討會，邀請該院院士全漢昇先生演講，講題是：「略談近代早期中菲美貿易史料《菲律賓羣島》——以美洲白銀與中國絲綢貿易為例子」。

7.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玉法先生當選為該院第 19 屆人文組院士。

7.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演講，邀請該院院士、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歷史系教授劉廣京先生演講，講題是：「知識份子與晚清變法」。

7.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存武及朱宏源兩位先生因執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之「菲律賓華人史料基礎調查與蒐集計畫」，於 7 月 12 至 25 日前往菲律賓國史館訪問研究兩週。

7.15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及蔣經國國

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贊助之「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臺灣大學理學院思亮館舉行，會期歷時3天（至7.17）。與會學者專家來自臺灣、美國與日本等地，宣讀論文18篇。（詳情請參見本期學術會議）

7.22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舉辦學術研討會，由夏威夷大學歷史系教授 Harry Lamley 先生演講，其講題：“The Chinese of Hawaii: Their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1789-1988.”

7.2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舉行研討會，邀請該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朱德蘭小姐演講，講題是：「日據時期臺灣批發店的若干考察——以泰益號關係資料為中心」。

7月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人類學系教授史堅雅（G. William Skinner）先生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至該所訪問一個月，並於該院舉行一系列演講，其日期、講題及演講地點分列如下：(1)7.20: “Family System and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among Premodern Japanese Villagers.”（民族學研究所）(2)7.23: “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 Three Contrasting Cases;”（近代史研究所）(3)7.30: “Analyzing the Regional-Systems Hierarchy: China in the 1980s.”（近代史研究所）

8.6 國史館主辦的「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假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與會學者計有百餘名，提交論文28篇，會期歷時3天（至8.8）結束。（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8.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李健民先生報告：「嘉慶元年川楚白蓮教起事原因的探討」。

8.19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舉行研討會，邀請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前所長暨教授蔡明哲先生演講，講題是：「臺灣近代社會史的研究法問題」。

8.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舉辦學術討論會，邀請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金丸裕一先生演講：「明治初年日本之中國情報——以《橫濱新報》為例」。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

游鑑明* 輯

一九九〇年出版

上海絲綢進出口公司等編 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八月 四〇〇頁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 清史研究集（第七輯）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
社 十月 三七七頁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 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
（第六冊） 北京 人民大學出版社 三月 五一頁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
社 三月 四八〇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沙俄侵華史（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四月 五三一頁

天津租界檔案選編 天津 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王元年等編 東北解放戰爭鋤奸剿匪史 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三月
四四九頁

王天獎等編 河南近代大事記：1840~1949年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九
月 五〇九頁

朱日耀主編 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 吉林大學出版社 五月 三七七頁
朱建華 中國近代政黨史 吉林大學出版社

李允經 魯迅的婚姻與家庭 北京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二四六頁

李龍牧 五四時期思想史論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八月 四五〇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 李春輝、楊生茂主編 美洲華僑史 北京 東方出版社 六月 七五三頁
- 孫少華主編 中國革命史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七月 三二四頁
- 馬懷忠主編 中國現代文化史 吉林大學出版社 十一月 三〇八頁
- 陳國屏 清門考源 上海 文藝出版社 七月 三八〇頁
- 鄭洸主編 中國青年運動六十年(1919~1979) 青年出版社 十二月 七〇四頁
- 魏永理 中國近代經濟史綱(下卷) 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六七六頁
- 謝天佑 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六月 一六四頁
- 伊藤一彥等編 現代中國研究案內 東京 岩波書店
- 阿部洋 中國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 東京 福村出版 八月 二四四頁
- 森田明 清代水利社會史の研究 東京 圖書刊行會
- 路遙·佐佐木衛編 中國の家·村·神神——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論 東方書店 十二月 二〇三頁
- Choa, G. H., *Heal the Sick' was Their Motto: the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55 pp.
- Kipman, Jonathan N. and Harrell, Steven eds.,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59 pp.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89 pp.
- Neils, Patrica ed., *United States Attitudes and Policies Toward China: The Impact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New York: M. E. Sharpe, 291 pp.
- Potter, Sukamith Heins and Potter, Jack M.,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8 pp.
- Schaller, Mich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pp.
- Siu, Helen F. ed., *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41 pp.
- Thompson, Roger R. ed., *Mao Zedong: Report from Xunw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78 pp.

一九九一年出版

- 上海市公共交通總公司上海公共汽車工人運動史編寫組編 上海公共汽車工人運動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六月 二三一頁
- 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編寫組編 上海紡織工人運動史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六月 六九一頁
- 上海鐵路工人運動史編寫組編 上海鐵路工人運動史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五月 三一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東北問題(三)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八月 一九一八頁
- 中共上海市寶山區委組織部等編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吳淞區組織史資料：1923~1988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七月 一八三頁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七月 八三六頁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 李大釗研究文集：紀念李大釗誕辰100周年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六月 四〇三頁
-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北京現代革命史資料目錄索引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七月 四七〇頁
- 天津市檔案館編 三口通商大臣致津海關稅務司札文選編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四月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乾隆朝上諭檔(十八冊) 北京 檔案出版社 三月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十四輯) 北京 中華書局 五月 三九六頁
- 王永貞 中國近代軍閥史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四月 二五三頁
- 王秉忠、孫繼英 東北淪陷十四年大事編年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十二月 三二三頁
- 王綱編 清代四川史 成都 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 八月
- 石永言 遵義會議紀實 北京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六月 三六一頁
- 史和等編 中國近代報刊名錄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二月 四五六頁
- 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所編 陳鶴琴全集(第四卷)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三月 一〇三〇頁

- 多杰才旦 大清會典 理藩院事例（漢文版）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十二月
- 全國婦聯婦運室編 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7~1937 北京 中國婦女出版社 四月 五三一頁
- 朱玉湘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六月 四二二頁
- 朱解琳編著 藏族近現代教育史略 西寧 青海人民出版社 九月 三三八頁
- 忻平等編 民國社會大觀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三月 一一一〇頁
- 杜永鎮 辛亥革命時期的華僑 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十二月
- 宋佩華 禁煙先驅林則徐 臺北 雲龍出版社 十一月 二一〇頁
- 吳志淵 西北根據地的歷史地位 湖南出版社 四月 五二二頁
- 林天蔚主編 亞太地方文獻研究論文集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五五六頁
- 林保淳 經世思想與文學經世——明末清初經世文論研究 臺北 文津出版社 十二月 四六八頁
- 林聲 「九·一八」事變圖志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八月 二九〇頁
- 周秋光 熊希齡與慈禧教育事業 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三月 二四九頁
- 金普森主編 浙江企業史研究 杭州 杭州大學出版社 五月 一七九頁
- 李松林 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1894~1990） 合肥 安徽美術出版社 十二月
- 李桂林 中國現代教育史 吉林教育出版社 四月 三二七頁
- 李喜所、凌東夫主編 辛亥革命研究一覽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十月 五二三頁
- 李新主編、蕭超然等編 國民革命的興起：1923~1926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六月 六三三頁
- 東北抗日聯軍鬪爭史編寫組編 東北抗日聯軍鬪爭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二月 五五五頁
-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 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七月 一〇六六頁
- 韋政通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 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九月 四七二頁
- 徐永昌 徐永昌日記（三~十二冊）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十二月

- 南炳文等 清代文化：傳統的總結合中西大支流的發展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十月 二九六頁
- 俞炳坤主編 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一冊）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四月 五四二頁
- 祝啟原等編 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十二月
- 馬越山 「九·一八」事變實錄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八月 三三二頁
- 孫占元 中國近代史通論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三月 五七七頁
- 孫占元主編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七月 三〇九頁
- 陳支平 近五〇〇年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 上海 三聯出版社 四月 一四四頁
- 陳銀崑 清季民教衝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九月 二二七頁
- 陳錫祺主編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三冊 北京 商務印書館 十二月 一九六〇頁
- 陳學恂、田正平編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留學教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七月 六九八頁
- 梁森泰 明清景德鎮市經濟研究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十一月
- 莫世祥 護法運動史 廣西人民出版社 三月 四三六頁
- 曾憲林等 北伐戰爭史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月 三五二頁
- 張研 清代族田與基層社會結構 北京 人民大學出版社 五月 二五六頁
- 張靜如主編、秦千里等著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現代化 長沙 湖南出版社 五月 三六六頁
- 張隆志 族羣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羣史的重建和理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六月 三〇九頁
- 張蘭英、張寶珍 中國革命史 北京 北京出版社 七月 四三九頁
- 彭漪漣 中國近代邏輯思想史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月 二五六頁
- 雲南史學會等輯 雲南辛亥革命史 昆明 雲南大學出版社 十月
- 董孟雄 雲南近代地方經濟史研究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四月 三一頁
- 福建革命史編寫組編 福建革命史（二冊）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三月
- 賈熱村 太平天國時期的地主階級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一月 五五七

頁

- 楊雲素編 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鬭爭史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十二月
- 趙京峰主編 中國革命史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五月 三四二頁
- 齊德學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四月 三七一頁
- 黎惠英 中國現代經濟史 長春 吉林大學出版社 三月
- 樂正 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一月
二六九頁
- 遼寧省檔案館編 「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八月 六八七頁
- 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社會科學院編 「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日本與中國東
北——滿鐵秘檔選編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八月 六四五頁
- 簡炯仁 臺灣民眾黨 臺北 稻鄉出版社 十二月
- 璩鑫圭、唐良炎編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 上海 上海教育
出版社 三月 一〇九八頁
- 譚立剛 紅樓夢社經面面觀 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十二月 五〇〇頁
- 譚譯主編 「九·一八」抗戰史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八月 四三八頁
- 羅爾綱 太平天國史 北京 商務印書館 十二月 二七八八頁
- 竇愛芝 中國民主黨派史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十二月
- 顧明義、張德良等主編 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八月 八二二頁
- 市川信愛 現代南洋華僑の動態分析 福岡 九州大學出版會
- 寺川雄一編 華南經濟圈特集 東京 國際評論社
- 朱建榮 毛澤東の朝鮮戰爭 東京 岩波書店
- Bartlett, Beatrice S.,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09pp.
- Bartlett, Robert M., *The Obstinate Illusion: A Historical Novel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1950*. Portsmouth, NH: Peter E.
Randall, 348pp.
- Chan, Sucheng ed., *Entry Denied: Exclus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
nity in America. 1882-1943*. Philadelphia, Penn.: Temple

- University Press, 286pp.
- Chang, Hsu-Hsin, *All under Heaven: Sun Yat-sen and his Revolutionary Thought*.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53pp.
- Cherrington, Ruth, *China's Student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39pp.
- Dirlik, Arif,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26pp.
- Eastman, Lloyd E., Ch'en, Jerome, Pepper, Suzanne and van Slyke, Lyman P.,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6pp.
-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Selden, Mark and Johnson, Kay An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36pp.
- Grasso, June, Corrin, Jay and Kort, Michael,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London: M. E. Sharpe, Inc. 269pp.
- Henriot, Christian, *Shanghai 1927-1937, Elites Locales et Modernisation dans la Chine Nationaliste*.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342pp.
- James, Reardon-Anderson, *The Study of Change: Chemistry in China 1840-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4pp.
- Joanna Waley-Cohen, *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67pp.
- Kitts, Charles R., *The United States Odyssey in China, 1784-1990*.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91pp.
- Kraus, Richard Curt, *Brushes with Power: Moder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20pp.
- Kraus, Willy,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Revival Between Ideology and Pragmat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46pp.
- Lamb, Alastair,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 1846-1990*. Hertingfordbury, Herts: Roxford Books, 368pp.

- Macchiarola, Frank J. and Oxnam, Robert B. eds., *The China Challenge: American Policies in East Asia*. New York: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sia Society.
- Mackerras, Colin,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7pp.
- Schrecker, John 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40pp.
- So, Wai-Chor,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the Leftist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0pp.
- Storti, Craig, *Incident at Bitter Creek: The Story of the Rock Springs Chinese Massacre*.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3pp.
- Thomas, Gordon, *Chaos under Heaven: the Shocking Story of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Secaucus, NJ: Carol Pub. Group, 336pp.
- Valone, Stephen J., "A Policy Calculated to Benefit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a Arms Embargo, 1919-1929*.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55pp.
- Wassertrom, Jeffrey N.,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i, Betty Peh-T'i, *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9pp.
- White, Gordon ed.,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 The Road to Crisis*. London: M. E. Sharpe.

一九九二年出版

- 人民銀行編 中國清代外債史資料 北京 中國金融出版社 三月
- 丁永隆、孫宅巍合著 南京政府崩潰始末 臺北 巴比倫出版社 一月
-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 清咸同年間名人函札 北京 檔案出版社 五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月 四三〇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東北問題(四)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四月 二五一八頁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六月 一一五〇頁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編 五四運動在江蘇 上海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月
- 王成勉編 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 臺北 國史館 五月 六四〇頁
- 王耿雄 孫中山與上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月
- 王萍訪問，洪慧麗、蔡說麗紀錄 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六月 二三六頁
- 孔令仁等編 中國近代化與洋務運動 濟南 山東大學出版社
- 卞孝萱、唐文權編 辛亥人物碑傳集 北京 團結出版社 二月
- 列強在中國的租界編寫組編 列強在中國的租界 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三月
- 任念祖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臺北 國史館 二月 一一七二頁
- 吳惠齡 北京高等教育史料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四月
- 李平 俞大維傳 臺北 臺灣日報社 元月
- 李孝悌 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月 二三七頁
- 何鳳嬌等編 中國近百年憲政大事年表 臺北 國史館 三月
- 茅仲英 俞慶堂教育論著選 北京 教育科學出版社 四月
- 侯坤宏編 糧政史料（第六冊） 臺北 國史館 一月 五一二頁
- 姜明清編 鐵路史料 臺北 國史館 五月 八〇〇頁
- 孟昭信 明清政治制度述論 吉林大學出版社 四月 八八〇頁
- 孟廣涵主編 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 重慶 重慶人民出版社 二月
- 范小方 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三月
- 房德鄰 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一月 二七一頁
- 南開大學歷史系 冀東日偽政權 北京 檔案出版社 五月
- 馬亞中 中國近代詩歌史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六月 三八四頁
- 馬勇 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月
- 夏東元 洋務運動史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 五月
- 孫尚揚 明末天主教與儒學的交流與衝突 臺北 文津出版社 二月 二五九頁
- 馮玉祥 馮玉祥日記（五冊） 上海 江蘇古籍出版社 五月

- 陳方等編 閩南現代史人物錄 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五月
- 陳立文 宋子文與戰時外交 臺北 國史館 四三七頁
- 陳玲蓉 日據時期神道統治下的臺灣宗教政策 臺北 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四月
- 陳旭麓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五月
- 張玉法 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史(1860~1916) 臺北 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五月 二九八頁
- 章開沅 折斷了的槓桿——清末新政與明治維新比較研究 長沙 湖南人
民出版社 四月 七七〇頁
- 國史館編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第八輯) 臺北 國史館 五二五頁
- 國史館編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二) 臺北 國史館 五月 六四〇頁
- 莊吉發 清史拾遺 臺北 學生書局 三月 三六〇頁
- 郭廷以、王聿均訪問,劉鳳翰紀錄 馬超俊先生訪問紀錄 臺北 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 四月 二二二頁
- 郭緒印 國民黨派系鬭爭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五月
- 張海聲 中國近百年經濟史辭典 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二月
- 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 黃通先生訪問紀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 六月 五一六頁
-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清代刑部奇案例選編 北京 燕山出版社 三月
- 彭軻(Frank N. Pieke)著、莊國士譯 荷蘭華人的社會地位 臺北 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月 二六〇頁
- 齊紅深主編 東北地方教育史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二月
- 楊翠華訪問,楊明哲、萬麗鵬紀錄 阮維周先生訪問紀錄 臺北 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 四月 一四八頁
- 賈秀岩 民國價格史 物價出版社 二月
- 葉桂生 郭沫若的史學生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五月 一一九〇
頁
- 資本主義國家在舊中國發行和流通的貨幣(1845~1949) 北京 文物出版
社 三月
- 蔡泰彬 明代漕河之整治與管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五四一頁
- 廣東文史館編 廣東洪兵起義史料(上册)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五月
- 滕利貴 偽滿經濟 吉林教育出版社 四月 七四〇頁

- 劉健清等主編 中國國民黨史 上海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月
鄭樑生 中日關係史研究論集(二)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一月 一八〇頁
蔣永敬等編 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 臺北 國史館 六月 六一六頁
穆欣 抗日烽火中的中國報業 重慶 重慶出版社 八月
魏秀梅 清代之迴避制度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月 二六三頁
小山正明 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五四六頁
Golany, Gideon, *Chinese Earth-Sheltered Dwellings: Indigenous Lessons for Modern Urban Desig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78pp.
Ogden, Suzanne, *China's Unresolved Issues: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364pp.
Polachek, James M.,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00pp.
Seagrave, Sterling, *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 New York: Knopf, 601pp.
Stephens, Thomas B., *Order and Discipline in China: the Shanghai Mixed Court, 1911-192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59pp.
Vohra, Ranbir.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308pp.
Wang, James C. 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257pp.
Yeang, Yue-man, Hu, Xu-wei ed., *China's Coastal Cities: Catalysts for Moderniz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30p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一期出版

收錄論文 23 篇，728 頁。精 650 元 平 600 元

函購八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讀者來函

編者按：美國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馬若孟 (Ramon H. Myers) 及國立中山大學魏尊三位教授，最近先後來函，對本刊第 13 期 (民國 81 年 3 月出版) 所刊登賴澤涵教授口述 (謝國興博士訪問，陳南之小姐紀錄) 〈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一文，表示不同意見，經本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三井所長，將三位意見送交賴教授，獲賴教授以書面答覆。本刊現將墨子刻等三位教授來函及賴教授所作答覆，一併刊登如後，供各界參考。

墨子刻教授致賴澤涵教授函 (1992年 7 月 31日)

Dear Lai Tse-han:

1. Your remarks about me in the *Newsletter* were insulting to me and ended our friendship.
2. You are ignorant about my role in the writing of the book.
3. You were never the "prime author." Authors were listed alphabetically. Your work was that of a research assistant, and I had the impression you were not very careful. Therefore I obtained the consent of Professor Lin Ming-te to check the manuscript. I understand you refused his help. That is a major reason so many mistakes were made, I believe.
4. You call me "conservative." That is a distortion and an insult. My goal was that the book be as truthful as possible. That is why I asked Lin Ming-te for help. I was very happy he agreed. He knew I was sincere in pursuing objectivity.
5. I believe you lack the intellectual ability to read *A Tragic Beginning* and understand its point of view. The title does not mean 悲劇的開端. It means 悲劇性的揭幕.
6. If anyone was the prime author, it was Ramon H. Myers. Even if data are collected efficiently—and I doubt your work was meticulous—much more is

needed to write a book acceptable 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f one day you are able to write such a book, you will understand this. Moreover, for much of the book, Myers collected the data, not you.

Thomas A. Metzger

cc: Professor Ramon H. Myers

Professor Ch'en San-ching

Professor Hsieh Kuo-hsing

馬若孟教授及魏幕教授致陳三井所長函（未註日期）

Dear Professor Ch'en San-ching:

We are outraged and dismayed about statements by Lai Tse-han describing his role in the research, writing, and publishing of our book *A Tragic Beginning*.

First, we three had agreed that our names would be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and that our work was a cooperative effort in which none of us would claim that he was a key author. Mr. Lai broke this agreement. It should also be pointed out that Mr. Lai's research findings were filled with many errors requiring correction and close checking of source materials he used.

Second, Mr. Wei and Mr. Myers first discussed this project in spring of 1984 before ever meeting with Mr. Lai. After our meeting we asked Mr. Lai to join our team because he had recently written a ph. d. thesis about the KMT party before 1949 and could obtain materials from archives for our project. Mr. Lai had never published any serious scholarly work and was unknown in scholarly circles. Moreover, his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history was far more limited than our own. About one year later, Mr. Lai did provide us with a brief manuscript of 50 pages in Chinese, and we used that evidence to expand our book into a nearly 300 printed page study. Mr. Lai never supplied any real original documents. Mr. Wei and Mr. Myers obtained the most original documents in our study from KMT archives and translated these into English, providing the important facts for chapters 5 and 6 which supported key arguments of our study. Moreover, Mr. Lai never conducted our interviews alone, but most were arranged by Mr. Wei and both scholars conducted these interviews. Mr. Lai simply lies when he claims he conducted most of the interviews.

Third, Mr. Myers and Mr. Wei, including Mr. Metzger, are not members of any conservative scholarly group. We are scholars whose works have been vindicated by history such as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miracles of Taiwan modernization, etc. We deeply resent Mr. Lai calling us conservative and regard his claim as insulting and vicious.

Finally, our study was a long historical essay seeking to present a new but complex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a violent event in Taiwan history which was a tragedy for the people in Taiwan. We knew ou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was not complete, but we hoped that our study would encourage other scholars to confirm or modify our thesis. Our work was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 in which all three authors contributed their research. We strongly resent Mr. Lai trying to take credit for a book in which his contribution was small, but really represented a team effort. We hope he will make a public apology so that this unhappy incident can be dismissed.

Ramon H. Myers
Wei Wou

賴澤涵教授覆馬若孟、墨子刻、魏蕪三教授函（1992年9月9日）

編輯先生：

謝謝貴刊在第十三期（民八十一年三月）刊出謝國興博士訪問本人的文稿，該稿全文架構並非本人所預擬，是在有問必答的情況下完成，稿中（頁九八，一〇四）言及馬若孟、墨子刻和魏蕪等教授為保守派學者，並非本人給他們的論斷，這是「十四天與四十年：臺灣二二八事件之研究」（即後來成書《悲劇的開端》一書最早之名稱），剛着手研究時，被在美國所發行的《世界日報》報導後，海內外報章雜誌，如當時在美國的《中報》（現已停刊）及黨外時期的一些政論性雜誌和私下對「我們」（自然本人也包括在內）的批評，當然這些批評都不是有確切的證據（如根據我們的著作

悲劇的開端：台修三二八事件之研究

本稿係三人合作完成，目前已送美國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審，蓋惟大體乃採分工方式，馬若孟先生介紹日文資料，部作理論架構等部作；魏蕪先生介紹第四章增補，接洽使用中文檔案，取於重要關鍵人物之訪問，本人介紹二二八事件之研究研究起筆，本稿及中外文獻之搜集，增補文獻共修正本稿等工作。

一九八九年七月
馬若孟
墨子刻
魏蕪
謝國興
賴澤涵

讀者來函

），我們對此批評均不以爲然。因爲是口述訪問，所以在稿中沒有註明出處，這可能帶給馬、墨、魏三教授不必要的困擾或誤會，本人對此深感不安與抱歉。

本人參與該書之研究計劃，主要的工作爲負責整體研究，除在臺灣各地搜集資料外，尚到美國各著名大學圖書館、英國大英博物館、國家檔案局等處搜集資料，並在臺灣作人物訪問（魏蕪教授曾介紹並參加訪問過：葉明勳先生、王民寧先生、許金德先生和彭孟緝將軍之副官），然後起草最初之中文稿（該稿本文加上註釋有一五四頁，參考書目二十四頁，合計一七八頁，非如馬教授所言五〇頁），提供部份照片（參見所附三人研究工作分配簽名影本）。在出版階段的修訂過程中，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協助本書校對之林音女士和羅珞珈女士，不時傳真她們在校對該書時所發現的各章節大小疑問及書中引文出處的核對，均由本人解答，對本書如無全盤性的瞭解及資料的掌握，則無法勝任此任務。所以本人在訪問稿中所說容或有有用字遣詞欠精確或欠周延的，亦只是事實的陳述，並無虛構不實之處，更無對三人有貶損或影射之意。至於馬、墨、魏三教授對本書之角色與貢獻，自各有其認知，本人亦尊重其觀點，專此敬頌

編安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

賴澤涵 敬上

八十一、九、九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叢書

- | | | |
|------|---------------------|-------------|
| (33) |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 215頁 |
| | 黃俊傑訪問、紀錄 | 精350元 平300元 |
| (34) | 張法乾先生訪問紀錄 | 122頁 |
| | 張朋園訪問 鄭麗榕紀錄 | 精250元 平200元 |
| (35) | 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 | 172頁 |
| | 郭廷以、沈雲龍訪問 謝文孫、劉鳳翰紀錄 | 精300元 平250元 |
| (36) | 阮維周先生訪問紀錄 | 148頁 |
| | 楊翠華訪問 楊明哲、萬麗鵬紀錄 | 精300元 平250元 |
| (37) | 馬超俊先生訪問紀錄 | 222頁 |
| | 郭廷以、王聿均訪問 劉鳳翰紀錄 | 精300元 平250元 |
| (39) | 黃通先生訪問紀錄 | 516頁 |
| | 陸寶千訪問 鄭麗榕紀錄 | 精450元 平400元 |
| (40) | 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 | 226頁 |
| | 王 萍訪問 洪慧麗、蔡說麗紀錄 | 精350元 平300元 |

函購八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出史料叢刊兩種

(13)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

430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精400元 平350元

民國八十一年二月，中研院近代史所刊布了《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甚受各界注意及肯定，於是有了第二冊之編輯。本選輯共包括三個部分，一為總統府的大溪檔案，一為李翼中的〈帽簷述事〉，一為徐鄂雲的〈看臺灣二二八問題在歷史的天平上〉，都是第一次向外界公開的史料，甚具價值。

(14) 荷蘭華人的社會地位

260頁

彭軻(Frank N. Pieke)著 莊國土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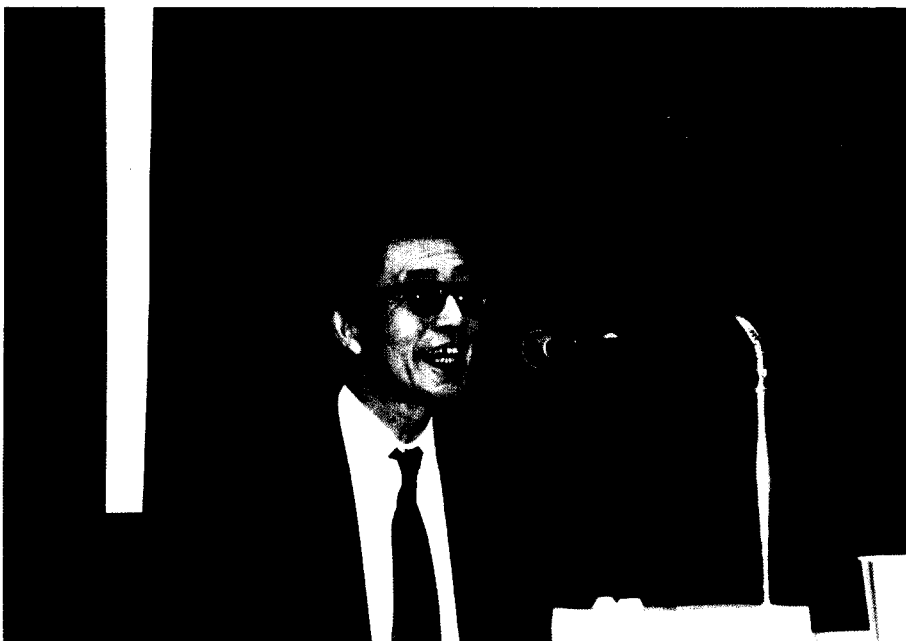
精350元 平300元

本書原係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當代中國資料中心，應荷蘭政府內政部之委託，所作的一項研究調查報告，由彭軻先生總其成。所用的資料大多是檔案、統計，以及田野採訪等第一手材料，係迄今為止關於荷蘭華人現狀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對於瞭解華人移民荷蘭、荷蘭華人的家庭和社會結構等問題，必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函購八折，郵撥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一)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二)本通訊暫定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三)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依本刊格式用有格稿紙騰寫，亦可附寄相關照片。
- (四)來稿請署真實姓名、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五)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如有重大刪改，將商請作者同意。
- (六)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七)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 畢生研究中國經學史的湯志鈞教授（照片由劉鳳翰教授提供）

↓ 以文筆優美細膩著稱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照片取材自
Yale News and Calendar）



本期要目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

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議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

柏克萊「文化、宗教與中國經濟發展」會議

莫斯科「中國民主和人權問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末）」學術座談會

學人簡介——湯志鈞、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從變法維新的觀點看俄國傳統與中國傳統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wer Yangzi Education and the Lower Yangzi Educated Elite, 1895 - 1911

大陸學界關於南京大屠殺問題的研究

胡適佚信六封箋注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五部檔」簡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十一)

新書九本評介

na1 51086

\$100